

国界

■本书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人类文明的起源，已经是振聋发聩了；加之书中纵论古今，横贯中西，把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统而握之，条分缕析，兼收提纲挈领之效，将会给人们以多的启迪，关心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人，应该一读。

申世

■本书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人类文明的起源，已经是振聋发聩了；加之书中纵论古今，横贯中西，把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统而握之，条分缕析，兼收提纲挈领之效，将会给人们以多的启迪，关心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人，应该一读。

从到

——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

CONGZHONGGUODAOASHIJIECONGZHONGGUODAOASHIJIECONGZHONGGUODAOASHIJIE

方宇军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从 中 国 到 世 界

——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

方宇军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方宇军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10

ISBN 7-221-05195-X

I. 从... II. 方...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世界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938 号

从中国到世界

——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

方宇军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65 千字 印刷数:1—2000 册

书号:ISBN 7-221-05195-X/C·73

定价:19.80 元

序

中国人爱说：“历史是面镜子。”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借古喻今，都不外是说以历史为殷鉴。西方人则不然，他们在历史中往往看到的是失败。这有以使然。

西方人对历史的悲观论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当中国人在充栋汗牛的历史典籍中优游取食时，西方人则在以一鳞半爪的文献补缀着西方文明的镶贴画；当中国人在聆听老祖宗的遗训，并同时陶陶然其华美词章时，西方人则在为千方百计收罗来的只言片语而绞尽脑汁。此其一。最使西方人感到恼火的是其二，当西方人为自己一个个文明的衰亡而兴叹时，中国人则以绵亘五千年的文明史而自豪；当西方文明在自身的内乱、外族的入侵、战争的烽烟中相继毁灭时，中华民族却以其精深的文化消融了入侵者的暴戾，弥合了无数的纷争，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然而，当中国人沉迷于中央帝国而志得意满之际，西方的利炮坚船已在紧叩华夏的大门；曾经执拗地要西方使者匍匐称臣的满清皇帝，却阻挡不了英法联军把圆明园付之一炬。接踵而来的割地、赔款、妥协、退让，让中国人倍受欺凌与屈辱。如果说以往异族对中国的入侵是野蛮对文明的征伐，这次则不同，它是以西方新崛起的文明对中华古典文明的挑战。

于是，中华的有识之士又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以西

为师”、“洋为中用”，中国人仍然不忘历史这面镜子。历史是胜利者的，“欧洲中心论”一时成了史学界的定式，远必称希腊、罗马，近必言英吉利、美利坚。这同样也是有以使然，因为上帝把近代文明之光正好照射在西欧这片土地上。

为了抵遏“欧洲中心论”的喧嚣，我们可以让古埃及、两河流域遥据人类文明的上津，而中华民族则以秦汉以来的封建帝国，在几达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独领风骚。可惜，历史上的这种自我陶醉是无济于事的，它除了陡增些微的民族虚荣心之外，难以有更多的功用。但是，让东方文明继续呆在西方文明的阴影中，也不是我们应守的主臬。脚踏着五千年的文明厚土，浸沐于汉风唐韵的绝代风华，当新世纪的脚步急速向我们迫来时，中国人还甘愿做落伍者和看客吗？

历史是面镜子。

导 言

一

现代中国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少,但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有一些问题总是萦绕不去,撮其大者而言,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的民主,可算得上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这些问题在中国理论界至少激烈争论了 20 年(姑且不算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殊无新鲜感可言。但是,某一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会因其争论的时间长而稍减,反而因其长期争执不休而愈显突出。不过人们或许认为,这些问题大体上都已得到解答,就算是社会主义民主还颇有争议,商品经济和所有制的问题争论则已是尘埃落定,不须再搅得沸沸扬扬了。

我们无需追究商品经济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到底有多少抵牾;也不必重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遭际的历史磨难;单就商品经济在中国的现实处境而言,人们是否已经深悟了商品经济的功与过,是否已经在商品经济引发的现实的急功近利和未来的深层危机之间搭起了桥梁,看来还是大有疑问的。所有制方面的困惑要更多一些,且不说公有制的领地在私有制的挤压下逐渐萎缩;也不论国有企业改革之步履维艰;只消看一下私有制的千帆争竞与公有制的万马齐喑,难道不值得我们所有制理论上来一次革命,难道还要我们在所有制的固有框架内死撑苦熬吗?最让人感到底气不足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不仅陷在民主与专政的漩涡中难于适

从,而且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围攻中窘态毕现。倘若我们能超脱于专制与民主的对立之上,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即使再艰难也应该试一试,何况中国的传统文化尚能够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给养。

以上的问题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困扰,在资本主义世界则以另一种面目表现出来。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历来被资本主义奉为至宝,但是在人类进入 20 世纪以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险象环生,人们除了把经济危机的灾难归诸于它,还将众多的社会冲突的因缘列于它的名下,于是从二战以还,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遂取代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陶醉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在 20 世纪同样遭受了严峻的挑战,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国有国营企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否定了把私有制作为万妙灵丹的资本主义现实。虽然在 80 年代又出现了全球性的私有制回潮,但谁又能肯定未来的世界必将是私有制的一统天下?资本主义民主从来都是资产阶级政客恃以为傲的不二法门,据此对各主权国家的颐指气使更把他们的凌人盛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始终如一,表里一致。姑且不表他们曾经对各弱小民族犯下的强盗行径与他们自诩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如何的天差地远;也可以把他们国内的种族歧视、妇女权利、社会暴力、贫富对峙等搁置不论;而就民主而论民主,也决不是无隙可击,而是蛰伏着内在的隐忧。

当我们深入探究以上问题时,便惊异地发现,这些问题不仅是现代的,而且与人类的过去一脉相承;这些问题也不是孤立的,不仅它们相互之间关系密切,而且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与人类文明的其他特征——如阶级、战争、制度、城市等——情同手足,而它们的共同母亲则是貌似平庸的商品货币关系。

商品货币关系不惟对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必

不可少的,对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封建社会的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指人类文明的源头,简言之,人类文明滥觞于商品交换。问题的重要性还不限于此,商品交换犹如一位双面的怪兽,它既是人类的福祉,又为人类带来灾难;我们迄今为止所享受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导源于此,人类文明史上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它亦难辞其咎。

二

《礼记·礼运》中记载了孔老夫子关于“大同”与“小康”的一段论述,比较一下西方学者关于人类“文明”的定义,实际上便是孔子所说的“小康”。然而,孔夫子并不景仰这样的文明,他只是在喟叹大道不行之余,不无遗憾地承认“小康”是一个客观事实。在他的心目中,真正令人神往的是那个天下为公、各得其所、和睦友爱、无私忘我、谋偃盗闭的“大同”社会。^①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大同”才是理想的社会,而“小康”则差强人意。迨乎近代,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遂成了孙中山先生一生的梦想。如此深重的历史情结,不是没有由来的,当我们审视人类文明的进程,总不难发现,与文明结伴而行的,是惨烈日甚的战争,是同室操戈的残忍,是极富极贫的悬隔,是蝇营狗苟的卑贱,是志得意满的狂妄……这样的世界,究竟是文明还是野蛮?

此情此景,世界皆然。古希腊诗人海西奥德在他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

^①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时代、英雄时代和铁器时代，五个时代相互承继，每况愈下，到了铁器时代，“人们日间辛苦劳作，夜间则受尽侵害，不得安宁；父亲与子女离心离德，主人与客人反目为仇，友朋之间尔虞我诈；……光明磊落、恪守信用者不得重用，骄横行恶之士反而见宠，正义为暴力所压倒，真理不复存在。”^① 多么黑暗的现实啊。于是，从柏拉图财产公有、哲人统治的《理想国》到圣奥古斯丁的脱却人世苦难的“上帝之城”，从莫尔摒绝私有、共同富裕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重返黄金时代的《太阳城》，从圣西门空想的“实业制度”到欧文付诸实践的“合作工厂和公平市场”……无数仁人志士对“文明”的残酷现实发起了猛烈的抨击，意欲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但是，最终竟无一人成功，理想终归理想，现实还是现实。

人类无数崇高的社会理想，都被浸渍在利己主义现实的冰水中，终无一例摆脱了灭顶之灾，这是一个人们难于直面的客观存在。但是“文明”现实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汤因比列举的 21 个主要文明，残留下来的没有几个；斯宾格勒面对着“西方的没落”，更是一派悲凉的腔调。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却又数度毁灭在人类自己的手上，即使在 20 世纪的今天，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再次体验到文明毁灭的威胁，至今还令人思之惕然。在文明时代，人类似乎永远处于这样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人们在欣喜于文明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之余，又为文明固有的负面影响而忧心忡忡，而这些负面影响往往予文明以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人们有感于世事的冷酷、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伦理道德的颓败而致力于一个美好、平等、和谐、友爱的新世界，然而终究都无功而返。

以上这一矛盾为什么自古至今一直存在却又从未得到彻

^① 参见里夫金、霍华德合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 6—9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

底解决呢？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对文明起源的根本所在尚未弄清。这犹如医生面对一个复杂的病症，当没有查明它的病理时，是无法治愈它的。因此，对人类文明进行探本溯源，就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学者关于文明起源的论说多多，但我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起源，至于城市的兴起、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形成、频仍的战争、制度的设立……均可以由此导出，它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决定性的力量。

在对文明的商品货币关系起源说进行详细论证之前，我们且先行提出一个无与争辩的历史事实：在迄今为止的所有文明中，都必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的地域，人们都仍处于原始状态。提出这一史实有两重重要意义，一重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同一的，即同源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重是否定某些西方学者的人种优越论，指出文明的起源是由经济条件所决定，而非取决于人种的优劣。

如果说人类文明同出一源，那么文明的流域却广被宇内、各具曲折、千姿百态。每个文明都有自己引以自豪的风流年华，当炎黄子孙回顾祖先们留下的足迹时，总会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清晰脚印而倍感踏实。一个民族能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成功地把自己的文明延续下来并使之浩浩荡荡成其大观，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称为奇迹了。纵观古代众多的灿烂文明，或是在内部各逞其欲的纷争中，或是在民族仇恨的征伐下，或是在宗教冲突的狂热里……相继灰飞烟灭，而中华文明尽管也经历了无数的内忧外患，但在大多数时间内却保持着统一和强盛。尤其令人惊羡的是，无论是盛是衰，无论是成是败，中华文明总是一脉永系，从无间隔。中华文明的恒久与博大，对于解决世界性的“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千古难题，是否有所助益呢？

汤因比在和池田大作展望 21 世纪时认为：“就中国人来

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① 作为西方人且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却把世界统一的重任期许于中华文明,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已经意识到中华文明特有的凝聚力和包容性也许对西方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自我中心主义是一副最好的解毒剂,他也认可中华民族不注重武力征服而崇尚精神感召的一贯风范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但是,要完整地探究出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这个任务恐怕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胜任。

三

出于以上的考虑,这本小书试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来探讨文明社会的起源、内在冲突与危机,并竭尽愚钝地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一管之见。

本书第一章通过对商品货币关系内在运动的分析,力图阐明商品交换所导致的两个矛盾——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这一矛盾外化为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以及人们之间作为私有者而普遍对立——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动力。依据这一观点,我们将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透视人类的文明进程。在第二章论述文明的基础时,传统的所有制划分被一种新的类分所取代,以此为解决恼人的公有制问题留下伏笔。第三、第四、第五章用于展现文明特征的几个重要方面。第三章作制度分析时发现,现代人对权力和制度的理解常有歧异,而于专制政体的认识尤为偏颇,对现代西方

^① 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9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民主却多有执迷。战争与阶级作为本书所涉及的另外一组文明特征,与商品交换的因缘是太直接了,而人类对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厌恶,也几乎是一边倒,可是人类面对难能驾驭的它们,难免会有几分痛楚,几分惆怅。对于这些问题的论述,将在第四章作出。第五章关于城市与商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城市与商品交换的关系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直接,但城市对商品交换的反作用却值得大书特书;商业的魔力不仅蕴含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它发作于现代,使人类为之癫狂。

商品货币关系不独是古代文明的摇篮,也给近代西方文明带来了曙光,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兴起,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贸易的拓展,工业革命的到来,商品交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人为之而兴奋不已,灿若群星的思想家蜂涌而出,到处听到的是对西方文明的赞歌,而对私有财产的颂祷、对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讴歌、对商品交换关系的尊崇,则成了这首赞歌中的最强音。然而,西方文明所固有的负面影响却在警醒着某些卓越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明确地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必然导致私有制、导致阶级、导致两极分化。由此自然引出这样的结论:建立公有制,消除商品货币关系,让国家自行消亡,实现一个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分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箴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之前仆后继,蔚成沛然莫之能逆的历史潮流。当社会主义阵营俨然与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时,谁又会怀疑“东风压倒西风”呢?然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用于实践指导,却惊诧地发现,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无论在东欧还是在东亚,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令人迷惘的后果;到了本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颓然崩圯,其速度之快,实有目不暇接之感。曾几何时,运转祚移,其中究竟,将在第六章试作探讨。

西方国家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拍手叫好,它们悠然神往地注视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漫卷全球。^①对于中国这个一脉尚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它们正以“民主”、“人权”为武器,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战书。其实,当西方国家踌躇满志地觊觎着中国这块社会主义的禁脔时,它们自己碗中的稀饭是否吹冷了呢?回望西方民主政治的两百年,除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之外,在战争的惨绝人寰、经济危机的世界震荡、伦理道德的沦丧、社会的暴力犯罪、民主政体的低效率等等方面,同样也是空前的。西方精神在近代喧嚣了几百年,为人类博得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东方智慧在沉寂了数世纪之后,能否再为世界找回几许和谐,恢复一些超然,增添数分宏远呢?本书最后一章为此可视为—块引玉之砖。

以上各章不只限于中国问题的探讨,而且力图沿着历史的长河把人类文明的脉络简略地梳理—番,意欲使商品货币关系—为主线凸现出来,并用这条主线将众多的社会问题—以贯之。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在绝大部分意义上也是世界的。至于作者本人的能力,并没有太多的自信,由于本书涉及的领域较宽,恐力有所不逮,舛误错漏在所难免,倘能以—颗追求真理的心而见容于世,则幸甚。

① 按照西方人的观点,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878—1926年间,根源于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但真正的国家民主制度却出现在19世纪。在近—百年的民主化进程中,三十几个国家先后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943—1962年间,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战后各国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结束了西方的殖民统治,五十几个国家纷纷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军事政变,1989年东欧、中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分裂、瓦解则是民主化浪潮的顶峰,此次浪潮的余波—直延续至今。引自沈国明、朱敏章主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7)》第108—10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引 子	1
第一章 人类文明的滥觞	5
一、孩提时期的人类	5
天地洪荒与草莱初辟 [5]	
质的飞跃 [9]	
二、世界之王的降临	13
以物易物 [13]	
货币的源起 [18]	
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定性 [22]	
世界之王的神光 [26]	
三、沧桑巨变	30
静态的和谐 [30]	
无尽的追求 [34]	
人与人的对立 [39]	
第二章 文明的基石	43
一、还是所有制问题	43
新的类分与定义 [43]	
文明形态所有制的成因 [47]	
二、农业社会	51

情有独“衷”的奴隶制 [51]	
中西方封建之轩轻 [55]	
三、资本主义“宁有种乎”	63
近代文明之星在西方升起 [63]	
姗姗来迟的中国资本主义 [71]	
四、文明历史的沉思	75
对立方式的嬗变 [75]	
所有制迷宫的两扇大门 [82]	
第三章 制 度	89
一、何谓制度	89
与文明结伴而行 [89]	
人际关系之三类 [94]	
制度及其演进 [97]	
二、专 治	103
还权力以本来面目 [103]	
专制还是专治 [107]	
专治学说 [111]	
专治政体之否定 [117]	
三、民 主	122
亚里士多德的彷徨 [122]	
近代西方民主的勃兴 [127]	
现代民主的痼疾 [135]	
第四章 战争与阶级	144
一、战 争	144
文明与野蛮 [144]	
箭在弦上 [149]	
战地黄花 [156]	
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61

拂去历史的尘埃 [161]	
宜将剩勇追穷寇 [166]	
立马横刀难了情 [172]	
三、难听的阶级斗争	178
惊弓之鸟 [178]	
柳暗花明又一村 [185]	
出墙红杏 [190]	
第五章 城市与商业	197
一、城市在文明中的位置	197
城市的源起 [197]	
文明的加速器 [202]	
城乡对立的新视角 [207]	
二、独具魔力的商业	211
“剥削”与商业利润之抵牾 [211]	
贱买贵卖之灵窍 [216]	
商业欺诈,瑕不掩瑜 [224]	
三、商业周期	229
聚沙成塔 [229]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 [235]	
是否峰回路转时 [240]	
第六章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龃龉	247
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	247
理想的公有制 [247]	
消灭商品货币 [253]	
二、正与反的冲撞	258
天使与撒旦 [258]	
中国城乡改革的反差 [265]	
无可奈何花落去 [270]	

三、天堂的呼唤	278
徘徊于地狱与天堂〔278〕	
公与私的较量〔283〕	
几点启示〔287〕	
第七章 新世纪的钟声	293
一、文明的原动力	294
“人为财死”的精义〔294〕	
辩证法的自白〔299〕	
同源异类的善与恶〔303〕	
二、社会伦理的悖反	308
人心不古〔308〕	
原罪教义〔313〕	
现代人的忧患〔318〕	
三、中庸之道	326
中庸之道〔326〕	
道德重建刍议〔331〕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36〕	
专制与民主之再否定〔342〕	

引 子

什么是文明？对这一问题可谓见仁见智。斯宾格勒对文明有着独特的解释，他那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思辨色彩，使他的论说高深莫测，我们姑且把它放在一边。

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个文化的系列，他把每一个主要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称为“文明”，这样的“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有 21 个，各个“文明”与“原始社会”的区别主要是数量上的：“原始社会”存在的时间较短，局限在比较狭小的地区内，包含的人数较少；而“文明”则相反。^① 这种解释首先使人感到含混，时间的长短、地域的广狭、人数的多少以什么量为限？更主要的是这里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

“文明这个词还有一个含义，由于每个文化都有其自己的特点，由于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发达得多，我们完全可以说文明即一种先进文化。我们可以说，一个文明一旦达到了文字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使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制度已经发展到至少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的某些问题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文化就应该可以称为文明。”^② 伯恩斯的这段解释，由

^①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 44—4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② 见伯恩斯和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 26 页，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

于其语言的相对和模糊,也使人难得要领。

相比之下,巴格比的看法要明确得多,只是明确得让人不敢轻信:“文明就是城市的文化,而城市则可以定义为一种聚居点,其中许多(更确切地说,多数)居民不从事食物的生产。一种文明则是一种可以在其中找到城市的文化。”“让我们这样说: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并不从事食物的生产。正是由于这种免于自身食物的直接生产的自由,使城市居民有可能将其所有时间用于专门的方面,并使他们的文化多样化。同样的自由还使他们能够旅行、经商,使他们能够在广大区域内施展其军事力量,从而在地域上扩大他们的文化。”^①

费根把西方学者关于文明的含义用以下几个特征来归纳:(1)城市化社会。这种社会是在具有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组织的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共生经济。这种经济是以缴纳贡赋与税收而集中积累资本和社会地位为基础的,其中大多数人从事食物的生产,劳动分工专门化了,远距离贸易得以存在。(3)有给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建筑物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②这三个特征,如果说前两个还有些道理的话,第三个却显得过于牵强。

在历数了近代西方史学家关于文明的主要观点之后,再比较两千多年前孔子的精论,则倍感经典和亲切,所不同的是孔子把“文明”称为“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

① 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第194—1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参见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第388—38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① 这里指出了“小康”或文明的几个特点:(1)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2)财产私有;(3)阶级形成;(4)城市兴起;(5)伦理道德愈为重要;(6)各种制度的建立;(7)战争的出现。这些与以上关于文明的其他定义相较,似乎全面得多,我们就暂且以此作为文明的定义吧。

关于文明的定义众说纷纭,与之相应,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亦莫衷一是。大家都知道,人类的文明是相对于人类的原始状况而言的,文明并非从来就有,但它一出现,人类的历史就大为改观。那么,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呢?费根在《地球上的人们》一书中,介绍了关于文明起源的一些较新理论,这些理论纷然杂陈,从不同的方面来阐释文明的起源,如生态、灌溉、人口增长、贸易、宗教信仰、战争等。作者比较中肯地指出了这些理论的缺陷,并明白表示,没有哪个方面的单独发展能导致文明的出现。

但是,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不论是费根还是其他学者,都普遍认为,文明的起源及城市的兴起,都需要以食物的过剩为前提,以此才能够供养城市中不从事食物生产的人,如官吏、僧侣、工商业者等。这是一个谬误。首先,食物的过剩未必能引致文明及城市的兴起,在非洲腹地和澳大利亚土著聚居的地区,不少地方的天然食物是取之不尽的,而正是这一点,使他们长期处于原始状况。其次,即便有过剩的食物,也不会无端地供给城市人口,要么通过贡纳,要么依靠交换,要么采取强夺,这都需要中间环节,如行政命令、贸易、战争等,才能得以实现。再有,产品的过剩(包含食物和其他使用物)只是相对的,要以产品的过剩来说明阶级的出现、贫富

^① 见《礼记·礼运》。

的分化、国家的形成,其间还得作许多抽象。

第二,在诸多的文明起源说中,有贸易一说,认为贸易的急剧增加就是文明的起因。费根在肯定贸易是文明兴起的诸多因素之一的同时,用了最多的篇幅来驳斥“贸易说”的不足恃。^①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此既未见持“贸易说”的学者的有力论据,也未领略到费根有说服力的批驳,给我们的印象只是,面对着有丰富史实的商品交换现象,学者们无法演绎出科学的论证。

我们的论证正是要从商品交换开始,以此来说明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动力、文明的特征和文明的内在冲突。

① 见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第397—401页。

第一章 文明的滥觞

人类最早的文明,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算起,距今只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人类的起源则可以向上追溯至五百万年以前,人类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才开始迈入文明的门槛。我们要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为文明的源头确定一个坐标,需要找一个参照物。本章开始,我们先概述一段文明的史前史,在这段史前史的末期,商品交换的两个前提条件——社会分工和财产关系——已经具备;紧接着我们将阐述物物交换的产生和货币的出现;最关紧要的是第三节,在那里我们将了解到商品交换出现以后所直接导致的两个矛盾——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这一矛盾外化为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和人们之间作为私有者的普遍对立,是人类文明历史的根本动力。这一节不仅是本章的重点,更是全书的灵魂。

一、孩提时期的人类

天地洪荒与草莱初辟

按照现今的考古研究,五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就已经有了人类,这对本书的研究课题而言,是太久远的事了,好在历史

学家们为我们作了很好的工作,他们把史前期的人类按阶段分为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而智人又可以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类,大约生活于五万年前,这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研究时段缩短了一百倍。我们的论述,就从五万年前的现代人类开始。

现代人类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可以用双手打制出具有各别用途的石器,但人们的生存方式,仍处于采集渔猎的阶段,完全仰赖于大自然的供给。把天然植物的果实块茎采集起来,以供人们的食用,这在人类的早期是普遍的生存方式。有资料表明,早期的人类主要以天然植物类食物为主,巴巴拉·沃里斯对 90 个采集和狩猎群体的研究报告指出,75% 的群体是以采集为主要的食物来源。^① 显而易见,天然植物的果实块茎是比较容易采集的,人们只需要具备攀援树木的本领便可以获取这类食物。随着四季的变化,食物的种类也不同,也正是这种大自然的赐予,使人类得以在季节的更替中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当一个地方的果实采集完了,人们将迁移到新的地方,进行新一轮的采集劳动。居无定所、四处觅食成了采集经济的主要特征。

但是,人类的原始境遇不会总是很好的,或是由于森林植被的减退,或是由于人类过度的采集,或是由于人口的增多,或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天然植物类食物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在有河流的地方捕食鱼类,在动物出没的地区进行猎杀,自然也成为人们的生存手段。与采集相比,渔猎需要更高的劳动技能,在与其他动物的搏击中,也更具危险性。面对自然界的挑战,人类也自有办法,他们除了制作工具以增进自己的能力以外,还利用群体的力量,集体捕猎大的凶

① 参见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第六章。

猛的动物。与此同时,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他们不嫌弃自然死亡的动物,而取食它的尸体;他们弱肉强食,更愿意猎取小型或驯良的动物;对于他们难以相抗的猛兽,他们宁可攻击其中的年老者 and 幼小者。^①

人类的祖先以采集和渔猎为手段,艰难地跋涉在人类漫漫的长途中。他们运用自己那双已经不算笨拙的手,制造旧石器晚期的尖端刮削器、装上把柄的石制长矛,还有骨制的针、鱼叉,其中最优秀的要算弓和箭的发明。人们已经能用兽皮缝制衣物,用树枝茅草搭设窝棚,或者栖息在天然的洞穴中,用火取暖并烧煮食物。在这个时期,人们除了拥有自己使用的工具外,没有其他的财产意识,这决定于以下两个事实:人们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使任何对土地的固定占有变得毫无意义;人们还未能能在固定的地域内依靠自己的劳动再生出动植物食物。这一切都有待于农牧业时期才能改善。

距今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进入农业和畜牧业时期,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学术界仍各持己说,但在两个方面几乎形成了一致的看法:(1)农业畜牧业与采集渔猎相比,人类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获取食物;其次,最初的农业畜牧业也更具风险性,因为播下的种子能否获得收成,豢养的动物是否会伤人或逃逸,这对最初的农耕者和牧人来说都是没有把握的事。(2)与前一个方面相联系,人类只有在采集和渔猎不能满足其生存需要时,才会转向农业与畜牧业。这后一点可以在近代的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非洲腹地的原始民族中取得例证,在那些地区,由于有取之不尽的天然食物,即使他们已经知道农业生产方式,也不会采用。^②

① 参见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第六章。

② 参见同上,第十章。

要理解采集渔猎向农牧业的转化,读者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转化是漫长的,经历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程。人类在长期的采集渔猎经济中,逐渐掌握了动植物的习性和生长规律;而且,作为采集渔猎的补充形式,只是到了农牧业的发展使其产品基本上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后,农牧业才能最终取代采集渔猎而占据经济上的主要地位。在下面简述农牧业的形成时,我们略去了时间上的度量,只按照一般的过程来处理。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当种子撒落地上,再长出新的植物,这一过程肯定被人类观察到,当采集渔猎的食物已经不能满足人们需要时,人们便尝试重现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地区生长着不同的天然植物,而这一地区也就是这一植物最适宜的生存环境,于是,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被栽种的是麦子、在黄河流域是粟、在东南亚和中国南方是水稻、在美洲则是玉米……

最先被栽培并成为人们主食的是禾本植物,木本植物一般不在考虑之列,这是因为木本植物的生长周期太长,并且其果实绝大部分不易保存。与此相反,禾本植物则有生产周期短、容易贮藏的优点。块根植物如木薯、甘薯、芋类等,也具备生产周期短的优点,而且也容易栽植,在一些地区也曾成为农业的对象,但也许因为它们也有不易保存的缺点,一直没有成为人类的主食。

早期的农业是极度粗放的,也许人们撒下种籽,剩下的事就是等着收获,最初能做到刀耕火种,就算不错的了。至于休耕、轮种以及锄草、灌溉、施肥等等,那都是以后逐渐实行起来的。

畜牧业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被驯化的动物大都是性情比较温顺的,如绵羊、山羊、马、鹿、牛、火鸡之

属。开始时或许人们把捕获的未能食用完的动物圈养起来，以备将来之用。这样做有诸多好处，譬如当人们迁移时，它们可以被牵赶着走，不需人们肩挑背扛；它们是流动的活的仓库，避免了食肉难于贮存的困难；它们在被圈养时，如适逢生殖期，还可为人们产下幼畜……这些优势渐渐地被人们所认识，人们便特意地让母兽和幼兽存活，以保持食肉来源的供给；尤其是被活捉的幼兽，被带回宿营地，只能依靠捕捉它们的人生活，这样就达到了部分驯化。另一种可能性是，大多数被驯化的动物是群居动物，人们只要能控制住带头动物，就会有一群动物跟随着它。

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最初是极其缓慢的，但却实实在在地进行着，当农牧业的发展已基本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采集渔猎便退居次要地位。与此相伴随，人们的生产工具也进一步提高，史学界把这一时期也称为新石器时代，石斧、石镰、石簇等磨光石器是其标志，一些地区出现了粘土器皿甚至陶器，用于挖松土壤的木锄、陶锄也时有发现；在中国出土的新石器中还有石纺轮，纺织及编织技术已开始进入人类生活；人们已在建立牢固的、永久性的住房，只是在不同地区，所使用的材料有别，即便是游牧民族，他们也在用皮草做服装和帐篷，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用它们保护自己。

人类从采集渔猎发展到农牧业，从天地洪荒到草莱初辟，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真正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而成其为人。当人类还没有自觉到这一点时，潜藏着的巨变已经开始了。

质的飞跃

当农牧业的形成与发展取代了采集渔猎而成为人们主要的生存方式时，人类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人们已能获得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改善并因此而日益扩大：

人口增长的速率有所加快,导致许多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人类抵御大自然危害的力量有所提高,利用大自然以利于自身发展的力量有所加强;……然而这些还不是最引人注目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分工的出现和财产关系的发展。

说到分工,不少人类学家指出,从采集渔猎时期开始,在原始家庭、氏族或公社内,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分工,这种分工主要表现在两性之间,比如男的从事渔猎,女的从事采集;而在农牧业时期,打仗、狩猎、饲养牧畜、工具制作、皮革整理等,都属于男子分内之事;农业、采集、缝纫、编织等则归女人所为。但这些却被视为原始人类内部的自然分工。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发生在农牧业时代的中、后期。按习见的说法,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一些氏族或部落专门从事农业(畜牧业只具有副业的性质),另一些氏族或部落则专门从事畜牧业。由于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商品交换成为可能。

容易被人们遗忘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分工。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人们在封闭的原始状态中独自形成的传统习俗和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氏族或部落,人们的生产物品和产出物必然呈现出形形色色的差异,尽管那时人们所能生产的物品及其种类都不多,但考虑到地域的广阔和原原始人群长期的相互隔绝,各地产品如果汇聚拢来仍可能是丰富多彩的。这种主要因地区的自然差异而出现的产品的不同类别,表现为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分工,这类社会分工的存在,对商品交换的产生至为重要,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固然要强调,但另一个变化的重要性更要提及,即财产关系的变化。我们在上面谈到采集渔猎时人们的财产唯有他们制造并使用的简陋工具而已,但到了农

牧业时期,关键性的变化出现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财产的范围扩大了。**在采集渔猎时期,人们只占有为数有限的几件工具,而现在不仅占有较多的工具,还占有农产品、畜牧产品和土地。尤其是土地的占有,在以后数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人类重要的生产资料。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采集渔猎时期人们对土地不可能形成占有关系,但经过农业的耕种与收获,必然导致对土地的占有。这一点对游牧民族尚不重要,因为畜牧业的流动性质决定其不能固守在一块土地上,而农业则必须有明确的土地占有不可。

2. **占有的目的性更趋明确。**如果说人们过去对工具的占有也是一种财产关系的话,那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也仅是一种间接性的占有,因为生产工具只是劳动的手段,而不是人们直接消费的生活资料。农牧产品则不同,它们是直接供人们生活消费的,通过对农牧产品的储存和占有,不仅免除了人们的冻馁之苦,更明确了人们占有的目的,即这种生活资料的占有,既维持了人们的生存,也保证了人类的发展,同时还加强了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3. **财产意识的强化。**农业和畜牧业再现了动植物的生长过程,人类的这种自觉劳动,在人类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再现自然过程,表明人类已开始利用自然,掌握自然,摆脱了完全屈从于大自然的命运,使人类最终完成了从动物向人的转化,为人类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永久的助推器。这便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或自由意志。这种主观能动性或自由意志表现在人们的生产物中,必然强化人们的所有权关系,强化人们的财产意识。黑格尔这样写到:“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

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从而我初次成为现实的意志,这一方面则构成占有的真实而合法的因素,即构成所有权的規定。”^①

以上财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的根本变化,还只是个开始,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财产的范围越来越大,财产占有的目的性也越来越明确,财产意识的强化与之俱来的人们的自由意志,越来越成为人类的精神依托。总之,财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为之旋转的核心,到了文明时代,这一点就愈显突出,这已经算后话了。

让我们还是先回到财产的原初形态上来。最初的财产,其所有权的归属,历来在学术界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个人使用的工具归个人所有,对此各个学派没有歧异;但对于土地、牧畜和其他生活资料,是属于公有还是私有,各派则各执一端,并以其考古发现及对原始部落的实地考察作为各自的证据。对此种现象,马克斯·韦伯有比较公允的看法,他认为原始社会的财产形式既有公有的,也有私有的,无法作任何概括性的论断。^② 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也为我们展现了财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并描述了文明社会出现以前土地占有关系由公有向私有的转化。^③

对于土地、牧群及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关系,我倾向于这样的认识:在这一时期的农牧业群体中,财产或是公有,或

① 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52页,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引文中重点号是原文中的。

② 参见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一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第八编,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是私有,或者部分公有、部分私有。是公有亦或私有,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生产方式:如这些财产是人们共同使用共同劳动的成果,则为公有;反之,当它们个人使用个人劳动的成果时,则为私有。另外,人们的家庭形式、不同的地域环境、各别的发展阶段,都会对财产的归属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在众多的历史学家那里看到分歧,也就不足为怪了。也许他们只是截取了某一地区、某一阶段的某一断面而得出结论,如果再加上各自的主观成见,则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难能统一。

社会分工的出现和财产关系的发展,是自然发生并悄然进行的,但作为商品交换的两个前提,它们已经在叩击文明社会的大门了。

二、世界之王的降临

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是指用一种物品交换另一种物品,这样的交换,一般的理论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和条件:(1)社会分工的存在;(2)物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这两个前提或条件,正如前面所述,在农牧业时代的中、后期已经具备,交换的发生势成必然。最早的物物交换发生于何时何地,无从稽考,历史学家们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张详细的纪年表,但在农牧业时期,已经开始有物物交换,这已被大量的人类学知识所证实。

“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① 马克思这么说。韦伯也表达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同样的看法：“起初，商业是种族集团之间一种事务，它并没有出现于同一部落或同一社会成员之间，而是最古老的社会共同体中的一种对外现象，只以异族部落为对象。”^① 这既可以证之以原始部落的考察，又可以用理论来推衍。

按照流行的史学观点，早期的农牧业民族的社会组成形式都是以原始氏族、部落或原始公社的形式出现，并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这些共同体（氏族、部落或公社）内部，不存在产品交换，这是因为，在共同体内部人们所生产的物品基本上是相同的，没有交换的必要，人们不会在相同的物品之间进行交换。那时虽然有分工，也只表现为共同体内的自然分工，分工的各方被包容在家庭或氏族内部的经济活动中，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交换的关系。这在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北美印地安人的氏族，以及其他原始民族如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马来半岛的色曼人、中国东北的鄂伦春人……中有着不胜枚举的事实。

从理论上讲，农业与畜牧业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各个共同体之间由于其自然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分工，使社会产品的种类多样化和差异化。财产关系的变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关系的明确与加强，使人们有可能作为不同的所有者而彼此对立。但是，以上两个条件（社会分工和所有权关系）的彰显是以各个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诱因的，人们只是在与别的共同体的交往中才发现彼此生产物品的差异，因此萌发这样的愿望：以自己共同体所生产的物品与另一共同体所生产的不同物品相交换，从而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同时，也只有在与其它共同体的接触和交换中，人们才作为物品的不同所有者而彼此对立，以完成不同所有者之间的

^① 见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165页。

物品互换；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财产关系。

所以说，最初的物物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各个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发生的。

社会分工和产品的不同所有者的存在，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和条件。这一点似乎还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人们在承认社会分工和所有权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前提和条件时，又提出了另一种补充观点，认为最初的物物交换的出现，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所生产的物品除了满足自己的消费之外，尚有剩余，这些剩余物品的存在，成为交换产生的必要条件。

这一“剩余产品交换说”，看似很有道理，当人们所生产的物品还不够自己消费时，不可能有多余的产品去与别人相交换，因而只有自身消费满足后剩余的产品，才使交换成为可能。但是，从大量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最早进入交换领域的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如粮食衣服之属，而是一些奢侈品或手工工具。这一史实表明了什么呢？

首先，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需要的，特别是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食物，更是人们须臾不可或缺的，无论在采集渔猎时期还是在农牧业时期，人们首先要满足的是“食”的需要；实现食物的自给自足，则是原始人类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诚如上面所说，人类在农牧业时期开始出现交换，但最初的物物交换只是极其偶然的、零星的交换，人们不可能依靠偶然的、零星的交换来满足自己每天都要发生的需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首先达到自足，既然实现了这一点，人们便很少会在最初的交换中，有交换生活必需品的欲求和冲动。

其次，奢侈品和手工工具的需求与交换则呈现相反的状况。奢侈品对于人们的生活需求而言，弹性极大，人们可能对它有较多较高的需求，也可以把对它的需求降至为零；人们可

以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将它完全放弃,而不影响自己的正常生存;也可以将它长期保存,无须进入交换领域。这样,奢侈品的交换相对于偶然的、零星的交换来说同样是偶然的、可有可无的,因而更具有灵活性和适用性。至于手工工具,作为人们的劳动手段,其需求较为有限,容易饱和,使用期较长,且制作也不难,人们完全可以将它易手后,另制作新的。更主要的在于,各共同体之间手工工具的差异比食物类产品的差异,要多得多、大得多,因此产生的交换冲动也要强烈得多。而且手工工具的交易与奢侈品的交易有其相似之处,即偶然的、零星的交换就能满足交易的需要,而不至于影响人们的正常生存。

如果以上的推论正确(并且可证之以历史事实),“剩余产品交换说”便似是而实非:按照“剩余产品交换说”理解的剩余产品,主要指生活必需品,而最初进入交换的则主要是奢侈品或手工工具,并非生活必需品——“剩余产品交换说”显然不攻自破。其实,只需要也只能从社会分工的存在和财产关系的确立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商品交换出现的必然;而且从上面的论证中可以看出,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分工——因地区的自然差异表现出的社会分工——在最初的交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交换最初是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行的。

最初的交换是零星的、偶然的、个别的,主要局限在一些奢侈品及手工工具上,但是随着交换的发展和扩大,进入交换的物品愈来愈多,交换的频率也逐渐加快,交换的范围日益增大,交换已不仅只是共同体之间的事,它冲决了旧时代的樊篱,在共同体内部,在各个地区之间,也蓬勃地兴起。

交换与社会分工和财产关系的交互作用是最为人们称道的:交换发轫于社会分工和财产关系,交换的发展又反作用于社会分工和财产关系,使财产关系更为扩展、分化和巩固,不

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日益私有化了;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继农牧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而来的是手工业分工的形成,然后是商业的出现。顺便说一句,只有在这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不从事食物生产的专业部门出现以后,食物在商品交换中的地位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①

原初的交换是以物易物,即人们以属于自己的物品交换属于别人的物品,这其中有两个规定性:其一,进入交换的物品必须被人们所占有,而不是人们从自然界中可任意获取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财产关系;其二,进入交换的物品必须是对方所需要的,并且是相异的,因为人们不会用自己的物品去交换相同的别人的物品,这一点取决于社会分工。

当人们的交换还仅是偶然进行的零星交易时,交换在人们的生活中尚不重要,交换的矛盾也未被人们所重视。随着交换的发展及其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人们便会发现,即使在社会分工和财产关系都已明确的前提下,交换并非都能实现,因为物物交换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交换双方必须同一的时间和地点对对方的物品彼此需要,才可能成交,否则交换便不能实现。举个例来说,当甲和乙分别拿着自己的产品——衣服和锄头同时来到市场上交易,如果甲需要乙的锄头,乙需要甲的衣服,甲乙双方的交换便可能成交;倘若甲虽然需要乙的锄头,而乙却不需要甲的衣服,交换便会受阻。

以物易物的这种矛盾,滞碍了交换,给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不便,但矛盾的存在也预示着矛盾的解决,货币就是解决这

^① 这种转换甚至是很缓慢的,在中国到了汉唐时期,粮食贸易在整个贸易中仍只占较小的比例,这虽然和特定的历史时代有关,但在农业仍居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这表现为一般的趋势。参见本书第 202 页脚注③和第 222 页。

个矛盾的手段。

货币的源起

韦伯对货币的看法很特别：“货币是私有财产之父。”^①没有一种具有货币性质的东西不带来私人财产的性质。他认为货币与私有与生俱来，在没有交换的时期货币就已经存在了，货币首先是作为支付手段在部落内部或部落之间来使用，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是尔后的事。这样一来，在韦伯那里也就不存在货币起源的问题，因为只要有私有财产的存在，就有货币的存在。韦伯所指的货币最初只是某些具有使用价值并被人们占有的物品，可以用来赠与、赔偿、支付的财产形式。^②

对于货币的起源，马克思则独树一帜，他从商品价值的实现，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中，演绎出艰深的货币理论。马克思认为，进入交换的物品，是彼此孤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必须在交换过程中通过转移来证明是一般社会劳动，而这种转移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或银，被当作一般社会劳动的化身来同其他商品相对立，才能实现。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货币。^③

如果说韦伯是从物品的使用价值上来确认货币，马克思是从商品的价值实现上来探究货币的起源，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则从物物交换的滞碍中来阐明货币的产生：在物物交换中，如果交换双方不能同时对对方的物品产生需求，交换便会受阻，这一矛盾，随着交换的频繁和扩大，会更加突出。人们

① 引自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00页。

② 参见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十九章“货币和货币史”。

③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8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在反复的交换中逐渐意识到,如果自己手中握有一种人们在交换中普遍需要的物品(不论这种物品是通过生产、交换或其他方式占有的),再去与别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交换便容易成功。这种人们普遍需要的、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就是最初的货币。^①

这种人们普遍需要的、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是如何变为货币的呢?仍然延用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当甲需要乙的锄头,而乙不需要甲的衣服时,如果甲灵机一动,问乙需要什么物品与之交换,假如乙需要丙的铁,而丙又不需要乙的锄头,需要甲的衣服,甲就会用衣服交换丙的铁,然后再用铁去交换乙的锄头,这样,甲、乙、丙都实现了交换,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在这里,铁就担当了货币的功能。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简略的例子,在现实的物物交换中,情况要复杂得多,不能成交的可能性极大。不过,人们在长期的纷然杂陈的交换中,经过千百次的自然筛选,会发现某些物品是人们普遍需要的,在交换中容易易手;人们便争相获取这些物品,这些物品就成了最初的交换媒介——货币。这里需要提醒一下,最初成为货币的、人们普遍需要的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往往不是人们普遍能生产的物品,而是少数人能够生产的或舶来的人们普遍需要的物品,因为人们普遍能生产的物品就不需要交换来获取了。这样,我们就进一步得出了原始货币的定义:原始货币是一种人们不能普遍生产、又普遍需要的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

^①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第20—21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386—38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骆耕漠:《社会主义商品货币问题的争论和分析》总论,第一分册,第29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

在商品交换的历程中,曾经有不少物品赢得货币的桂冠,让我们再从货币史的角度,寻找一点货币产生的佐证。中国是文明历史延续最长的国家,货币形态的发展演化也许最完整,也最具有代表性,我们下面主要以中国历代货币为例。

海贝作为货币也许是最早的,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所发现。海贝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是作为装饰品或奢侈品为人们所钟爱。以海贝为货币的地区一般并不邻海,而是在离海较远的内陆,如中国的河南、西藏等地以及非洲腹地和深入亚洲内地的印度洋地区。供助这一史实可能证明这样几个问题:把海贝视为稀罕之物的地区是内陆,它在那里被人们普遍珍爱,且不易获取,因而成为货币;海贝进入内陆是通过交换,而交换最先是在部落之间、地区之间进行的;首先进入交换领域的物品是奢侈品、工具之属,而不是食物类用品。

在中国货币史上比海贝稍后作为货币的物品,是布币和刀币,前者是农业工具,后者是武器。布是铸的假借字,铸在古代是重要的农具,甚至到今天仍在中原一带使用,现被称作铧。布和刀都是极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但大多数人却不能生产它们,只有少数工匠能够制造。这同样也印证了最初成为货币的是人们普遍需要且不能普遍生产的物品。

不论是海贝还是刀和布,最初都是以其使用价值形态成为货币的,或者换句话说,海贝是作为装饰品或奢侈品,布和刀是作为工具或武器,都是人们需要的具有某一**特定使用价值**的物品。但当它们一旦成为流通手段或交换媒介,就转化成其对立物,变为具有一般使用价值的物品——货币,逐渐脱却它原有的特定的使用价值形态。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分析,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来完成;而它现实的演变过程,我们

可以从布币和刀币的铸造与流通中寻找其脉络。流通中的刀币和布币,到它们完全定形的时候,比起实际的刀和布来,在形状上没有多大改变,但在几何尺寸上则小得多,已经不复是可以使用的农具和武器了。如果把刀币和布币的货币历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个从大到小、从刀和布的实物形态向刀币、布币的货币形态转化的过程。海贝作为货币的历程也有类似情形,当各种玉贝、铜贝、石贝等仿制品相继出现时,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装饰品,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为人们所使用和保存。

充当货币的物品最终凝聚在金、银、铜等金属上,世界皆然。这些金属以其易于分割、便于携带、可以长期保存,每一部分具有均质等优点夺得了货币一尊的地位,前人早已论及,不必赘言。至于以后的铸币,不论是铜还是金银铸造的,都可视作金属货币的流变,到了这时,货币已经完全脱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物品的外衣,似乎没有多少可说的了。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作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在货币史上是划时代的,但于本文的论题关连不大,亦无暇论及。

值得提到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屡屡担当货币职能的物品——谷帛,每逢战乱频仍、时局动荡、币制混乱之际,谷和帛作为人们普遍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往往成为人们的流通手段,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中,每每如此。这一史实同样也说明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是货币的原始形态。不过,这里需要作一点补充与修正,前面我们曾经定义道:原始货币是一种人们不能普遍生产、又普遍需要的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这一定义似乎与这里所说的谷帛货币相矛盾,因为谷和帛这两种生活必需品,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每个农户都能生产的,因而也就是大多数人所能生产的物品。其实,我们所说的原始货币,是指货币的发端时期,那时,一些生活必需品,譬

如食物,是每一个氏族、部落乃至家庭都能生产的,很少有可能进入交换,更难于成为交换的媒介。秦汉以后的时期则不同,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分工的完成以及城市的兴起,形成了不从事食物生产的人类群体,对这部分人来说,他们要获得食物,必须通过交换,当社会动乱、货币贬损失效时,谷和帛自然就成为人们最需要获取的物品,从而货币化了。另外,当金属铸币出现以后,以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为货币的原始货币形态,便隐而不露;当币制败坏时,原始的货币形态便会显露其原形,谷帛充当货币即是其例。这只是再一次说明,最具有使用价值、人们最需要且不能普遍生产的物品,最有资格成为原始货币。^①

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定性

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已经是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换了,当各种货币形态以它幻化的形式展现其迷人风姿时,当世人锱铢必较地称量商品能值多少钱时,哲学家们则更醉心于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定性。亚里士多德从一般的交换关系中看到,五张床与一间屋相交换,也可以看作五张床与若干货币相交换。但是,床、屋、货币都是使用价值各异的物品,它们在本质上没有等同性,“而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实际上,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因而只能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马克思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已隐约地感觉到在商品交换中有某种同质的东西,否则交换就不能实现。马克思把这种同质的东西称为价值,也

^① 关于中国货币的资料,参见千家驹、郭彦尚合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就是马克思所发明的一般社会劳动。^①

实质上亚里士多德是以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待商品交换的内在运动,从辩证逻辑的角度看事物的运动在于自身的对立统一。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同一性,更要有对立性,没有同一或没有对立的运动都是不可思议的。在商品交换的内在运动中,这种对立统一是否存在呢?人们首先看到,进入交换的商品,林林总总,千差万别,每一种商品都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比如说,粮食衣物、鸡鱼肉鸭、锄镰犁耙、珍珠玛瑙……千千万万,数不胜数,这些商品族类都有不同的特定的使用价值,粮食可以充饥裹腹、衣物可以蔽体御寒、鸡鱼肉鸭可以爽五味之欲,锄镰犁耙可以佐耕作之助,珍珠玛瑙可以极装饰之美……不一而足。在这里,我们只看到各种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异,而看不到它们的同一性,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这里没有质的同一,只有差异和对立。可是另一方面,凡是进入交换的商品,不管它们是如何地种类繁多,也不管它们的使用价值是如何地天差地别,但有一点对商品全体都是一样的,即作为商品,它们必须是人们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没有任何一种商品不是对人类有使用价值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物品绝对不可能成为商品。商品的这种对人类而言的使用价值属性,即商品交换的同一性。或者换句话说,就它们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点而言,它们在质上又是同一的。

以上我们分述了表现在商品使用价值上的同一性与对立性,但只有在商品交换的实际过程中,才能领略到这种同一性与对立性的统一。在物物交换中,持有不同使用价值物品的

^①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引文以及马克思对亚氏的评述,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3—74页。

人们,作为商品的所有者,相互交换自己手中的物品,他们所中意的,只是对方的物品的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在交换者双方,各自所占有的使用价值物品是不同的、相异的,这是商品交换对立的一方面;而且只有这种对立,才使交换成为必要,因为在相同的商品之间,人们不会交换。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相异的使用价值物品,又是交换双方彼此所需要的,并且要在互相让度其商品的同时,交换方能完成,从而使商品交换具有同一的内容。这样,在商品交换中实现了辩证的对立同一,具有了运动的内在力量,商品交换得以进行。我们在这里看到,商品交换只有同一性,交换便不能实现,商品交换只有对立性,交换同样不能实现,必须具备商品交换的对立统一,商品交换才会在矛盾的自身运动中,达到其现实性。

但是,物物交换并不总是顺畅的,商品交换的对立统一并非总能实现,两个持不同使用价值物品的交换者,如果彼此对对方的物品没有需求,交换不能实现,这自不待言。即使甲方对乙方的商品有需求,愿意交换,但乙方对甲方的商品却没有兴趣,交换还是不能实现。在这两种情况下,交换者之间只有对立,没有同一。这种无同一性的对立,黑格尔称之为“恶的对立”。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或“恶的对立”,人们在反复的交换中逐渐发现,某些商品具有较为普遍的使用价值,在交换中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以此种商品和别人交换,便能顺利成交,这种商品就是最初的货币。

从最初的物物交换到原始货币的产生,已经潜藏着这样一种辩证法:商品所有者要想让自己的商品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就必须把自己的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转化为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在这种转化中,商品扬弃了自身的特殊性,赢得了普遍性;扬弃了自身的差异和对立,实现了一般和同一。不过,同时要强调的是,商品首先必须具有特殊的使用

价值,必须对需求者有具体的使用价值,才能转化为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必须具有差异和区别,才能实现一般和同一。所以说,商品的特殊性、对立性,又是实现普遍性、同一性的前提。

然而,不管最初充当货币的物品是什么,即使是人们普遍需要的、喜欢的最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一旦作为具体的使用价值物品,仍只能是一定的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物品。即以金银为例,撇开其货币职能不论,它们的具体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只是打制器物、装饰金身,在现代科技时代,它们可能又会多几种用途,但这些具体用途毕竟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都不可能是一般的、普遍的。但是,商品交换的辩证法却要求任何具体的、特殊的使用价值物品转化为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物品,商品交换才能实现。这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有一种物品要变为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物品,以便所有的商品族类与之相交换。但这种物品既要成为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物品,它就必须放弃它的具体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成为使用价值一般,成为一种抽象。货币的历程以及货币最终可以用一个符号来代替,正能说明这种抽象的必然性。

任何理论的归纳都是事后的,现实的运动表现出它的必然性,才能上升到理论。不过,现实运动的必然性,往往是以它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货币产生的必然性亦是如此。最初的货币只是一些具有较普遍使用价值并在交换中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的物品,至于哪些物品会有此殊荣,成为最初的货币,常常是偶然的。但只要货币的职能一旦凝结在某一商品上,这一商品的特定的自然的使用价值就不重要了,它成了使用价值一般,和千千万万的商品相对立,只要它愿意,它可以和任何商品相交换。在货币身上,包容了商品交换的对立统一,货

币作为使用价值一般,可以和无限扩展的商品系列相交换,这是商品交换的同一性;但任何一个特定的货币量,又只能交换有限的、特定的商品,这是商品交换的对立性。货币的这种质的无限与量的有限的矛盾,我们后面再谈。但在这里,这一矛盾表现为商品交换的对立统一,货币成了“自在自为”的至上之尊,藉助于货币,商品交换的对立统一更容易实现,“恶的对立”得以克服,人类的经济活动有了更为灵动的运动形式。

世界之王的神光

世俗社会中,一个君王的权威是在芸芸众生的默许、赞同、拥戴下建立起来的;在商品世界里,万千商品的涌动推举出它们自己的崇拜者——货币。但是,一旦货币的地位得以确立,它就反过来统治了这个世界,“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①商品所有者被货币所统治,这只是事情的开始,货币侵入原始人群内部,把人们分离为一个个彼此对立的私有者;货币侵入个体家庭,使父子反目、夫妻成仇;货币侵入人与人的关系中,富贵贫贱、财大气粗,遂成为文明历史中的定格;货币侵入国与国之间,征战杀伐、折冲尊俎,便成了家常便饭。货币浸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调动了人们最狂热的情感,激发出人们最龌龊的贪欲,成为人类为之旋转的核心。货币成了真正的世界之王。

货币这个世界之王的神威对人类是一种嘲弄。它出于人类的行为之中,却又凌驾于人类的行为之上;它是人类创造的最世俗之物,却又放射出最迷人的神光。标榜自由意志和个

^① 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163页。

人权利的西方人,也许最不能容忍货币的这种至尊地位,亚里士多德把人们对货币的追逐和迷恋,称之为“不自然”的、令人憎恶的,有碍于人们过有道德的“优良”生活。^①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简直就把货币视为恶棍,毁人家国、教唆犯罪。莎士比亚则把货币诟置为“人尽可夫的娼妇。”^②

东方人对货币的态度可能没有西方人那样极端,他们宁可以平和与现实的眼光看待世界之王。一千六百多年以前的中国晋朝,就有人著有一篇《钱神论》:“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杀,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③一篇妙文,几乎把货币的世俗神威写尽。

不管人们对货币的诅咒是如何地恶言相加,还是极尽虔诚地对货币顶礼膜拜,世界之王的权威并不曾有丝毫的贬损和被捧杀。它像一位高高在上的神圣之君,任何诽谤或谄谀都不能使它为之所动,它的统治遍及宇内,古今中外的人们无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章九,章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52页。

③ 见《晋书·鲁褒传》。

不感受着它的威权,而且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发展,它的权威更趋尊隆。

在现代历史中,世界之王不可撼摇的地位又让我们再次开了眼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并试图消灭货币,然而却引致经济生活一片混乱,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最后不得不启用“新经济政策”,不无勉强地重新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权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多年中,也曾经两次出现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断然否定,一次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另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两次否定的时间、背景虽然不同,其结果却是一样的:社会经济生活极度衰败。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共产党来得更加直接,他们刚刚取得政权,便立即动手消灭货币商品,致使柬埔寨的社会主义过早地夭折。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权威,尚对世界之王的权威无奈他何,更遑论一般的国家政府了。

近年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让我们就近一睹世界之王的风采。索罗斯运用数十亿美元,在东南亚地区进进出出,搅得东南亚危机四起,并且波及世界经济,东南亚国家的政要们对此大为光火,声言要以颠覆罪起诉索罗斯。按多数专家的意见,索罗斯的货币炒卖只能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但在泡沫经济、银行呆帐、不当的汇率政策、国际收支失衡等多项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又有多少能与货币脱得了干系呢?人们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认清了世界之王的底蕴呢?看来,货币对于人类的认知来讲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必然王国,世界之王仍然发散出它那令人目眩的神光。

世界之王在建立自己的统治的同时,也对一切世俗的权威和神圣的权威发出了挑战,全然一副独步天下、混一宇内的架式。在西方,基督教的神圣权威在货币商品的冲击下,一再

退让,^①但终究不能挽回其颓势,上教堂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而真正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又有几何?在东方,人们对佛教的信仰,总是与求福避祸、招财进宝夹杂在一起,搞不清人们究竟是在虔心向善,还是因为利欲熏心,看上去,释迦牟尼更像是世界之王的保护神。^②

宗教的神权尚且不能与世界之王抗衡,地上的世俗权威就更不在话下了。如果说汉高祖刘邦面对商人的恃“财”傲物和骄奢淫逸,“重租税以困辱之”。^③还有一定效果的话,那在商品货币关系大发展的今天,只能算是政治上的败笔了。当今的西方民主政府,在各大财团的包围下,其政策举措,多与资本的欲求相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至于货币金融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各国首脑对之拱手相让、揖之高座,惟恐过其门而不入,更成为平常的景观。

学者们近来屡屡论及,世界经济愈来愈一体化,地球也越来越变得像一个地球村。然而,在日益微缩的世界版图面前,世俗的权威又能有多少作为呢?克林顿的权力绝对不能与美元的权威相比,即使他能在世界事务中崭露头角,恐怕也是以美元的霸权地位来撑腰的。欧洲的统一已喧闹了多年,但有哪一位政治家有资格来充当统一欧洲的盟主呢?或许最能承担这一统一重任的只是欧元吧!反观各金融巨头在世界范围内的呼风唤雨,纵横捭阖,世俗权威显然已经相形见绌。不过,政治家们可以告慰的是,金融巨子的至上权威,并不是由

①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描述了基督教新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妥协,对人们的金钱欲望作了道德上的认可。

② 有趣的是,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对货币这个世界之王早就心存戒备,一直对之疾言厉色,急欲除之而后快。然而随着货币商品关系的发展,它们越来越抵御不住世界之王的侵袭,只好对之纡尊降贵,妥协退让。

③ 见《史记·平准书》。

于他个人的修养识见、聪明才干,而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世界之王这张王牌。

一枝秃笔,难以将世界之王的神威写尽,人类文明越发展,货币的神光就越耀眼,真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① 人类凭借自身的智识最终能否驾驭货币这个世界之王,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对人类文明的作用至深至巨,毫不夸张地说,文明社会的停滞与进步、昌盛与衰亡,系之于我们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有多深,把握有多大。

三、沧桑巨变

静态的和谐

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是如何进行生产来满足自己的消费。不难想见,当人类的祖先游弋于蔽日的林莽中,追逐于茫茫的荒野上,以采集渔猎为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时,其境遇是不同的。或许受大自然之恩赐,人们生活在气候温暖、植物繁茂的地区,有着取之不尽的天然食物,人们在其中优游取食,并无生存之虞;或许自然条件一般,人们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免于冻馁之苦;或许自然环境过于恶劣,人力无以回天,人们不流徙他处便坐以待毙。但不论人们的境况如何,在这一时期,人类完全受制于自然界,生产与消费的必然联系执掌在大自然这个造物者的手中。

^① 用《论语·子罕》中的这段话来比喻货币,的确是有辱斯文,不过仔细体味一下,这段话用在这里还是很妥贴的。货币关系越发展,人们对它的尊崇越高,对它的认识越需要深化。

到了农牧业时期,人类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能够再现自然的过程,以农业和畜牧业的方式生产出满足自身需要的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根本上改变了生存的状态。农牧业产品的生产,使人类有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但这些产品是否能够满足人们一年四季的需要,同样也存在多种可能性。如果年成好,人们生产的食物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后,尚有剩余;如果灾害频仍,食物生产大量减产,结果是饿殍遍野,以人相食;如果丰歉差强人意,食物产品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人们只好重操采集渔猎之旧业,以野生食物作补充。

可是,不论是采集渔猎还是农畜牧业,不论人们获得的食物是能满足还是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商品交换未发生前,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一个自内的、封闭的体系。在一个家庭或共同体内,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这种自我封闭的生产与消费,无论是自给不足、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有余,人们的消费都只局限在自己生产的范围内,生产的领域是狭小的,相应地可供消费的物品也极其有限。在这一状况下,自给不足,自然会促使人们努力生产,以达到自给自足。自给自足是一个饱和点,超过这一点,其产品是多余的、无用的。在这里,生产限制着消费,消费也制约着生产,生产与消费的这种互为制约,限制了人类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家庭或一个共同体,只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物品,自产自足,和外界没有交换关系。那么,当粮食和衣物的生产能够满足这个家庭或共同体的需要时,即达到了饱和点,如再继续生产,便是无用的、多余的。这里既有生产对消费的限制,又有消费对生产的限制。只能生产粮食和衣物,人们的需要和消费就被限制在这两类物品上;而当两类物品的消费达到饱和点时,也就构成了消费对生产的限制。因此,生产是有限的,

消费也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性是被统一在家庭或者共同体这一自我封闭的经济实体中。于是,我们便得到一个重要的命题:在自我封闭的原始经济中,人们的生产是有限的,消费也是有限的,生产与消费的这种有限性互为作用,滞缓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封闭式经济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一部分人的观点,那时人类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在一个氏族或共同体内,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相互之间不存在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人们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在共同的劳动中实现的,其生产与消费的对立运动,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进行的。或者换句话说,人们生存资料的获取,是人们共同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结果,在这一运动中,以人们的协同劳动为一方,以生产资料的存在为另一方,生产过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在协同劳动的人与人之间,他们并不曾作为不同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他们之间不存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关系,而是表现为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和谐性。按照另一部分人的观点,那时私有制家庭已经存在。即使是这样,由于封闭式经济把人们局限于家庭这个经济实体中,与外界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在家庭内部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当然也就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无论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个体家庭中,当商品交换未出现时,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不存在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

史前史时期人类的和谐友爱,古人早有洞悉。孔子把人类文明时代以前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大同社会,并作了理想化的描述,认为大同社会人们做什么事都出于公心,选择贤能的人来执掌公务。所以,人与人之间讲求信谊,和睦相处;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父母子女,而且兼及社会中所有的人;男人

女人都有自己的职业与归宿,人们努力地工作,并不只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财产怕的是被无端浪费,而不一定要归自己所有;社会罪恶无由而生,夜不闭户习以为常。^①

无独有偶,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海西奥德也把人类的原始状态称之为黄金时代,他写到:“鸿蒙初辟之时,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缔造了黄金般的生灵……他们像神一样地生活,无忧无虑;没有悲伤,没有劳顿。等待着他们的不是可悲的衰老,而是永葆的青春。他们欢宴终日,不知罪恶之骚扰。死亡之到来一如睡眠之降临。他们拥有一切美好之物,富饶而又慷慨的大地向他们奉献源源不断的丰收。在一片莺歌燕舞中人们和睦相处。”^②

古代先贤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理想描绘,并非完全受到后世学者的首肯,东汉时期的王充就认为对上古之世的美化是一种虚妄,指出“彼见上世之民,饮毛茹血,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地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③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也认为,海西奥德所称颂的黄金时代不过是一个神话故事而已,而人类的初始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孤独、贫困、肮脏、残酷和短暂的事件”。^④

以上两种对原始社会截然相反的认识,孰为真伪?倘使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上述看似矛盾的说法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孔子关于大同社会的那段话,主要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亲善,这在原始社会是一个不移的事实;王充的论辩则

① 这段描述的原文,见本书导言第3页注释。

② 转引自里夫金、霍华德合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7页。

③ 见王充:《论衡·齐世篇》。

④ 参见《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7页。

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物质进步。海西奥德的黄金时代描绘的是自然资源充裕的原始状态,人们优游取食,无忧无虑,人与人和睦相处;霍布斯所想到的是原始状态下人们受大自然的摆布、缺乏物质文明的悲惨境况。把这些观点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幅较为完整的原始画面:在原始社会,或者由于大自然的恩赐,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人们自由自在,食用不愁(海西奥德体察到这一点);或者自然境遇较为恶劣,人们必须艰苦劳作,方能生存(这是王充、霍布斯所想到的)。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主要取决于现实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人们耽于现状,无忧无虑;自然条件恶劣,人们艰难困苦,却增强了征服自然的潜能。不过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人类主要表现为屈从于自然界,人类的物质进步极其缓慢,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另一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们或者优游自在、相安无事;或者协作劳动,相濡以沫;人与人之间没有物质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而更多的是和谐与友善(这正是孔子极力阐扬、海西奥德也曾意识到的)。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对前面提到的重要命题有了新的补充,使之更为完整:在自我封闭的原始经济中,人们的生产是有限的,消费也是有限的,生产与消费的这种有限性互为作用,使人类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处于相对的静止状态;同时,人们之间不存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人与人的关系和睦友善。

无尽的追求

原始社会的末期,商品交换开始步入历史舞台,它最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间或地在台上跑跑龙套,偶然也充当一下替补演员。时间一长,商品交换这个小角色以其多变的身姿、花样翻新的演技,愈益赢得人们的青睐,逐渐登堂入室,

成了舞台上的领衔主演。商品交换的登台,把人类带入了气势更为恢宏、色彩更为斑斓的历史画卷,生产与消费这一人类社会的主旋律,因此也有了更为宽广的音域、更为丰富的音色,从而具备了无限的表现形式。

我们知道,在商品交换开始前,人们的生产是有限的,消费也是有限的,人们生产的剩余产品是无用的、多余的,人们的生产与消费互为制约,限制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理由如前述。

交换发生后,情况就开始改变。最初的物物交换,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时,剩余产品的存在已不再是无用的了,人们可以把它们用于交换其他物品,以满足新的需要。随着交换的扩大,社会分工的发展,进入交换的物品日益增多,人们的消费也向更多的方面扩展,社会生产的多样化,同样也带来社会消费的多样化,二者是同步的。这是就整个社会范围而言。

就个别家庭或共同体来说,交换发生后,生产变得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在交换的前提下,生产的物品可以和其他人生产的物品相交换,因此物品的生产不受家庭或共同体内部消费的限制,从而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是无限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既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区、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等),一个家庭或共同体,只能生产出某一定量的物品,尽管在交换发生后他们有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的冲动,但却不可能生产出无限多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说生产是有限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表现在个别家庭或共同体中的这种生产的有限与无限,其生产的无限性只是表明为一种运动的趋向,而生产的有限性则表现为一种既定的现实。

从消费的方面来看,也是如此,既表现出有限性又表现出

无限性。任何家庭或共同体,对某一消费品的需要量,在一定的时间内,总有一定的限度。这是消费的有限性。譬如一个五口之家,一年之内用于食用的粮食或者一千公斤,或者两千公斤,它毕竟是个有限的量,不可能趋于无限。但在消费的种类上,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却变得多种多样,有无限扩张的势头。当人们吃的需要得到满足,会要求穿得更暖更好;当人们穿的需要得到满足,会需求住得更宽敞、更舒适;……当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得以满足,还会生出更多的其他需要。所以说,消费又是无限的。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我们在谈到生产的有限与无限时,是把它们放在家庭或共同体内部来加之考察的;而谈到消费的有限与无限时,消费的有限性仍然还是把它限于家庭或共同体内部,但消费的无限性却是自外的,也就是说这种无限性决定于外部条件,决定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存在。然而,生产与消费这一对矛盾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消费决定了生产,生产又反过来引导或制约着消费,所以又有人说生产决定着消费。生产与消费的这种交互作用,也表现于生产与消费的无限性中。前面已谈到,消费的无限性是由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存在决定的,那么,生产的无限性呢,则又决定于消费的无限性,因为只有消费的无限扩大的势头,人们才有无限扩大生产的冲动。因此,消费与生产的无限,最终都是由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出现所引致的。

以上发生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上的变化,改变了自我封闭的原始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性,使事物的发展错综复杂化。生产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消费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二者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新的运动。在这里,和没有商品交换时不同,生产已不受家庭或共同体内部直接消费的限制,满足消费后的剩余产品不再是无用的,而可以通过交换转变为

其他消费品,从而使生产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同样,消费也不受制于直接性的生产,除了消费直接生产的物品外,还可以通过交换,消费其他人生产的各种各样的物品,使消费不断发展和多样化。这种新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使生产和消费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是,在既定的条件下,人们的生产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生产的无限发展,必然受制于生产能力的有限性。相反,消费的无限却取决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不受消费有限性的限制。因此,我们又得出另一个最为重要的命题:在商品交换的前提下,就个别家庭或共同体而言,其生产能力是有限的,消费则是无限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表现为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生产能力的有限,限制了消费的无限扩大,而消费的无限扩大,则又促使人们生产能力的无限发展。

这里提醒一下,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显得词难达意。这一矛盾使人类结束了野蛮,跃入了文明,在尔后的人类文明历史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推动和主导着历史的进程,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感受到它的存在,不过它往往以千姿百态的面目出现,使人们难窥其中真奥。

但是,在我们所说的物物交换阶段,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还处于萌芽阶段;货币的出现,才使这一矛盾取得了显著的地位。马克思以其哲学家的睿智谈到:“在质的方面,或按形式来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为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

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①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使用价值一般”,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它可以和商品世界中任何商品相交换。因此,如果说物物交换的出现使人们的消费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那么,只是在货币这一形式上,人们消费的无限性才找到它现实的代表。应该说,货币的量和质的矛盾,只不过是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的集中表现,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反作用一样,货币作为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又将反作用于这一矛盾,使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更形突出、更形尖锐。

一般抽象地看,人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商品交换产生前,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消费是有限的、易于满足的。商品交换产生后,消费却成为无限的。因此,在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中,表现为人们对消费资料的不同种类的无限追求;在货币的质的无限与量的有限的矛盾中,表现为人们对尽可能多的货币量的追求。最终,二者凝固在人们世俗的物欲之中,即表现为不断地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

以上我们是从完全的形态上来考察商品交换的出现对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但在实际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货币关系的这种革命性影响是逐步释放出来的,其时间跨度可以以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计。不过,商品货币关系的这种革命性影响,具有加速度的效应,愈到人类文明社会的后期,其影响就愈广泛、愈强劲、愈深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53页。

人与人的对立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在商品交换未出现以前,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在与自然界的共同斗争中获取的,不论是在采集渔猎时期还是在农牧业初期均是如此。人们之间不存在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而是表现为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或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和谐性。商品交换出现以后,情况则开始改变,人们虽然在根本上不能割断与自然界的纽带,仍然必须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汲取养分,但是他们却可以用间接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交换中,人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物品的让度来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消费需要,而不是直接取给于自然界。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人们生活与生产中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不只是人们自己直接生产的产品,还有部分甚至大部分消费品是通过与其他所有者的交换获取的。而且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不消费自己的直接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地取给于交换。这就是说,在商品交换条件下,人类要获取生存资料,不仅要与自然界作斗争,还要与其他商品所有者相对立。

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人们是作为不同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交换过程体现了不同所有者之间物质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具有不同物质利益的所有者,交换诚然使他们之间具有物质利益上的同一性,即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但是,他们之间的对立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在交换中总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双方之间的利益此消彼长,尔损我益,即是对立性的具体表现。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当商品交换出现后,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上出现了物质利益的对立性。这一对立性是人类相互关系中最重要变化。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最初人表

现为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显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①

人的这种孤立化或对立性,是如何完成的呢?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在原始社会的后期,人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完整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这种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正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在商品交换尚未出现以前,人们的这种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是人与自然界斗争的产物,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它体现的现实世界的联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藉以运动的对立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举例言之,人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因为人们在这块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是人的自由意志在自然物上的表现。人对工具的占有,是因为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对自然物质(如石头、树干等)进行加工和制作,形成对工具的财产关系。在这里,人们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或对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商品交换出现以后,人们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诚然,就人类整体而言,人类仍然是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依存或对立中来创造财富,获取财富,人与自然的关系或对立仍然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或唯一源泉,因而人们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主要仍奠基于此。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商品交换的产生,财富的范围和财富的总量都迅速膨胀起来。从个人的角度看,人们对财富的占有,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更主要地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中;不仅交换使人们的财富得以不断地扩展,而且反过来激人们努力生产,加速并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从社会的角度看,商品交换中所体现出来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对立、竞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497页。

争、激励、交流,对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社会财富迅速地扩张,人们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更为强化。因此,商品交换中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人类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商品交换的出现,不仅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注入人们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中,而且由此对立生发出来的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使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无限膨胀。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人们愈发依赖交换来获取生存资料,人们之间的对立便愈发普遍。同样,商品交换越发展,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就越突出,人们对财富的追逐便越疯狂。这里构成了一个交互关系:商品交换或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越普遍,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就越强烈;人们对财富的追逐越强烈,商品交换或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就越普遍。^① 在这种交互作用下,人类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日臻强烈,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中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日益普遍。

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的发展,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中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必然把人类分离为一个个互相对立的私有者。我们知道,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不管其表现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不管是财富积累还是财富耗费,从终极意义上讲,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并且最终体现为个人的消费。在原始社会条件下,人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或者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人们之间不存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性。即使那时的财产或者属于公有,或者属于私有,人们并没有因为

① 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随着其发展,往往会溢出商品交换的范围,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在以后诸章中将看到人与人之间对立的各种表现。

是不同的所有者而彼此对立。在商品交换条件下,人们不仅作为不同的所有者而彼此对立,而且在这种对立中人们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不断强化,这种不断强化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最终都将体现在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势必把人们分离为不同的私有者。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者。”^①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私有者,是彼此对立的私有者。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第三个重要的命题:在商品交换条件下,不同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存在的对立,使人类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财产关系不仅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对立,人们的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不断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亦更趋普遍,最终导致了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

从原始蛮荒到文明时代的过渡,比之为沧海变桑田,并不为过,导致这一历史巨变的,则是小小的商品货币关系。商品交换的出现,引致了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以及人们物质利益上的对立统一关系;当这两个矛盾世俗化为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我们就站在了文明的起跑线上。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原动力。它们又犹如铁路的两条铁轨,载着人类历史的列车,驶向文明之域,也把人类带入万劫不复的境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50页。

第二章 文明的基石

文明的泛滥,已及于地球的每个角落。把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作为文明的基石,不会是没有异议的,但可能最少异议。辩证唯物论中物质第一性的原理,如果运用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亦因之而起的制度结构、文化嬗演,都莫基于此。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以商品交换的发生和发展引申出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上的变化?这是本章必须要回答的。另外,农业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所有制基础,也需要论及,并且必须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相联系。当论证展开时,我们便发现,传统的所有制理论,容量不够大,因而不得不对所有制关系作了新的类分,提出文明形态所有制的二重属性,以期能增强论证的说服力。

一、还是所有制问题

新的类分与定义

大部分西方学者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看作亘古不变的永恒,视而不见它的历史变迁,自然也就不会把它的演变过程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马克思站在前人从未达到过的高度,纵览历史风云,从纷杂的过往云烟中辟理出以物质生产为基础

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脉络,并把它视为一过程,是活生生的、发展变化着的有机体。承袭于这一原理,遵循着唯物辩证的精神,因应时代的发展,我们不应无所作为。

传统的理论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分为两大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分为原始公社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则依次表现为奴隶主所有制、封建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三种形式。这五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依次更迭,相互继起,因此人类历史相应也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以上这种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划分法,忽视了小私有制的存在,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内,都普遍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小手工业者和自耕农,他们的生产资料属于个人私有。把这种小私有制摒除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定义之外,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内涵有所欠缺。对于这一责难,人们也许会嗤之以鼻,并继而用轻蔑的口气驳斥道:在传统的划分法中,只是强调五种所有制是以其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形式决定着五种社会形态,并没有否认小私有制存在的意味,仅是把小私有制视作次要的、附属的所有制形式,何必要利用这无关紧要的小私有制问题来故弄玄虚呢?

与此相反的另一观点认为,小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温床,它会经常地、随时随地地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敌。这种观点在“文革”时期占据了上风,并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政策中大显身手,把“自留地”、集市贸易、小商贩、小手工业等都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副谈虎色变的样子,力图刈除务尽。把这种观点与以上那种对小私有制不屑一顾的观点相对照,形成两个极端。在我看来,小私有制既非可以忽略不计,又与传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有根本

的区别,而且对于理解所有制难题有重要意义。

通常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系指生产资料为少部分人所私有,并以此为条件进而奴役和剥削劳动者的所有制形式。在这一形式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首先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阶级对立关系。小私有制则不同,不论是小手工业者还是自耕农,他们自己占有生产资料,自己生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说,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小私有制在性质上是迥异的。

通常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只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只与阶级社会相伴随;而小私有制则与人类历史相始终,它不仅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原始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能随处发现它的踪迹。尤其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乃至以后的社会形态中,小私有制的作用和影响也许会越来越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也会日益重要。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小私有制的一个重要区别:生产资料私有制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而小私有制则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中。假如西方学者所说的永恒的私有制是指小私有制的话,或许具有真理性。

通常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小私有制不仅在性质上不同,在所占据的历史跨度上各异,在历史成因上也有根本的区别。小私有制作为更为恒久的所有制形式,自人类有意识地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时便已出现,它起源于人们自己生产、自行占有这一自然行为,表现为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往关系;而以人与人的对立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其历史成因则要复杂得多,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作专门的阐述。

通常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人剥削人的阶级对立

为前提,但当它们作为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出现时,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更显明地说,当奴隶主所有制取代原始公社所有制时,它是进步的;封建主所有制取代奴隶主所有制时,也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取代封建主所有制,还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更是进步的。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由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则是一种退步。因此,当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时,人们所欣喜的主要在于剥削制度的消灭,而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存在。当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这是不容置疑的。按照这种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复活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种退步或反动。但是,这种复活在现今历史中是不可抵遏的,并由此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显然,通常的理论已经不能涵盖变化着的历史现实,需要新的包容量更大的理性说明。

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分为两大类:自然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文明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自然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被定义为劳动者个人或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而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自然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又分为自然形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当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时)和自然形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当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时)。自然形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简称为自然形态的私有制)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即通常意义的小私有制;自然形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可简称为自然形态的公有制)仅只存在于原始社会,即通常意义的原始公社公有制。

文明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简称为文明形态所有制)被定义为生产资料被个人或部分人所占有,并以此为条件迫使

劳动者为其生产,进而从中谋取财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对立。文明形态所有制与文明时代相伴随,具体表现为通常意义上的奴隶主所有制、封建主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即通常所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①

文明形态所有制的成因

文明形态所有制从总体上看,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即在这类所有制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表现为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却丧失了生产资料;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与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整个经济过程中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主要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决定。一般都认为,文明形态所有制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们的类分中,文明形态所有制是一个系列,依次表现为奴隶主所有制、封建主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文明形态所有制出现以前存在的是自然形态所有制,是什么力量使自然形态的所有制转化为文明形态的所有制呢?

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消费外,还有剩余,于是便产生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愿望和可能,并进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以实现占有剩余产品的目的,从而形成了文明形态所有制的第一形式——奴隶主所有制。其实,这种解释是大有纰漏的。既然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能满足自己的消费,并有剩余,那么人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占有他人的剩余产品来满足自己的

^① 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里既没有归入自然形态的公有制,也没有归入文明形态的所有制,主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正在变革之中,尚无定型。

需要呢？问题解释者的唯一选择是，占有他人剩余产品的人是那些产品尚不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人。如果选择这一回答，问题就更多，因为产品不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劳动者，所掌握的生产力显然比较低，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应也要少一些。如此，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悖谬的结论：落后的生产力决定文明形态所有制的产生。问题还不仅止于此，就算我们选择生产不足者占有生产有余者的剩余产品这一回答，那么，当生产不足者占有的剩余产品已能满足自己需要，达到和生产有余者相当的消费水平时，占有过程也就该结束了。然而，文明历史所展现了我们的却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到此为止，“剩余产品说”已三现其身：一是认为剩余食品的存在是文明产生的前提；^①二是剩余产品导致了交换；^②三是剩余产品使文明形态的所有制得以形成。由此可见，“剩余产品说”已经深入人心，在解释历史时屡屡得手，成了历史研究中的误区。

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已观察到，在江南的某些地区，虽然原始农业已经存在，但是地广人稀，自然食物丰饶，衣食不愁；人们懒散闲适，不必艰苦的劳作，也不积攒财物；没有贫富分化，更不存在阶级对立——这一切都是因为未发生商品交换。^③司马迁的这段记叙可以这样理解：虽然有农业的存在，虽然有剩余的食物，但如没有商品交换，人们便不会努力地工作，拼命地积累财富，也就不会有贫富分化和阶级的对抗，当

① 见本书第3页。

② 见本书第15页。

③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眚蠃偷生，无积累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

然更不会有奴隶主所有制的诞生,不会有文明时代的到来。

商品交换的出现,却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上一章我们已经说明,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和发展,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表现为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同时也产生了人们之间物质利益上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两个矛盾相互作用,外化为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作为私有者的普遍对立,那么,它们是如何推动自然形态所有制向文明形态所有制转化的呢?

在商品货币关系中,人们消费的无限扩大,迫使人们尽力地去追逐财富,而个人生产能力的有限,又往往为财富的积累设定了限额,以个人的劳动来积攒财富,这对人们迅即膨胀起来的物欲而言,是太迟缓太费事了。既然人们在交换中已了解到在他人手中有着自己所欲的全部东西,既然人们已分离为彼此对立的所有者,既然人们曾经为争夺原始栖息地而进行战斗,那么以暴力的旧形式来实现攫取财富的新内容,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难怪古希腊人曾自豪地认为,能用刀剑获取的如果改由劳动获取,是一种耻辱;他们崇尚武力征服和暴力掠夺,勇武悍猛被视为人生美德。在古代社会,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过渡的过程中,以暴力手段去掠取他人财富几乎是一个通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以及人们作为不同所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而暴力手段只是人们在与他人对立中追逐财富的一种习用的形式。

固然,暴力掠夺是人类最初积累财富最本能最快捷的手段,但并不排除以其他方式获取财富。当商品货币关系侵入原始社会内部,把人们逐步分离为一群群的私有者时,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同样也会表现在原始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氏族的酋长、部落的首领、共同体的祭司或巫师等握有公共权力的人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共同体内

部原有财产的分配中,在与其他共同体战争所缴获的战利品中,在共同体外部通过交换所获取的物品中,多分一杯羹,必将渐习为常,而且在追求个人财富无限增长的推动下,将愈演愈烈。人们或许会发现,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谋求个人财富的增殖,比起暴力掠夺来更惬意更无风险。

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的财富欲望的急剧膨胀,是和商品交换密不可分的。人们自然不会忘记通过经商来致富这样一条捷径,尤其是那些较早地主动地进入商品交换的部落或民族,或者利用他们适宜的地理条件,或者凭藉长期积累的经商经验,专门从事商业贸易来获取财富。比如古代的腓尼基人即是如此。在古代,经商能够较快地致富,是有定评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突出的供求矛盾、垄断或半垄断的商业行为、人们商业意识的过于悬殊等因素所决定。对此我们在后面有较详细的讨论。^① 这里所要强调的只是,人们的致富冲动,在商业行为中也有其重要的表现。

但是,不论人们获取他人财富的手段是暴力、权力还是经商,也不论财富的形式是货币还是直接的消费品,人们在无尽的财富追逐中终将认识到,凭恃暴力掠夺有时或尽,依靠权力占有亦非长日,而真正的社会意义上的财富最终只能来源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失却了这个源泉,不管人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如何地花样翻新,都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当人们这样想时,他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以个人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来创造有限的物质财富(这种思想已被他自己所扬弃),而是想到如何利用他人的更多的劳动,来实现自己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于是,人们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迫使他人人为其劳动,从而占有他人的

^① 参见本书第五章“贱买贵卖之灵窍”一节。

劳动成果,便成为文明社会人们无限追逐个人财富的主要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不言而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糅合各种相关因素的歧异,文明形态的所有制将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奴隶主所有制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封建主所有制作为它的替代形式,是一种进步;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成正值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这些都是下面将要分别论之的。

二、农业社会

情有独“衷”的奴隶制

人们对财富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必然把人们引至财富的源头——生产过程中,这犹如孜孜以求的学者,必然会达到所研究的问题的本源之处。人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只有控制了生产过程,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来源。另一方面,在商品交换中形成的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统一关系,诱使人们在人与人的对立中来实现财富的增殖。因此,商品交换所产生的这一双孪生姊妹——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以及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在特定的历史土壤中,终于滋生出作为文明形态所有制之一的奴隶主所有制。

奴隶主所有制是以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并迫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而占有劳动成果的一种生产方式。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并最终占有劳动成果的人,被称为奴隶主;被奴隶主占有的劳动者,被称为奴隶。奴隶归奴隶主所有,他们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利和自由,可以被任意买卖、遗赠,甚至屠杀。奴隶的来源各种各样,如战俘、为满足对

劳动力需要而进行的绑架、奴隶的买卖、因犯罪而受到惩罚的人、奴隶自身的繁衍……奴隶被广泛用于土地耕种、开矿、家庭劳役、手工作坊劳动等方面。奴隶主所有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不相同。

人们习惯于对奴隶主所有制作道德上的责难。资产阶级的学者以天赋人权指斥奴隶制的非人道,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从阶级压迫的角度对奴隶主进行否定,而马克思更倾向于把历史看作一个过程,把奴隶制视作历史的必然。老黑格尔说得对: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撇开对奴隶制的道德判断,我们面对的将是冷峻的历史现实。

不杀掉战俘,把他们当作奴隶使用,这种作法,人们称之为一种进步,未始不可;但如为了得到劳动力有意识地去捕获奴隶,是否也可以视为一种进步呢?在原始社会,人们把战俘杀掉,甚至吞噬其肉,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不把战俘看作同类,而视为动物或异种,是原始人类生存的客观需要。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当人们意识到捕获战俘使之成为奴隶能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时,人们不会被动地满足于把战俘转变为奴隶,而会把获取财物和奴隶作为战争的直接目的。人们过去也许只是为了争夺生息之地偶尔与其他氏族或部落发生争斗,现在则是为了夺取他人的财产以及占有他人而经常进行战争。战争的性质变了。但有一点却没有变,即人们仍在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斗争,只不过生存方式由原始的野蛮的变为文明的。

也许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如果不是把战俘当作奴隶,而是把他们当作封建制度下的佃农,不是既能达到剥削的目的,又能显得人道一些吗?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却不容许我们作这样的遐想。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在不同的氏族或各个共同体之间,盛行的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这种社会达

尔文主义,即使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很久之后,仍不乏其见。因此,任意处置战俘,是通常的行为方式。以此为前提,并与此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我所获取的就是我应该占有的自然法权的财产观念,一旦和以战俘为奴隶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必然产生奴隶主占有奴隶这一令后人愤懑不已的生产方式。

人们只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他的行为、意识必然受制于现实的历史条件。当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当人们把自己不论以什么方式获取的都看成是自己所有的,当商品交换使人们的贪欲无限膨胀,当把战俘当作奴隶有利可图时,奴隶主与奴隶在历史中的地位也就这样定格了。无论我们今天对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历史事实如何看,但在当时当地,我们的当事人——奴隶主与奴隶,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许只能默然身受,难以逃脱历史的樊篱。这令人想到近代欧洲的奴隶贸易,奴隶贩子们最终把贪婪的目光聚焦在原始非洲的大地上,确实显得很精明,因为非洲的原始状况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观念意识,是最适合于他们所推行的奴隶制的。更为精明的是,他们把非洲人说成天生为白人效劳的异类,是需要他们帮助使其进入文明社会的野蛮人,以此来为他们的暴虐行为辩解。^①

奴隶主所有制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条件,是土地占有关系的未完整性,这一点在种植业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方面的奴隶制必须以奴隶主占有土地和奴隶为前提,但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很多地区地广人稀,只要人们愿意,都可以进行处女地的垦殖并进而占有之。奴隶主不可能对全部土地实行垄

^① 参见杨人梗:《非洲通史简编》,第七章“西方殖民主义者贩卖非洲黑人始末”,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断,土地权属关系并未划分完毕。因此,奴隶主不占有奴隶的人身,便不能迫使奴隶为其劳动,也就不可能实现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因为奴隶如果有人身自由,他尽可以自己开垦土地,为自己的生存而劳动。当美国北方的自由工业区谴责南方蓄奴诸州的奴隶制时,在他们的慷慨陈词中并未见得比南方的奴隶主有更多的人道主义,北方工厂主是在用工人无法获取的生产资料——资本来迫使无产阶级为其劳动的,而南方的农场主们则深深地知道,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土地却没有这种强制性,只要解放了奴隶,他们自己便濒临破产。解放后的奴隶会用自己的双手开垦唾手可得的处女地,谁还甘愿受农场主的役使呢?

奴隶主所有制并非普遍开花,遍地结果,当一些氏族或部落进入奴隶制时,相邻的一些地区也许还处在采集渔猎时期或者原始农牧业时期,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未曾见过的。相比之下,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更为优游自在,懒散闲适。当别的共同体把奴隶制强加在他们头上时,除了暴力一途,除了强制他们为奴隶,其他方法是不能得逞的。这也是奴隶主所有制为什么一定要采取暴力强制的因素之一。与这一情况相印证的是这样一个史实:英国的圈地运动把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来,而工业兴盛所带来的繁荣使资本家们迫切需要劳动力,但无家可归和无事可做的农民却不愿到资本家那里报到,宁愿乞讨流浪,以致英国国会制订出严厉的法令,强制农民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轭下。现代资本尚且不能诱使封建农奴自愿加入自由劳动大军,自由自在的原始人就更不会自觉接受奴隶主的暴虐统治了。由此可见,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时,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受到抵制,尤其在这种替代中当事人不能感受到任何好处而唯有痛苦时,这种抵制会更强烈。

奴隶主所有制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自身的必然性,商品交换所引致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之间作为私有者的普遍对立,是奴隶主所有制产生的内在的根本原因;而历史现实所决定的人们行为方式、观念意识,土地占有关系的未完整性,以及新旧生产方式转换固有的心理排斥等因素,则决定了作为文明形态所有制之一的奴隶主所有制形式。如同奴隶主所有制的形成与发展一样,奴隶主所有制的衰亡也有规律可循。不少历史学家客观地指出,当奴隶的非人待遇使其怠工、破坏工具、逃跑等现象普遍出现时,奴隶制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当然,奴隶主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只有新的生产方式能够取代低效率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并且能而且主要能给统治者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时,奴隶主所有制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中西方封建之轩轾

由商品交换所引致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使奴隶主所有制的出现成为必然。但是,奴隶主所有制下奴隶的非人待遇,使奴隶的劳动热情丧失殆尽,生产力的发展大为受阻,相应地对奴隶主榨取所生产的物质财富也有不利的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种较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较能增加统治阶级利益的生产方式——封建主所有制也就应运而生。

如果说奴隶主所有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么封建主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就更是五花八门。撇开形形色色的封建主所有制的具体表现,把它们作一抽象,中国学术界大体上把封建主所有制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

封建领主制是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普遍实行的

一种封建制度,它是以封建领地、农奴制和庄园经营为特征的。国王和封建领主拥有大量庄园,庄园的土地一部分分给农奴作为他们的份地,一部分是领主的直属地。农奴依附于领主,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每周以一定的时间在领主的直属地上服役,提供劳役地租。同时,还要向领主提供各种实物,并缴纳捐税、使用费等。农奴与奴隶相比,其经济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他们自有工具和牲畜,或使用领主的生产工具,在领主分给他的份地上生产,生产物除了上缴领主的之外,其余部分归自己支配。农奴有自己的家庭,可以娶妻生子,而且份地一般是世袭的。这样,农奴就有了较高的生产积极性。

范文澜先生认为,在中国,从西周到秦统一,是封建领主制,秦汉以降,则为封建地主制。封建地主制主要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但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以土地国有制为主还是以土地私有制为主,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这些争论盖因于如下的史实: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每朝每代的皇帝大都控制着数量可观的“公田”或“官田”,这些土地或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由士兵或奴婢耕作,或作为赏赐给予贵戚大臣,或“假于贫民”,租佃给农民耕种;在这种情况下之外,皇帝还不时下达“占田”令、“均田”令、“垦田”令,对全国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并实行租庸调法。这些做法,令人不免产生土地国有的印象。另一方面,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则是,从战国开始,就出现了土地的地主私有制和小农私有制,并且更主要的是这些私有土地可以自由转让,自由买卖,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私有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使地主所有制得以普遍泛滥。

但不管是以皇帝为统治阶级代表所占有的“公田”或“官田”,还是归地主、官绅或寺院私有的土地,实质上都是通过对

土地的占有,迫使劳动者为其劳动,从中榨取生产物品。在具体的形式上有租佃制、佣耕制、庄客制、屯田制……但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租佃制和佣耕制是主要的剥削形式。所谓租佃制,就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向土地所有者租土地,进行耕种,定期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有时还须向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而佣耕制则是农民以打短工或做长工的方式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为地主耕种土地和做其他杂活,以此来领取佣金,维持生存。无论是租佃制也好,还是佣耕制也罢,被剥削的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私有财产,在人身关系上相对也是自由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封建社会中的自耕农,他们有自己的土地,自耕自织,自给自足,在这种意义上,不应该把他们放在地主所有制中来考察。倘若把他们放在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发展的趋势中来看,我认为有必要把他们纳入地主所有制的分析中,其理由有二。一是自耕农的小土地,不论其来源如何,在封建压迫和土地自由买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很大一部分将被封建地主所兼并,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在两个朝代的更迭中,由于战乱兵燹,田园荒芜,人口流离,为了恢复生产,新的统治者会鼓励人民垦殖荒地,产权听其私有;或颁布“占田”令、“均田”令,把土地分给农民。一时之间,小土地私有者普遍皆是。但到了这个朝代的中后期,大量土地又集中到大小地主的手中,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又形尖锐,往往酿成新的社会动乱。其二,自耕农表面上虽然不受地主的剥削,但官府或朝廷的租庸调或其他赋税形式,往往使农民不堪其负,迫使农民归附于豪族大户,求其荫庇,从而沦为农奴。这种强征暴敛,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负,而是具有封建剥削的性质。因此,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小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的封建制中只是一名附庸,一种向地主所有制过渡的形式。

关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我们还要多说几句,这关系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公案,论说的范围不只局限于封建土地所有制,还将涉及别的方面。

也许震慑于近代西方的技术进步,也许为文明中华的衰败而扼腕,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引发了一场争论,论及“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在这场论战中,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认为中国社会是停滞的,极端者认为自从周期以来,中国社会就长期停滞不前,只是在不断的改朝换代中循环往复。反对者则强调中国社会并非长期停步不前,而仍是有进步的,只不过相对西方封建制来说进步迟缓而已。抗日战争开始至建国前一段时间,争论又起,仍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是停滞的,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长期停滞”的提法不妥,改称“发展迟滞”,“发展迟缓”。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一争论继续进行,在提法上更为和缓一些,论题转换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长期停滞”改为“长期延续”,但在字里行间总让人感受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光彩,而让人体验到的仅是中国封建落后的忏悔。这场争论在“文革”期间停止,之后又再度兴起,这时的中国人已经从西方列强凌辱中华的梦魇中警醒过来,在历数中国落后的原因之际,人们并没有忽略中国封建社会曾有过光辉灿烂的一页。^①

其实,把中国封建与西方封建相较,孰为优劣,可以立判高下。近代西方国家在人类地球上高视阔步自得意满之后,转眼于世界历史,逐步地、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古典文明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前的西方史学家,大多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西方文明之外的世界,当他们的无知被

^① 关于这场争论的全过程,详见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更多的历史知识填充的时候,才逐渐地、不无勉强地承认其他文明的璀璨。在韦尔斯的笔下,中国在六、七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之间,领先于世界。^①斯塔夫里阿诺斯以更为肯定的口气说到:“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传播许多文明。”^②汤因比在他写作《历史研究》时,对中国文明也许还不以为意,只把它看作一个行将就木的文明,但在他70年代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对中华文明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把世界统一的重任寄望于中国的传统文化。^③

比照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褒赞,我们的论战者们显得过于气馁了。当人们责怪自己的老祖宗总是这样总是那样或者为什么不是这样不是那样时,自己难道不汗颜吗?我们的祖辈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明遗产,尤其在秦汉至明末近两千年的封建时段中,独步海内,几无能望其项背者,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把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相比,有可比因素吗?中国在封建时代把技术、文明、友善传播到世界各地,而西方资本主义则用大炮、强权和嘲辱回敬中国,这就是我们所要景从的西方文明?诚然,西方文明有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方面,但中国的优秀文化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展,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尤以封建制度为最。设想一下,倘没有中国封建社会这一页,中华文明甚至世界文明将会如何地残缺不全?

秦汉以前的中国,并未领先于世界,至多与古印度、古希

① 见韦尔斯:《世界史纲》,第629—63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以前的世界》,第336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参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93—295页。

腊并驾齐驱；秦统一后的中国，则逸群出众，稳居于世界之首，几达两千年。这并非是中国入种优于列邦，亦非地理环境天作之故，而主要在于我们的封建制度。近人对待中国之封建制度，我认为好如一比：手捧和氏玉，却当烂石头。当然，封建制度并不是信手拈来就可以用的，不经过去芜存精，不经过抛光打磨，不经过洞隐烛微，不经过精雕细琢，和氏璧岂会再放异彩？希望海内外华人都来做这项艰巨的工作。作为引玉之砖，我认为中国封建的土地制度和以孔子思想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是起主要作用的方面，其他的如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用人制度……亦有足以多之之处。下面我将对封建土地制，先谈一点意见。

秦汉以后，中国封建土地制与西方的封建领主制有重大的区别。在中国，土地归地主或农民私有，可以用买卖、转让、继承、出租等方式任意处置；而在西方封建制中，把土地分封给领主，领主也可以再把土地分封给封臣，但这种分封随时可以撤消，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领主或封臣在他的领地上只有使用权或占有权，而无所有权。难怪韦伯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废除了封建制度，奠定了土地私有制。这一过程在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才开始。他所说的封建制度，指的就是西方的封建领主制。^① 其次，西方的封建领主制实行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合二为一，领主不仅部分占有农奴、土地以及其产出，同时在他的领地范围内还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权；而在中国，地主只具有经济上的权属关系，行政司法权则由国家统一控制。再有，相对而言，西方领主制是封闭型的经济，各个领地自给自足，彼此孤立，极少与外界有经济交往关系。中国的封建制则具有开放性，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进行集市贸易

① 见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81页。

自不待言,地主阶级除了经营土地外,还兼营高利贷、手工作坊、商业等经济活动。最后,中国的农民不论租种地主的土地,还是耕作自己的家园,他们在人身关系上是自由的,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而西方的农奴则被固着在领主的土地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诸多的封建束缚。

比较了中西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不难看出,中国的封建制明显优于西方,其直接性的结果,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政经分离的封建土地制,为大一统的帝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战乱时有发生,分分合合,但最终却归于统一。另外,中国自由的小农有较高的劳动热情,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在滩涂山野中开辟草莱,到苦寒极北之地屯垦开边……艰难困苦,在所不辞,皆因于他们自己的收获和自己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经济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工商业的繁荣,场面之大,地域之广,商品之多,为世界各国所仅见,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屡有记载,其主要原因在于土地的自由买卖,财富聚积的无限冲动。人们的自由流动以及国家统一所带来的商旅之便,也是重要的外部条件。

从消极的方面言之,中国封建的弊端也历历在目,由土地自由买卖所引致的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是世界仅见的。此外,统一的专制帝国在政治腐败时的横征暴敛,往往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变本加厉:一是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度,高高在上,不恤民情,认为可以无限制地增加赋税,以饱私欲;另一是各级官吏因循相陈,上行下效,敲榨勒索,假公济私。这样,在广大的疆域内将会产生普遍性的恶果,为害尤烈。因此,在封建地主和封建帝王的双重压迫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触即发,这也就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最多最烈的根本所在。

诚然,中国的农民起义在客观上表现为封建化过程的中

断以及社会经济的破坏,但是并非如某些论战者所指出的那样:“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① 因为农民起义只是封建生产方式中社会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农民起义有什么消极影响,那只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被动的表现形式,况且每次农民起义客观上都不同程度地缓解了社会经济矛盾,使封建社会得以继续发展。这就犹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同时又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统而言之,正如任何社会都有自身的弊病和社会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也不例外,但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从国家的统一与强大,从经济生活的富庶与活跃,从文化艺术的昌明与繁荣,从伦理道德的博大与深厚,从人文精神的崇尚与执著……等等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都是无以伦比的。人们或许还会追问,中国封建社会既然如此文明进步为什么会停滞不前,不能较早地进入资本主义呢?看来暂时只有这样回答,从上一个社会形态进入下一个社会形态,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先行进入,比如秦国较六国先进入封建地主制,英国、法国较印度和中国先进入资本主义,苏联、东欧较西欧诸国先进入社会主义……这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另外,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有其特定的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予以说明。最后不无强辩之嫌的是,“停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倘若世界都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也许还要为自己的千年帝国、万年盛世而山呼万岁呢!

^① 见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第184页。

三、资本主义“宁有种乎”

近代文明之星在西方升起

谈到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了,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存的中国人,即便是没读过几天书的人,对资本主义也并不陌生,只是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幻,人们的认识也曾经历过鄙弃—迷惑—欣羡的历程。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认识,不少人仍还置身于亦好亦坏、亦喜亦惧的摇摆中。

翻开每一本教科书,关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说明或解释便一览无遗:它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者为特征的私有制。这一私有制的建立,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出现了大批无产者,他们有人身自由,但失去了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2)大量的货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雇佣工人进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这一私有制使手工劳动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生产,实现了生产的社会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商品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统治地位,并且这种商品生产是以资本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目的的。

对于以上的定义并不是没有异议,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把它通通斥为伪说,这是不无道理的。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分析,至今仍闪烁着科学的洞见,毋庸置疑。但是,另外一个争论却不容回避,就是关于资本主义所有制起源的问题,亦即近代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至今还悬而未决,争论迭起,而

是在于人类大多数仍然生活于其中的这种制度,不仅昭示了过去,而且将预示着未来。

在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专著中,我们却难以寻觅“资本主义起源”的明确解答,他就像一个开自助餐馆的老板,各种菜肴调料纷然杂陈,听君选用,让读者自己去拼凑“资本主义起源”这道大菜。也许这样议论布罗代尔有失公允,他并非全然对“起源”问题不置可否,他认为“也不能完全都用物质因素、社会因素或社会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起源于单一的因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文明都曾对它产生过影响。历史也往往作为力量对比的最后裁决者起作用”。^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不能以任何单独的因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在众多的因素中他列举了基督教的扩张主义、西方的文艺复兴、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新的经商技术的使用、民族君主国的崛起等因素来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源。^②

乍看韦伯的书,你会认为他是以单一的因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他把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过后,他又指出合理的劳动组织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和原因;末了他却又在新教伦理中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③

相对于以上学者主次难分,过于散乱的历史解释,诺思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似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他直接以产权

① 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431—432页,三联书店,1993年版。

②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二章。

③ 参见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四编。

结构的变化来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可谓直抒胸臆,痛快淋漓。^①可惜他的立论却令人难于苟同。其他的如以地理的位置、人口的增加、新大陆的发现等等旧说为指归的见解,虽也有简明清爽的优点,然而却不得其中真味。

我认为,还得以商品交换的发展及其所蕴含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这样做不是没有风险,它首先面对的责难也许来自两个方面:(1)文明社会以来一直存在商品交换,为什么只是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才开始引发资本主义呢?(2)同时期的中国,商品交换的发展比之西欧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是最早在中国发轫呢?这确实是两个较难回答而又不能避而不答的问题。

我首先要用布罗代尔来抵挡一下:“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的存在都有一些前提条件,决定性的条件是流通,而且几乎可以说,仅仅是流通。”^②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无一不是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如影随形,但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其内在联系,绝对不是简单地寻章摘句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把一些历史事实铺陈出来就万事大吉,需要理论与实践的交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让我们从一个不争的史实出发,来回溯西方资本主义的源头。在11至15世纪之间,西欧各地兴建了许多屋宇、大教堂、修道院,附丽于这些美观的建筑物,一座座西方中世纪城市诞生了。^③这些城市在经济上、政治上甚至军事上都有自主的权利,“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

① 参见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二篇,第十一章,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647页。

③ 参见韦尔斯:《世界史纲》第三十七章,第七节,“新兴的欧洲城镇”。

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定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点在下面这个惯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①一个人逃到城市,在一年之内不被他的领主捉到,便成为自由人,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稀罕,但对于西方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制而言,则至为重要。西方不少学者都曾引证这一事例,可以想见,中世纪西方的城市自由与农村的封建专制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更为重要的在于,这种自由的城市不仅与古罗马的城市迥异,而且同时期较之繁华得多的中国城市在其自由度上亦不能与之比肩。马克斯·韦伯对此作了较详尽的比较,其他方面姑且不谈,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且最能说明中世纪西方自治城市优势的是这样两个方面:(1)它在经济、司法、政治上的自主权,是同时期西欧以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不可比拟的。(2)它首先是以市场机会为其生存条件的,主要是一个经济的、工商业行会的实体,政治实体的含义只处于次要的位置。这又把它与古罗马的以行政或军事需要为主的城市区别开来。^②正是以这种西方城市

^① 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464页。

^② 参见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二十八章。此外,中国的古代城市也与古罗马的城市近似,其存在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在城市中,真正的工商业者只占较小的比例,大部分是官吏、地主、军队和游手等消费人口。还有,中国的古代城市从未获得过西方自治城市那种自主权。参见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十二章第二节,三联书店,1979年版。

为契机,近代西方迈向了资本主义的历程。

举世无俦的西方自治城市,是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兰西的启蒙运动、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英格兰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一不是藉助西方自治城市这个舞台,方才上演了如许的资本主义英雄史诗。我无意于把西方文明复兴的所有精彩场面与商品交换的发展硬凑在一起,从而得出没有商品交换的勃兴便没有一切西方文明成果的机械性结论。但是,商品交换在总的趋向了对西方文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或多或少、或速或缓、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人们在历数近代西方文明早期的辉煌成就时,或是忽略了商品货币关系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决定性作用,或是仅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来认可;我所要再次强调的是,商品货币关系是一切文明内在的决定性的力量,西方近代文明也不例外。

在上一节中我们曾经谈到,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由于商品交换的稀缺,人们的消费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马克思不无调侃地说:“领主的肚皮给他对农民的剥削设了一个限制。”韦伯在谈到封建领主庄园制时引用了这句话,他明确指出:在自给自足的封建领主经济中,农民除了为维持本身生活和上缴给领主的贡纳以外,对增加土地产品不感兴趣;而领主在**为市场生产以前**,对增收贡纳也不感兴趣。^①这又一次证明,在没有商品交换或商品交换缺乏的前提下,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都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也予以证实,他在《国富论》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在没有交换或工商业很不发达的西欧封建领主经济中,领主们视剩余产品如草芥,慷慨大方,无端挥霍,对于农奴上缴贡

^① 见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61页。

纳的多寡,也不计较,有时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微不足道的地租;一旦商品交换发展了,侵入封建领主经济,领主们便一反常态,变得吝啬起来,并竭力增收农奴的地租。^①

亚当·斯密所说的商品交换发展后的情况,就是中世纪西方自治城市的出现所导致的。韦伯也肯定地认为,自治城市中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以及市场活动和市场利益在农村的发展,是导致封建领主制解体的主要原因。^②从一开始,西方的自治城市就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实体,而摆脱了封建羁绊的城市自由,更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如虎添翼。自治城市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封建领主经济,把城市和乡村都投入到商品经济的炼狱中;人们在物质利益的诱导下,在商品交换内在矛盾的驱动下,拼命地挣钱,努力地工作,使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提升。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宗教、文化、法律诸方面的一系列改变。所以说,近代西方的文明之花,是在自治城市这块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绿洲中绽放的。^③

中世纪的欧洲人在本土的商业交往中尝到了甜头,他们将目光转向富饶的东方,当奥斯曼帝国阻断了他们通往东方的海上通道时,他们希图横过大西洋去到神往的东方。于是,

①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三篇第四章。

② 参见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80—81页。

③ 自治城市(实质上是商品货币关系)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和破坏,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市民阶级有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的。……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骑上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因此,在15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处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装的市民的城市;它们通过货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自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49—451页。

新大陆被发现了。每一部关于近代西方的历史书,都详略不同地谈到这一浪漫的激动人心的发现。再接下去的故事就不那么浪漫了,强盗式的掠夺、亚强盗式的不平等交换、完全强盗式的攻城侵地,西方人成了瓜分世界的饕餮。西方的殖民运动,为西方各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某些学者认为,正是这些财富,成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历史条件。然而,大多数西方史学家耻于承认这一点,他们提出种种因素,认定西方文明另有所原。诚如斯言,但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贸易的扩展,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更上层楼,不能不说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吧!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司马迁的这句名言,西方人也许是实践得最好的了,他们的商船肆行无忌于各大洲,他们在世界各地开设商埠,源源不断的货币财富潮水般涌入西方国家。更有甚者,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生意都做,从令人发指的奴隶贩运到吸人膏脂、毁人家国的鸦片贸易。他们坚信,只有经商,只有对外贸易,才是最终致富的法门,早期重商主义由此从出。勿庸讳言,早期海外贸易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巨额利润,有如一股无法抵御的神力,驱使西方人奔向四面八方,去从事几近疯狂的贸易活动。与此相伴,商业、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科技进步……也展现出蓬蓬勃勃的景象。

从事贸易确实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尤其在不平等竞争或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前提下更是如此;而高额的利润又能最大限度地驱策人们去甘冒任何风险——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始冲动。可是,人们往往在利令智昏的贸易往来中只注意于通过贵卖贱买来积攒财富,却忽视了商品交换如果不和商品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最终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虽然在海外掠夺和贸易中获取了巨额财富,但由于没有后继的有竞争力的商品生产和

工业进步,在荷兰航运业优势的冲击下,迅即地没落了。^① 同一个道理,主要以航运业立国的荷兰,在世界争霸中也曾独占鳌头,最终却败在工业鼎盛的英国手中。由此可见,仅靠掠夺,仅靠贸易,是不能使任何一个国家长保富强的,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必须要有居于同时代前列的本业,^②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习惯上人们把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连在一起,这很有道理。如果没有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没有普被全球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谈不上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不过,有必要强调,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是互为促进、密不可分的,而近代的工业革命,只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斯塔夫里阿诺斯有很好的阐述,他指出,商业革命在好几个重要方面有助于工业革命。首先,它为欧洲的工业提供了很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而为了满足这些新市场的需要,工业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其次,要为工业革命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就得筹措资金,商业革命也提供了这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资本,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最后,商业革命所引致的人们追逐利润的欲望成了起推动作用的永动机,把资本主义带入了生气勃勃的扩张型的社会。^③

现在,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该有一个逻辑上的归结了:蕴含在商品交换中的内在矛盾运动所外化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以及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是资本主义产生的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是因为“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见《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52页。

② “本业”的指谓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同,封建社会的“本业”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本业”是工业,在以后的时期肯定还会有新的“本业”出现。

③ 参见《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276—282页。

内在本源;这一根本性的力量适逢西方自治城市这块沃土,得以发育壮大,由此而引发人文精神的勃兴、新教伦理的形成、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地理的大发现……在这诸多因素的辅助下,遂构建了资本主义的大厦。

姗姗来迟的中国资本主义

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作了一番论证后,也该对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迟迟不能产生给一个说法了。首先,我也许要故作惊人之语:中国之进入资本主义较西方为迟,是因为中国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当时远较西方发达和完善。这乍看似乎是悖理的,但细究却有一定的道理。大家也许还记忆犹新,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崩解而商品经济昌新之际,长期窒息在计划经济中的人们的致富冲动迸发出来,人们发现,在市场规模稚嫩和不完善的前提下,钱似乎太容易赚了。一时之间,大有人人言商、个个下海之状,即使在美国、日本这些当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这种盛况。中世纪后期的西方,也有类似情况,西方自治城市的兴起,给停滞的封建领主经济注入了活力,久滞乍兴的商品贸易,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能获取丰厚的利润,这无疑成了西方经济最主要的动力。反观当时的中国,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要成熟得多,相应地获取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及由此决定的致富冲动也要小一些。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给英吉利国王的敕书,历来被看作清王朝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范本,其实是有些冤枉的。别的姑且不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并非无稽之谈。当时中国物产丰饶,商品众多,于西方各国亦不多让;如果再上溯四五百年,时

^① 见《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八。

值西方自治城市兴起之际,中国的产阜物丰,更是世所欣羨。所以元、明两代即使主张海外贸易的思想家,“也大都认为中国不需要海外商品,而海外则很需要中国的商品。”^①由是观之,一种较为先进的状态,往往会造成某种惰性或自我封闭性。以上这些,是否可聊作中国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先进适成为落后于西方的一个原因呢?

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存在西方那样的自治城市。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虽然给中国境内的贸易营就了商旅之便,但另一方面也极易为中国的工商业构建封建樊笼,如海禁、国家专卖、工商官营、抑商等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西方的封建领主制,各个领地、采邑的分立状况确实形成了许多贸易障碍,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各自为政的领主制,却为百业待兴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赢得了空间,自治城市就是利用国王与领主、领主与封臣之间的矛盾发展起来的。最为重要的是,西方自治城市中的工商业者,不仅在经济上是独立自主的,在政治上也取得了相应的地位;而中国的工商业者,即使在经济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政治上则杳无声息,与西方之差距不能以道里计。因此,当西方城市带着经济上的成功,挟着政治上的威势昂首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国商人则畏葸不前,至多只是盘算着在既定的封建藩篱中多挣几个钱。

正当西方商盗合一的船只在世界范围内横冲直撞之际,中国却时运不济,有明一代,大部分时间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代后期虽部分解除海禁,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仍然很多。到了清初,为了防御郑成功父子及东南沿海的抗清势

① 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第5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力,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下令“迁海”,强迫沿海居民内迁30里,海外贸易几近断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宣布“开海贸易”,但已经时不我待了,西方国家因应时势而坐大,中国在海外贸易中的优势已不复再有;在西方耀武扬威的外在形式与精良商品的实际内容相结合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又迅速地关上自己的大门,只留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①事已至此,中华帝国的颓败已是指日可待了。中国的“闭关锁国”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这对明初来说,是言之有理的,但就明末清初而言,毋宁说是一结果。

近代学者大都认为中国的“重本轻末”^②或“重农抑商”政策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又一原因,其实非也。自战国以降,“重本轻末”一直作为主要的国策而延续,而中国封建社会在大部分时段中都领先于世界,只是及于近代,才落后于西方。同一个国策,怎会产生如此迥异的效果?这也许是“重本轻末”误国论者难以解说的。在我看来,“重本轻末”不唯无害于国计民生,反是维系中华帝国而不坠之根本。前面我曾经说到,西班牙、葡萄牙由于“重末轻本”,尽管拥有金山银山,^③却只风光了几十年,而英国则因其“本业”之兴盛而雄踞于西方各国之首。古希腊、古罗马的衰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重末轻本”的结果。竞于奢靡、轻视劳动是西方古代社会的通病,如果不是依靠军事征服和殖民地财富的喂养,西方古典文明也许还维持不了它实际存在的那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自己的例证,周朝取代商朝,可以看作“重本轻末”

①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限定只开发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

② 中国古代,一般来说,“本”指农业;“末”于西汉以前泛指工商业,西汉后常专指商业。

③ 葡萄牙、西班牙最早进行殖民活动,大批的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由于金银货币骤增,曾引致急剧的通货膨胀。

的一个胜利,当时的商朝工商业远比周朝先进,但却被以农为本的周朝所击败。这个例子或许不无疑义。另一个范例应该是众口一词的:秦国的“奖励耕战”、“重本轻末”是兼并六国、统一华夏的重要举措。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在很大意义上讲,正是赖于“以农为本”而能持续繁荣昌盛。迨至晚近,工业社会兴矣,中国却不能以“以工为本”取代“以农为本”,这才是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

还须说明的是,中国古代长期坚持“重本轻末”的政策,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商业的兴盛,首先表现于城市,而城市中仰赖商品供给的人中,官僚、大地主阶级是主要的消费者群体;他们所需求的商品中,生活奢侈品占有较大的比例,^①他们对奢侈品的需求越旺盛,人民所受的盘剥就越重,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于老百姓的赋税和地租。唐高祖李渊对此已有深刻的认识:“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②在这个意义上,重商则启人侈靡,启统治者侈靡必加重老百姓负担;而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租税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农民,因此,重商则伤农,崇末则绌本。在此情势下,明智的统治者作出“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需要辨明一点,中国传统的“重本轻末”或“重农抑商”,并不是完全地否定“末”或取缔“商”,只是与“本”与“农”相比,“末”与“商”被放在次要的位置。诚然,在总的“轻末”或“抑商”的政策取向上,有时难免会有过火的举动,从而在客观上影响“本”的发展,但如以此来从根本上否定“重本轻末”,不也是舍本逐末吗?

① 生活奢侈品为什么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的商品消费对象,在本书第五章“独具魔力的商业”一节中有较详细的表述。

② 见《资治通鉴·唐纪八》。

我们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推动了文明历史的进步,强调商品交换所引致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动力,主要是指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引导人类努力地扩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社会财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经济的无限发展,仍然有它的负作用,商业周期的出现即是其例。^① 在另一种意义上,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还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灾难,这些我们将在后面论及。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会使一切万事大吉;而强调商业贸易的片面发展,忽视社会生产的根本进步,同样会弄巧成拙。

中国资本主义的姗姗来迟,如上所述,有其诸多的原因,从根本上讲,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没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及至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冲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猝遭变故,中国人想以“师夷长技”、“器物之变”来回应,但是,单纯地造几艘战舰、塑几门大炮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人们又想通过官办工商业的发展来实现富国强兵,然而,官办工商业的弊端很快便显现出来,它既不能使企业保持活力,更不能促进全国工商业的发展;尔后,又有人提出由“官督商办”企业,可是好景不长,“官督”成了苛勒民办企业的新财路。^②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是长路漫漫。

四、文明历史的沉思

对立方式的嬗变

人类之进入文明社会,是以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为基础

^① 作为负面效应的商业周期,参见本书第五章“商业周期”一节。

^② 参见李双楗:《从经世到启蒙》,第五章,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版。

的,这一经济制度,我们称之为文明形态所有制。在这一制度中,一部分人占有生产手段和劳动对象,迫使另一部分人为其劳动,最终占有劳动成果。作为这一制度的内在的决定性的力量,是由商品交换所引致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

在上两节中,我们对文明形态所有制的三种形式进行了考察,在奴隶主所有制中,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亦占有劳动者——奴隶;在封建主所有制中,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但是部分占有劳动者——农奴或佃农;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中,资本家只占有生产资料,完全不占有劳动者——工人。文明形态所有制的这三种形式,有一个共同点,即在这三种所有制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这一恒定的物质交往关系,都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对立。但是,在这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相对立的总的态势下,却涌动着渐进变化的暗流。在这股暗流的上面,我们将看到这样的表象,即在文明形态所有制三种形式的转换过程中,完全的暴力役使逐渐向完全的经济役使过渡。换句话说,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主要以暴力的手段迫使奴隶为他劳动;在封建社会,封建主以强力手段和经济手段相混合的方式役使农奴或佃农;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完全自由的,他只屈从于资本家的经济手段。

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者剥削和压迫手段的这种变化,或者说人们之间对立方式的这种嬗变,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变化是如何完成的呢?

我们知道,在文明形态所有制中,统治者或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目的,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手段,迫使劳动者为其劳动,最终占有部分甚至大部分生产物。为了这个生产目的,统治者或生产资料所有者将尽可能攫取最大限度的劳动产品;而与之相对立的劳动者,则力图使自己的生活在

遇和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在这种相互利益的对抗中,各种利益集团力量的较量、消长、妥协,必然导致这样一个普遍的历史趋势:当一种较能改善劳动者境遇、较能刺激劳动热情、较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又能保证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的生产方式出现时,必将取代旧的生产方式或旧的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的这种对立运动,或者说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斗争,^① 是对立方式嬗变的主要动因。

另一方面,在文明形态所有制的历程中,作为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生产资料,从草莱未辟的处女地到技术精密的机器设备,表现出一个科技含量愈来愈高、人类劳动在其中凝结愈来愈大的过程,生产资料日益脱却它原始的物质形态,日益人格化和抽象化。我们不妨从广袤的大草原、原始的山木藪泽算起,它们不曾假借任何人力而存在,而成为人类最初最原始的生产资料;从被开垦的土地、阡陌纵横的田畴,我们已经清楚看见人类劳动的痕迹了,它们在整个农业社会中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从手工业、手工工场、大机器制造业这一系列变化中,我们只能依稀地联想到原始的物质形态,而把它们更多地看作人类劳动的结晶;货币、资本、科学技术、信息、智力等,在人类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我们在其中几乎体察不到原始物质的存在,只感受到人的力量的伟大。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学习自然,认识自然,运用自然,掌握自然,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得到提高,人类劳动在生产资料的形成和使用上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生产力或生产资料的这一系列

^①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阶级斗争已经声名狼藉,我在使用这个词时也就犹豫再三,但客观地看待历史,阶级斗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文明社会重要的推动力量。我所要强调的是,在文明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而我们过去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存在着绝对化、片面化的趋向。

变化,为对立方式的嬗变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既然生产关系的对立运动是对立方式嬗变的主要动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为对立方式的嬗变奠定了现实的基础,我们现在来理解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者从暴力役使到经济役使的过渡,也许要容易得多。

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与剥削,主要以暴力手段来维持,其所以如此,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在前文已有交待。在这种暴虐的统治下,奴隶对奴隶主的斗争,多以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诚然,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曾经震撼了古罗马,中国的史书中也偶见奴隶起义的记载,但从总的情况看,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主要以消极怠工、破坏工具、逃跑等形式来体现。不过,即使是如此消极的斗争形式,它也在逐渐消解奴隶制的暴戾之气。奴隶主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一味地以暴力相统辖,既不能激发奴隶的劳动热情,也无助于自己所占有的劳动产品的增加。于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便逐渐形成,即生产资料所有者把土地租佃给劳动者耕种,让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上缴租税和服劳役,在此之外的劳动产品和时间由劳动者自己支配和占有,并给他们一定的人身自由,使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庭、子女和财富。这样一种形式就是封建主所有制,它既缓解了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对立,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增加生产的同时也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

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历史的必然性,从根本上看,这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对立或斗争的结果。尽管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封建制所采取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劳动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善,却是不移的事实。封建制相对于奴隶制的这种进步,很快又被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掩盖了,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

为突出;统治阶级强征暴敛,鲸吞蚕食,兼并土地,造就了数不清的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多之烈,其原因何在,不是我们这里所要探究的。但是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我们无处不看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统治阶级或为了穷奢极欲的生活,或为积累财富的冲动,敲骨吸髓,鱼肉百姓;而被统治阶级却在穷途末路、无以聊生的处境下啸聚山林,铤而走险。农民起义的结果,或者结束了一个王朝,或者被镇压下去,如系前者,一般会换来一段时间的清平政治,阶级关系重新得到调整,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如遇后者,统治者或许从动乱中吸取一点教训,作出些让步;或许仍我行我素,最终加快下一次农民起义的到来。如此观之,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仍然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劳动者境遇得以改善的推动力。

资本主义所有制取代封建所有制,走着另一条道路。如前所述,近代资本主义是在西方自治城市中诞生的,从一开始就与封建领主制相对立,“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这一口头禅,成了西方自治城市的写照。封建领地中的农奴,只要逃到城市中,就可以成为自由人,这对他们是极具诱惑力的。城市的自由,城市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发展壮大,无疑地把封建领主制逐渐送入坟墓。伴随着西方自治城市的兴起,城市中的第三等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更为独立,更为自由;他们正在营建和逐步完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在社会财富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人身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等方面,都是封建领主制不可比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延长的劳动时间、强化而单调的劳动、恶劣的劳动环境

……^① 似乎比封建农奴的遭遇更为悲惨。从肯定的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论述,资本家将尽可能多地剥削无产者,尤其在资本主义初期,这种剥削更为粗野、露骨和不受约束。但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斗争也从未停息,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提高福利待遇,……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步步争得自己的权利,使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都达到了文明史中从未有过的高度。这同样再一次证明,只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这种斗争,只有生产关系的这种对立运动,才是不断改善劳动者状况的决定性力量。

固然,生产关系的对立运动是人与人之间对立方式嬗变的主要动因,但如果不结合生产力的发展来加以考虑,我们将无法说明对立方式嬗变的外在形式的多样性。

我们知道,生产力包含三个要素: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后两者又统称为生产资料。一切物质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也就是生产力运用和发展的过程。在文明形态所有制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首先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对立。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中凝结的人类劳动越来越多,生产资料日愈脱却它原始的物质形态,日趋人格化和抽象化。这一变化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标示了对立方式嬗变的现实存在。

从消极的方面言之,生产资料中凝结的人类劳动越多,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就越强,劳动者就越不容易获取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就越能用经济手段迫使劳动者为其生产。在奴隶制欲兴而未至之际,由于生产资料中物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第十三章。

化劳动量很低,有大量的未开垦的土地,只要允许,劳动者尽可以自己的劳动去开发原始的土地,并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不以暴力占有生产资料,不以暴力强迫劳动者为其劳动,奴隶主所有制是不可能存在的。封建制到来时,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分割已基本就绪,土地的开发也大致完成,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逐渐增多,在人烟稠密的地区,已没有未开垦的荒地,没有生产资料或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除了屈服于地主的经济剥削,已别无他途;在人口密度不高并有其他可谋生路的前提下,封建领主便采用半强制半经济的手段,迫使农奴就范。资本主义所有制就更不同了,它的生产资料且不管来源于何处,从一开始就是一般劳动者无法企及的。高大的厂房、昂贵的机器、大量的流动资本,无一不凝结着大量的人类劳动,无产者为了生存,只得进入资本主义的轭下,资本家无需用强力,便面带微笑地实现了对工人的剥削,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无论是生产资料中物化劳动的日益增加,还是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日益精巧,都无可规避地引向这么一个唯一的结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是与劳动者经济利益的改善、政治地位的提升成正比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对于这一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们也许并没有理性的认识,但他们在与劳动者的对立中,会非常实际地考虑到,如果不改善奴隶的非人待遇,如果对农民的逼勒过度,如果置无产者的经济利益于不顾,便不能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将给他们自己的利益带来不利的影响。尤其在现代企业中,劳动者的作用更形重要,不论是资本家还是董事会,不论是经理还是厂长,不论是资本主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如果不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取胜,是绝不可能的。现代的企业之争不外乎商品之争、市场之争、科技之争、管理之争,而归根结底是人才之争。人力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等等提法,其实都可以看作强调人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的另一种图解。

至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总体的归纳了。文明形态所有制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对立,从暴力役使逐渐向经济役使过渡,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是暴力对抗向协商对话的转化;如果说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这一转化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引致这一转化的根本力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阶级斗争,而生产力要素中人类劳动日益增强的决定性作用,是这一转化的客观基础。人与人之间对立方式的嬗变,倘若只是以上这些,至多是阐明了一个事实,而意义更为深远的则是,它仿佛已经预示了人类一个更为和谐美好的将来。

所有制迷宫的两扇大门

在本章的开始,我们曾经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分为两大类:自然形态的所有制和文明形态的所有制。对文明形态所有制的成因及其表现形式,我们已作了阐述;对自然形态所有制,前面仅给了一个简略的定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书旨在阐明人类文明的进程,故而着重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说明了文明形态所有制。也许有人会置疑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你认为商品交换所引致的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是文明形态所有制产生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观点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非常形象的话来说明生产力

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不管这句话是为了与蒲鲁东的论战需要还是马克思一贯思想的表达，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后来被人们通俗化了：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随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变化，生产力水平高，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公有制；生产力水平低，是个别的、分散进行的小生产，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就应该是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这种通俗的表述，虽然不能涵盖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全部内容，但毕竟还是反映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一个侧面。

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用来检验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真理的闪光，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无不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连，人类社会形态的每一次更迭，或者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每一次替换，都与生产力的发展直接相关。人类第一次运用生产力，便是人类的采集渔猎时期；有了动物驯养和种植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进入农牧业时代；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出现，人类的文明时代随之到来；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侔，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总之，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我们总能看到生产力突出的身影。

马克思把手推磨、蒸汽磨分别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挂起钩来，我想主要是形象化的比拟，切莫作机械的理解。恩格斯曾借用摩尔根的观点，指出铁的使用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力。^② 我记得有些学者就试图从中国历史中寻找铁的记载，或期待考古发掘中铁器的出现，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

② 参见同上，第4卷，第21页，第159页。

此来确定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野。这种按图索骥的搞法,是会闹出很多笑话来的。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生产力,不是指单一的生产工具或机械装备,而应理解为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长期积贮起来并不断得以提高和强化的人们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了通俗化的表述。比如说到原始公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因为那时人们使用石刀、石斧、弓箭等简陋的生产工具,个人无力单独同自然界作斗争,只有依靠共同劳动,才能获取生活资料,求得生存。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也正是因为有社会化大生产这个生产力基础。至于说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又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增强,只要依靠个体的劳动,依靠单个家庭的劳动,就可以进行生产,于是便有了最初的生产资料私有制。^①以上的引述,显得有些笨拙,但是意思是清楚的:社会生产力的物质技术水平及其运动的方式决定生产资料是公有亦或私有;当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资料是公共使用时,生产资料便是公有;当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资料是个别的、独自的使用时,生产资料便是私有。

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一学说,确实澄清了许多历史迷雾,因而具有真理性。但是,有一点要提请注意,由社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所引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所标示的仅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和使用,正如我们以上所举的例子,在原始公社公有制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决定了人们只能共同占有、共同使用生产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可以单独地或以家庭为单位地

^① 见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生产资料公有制”条、“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进行生产时,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私有制便产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生也是如此,当社会化大生产出现后,生产力的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劳动者必须集体地公共地占有生产资料。在这些所有制中,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并进行生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而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这就是我们前面所界说的“自然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生产力的物质技术水平及其运动的方式决定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公有或劳动者私有,这种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内容,我把它称之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物质属性”。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文明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种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并以此为条件迫使劳动者为其生产,进而从中谋取部分或大部分生产物的所有制形式,似乎不能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导引出来。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生产力的物质技术水平,只是决定人们是共同地或单独地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而不能说明为什么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以剥削另一部分人。换句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理论,完全适用于自然形态所有制,但用于文明形态所有制,则显得力有不逮。在传统的理论中,生产力对文明形态所有制的决定作用,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产的物品有了剩余,于是就产生了占有这种剩余产品的剥削制度”这一粗陋的形式来表述的。对于“剩余产品说”的谬误,我在论述文明形态所有制的成因时已有所指陈;下面我们再从历史现实的角度,对“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否定方面作一巡视。

我们先来看看南北美洲这块为欧洲带来狂欢的新大陆。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整整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奴隶贸易及其最终的消纳场所——奴隶制种植园,成为新大陆经济生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套用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理论,何以说明在当时大致相同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前提下,在西欧已开始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在东亚仍维系着封建地主的统治,在南北美则演化出奴隶制这一返祖现象。大家知道,在正统的理论中,生产工具的优劣是生产力高低的标志,生产工具大致相同,生产力水平也大致相当。既然这样,为什么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极为接近的情况下会出现西欧、东亚、南北美三种迥然有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呢?对于如此诘难,“生产力决定论”者最有作为的也许是抬出“生产力三要素说”。按照三要素说,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组成,生产工具只属于劳动资料这一要素,虽然这一要素在生产力的物的因素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独木难支啊;不结合其他两个因素——劳动者和劳动对象来加以论证,是会误入歧途的!面对这样语重心长的教诲,能不洗耳恭听?

可是,最令“生产力决定论”者难于招架的是近二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形态私有制的回潮现象。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一度使社会生产的发展突飞猛进,尤其在引人注目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失业问题消失得无影无踪,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早被抛到爪哇国去了。与此形成鲜明反衬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国际战争……一切似乎都在印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特别是1929年发生的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给予了沉重打击,至今谈起来仍令人为之色变;“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了”已经不是少数人耸听之危言,而是普遍笼罩人们心头的社会阴霾。于是,从社会主义中寻找福音,把计划体制移植到资本主义中来,成为新的社会时尚。缘于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干预以及生产

资料的国有化,风行一时。值此际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应运而生,结成了与资本主义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历史的天平仿佛在向社会主义一方倾斜,不少才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这是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谁不说“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带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历史研究的金科玉律呢?

曾几何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风云突变,生产资料私有化浪潮漫卷全球。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把国有企业拍卖、转让给私人经营;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急于把国有企业脱手,以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正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一番经济改革的煎熬之后,有些完全摒弃了公有制,有些还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孰多孰少的犹豫中摇摆,有些则干脆宣称私有制本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如此普遍的私有化现象,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它的历史因缘,但必须直面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几乎普被全球的前提下,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回潮,单纯以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理论,断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用“生产力决定论”来说明文明形态所有制的产生与发展,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自相抵牾之处,从总体上看,实有不能自圆其说之憾。在本书中,我们极力阐明商品交换出现后所产生的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是文明形态所有制产生的直接导因。这种由于商品交换的出现而引致的生产资料被一部分人占有,并用于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内容规定,我把它称之为文明形态所有制的“社会属性”。

我们强调商品交换对文明形态所有制的“社会属性”的决定作用,显然不是要割裂商品交换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当然

更不是否定生产力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物质属性”的决定作用,而只是要说明:在商品交换出现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表现为文明形态所有制这一类型,不是以“生产力决定论”所能简单处理的。追本溯源,商品交换的出现,也只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当商品交换出现以后,由商品交换所引致的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使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具有了人与人对立的形式。于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一方面表现为人们与生产资料的物质互换关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阶级对立;前者直接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我们所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物质属性”——后者则是商品货币关系的间接外化,即我们所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属性”,这便是文明形态所有制的二重属性。

理解了文明形态所有制的二重属性,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会掺入人与人的对立,为什么现代化大生产把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在一起劳动时,生产资料却属于少数人所私有;至于近代为什么会有美洲奴隶制的翻板,现代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回潮,也都能一一得到说明。迄今为止,文明形态的所有制都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而且是那种以人剥削人为特征的私有,对于这种私有制,古往今来,无数的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口诛笔伐,甚而奋发力行,舍身取仁。然而文明形态的私有制却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文明形态私有制的形式如何变换,总是保持着人剥削人这一恒定内容。这是多么无情的历史现实,在它冷峻的面容后面,我们要洞悉文明形态所有制的历史真象,必须先开启“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这两扇大门,然而才能深入堂奥,你说是吗?

第三章 制 度

第一章我们论证了文明的起源,在第二章中,我们阐述了构成人类文明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态;本章以及再后的两章,我们将阐明作为文明主要特征的几个方面:制度、战争与阶级、城市和商业。说到制度,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制度,即使用一本大部头的专著,也不能兼收并容。本章想用两三万字来说明这一问题,至多只能提纲挈领、高度抽象。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们是在从一个新的层面上试图对制度进行分析,故难免挂一漏万。

本章第一节将探讨制度的内涵及其一般的演进方式,第二节和第三节将分析制度得以运行的两种方式——专制与民主;和前一章研究所有制关系一样,我们的分析视野只局限在文明社会的三种社会形态,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一、何谓制度

与文明结伴而行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制度同文明与之俱来,制度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

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人类社会各种各样制度的总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制度抽象。在词义学上,制度是关于整个社会组织或某一事项的整套的行动准则或工作方式。在制度法学看来,制度是法律上人格化的社会关系,它是各种外部环境的复合体,它要求人们的行为与人们对待这些环境的态度持续地保持一致。^①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人物舒尔茨则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②综而言之,制度似乎可以定义为对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的调整、制约、规定和划一。

现今的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制度是人定的。”言下之意是说,用于管束人们行为的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因人而异。显然,这是一种揶揄。按照正统的观念,制度是规则、准绳,用于划一人们的行为,怎么可以任意伸缩,因人而变呢?但是,从这种世俗的调侃中,则引申出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用制度来约束自己呢?

制度是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的,使之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统一。任何人都希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涉及其他人,不对他人的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他尽可以自行其是,独往独来,不需要用制度来约束自己,也不存在在行为上与他人保持谐调一致的必要。于是,我们得到了关于制度的第一个规定性或前提: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制度的第一个前提。

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区别、对立、对抗、冲突、矛盾等等非同一性,而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达到某种一致性或同

① 参见《牛津法学大词典》制度法学条,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美]科斯等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一性;假如人们之间不存在对立,而是保持着一种统一性和一致性,那就没有设立制度的必要了。因此,建立制度的第二个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性。^①

辩证法早就揭示出,世间万事万物的对立是绝对的,而同一是相对的。我们要在绝对的对立中寻求同一,在人们普遍的对立中谋求一致,让人们放弃精彩纷呈的自我而听命于僵死呆板的制度,就必须具备更充足的理由,具有更高度的合理性。就人们的社会关系来说,要人们放弃自我,就必须能实现更大的自我;让人们牺牲较小的自我利益,就必须能获取较大的自我利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句政治俗语,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求人们按照统一的规范来行动,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样我们就认识到了建立制度的第三个前提:人们社会行为的目的性。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有助于理解建立制度的三个前提。以企业制度为例,在一个企业内部,人们聚集在一起,为了生产和经营,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企业的劳动者和管理者,每个人的懒勤、技术的优劣、工作态度的好坏、作息时间遵守与否……都不尽相同,尤其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都想获得较高的收入;如此种种,必然形成人们之间的差别和对立,特别在劳动者与企业主之间,更存在物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为了把这些对立协调起来,以利于生产的顺利进行,于是就有了录用与解雇制度、考勤制度、奖惩制度、分配制度……等等。假如我们从一个相反的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每个劳动者都工作勤勉、技术优秀、劳动态度好,更不计较个人利益,知道什么时候工作、如何与他人配合、怎样把工

^① “对立”一词在这里的使用,应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它包含一切差别或“同一性”。

作做得更好,一句话,在劳动者之间和劳动者与企业主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或对立,试问还需要制度吗?还有一种情况也不需要制度,即劳动者一个人进行生产,不与他人发生相互关系,如个体劳动者。因此,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关系的对立,是制度建立的两个前提。但是,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劳动者决不会平白无故地进入企业主的彀中,甘愿受其宰割;劳动者参加工作,目的在于获取工资,以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企业主也不会无端地把资本投入企业以解决劳动者的就业,而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二者的目的虽异,但却统一在企业的生产之中。

通过以上的论述,根据制度建立的三个前提,我们对制度作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制度是互相对立的人们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必须遵循的规则。

应该特别强调,人们相互关系上的对立是三个前提中最重要的,之所以特别强调不仅是因为人们在论述制度时大都忽视了它的存在,更因为这一对立是整个制度问题的核心,制度的建立、发展、转换都是以它为动力的。

马克思说过,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必然形成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但是,人们的这种社会关系或相互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表现却不一样,尤其是以商品交换的出现为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第一章中我们曾谈到,商品交换出现以后,人们生产关系上的和谐性转化为人们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这种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必然会表现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普遍泛化于人们的相互关系中。

在原始社会,无论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还是以个别家庭为单位而进行的生产,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上不存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而是表现为合作协调,一

致对外。不容否认,在原始人类的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中,都有协调行动的必要。譬如在人们共同与自然界的斗争中,统一的指挥、协调与行动往往是必要的,但人们都尽力劳动,不计个人的得失,诚如孔子所言。^①又如在与外部落争夺居留地的争斗中,更需要统一的行动,尽管也存在人们之间物质利益上的对立,但大家的目的只是把外部落赶走或者消灭,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互换关系。因此,在前一场合,不存在人们之间物质利益的对立;在后一场合,尽管存在这种对立,但这种对立只是自外的、短暂的。

商品交换出现以后,人们之间便出现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而商品交换愈发展,这种对立便愈普遍;加之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使人们之间的对立更为尖锐和宽泛。商品交换的发生与发展,一方面把人们分离为孤立的、相互对立的私有者,另一方面又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老子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②此并非是一种理想,而在上古确有其事。但在今天,人们自私自利,营造着自己的小家庭,盘算着自己的小日子,但却须臾不能离他人而索居。人类这种相互依存又互相对立的境况,如何才能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去实现人生的目的呢?

如果说原始社会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一致行动,需要某种制度约束的话,也仅是处在制度的萌芽阶段。^③当时所谓的制度种类很少,一般不带有强制性,其中最主要的制度是在与其他民族或部落的冲突中产生的,其作用的范围和时

①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

② 老子:《道德经·下篇》,第八十章。

③ 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明确地在社会、财产、家庭等关系中使用“制度”一词,尽管其他历史学家并不一定这样看。

限也极其有限,它通常被人们称之为约定俗成。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们之间对立的普遍化、相互交往关系的日益增多,各种制度便应运而生。由于战争的频仍而军事制度趋于成熟;歹徒杀人越货、偷摸扒窃使刑法有了用武之地;人们的交易、借贷、财产、婚姻等方面的纠纷使民法的产生成为必然;专门的制度、专门的机构、专门的执法者和管理者,政治制度便由此而兴……

人际关系之三类

上一小节我们已经谈到,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普遍对立是制度产生的前提,这些相互关系或对立,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人际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对抗、合作、予取。

人际关系上的所谓对抗,是指这样一类关系,即作为对立的双方,每一方目的的实现,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消灭或征服对方来达到;双方之间的对立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失败的一方被迫地、非自愿地屈服于胜利的一方。具体地说,两个部落为争夺生息之地所进行的争斗便是如此,战胜的部落或者把对手消灭掉,或者把对手赶出去。对抗关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强盗的抢劫、国家之间的战争、农民的起义、统治者的镇压、宫廷中的政变、群雄之间的杀伐等等,都可以作如是观。

合作关系可以这样来看,即人们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形成的互相协作、相互支援、协调行动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不存在利益上的对立,而只有同一。但是更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人们的目的还不能实现,必须以合作关系为一方,同心同力地与对立面进行斗争,目的才有可能实现。举例来说,人们为了共同的需要而兴修水利,显然,水利的兴修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集大众之力,于是便有了合作关系。但是,仅有合作,目的尚未达到,人们必须通

力合作,与自然界作斗争,开山劈岭以收渠成水到之效。其他的合作关系可以说不胜枚举,从小秤分金大秤分银的梁山兄弟到开门撬锁的犯罪团伙,从精诚合作的仁人志士到策划于密室的宵小之徒,从协同劳作的企业职工到蝇营狗苟的乌合之众,……可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最主要的是予取关系,这种关系是商品交换出现以后才普遍存在,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形象地看,它是把对抗和合作两种关系熔为一炉,但精确地分析,又绝不是把两种关系简单地糅合在一起。作为予取关系,当事人双方有各自的利益,而且往往处于此消彼长、尔损我益的对立中;但另一方面,双方的利益又具有互利、互补、互换的性质,因而是统一的。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双方的利益或目的,在予取关系中就能实现。它不像对抗关系那么极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有胜利的一方志得意满;也不像合作关系那样超脱,只能在外在的对立中寻找归宿。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是自在自为的绝对,在我们的主题中,它以其蓬勃的生机,成为文明时代的主角。最标准的予取关系是商品交换,交换者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最后在商品的互相让度中达到统一,分别实现各自的目的。其他的如老板与雇工、学生与老师、地主与佃农、公司与客户、行贿与受贿、男女之媾合,……均可看作予取关系的表现。

以上三类人际关系的区别是明确的,但切不可把它们作非此即彼的主观隔离,往往在某一人际关系中,三类人际关系交织在一起,而且还会互相转化。比如战争,敌我双方是对抗关系;在每一方内部又是合作关系,如果是雇佣军,则是予取关系,如果兵源是强征来的,则又可归为对抗关系。说到各类关系的互相转换,假如敌我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想结束战争,于是坐到谈判桌边,各提条件,反复较量,最后达成协议,

化干戈为玉帛,对抗转化为予取关系。

在三类人际关系中,合作和对抗关系的形成要早得多。幼年时期的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正是凭藉合作关系,才走完了漫长的艰难的原始历程;而对抗关系与合作关系虽然年龄相当,但它只是偶然在部落之间的血亲复仇和地盘争取中有所表现。姗姗来迟的是予取关系,它在人类结束蛮荒走向文明的时刻才来到世上,但是它的出现,不仅至深至巨地影响了人类的未来,而且在合作和对抗关系上也打上了它的鲜明印记。

大家都知道,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是物质消费品的获取。在商品交换出现以前,无论人们是处于合作关系还是对抗关系中,人们的生活资料都不能在这两类关系中获取,而只能在人与自然界的对立中来实现。比如说原始时期人们合作捕猎野兽,只有当野兽被杀获,人们才能分食其肉,获取生活资料。而在对抗关系中,人们把其他部落的人赶走或消灭,只是为了占有这块土地,在大自然中去获取生活资料。因此,在这两类关系中,都不存在人们之间直接的物质利益对立。

商品交换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生活资料的获取,不仅表现于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体现在人们之间的商品互换中,人们之间产生了物质利益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人们对物质财富无限追逐的冲动下更形尖锐。面对强化了的人们物质利益上的对立性,对抗和合作关系都感受到它强大的穿透力,日益遭受着它的侵蚀。如果说过去对抗关系只是间或发生在部落之间的血亲复仇和地盘争夺上,那么现在这类经常发生的对抗则是直接针对人们手中的财物;如果说人们过去的合作关系亲密无间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话,那么现在人们主要是关心在合作中他自己究竟能得多少。这种博施普被于人类的物质利益对立,在上文谈到的三类人际关系的具体表

现形式中,几乎是无所不在。读者应该回头去品味一下,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都有物质利益这个精灵在作祟,即使是自身具有原动力的婚姻关系,物质利益也成为其中重要的考虑因素。于是,人类已经到了这样的历史时刻,商品交换把人们分离为彼此对立的私有者,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物质利益对立的标识,除了用制度把人们的行为统一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中,再也别无选择。

在我们所论述的人际关系中,至少有一类重要的人际关系没有涵括进去,这类关系即友爱关系。在友爱关系中,当事人双方或一方的目的就是给对方予关心、帮助,甚至不惜牺牲,而且不要求、不考虑、不希望对方任何回报。这种友爱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没有把它纳入分析领域,并非是因为它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越来越显得稀罕,主要考虑到在友爱关系中不包含人们之间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因而不需要也不可能用制度来规范它;换句话说,自古迄今,没有任何制度是用来制约友爱关系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制度的建立是以人们之间的对立为前提的。

制度及其演进

在本节中,我们先谈了制度建立的三个前提,特别强调了人们之间的对立是三个前提中最重要的;以后我们对人际关系作了区分与类比,着重指明商品交换出现以后人们之间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将或多或少地表现在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因而把商品交换的出现和社会制度的产生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种主要是理论推演的表述,我们在下面将用历史事实加以验证,也许会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不过在我们谈到正题以前,先作两点说明,第一,我们说人们之间物质利益上的对立或多或少地表现在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但并非是一切方面,

而且应注意或多或少这个限定词。第二,我们说物质利益上的对立是人们之间对立的主要方面,但并不否定人们之间还有其他对立的存在。

人类最初的制度主要是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往往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从法的中西文字学来考察,拉丁文 Jus、法文 Droit、德文 Recht、英文 Law、俄文 Пpавo、汉文“灋”,都喻意“公平”和“正义”。^① 在阶级社会中,说制度或法意谓公平和正义,马克思主义者指斥这是骗人的鬼话,认定法就是统治阶级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如此对立的两极异议,我们暂不置评。但要指出一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便分裂为经济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级,为了不使这些阶级在无谓的斗争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便需要秩序或法律。^② 恩格斯在另一个地方还明确地谈到,为了使社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需要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把人们的行为规范起来,这个共同的规则就是法律。^③ 而在鼓吹法的公平与正义的一方,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也竭力说明,法的公正性就是要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即使是贵为王者,也要依法行事。这种思想,在汉谟拉比法典的序言中有集中的表现。^④ 其实,不平则鸣,讲所谓“公平”、“正义”,正是因为社会上存在不公平、不正义。由此可见,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旧时代的统治

① 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页。

③ “在社会发展某种很低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囊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法律。”引自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599—600页。

④ 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第26—27页。

者,都认为法或制度的产生,源于人们之间的对立并使这种对立不至于危及社会的存在,只不过前者的表述直截了当,后者则遮遮掩掩。

从时间上,也可以看出法或制度的产生与人类文明时代的进程比肩而行。在中国,黄帝时开始出现法,对照现代考古学的资料,黄帝时期相当于原始氏族的解体时期,不过那时的法还只是习惯法。同样的情况,在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中也有其客观存在。至于说到成文法,如《汉谟拉比法典》、《赫梯法典》、《亚述法典》、《摩西十诫》、《摩奴法典》、《梭伦法律》等,无一不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军事制度的出现也许还要早一些,因为战争是人类活动最古老的形式之一,虽然说文明时代的战争在质和量上与原始社会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在军事行动中氏族首领的号令成为每一氏族成员必须遵守的行动规则,因而军纪、军法便成为最早的制度雏型。在中国古代兵、刑无别,或说刑起源于兵,兵就是指战争。不过由于史料缺乏,夏代兵制无法详考,但至商代,一套军事制度业已形成。^① 在中国,政治制度滥觞于夏代,这已是史学界的定论;以“禅让”转变为世袭制为标志,一方面说明私有制的普遍存在,财产的世袭继承已成定局,另一方面也表明专门的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制度的设置及其内容。军事制度的建立是与频繁的战争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出现和专门化,则与社会对立的增加、社会事务的繁杂、社会管理职能的经常化密切相联。尤其能凸现时代变迁的是法律制度,在所有的文明古国,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条文上的繁简、法律内容上的异同,都会有所差别,但以下几个方面,则是

① 参见《中华历史通鉴》,第一部,第803页、第1020页。

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无一或缺的。首先是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这在所有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反映。私有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动产包括金银、货币、牲畜、工具等;不动产主要是房屋和土地。^① 其次是关于商业方面的法律,内容涉及商品买卖、借贷、契约、租赁等。第三,在刑法中,普遍都有关于惩治抢劫、偷盗别人财物犯罪的条款。第四,关于婚姻和财产继承的法律。婚姻都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用恩格斯的话说,一夫一妻制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② 而财产继承,无论是嫡长子继承还是由所有子女分享,都属于财产人的直属亲戚。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成为文明社会的主要问题,已是昭然若揭。

制度在其抽象的意义上是互相对立的人们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必须遵循的规则。从总体上看,制度是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和体系。但这只是我们从完整的形态上来理解的制度,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制度的建立及其演进,则是在两条道路上时停时行、跌跌撞撞地进行着。

一条道路是由简入繁,从少到多。人类最初的制度,开始是以一些简单的行为规定——或者是习惯,或者是约定俗成——来体现的,但随着社会活动的频繁,社会矛盾日显尖锐,人们便着意于把这些行为规定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制度的演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最初只是一些人们习以为常且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方式,并杂有宗教的神彩色彩,并没有明

^① 几乎在所有的文明古国中,最初土地都属于国王或神庙所有,然后分封给奴隶主贵族。这种土地归属有些学者认为不是私有土地,但我认为宁可把它看作带有氏族社会痕迹的土地私有。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7页。

确的条文规定,更无定型的司法制度;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法,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善,才逐渐被专门的成文法所替代,并且不断演化,从简单渐趋于复杂,最后形成历史上常见的综合性的法典。^①从每一制度本身来看,一般都经历了从简单粗略到细密繁复的过程;但就整个制度体系而论,人类从屈指可数的几种制度发展为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各种制度,从某种单一的制度衍生出众多的具有依存关系和从属性的制度,同样也表现为一个历史的必然的渐进过程,决定这一历史进程的,则是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复杂化。

另一条道路则是主观到客观的人类必由之路。马克思科学地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②制度的建立也是如此,它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人类对制度的客观性,远不是一开始就能认识到的,最初的制度建立,从形式到内容,都难免带有主观随意性;人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总是因循着从主观到客观、从必然到自由的认知老路来实现的。倘若仅是这样,我们只是重复了认识论中的一个普遍真理,会令人有老生常谈之嫌。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人类对制度的客观认识,不仅受制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般历程,更要强调的是,制度作为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必然会受个人利益或阶级利益的局限,因而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往往主要表现统治阶级的意愿;更有甚者,认为制度可以任意制定,任意修改,任意违背。在人

① 参见山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21—122页。

类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统治者发出了“朕即法律”的喧嚣;朝令夕改,恣意妄为,其造成的社会混乱便可想而知了。这种由利益主体而产生的主观性,在统治者的专擅和淫威下,往往更难克服,对制度结构造成的损害更大。不过,物极必反,当制度脱离它的客观轨迹时,当制度成为某一部分人胡作非为的帮凶时,社会革命的时期也就到来了。

我们在前面曾不嫌絮叨地谈到人们之间的对立是制度得以产生的动因,而其中又尤以人们物质利益上的对立为最。其实,这种动力不独孕生了制度,并对制度的发展、完善和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或者换句话说,人们之间的对立是制度机体的内在动力。在人们的对立中,对立双方都力图使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的目的就在于协调、制衡这些对立,以期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显然,在这些对立中,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决定性的因素,制度的天平必然向力量大的一方倾斜,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否定对立方力量的存在;而且在事物运动的过程中,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从而往往会表现为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目睹的制度变迁。从客观上看,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使封建制度得以建立,商鞅变法即是其例;第三等级与封建统治者的对立,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而告终;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登上历史的舞台。在制度内部,人们之间的对立也是制度进化的决定因素,农民起义,一般能换来一定时期的清平政治;朝代更迭,必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劳动者与企业主的斗争,会使企业制度渐趋合理;有色人种的反抗,将使种族歧视得以缓解……凡此种种,其揆一也,对立是事物运动的生命。大千世界,不都是这样的吗?

二、专 治

还权力以本来面目

我们把制度定义为互相对立的人们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必须遵循的规则。但就制度本身而论,其目的却在于协调、制衡人们之间各种各样的对立,把人们的行为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使人们各安本分,各守其则,从而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正常的运行。既是如此,制度也就可视为对人的约束。然而,反过来看,制度又是人制定的,而且制度的执行、监督、修正也都需要人来实施。因此,围绕各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便衍生出一种制度的制度,即政治制度。孙中山先生把政治通俗地解释为管理众人之事,而众人之事的的管理则要通过各种制度来实现,政治制度又正是从整体上对各种制度的一种管理,因之可称为制度的制度。

政治制度的运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的治理,在其完全的形态上来看,它是通过层层专门的机构专职的人员权威地来行使,在它之上通常有一个最高的统治者,从而形成一个权力的金字塔。说到权力,总不免令人敬畏且颇有微词,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是指强制的和支配的力量;老百姓心目中的权力则是一种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甚或胡作非为的特殊力量。林德布洛姆对权力有一个较为公允的指陈:“只要人们(不管是一个人、几个人还是许多人)明确地或缄默地允许他人为自

已作出某种行为规范的决定,权威就出现了。”^① 其实,关于权力的最为正宗的解释,应追本溯源于中文“权”的字义。权在汉语中的第一字义是秤锤,亦可比之为砝码,不过天平是外国人发明的玩意儿,中国人则用的是秤。秤锤和砝码都是用于称物平施,衡量轻重,于是由权字的第一义引申出第二义,即分辨是非,衡量利弊。望文生义,权力就应该是辨别是非,权衡利害,平抑对立,作出决断的力量。写到这里,真让人叹服老祖宗选字用词的精妙。

权力从其本义上讲,就是依据一定的制度,针对人们之间存在的对立、矛盾、冲突,进行辨别、调衡、仲裁直至强令其执行,目的在于排难解纷,调和衷济,使社会生活得以平稳地运行。关乎此,古人早就有所认识,《吕氏春秋》谈到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做到公正无私,才能致天下以太平,如果出于偏私,则会失去天下。^②《尚书·洪范》也曾明确地指出,对老百姓的统治,要不偏不倚,公平正直,不要结党营私,反复无常,这才是最高的统治术。^③但是,权力在其行使的过程中,要做到公廉无私,平正无偏,权力的执掌者必须超特于人们的对立之外,凌驾于社会之上,否则,掌权者陷于世俗的对立之中,混同于社会的利害得失,就难以做到公正不阿,无偏无私。那末,什么人才能达到这种至大至公、超凡入圣的境界呢? 古人对

① 引自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第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需要说明的是,权威一词的英文 authority,亦可作权力解。萨托利对权威和权力有明确的区分,他把权力界定为发号施令,并在必要时援以强制的力量。参见萨托利著:《民主新论》,第七章“权威主义、权威与权力”一节。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吕氏春秋·孟春季》

③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洪范》

此也早有论述,荀子认为,这样的统治者必须是圣人,他对社会规律了然于胸,在道德智识上达到很高的境界,所以能执掌天下,公平施政于万民。^①《礼记·礼运》中也谈到圣人没有自己的私利,而以天下为己任;他了解人民的欲情喜好,体察人民的利害祸福,教导人民循规蹈矩,在此基础上治理好国家与人民。^②老子更说得直接,圣人不固执己见,不主观武断,一切围绕老百姓的思想意欲而行事。^③

发了以上一番议论,至少会招致两个方面的诘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家们否认会有什么超乎阶级、超乎社会之上的公正无私,统治者的权力只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平头百姓则认为,权力历来都与老百姓相对立,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压迫、强制、鱼肉百姓的一种手段,偶或有一两个体恤民情的统治者,老百姓便感恩戴德,额手称庆了。这两方面的责难,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前者很容易在历史的长河中撷拾出统治者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事例;后者在具体的统治者(不论这个统治者出身于哪一个阶级)身上,总能迅即地发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劣迹。并且在一点上两者具有共识:不存在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权力,当然更不存在超凡入圣、普济万民的统治者。

应该承认,统治阶级的利益会受到统治者的特别眷顾,权势者以权谋私也所在多有,但如以此断言没有公正的制度准则,权力的运用也没有客观的标准,当权者可能恣意妄为,老

①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悬天下之权称也。”《荀子·正论》

②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身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礼记·礼运》

③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

百姓无端受宰割,那也未免失之偏颇。诚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平正义的含义有所不同,权力的基准也各各有异,但有一点在文明社会的任何时期都是不可规避的,即制度一旦建立,便构成了客观的社会行为准则,人们必须遵循它,统治者也要依据它来发号施令,王公贵族、庶民百姓,概莫能外,只有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如果轻重倒置,是非混淆,枉法徇私,便会轻则危身,重则亡国。^①试想一下,倘制度或法规只针对老百姓,那么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冲突靠什么东西来制衡呢?即使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也只是说对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有不同的制度约束而已;倘制度可以不遵,权力可以枉法,这样的制度和权力又能维持多久呢?因此,制度和权力在正常的意义上是公正严明的,这是国之福祚。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否定的形式,制度和权力也不例外。我们在前面已经谈了制度的否定式的表现,下面我们将着重考察权力走向其反面的过程,即权力的蜕变问题。

权力的行使要做到不偏不倚、公正无私谈何容易。权力如同其他自然力一样,也需要有载体,所不同的只是权力的载体是社会的人。而既是社会中人,要能超脱于社会对立之上,独立特行,至大至公,权称天下,治理万民,则又几不可能。古人虽有圣人之说,并具体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楷模,后人只认为是一种理想。不过,从人们对古圣人的景仰中,我们似可窥见权力蜕变的端倪。

① “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而无不败。以此为君者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不幸必亡。”《吕氏春秋·孟春季》“……失君则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管子·任法》

最初的权力执掌者,大都是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在长期的社会斗争中,他们以其较高的智慧、较强的能力,尤其以其任公无私、善于组织的品德与才能,超群出众,博得众人的拥戴。当商品交换尚在襁褓之中,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对立于萌动之际,他们往往能做到博施普济于民,兢兢日行其道而无以家为,赢得人们普遍的尊崇,这或许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具有极高威信的原因。但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对立的普泛化,权力从以下几方面发生蜕变,以致统治者逐渐由人民的公仆转变成社会的主人:(1)进入文明社会,伴随社会对立的增加,管理的职能日趋经常化和专门化,各种各样的国家机构相继建立,并且由国家机器集中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使统治者或统治者集团成为最强有力的权威。(2)商品交换的出现,人们分离为彼此对立的私有者,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不仅表现在个体生命的人生目标中,而且随着种的蕃衍体现为私人财产的继承权。同为凡夫俗子的统治者,把祖上的权位承袭下来,不同样顺理成章,符合民情吗?君权的传递由禅让而世袭,是最好的典例。(3)在阶级对立已经形成、贫富分化愈演愈剧的时代,统治者的权位的真正内涵正在被人们淡忘,它似乎不是代表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也非值得人们特别钟情;相反,最能打动人们的是它那号令天下的威势和与之相匹配的无尽的荣华富贵,为此不惜兄弟阋墙、臣仆反叛、杀父弑君、征战挾伐……

专制还是专治

专制一词,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并没有现代的这种含义,

它往往是指臣民对属于君主的权力的擅用,^①而并不含有君主独断地行使权力的指谓。近现代意义上的专制是相对于近代西方民主而兴的,通常寓意权力独操,恣意妄行,而且总是与封建君权和统治权联系在一起,因此而成为专横、残暴、落后的代名词。洛克对专制有他自己的理解:“任何人使用手中的权利,不是为受其统治的人谋利益,而是仅为了他自己的私人利益。不论统治者使用什么名义,只要他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只要他的命令和行为不是为了保护他的民众的财产,而是为了满足他的野心、报复欲、贪欲和一切其他不正常的情感,那就是专制。”^②因此,从各方面来看,专制真是声名狼藉,一无是处。

在正常的意义上,专制是指那种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普遍实现的政体,它的统治不是由人民的选举产生,最高统治者——君主的权力至上,不受法律的制约,并且在君主权位的继承上采取世袭制。鉴于专制一词已经臭名昭著,我把这种政体称为专治政体。^③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的专治政体,其存在并非如道德家们所痛斥的那样违背道德,也不是如政治家们所断言的那样无合理性,而是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在古代的东方和西方,都没有现今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被称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其所谓的民主是把很大一部分民众排除在外的。更要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是这样的民主,在亘古的夜

① 《韩非子·亡征》:“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淮南子·泛论训》:“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

② 见《政治论》,摘自《西方政治四大名著》,第4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 专制一词的滥用,不在于它有违古义,而是因为它造成了严重的误解,仿佛一谈专制,便一无足取,万恶不赦。

空中,犹如闪烁的流星,倏现即逝;而专治政体,则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不惟在文明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内尽领风流,而且迄今尚有余威,这不值得我们认真咀嚼吗?

专治政体的由起,或者如中国人所说的从禅让到世袭,或者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由王制而立宪而寡头而僭主,^①其客观存在是不争的,审度这一历史现象,必须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来予以考察。前面我们曾经谈到,在文明时代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两大阶级的对立,是靠暴力来催生并加以维持的。在如此尖锐的社会对立中,根本不可能产生人民参政的民主政体,在东方是以君主制的建立把人民参政直接排除在外,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中,则是把奴隶视作非人来变通处理。这是一个无须证明的通则,暴力强制和人们的自愿参与是背道而驰的。

以当时的社会生活而论,广泛存在的小型、分散、私自进行的农业生产,以及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使人们相互悬隔,极少往来,加之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交通系统和传播媒体,即使人们有利益上的一致需求,也难以互通声息,团结一致,势难在政治上形成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巨大力量。此外,长期被排斥于权力之外的平民百姓,不谙统治管理之术,偶值风云际会,揭竿而起,虽也能颠覆神州,但终难成其气候。历次农民起义即为其例。^②

与广大民众的分散孤立、政治能力的低下适成鲜明对照的是统治集团的组织化和专业化。社会矛盾的增加、社会对立的加剧,必然使社会管理的职能经常化和专门化,一系列的制度制定出来,一系列的机构建立起来,一系列的官阶尊卑确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5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 农民起义的不成功,还有更根本的原因,这将在后面述及。

定下来,一系列的政治学说流行开来,庞大的国家机器由此形成。专门的管理机构、专项的管理制度、专业的管理人员、专精的管理学问,是一个成功的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专治还是民主,都是如此。反之,在纷复繁杂的社会对立中,没有专项的管理制度,将无法度可循;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将有事难办;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将迁延不决;没有专精的管理理论,将如随风飘蓬,动辄得咎。概而论之,社会的统治、权力的行使在其形式上具有专擅、独断的性质。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将使权力定于一尊。在文明时代,人们分离为彼此对立的私有者,从宏观的方面看,人们将因其经济利益的异同和社会地位的高下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这种阶级与阶级的对抗马克思主义者早有定论。但这一点并不能削减在微观上人们之间对立的普泛化,在阶级和阶层内部,集团与集团、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立,亦未因其同处于一个阶级或阶层内而稍减;尤其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其无尽的贪欲和政治上的成熟,往往更为卑鄙和惨无人性。如此纷争对抗的社会状态,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加以平衡,并使之得到控制,社会将陷于混乱与毁灭。所幸的是,当人类社会客观需要这种力量出现时,人类的智慧就将使它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力量在客体上外化为各种各样的制度与机构,在主体上外化为各级各层的统治者及其之上的最高统治者。这种力量是独立的,它独立于各种社会对立之上;没有这种独立性,它便不能得到各种对立的社会力量——阶级、阶层、集团、个人的普遍认可和拥护。这种力量是统一的,它必须对人们之间的各种对立进行调衡,使他们实现某种目的,把他们的行为统一在社会规范之内。这种力量是唯一的,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如果政出多门,人们

将无所遵循,难以适从。这种力量是强健的,它的强大足以平抑各种社会对立,它的健康不致于暴虐百姓。因此,社会的统治、权力的行使,在内容上也是独立的、至上的、统一的、唯一的、强健的,因而是专断的,最终将定于一尊。^①

从形式到内容,文明社会的统治权力都有独断专行的性质,加之社会对立的暴力方式和人民大众的分散孤立,专治政体的生长便有了非常合适的社会土壤。我同意洛克关于“专制”的定义,^② 不能把专制混同于专治政体或君主制,如果认为专治政体的君主可以任意胡为,实行专制,而又能国运长久,则大谬矣! 专治政体有其内在的规定性,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

专治学说

在西方民主的喧闹声中,古代西方的专治学说被淹没了,人们不太理会色诺芬的君主政体的主张;柏拉图的哲人政治,也仅是一个理想,而没有实现的可能;亚里士多德虽也谈到君主政体,但只是把它视为客观的存在而非最好的政体。专治学说得以大行其道在西方是中世纪以后的事,不过,政教合一的专治学说是与黑暗的中世纪相为表里的。被称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奠基人的马基雅维里,其笔下极力褒赞的专治

① 至高无上的社会权力的形成,其过程与货币的产生极其相似。人们在物物交换中出现障碍,产生对立,便以一种交换双方都能接受的商品为中介,使目的得以实现,商品互换得以成交。这种对立双方都能接受的商品就是货币。货币最初也只是商品,也具有使用价值,但当它一旦成为货币,就逐渐脱弃了它的自然的使用价值,凌驾于所有商品之上,成为世界之王。类比还可以继续,如果货币忘记了它真正的内容规定,以致币制混乱,货币的内在价值贬损,这种货币的王位将会被颠覆,商品世界也会改宗其他有用的商品为货币,重新推举世界之王。

② 参见本书第108页。

君主,尽多是鸡鸣狗盗、权变诡诈之徒,难于登大雅之堂;而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开创者的霍布斯,在他大为推崇的专治政体中,又杂有几分暴戾之气。一言以蔽之,在西方没有正宗的专治学说。

既讲专治,而且还言正宗,世人或将嗤之以鼻。“专制”之名恶,始于欧风东渐,成于近代文明之西来。在西方列强炮舰外交的淫威下,东方“专制”颓然瓦解,一时之间,专治政体身价倍跌,世人皆倡言民主,诋毁专制。其实,中国专治政体之所以盛行千年而不坠,独步宇内而无有比肩者,是与其博大精深的专治学说密不可分的,苦于这方面的典籍浩如烟海,这里只能撮其大要,简而又简地概述之。

先谈最引人非议的“君权神授”说。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加以批驳的“君权神授”论是中世纪经由奥古斯汀和阿奎那先后建立起来的,而在古希腊古罗马,却没有“君权神授”思想的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在古代文明诸国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君权神授”则早已有之。由此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君权神授”论与专治政体密切相连。确实如此。说专治君主的权力是上天、上帝或者神灵授予的,乍看起来,纯属荒诞不经;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对立已经普遍,当国家权力已经产生,而这一权力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并非是人们自由意志的选择,人们仰视着这种对自己生之死之、予之夺之的至上权威,会产生什么思想呢?希望这种权力是公正的、神圣的、上天安排的。这有如宗教的起源,当人类在世俗的纷争中饱经苦难而又莫名以对时,只有幻想一个上帝、一个真主、一个佛来拯救自己。“君权神授”只不过是这种思想世俗化而已。另外,君权的正常行使,必须兼顾整个社会的利益,但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时通常会出现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而把君权神化则有助于统

一思想,统一行动。例如殷王盘庚准备迁都时,为了动员不愿迁徙的老百姓,便把天命抬出来,说这是天的旨意。^①不过,得自神授的君权不能任意胡为,而是要为人民做好事。^②到了汉代,董仲舒系统地提出“天人相与”的“君权神授”论,在理论上确立了君权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权威,同时为了防止君权的滥用,又以阴阳灾异说作为限制,使皇帝的威权不至于无所忌憚。这种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都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平心而论,在即定的历史条件下,“君权神授”论对于维护社会权力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它的否定方面,也是明摆着的,后世的谶纬学且不用说,对腐败残暴的王朝它也行使着维护的功能。

面对西欧林立小国的繁华富庶,中华帝国的“大一统”思想也有被非议之嫌。反对的人声言,“大一统”有什么好?欧洲国小国多,发展不更快吗?此言差矣。国大國小,有其历史的、民族的、地理的诸多原因,但不论大小,统一是强盛的重要因素。不能设想,如果欧洲各国内部仍然像中世纪那样,诸侯割据,各自为政,而能有今日?近来统一欧洲的提出,便是更有力的回答。由董仲舒明确提出的“大一统”思想,主要包含政治统一、思想统一、领土完整三个方面,这在客观上秦始皇混一海内时已经完成,“大一统”思想只是理论上的折射。从纵向上看,秦统一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国有七百,“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频繁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极端的痛苦。秦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割据,兵祸连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时期,史家已有定评。反观西方,自由独立的古希腊城邦抵挡不了马其顿统一的步伐;而分崩离析

① 事见《尚书·盘庚中》。

② 参见《尚书·召诰》。

的亚历山大的帝国在统一的古罗马帝国的铁蹄下又存在了多久呢？在此我要提醒读者，在“大一统”的观念中，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相比，是更为根本的，成吉思汗横跨欧亚的帝国因缺乏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性，在历史上只能昙花一现；而奥斯曼帝国正是仰仗《古兰经》的思想一统，才卓然勃兴；十字军的东征，如果不是拉出基督教这面大旗，也许一次也实现不了……秦汉以降，大一统的专治政体的延绵承袭，温厚宽惠的儒学一尊，加之历史地理文化因素成就的领土完整，才足以使中华古国光耀千秋。

神圣的君权应该由什么人来操柄？“大一统”的帝国依靠什么维系？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殚精竭虑，因而有圣人明君之说。董仲舒把圣人看作天意的代言人，因此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与他的“君权神授”说是合拍的。其他人并未给圣人戴上神秘的光环，而是把客在的历史人物理想化，他们指出，圣人道德高尚、智慧卓绝、备道全美、仁义中正，可谓至善至美，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属。固然，圣人作为最高的统治者是最好不过的，可是，圣人只能托之于过往，而在现时的社会生活中却难以寻觅。于是，学者们迫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为最高统治者定位，拟定了权称天下的君主的具体标准：仁德宽厚、选贤与能、强国富民、明礼慎刑、分均不偏、赏罚分明、明辨秋毫、以一行万、宽赋薄敛、公平中和、使民以时、恤寡抚贫……^① 如此完美的明君人格，在后世帝王中恐怕没有一人能完全做到，但它激励、警醒、鞭策着一代代君主，不能说没有积极的意义。

治理国家，光有明君还不行，再好的政策，也需要各门各类的官员来具体实施；何况政策的制定，也并非皇帝亲自而

^① 参见《荀子·王制》。

为,尚赖于卿相百官。因此,国家管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字塔般的官僚阶层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历来强调任用贤能之士来治理国家,甚至把是否选贤任能抬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民间还为此演义出姜太公八十遇文王,刘玄德三顾诸葛亮的佳话;可以说,在选用官吏上的“尚贤”之说,是中国专治政体中的一道特殊景观。或许有人说,在用人上主张选贤任能,世界各国皆然,不唯中国独有。诚然如此。但比较而言,中国的“尚贤”之说,不仅蔚成传统,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脱颖出一整套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官吏选拔黜陟制度,否定了名位世袭、门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而这在世界专治政体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迄今为止最无异议的也许是“民本”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中的这句话,是指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平安无事。作为统治者,必须明白这一点,要做到爱民、重民、利民。人们最熟悉的一个典故是把君王比作船,人民比作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这似乎也成了历代君主的座右铭。如果把“民本”思想说成是“民主”的先声,必不能获准于民主主义者,但要把“民本”学说斥之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矫情,恐也失之公允。“民本”而与“专制”联姻,是否有更值得玩味的内涵,这里暂不细究。但有一点是确切不移的,即在中国的专治政体中,“民本”思想历来被置于突出的位置,遍观世界各国的专治政体,无有出其右者,应该说这是中国专治政体优于其他国家的专治政体的又一重要方面。

我们再来谈谈“王霸道杂用”的统治思想。现在人们通常认为,在统治方法上,儒家主张实行王道,法家主张实行霸道;儒家重德不重力,法家重刑法而轻德。这种区分,是否有待商榷,暂且阙疑不论,但把“王霸道杂用”的思想归纳为在统治方

法上德力并重,礼法并用,还是可以接受的。大家知道,秦国重刑名之学,以吏为师,并统一了中国,于是秦始皇认为严刑峻法就能治理好国家,便出台了一系列的急政、暴政,最后弄得民怨鼎沸,二世而斩。汉惩秦弊,建国初期采用黄老之说,与民休息,以后随着统治经验的不断积累,逐步形成兼采儒、道、法诸家之长的“王霸”之术,并在以后的世代中成为中国专治政体主流的统治手段,这可以称为世界专治政体中的奇葩。秦汉以后近两千年中中华帝国居于世界之首,实赖“王霸道杂用”之力甚巨。

最后是现代人忽略甚或鄙夷的“名分”之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人们所熟悉的“名分”之说,而尤其为封建统治者所乐道。诚然,君臣父子之义是“名分”学说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名分”学说不尽于此,它还有更为深邃的内容。荀子对于“名分”有很精湛的论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①这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差别和利益对立是客观存在的,要正视这些差别和对立,并区别对待之,使人们各得其所,这就是“分”,而“礼义”是“分”的具体化。在另一个地方,荀子谈到:“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②这里,士农工商以至统治者的“分”都谈到了,并指出只要这些“分”都做到了,便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说,“分”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我不嫌累赘地引证荀子的原话,目的是要说明“名分”学说的科学

① 《荀子·礼论》。

② 《荀子·王霸》。

性和重要性。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人们之间对立的普遍性,把如何处理好这种对立摆在社会政治生活的首要地位,并在现实政治中创造出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使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名分”学说对于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繁荣功不可没;而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缺乏“名分”之说,这一点在下一节中将详谈。另外还须强调一点,中国的“名分”学说与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和印度的种姓制是有根本区别的:“名分”学说虽然界定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地位,但并不限制人们向其他阶级或阶层发展,也就是说,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从下层阶级转换为上层阶级;而西欧封建等级制或印度的种姓制则是及于终身,而且世代相袭,其阶级身分是僵固的,不同的阶级绝难躐等,这必然会极大地扼杀个人的上进心和创造力。

中国的专治学说不限于此,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浮光掠影而已,思想应是现实的模写与提纯,专治学说的博大精深,是与专治政体的雍容大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不得不提及。

专治政体之否定

以上各小节,笔者试图为权力和专治政体正名,尤其对于中国专治政体与学说,似乎多有溢美之词,为了论证的需要,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留待读者去评判。作者只想表达两点:1. 专治政体的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非由人之好恶主观决定;2. 中国的专治政体,是中华五千年文明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很好的总结、扬弃和继承。

对于第一点,人们或许不以为意,认为不管必然性也好,

偶然性也好,已经是历史的过眼云烟,不去理它也罢。对于第二点,人们或许颇多微词,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自由已成现代文明的主潮流,还去打理什么封建遗产,意欲何为。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不需要我在此罗嗦,但近人之论中华优秀文化,多谈中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耻言中国的封建专治,既或论及,也毁多誉少。在我看来,中国的专治政体及其学说,大有精华,而西方的民主政治,亦并非尽美,倘能参酌古今,廓清中外,对于今后政治体制的设计与选择,不也大有裨益吗?

前面我们主要从正的方面论证专治政体及其学说,极言它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打开历史的卷帙,统治者的昏聩、权诈、荒淫、残暴与老百姓的深受盘剥、贫困无助、无以聊生、铤而走险,尽皆跃然纸上,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前面的论证只是理想的敷设,而现实的政治尽是黑暗的篇章,则未免极端。在中国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多有政治清平、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客观上讲,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黑暗与光明、平治与混乱,总是交织在一起,或相互更替。一般而言,每一个王朝兴起时,总有一番励精图治、乾坤清朗、万物更始的新气象,即人们常说的太平盛世;迨乎王朝的中晚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亦即乱世。对此人们通常的解释是,在新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便对老百姓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如此说来,一旦政权稳固,似乎就不必对老百姓让步,甚至可以恣意渔肉百姓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感觉到此说之浅陋。在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企图澄清吏治、革新图强的统治者也不乏其人,然而大都不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无能于黑暗政治的颓势。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理论上讲,凡是盛世,均为以上所列举的优秀政治学说得展其能;凡是败世或乱世,优秀的政治学说均不得行。这种回答不会令人满意;而政治学说是否得行其道和为什么能否行其道,以及中国传统政治为什么治、乱交替,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下面我们将从政治层面上来加以分析。

我们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证明,随着商品交换出现而产生的人们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普遍对立,对社会制度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社会制度就是调节人们之间的对立,把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在有利于社会持续运转的范围内;而社会权力和政治体制作为社会制度的具体运作方式,必须超脱于社会的对立之上,才能做到至大至公,权称天下。倘若社会权力的执掌者陷身于社会的对立中,谋求个人的私利,社会权力的行使就难免偏私,权力的公正性受到亵渎,权力便不成其为权力了。

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货币的例子。物物交换的矛盾或对立使货币的产生成为必然,而最初的货币,是由某一种商品来承担的;当这种商品成为货币时,它就凌驾于其他商品之上,成为一般等价物,为各种对立的商品作中介,使商品交换得以实现。这时的货币,已经不再是商品,而是超脱于商品对立之上。如果它想再次成为商品,置身于商品的对立中,它就必将放弃交换媒介的职能,在一次交换后退出流通,不再成其为货币。

社会权力的执掌者必须公正无私,超群出众,对此古人早就有所认识。孔子把这样的人寄托于尧、舜、禹、汤等古代先贤的身上;柏拉图则在他的《理想国》中塑造出“哲学王”,一个智慧超群、道德高尚,在“共产公妻”的环境中生长起来而决无

私心的人,以之作为最高的统治者。^①然而,寄托也好,理想也罢,在现实政治中涌现出来的却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统治者:雄才大略者,能以国家民众为念,造福桑梓;善自珍摄者,能守祖宗之遗法,无扰民之滥举;昏庸无道者,肆行无忌,恣睢暴戾,则天下骚然。显然,不论优劣贤愚,明君昏君,均无一人能做到至大至公,了无私心。

制度的运作,权力的行使,客观上要求公正无偏,因此统治者必须做到大公无私,凌驾于社会对立之上。可是,人是社会的产物,在充满对立的社会中而能超尘绝俗,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而能洁身自好,作为个别人或能做到,作为一个群体、一个阶级却绝不可能;何况统治者长期身处权位,更有机会攫取个人的好处,实难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现实政治的两极,一极是制度、权力的内在规定要求统治者秉公执法,一极是客观的社会对立使统治者私欲难禁。这一矛盾,在人类的整个文明时代中是不可规避的,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只是两极力量的对比,而不同的政治体制,也因其如何处理这两极关系大有歧异。

统治者倘能秉公执法,毫无私心,便不会与老百姓处于对立之中,他只是人们之间对立的仲裁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执行人,他将因此受到人民的拥戴。这就犹如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人们喜爱它,是因为它能解决交换中的矛盾,通过它能获取人们所需要的商品。如果统治者徇私枉法,他就与人民相对立,而不成其为严格意义上的仲裁者。打个比方,法官办案,如果收受了被告的贿赂,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原告会因其执法不公而憎恶他,被告也因其贪赃枉法而鄙夷他,当事人都

^①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如果有超群绝伦的人,应该让他成为终身的最高统治者。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4、1288,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与他处于对立中。所以,当统治者夹杂着个人的私利去处理政事时,他就与人民群众相对立,这在文明时代的任何时期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们时常说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专制政体中,定于一尊的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其权力的行使,依靠宝塔状的层层官吏。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没有约束,而各级官吏的权力,来自皇权,受皇权和各种制度的制约。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制度,在其实行的过程中如果能做到公正无私,是最有效率、最受人民拥戴并不需受人民监督的,它超脱于社会的对立之上,致力于为人民谋福利。譬如,中国共产党最初取得政权时,它没有自己集团的私利,献身于人民的幸福,干部廉洁,行事公正,深得人们的拥护,即使没有公民的参政议政,亦不失为优良的政府。^①可是,正如前面所分析,人们之间利益上的对立必然表现于统治者内部,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吏佐,都鲜能至大至公,因而在权力的运作和制度的执行中,总难免徇私枉法,于是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对立便不可避免。在这种对立中,老百姓对统治者的权力毫无约束力,极易形成权力的恶性膨胀,尽管最高统治者往往能洞察这种权力的恶化,并采取一定的手段与方法来加以制止,要求下级统治者为官清廉,奉公守法。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制衡不能说不起作用,应该说在某些时期也能产生较佳的效果,但是这种权力制衡毕竟是自上的,自外的,因而难于做到及时、准确、普遍;何况这种制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天纵英明的好皇帝,倘若遇上一个昏君、暴君,老百姓就有苦头吃了。

^① 这个譬喻有点不伦不类,但一时找不到更好的例子,读者在理解这一点时,类比只限于中央高度集权的政体。

一方面是权力与制度客观上要求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对立导致的统治者的偏私,这两方面的对立及其双方力量的消长表现在专治政体中,便是我们通常在历史中所看到的那种治与乱、盛世与衰世的局面。一般来说,一个新王朝兴起时,最高统治者深感创业的艰难、民间的疾苦,往往能寡欲撙节,励精图治,而新生的统治阶层也未谙于骄奢淫逸、结党营私的权贵生活,所以总有一段吏治清明、百废俱兴的升平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阶层,自然是“近水楼台”,在财富的聚积中总是着人先鞭,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最高统治者昏聩无能,荒淫无度,统治者的权力无所制衡,那么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到了;至此,即使最高统治者还不失明智,欲匡救时弊,然而木已成舟,积重难返,亦难有所作为。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即是其例。^①

综上所述,专治政体的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不仅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而且使社会权力的蜕变成为必然,当这种社会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时,政治体制必将腐化,社会革命的时期也就不远了。

三、民 主

亚里士多德的彷徨

专治政体的自身否定,从其直接的对立面来看,应该是民

^① 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也许已领会到,中国历史上的治乱交替,除了政治层面上的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主政体。谈到民主政体,不能不令人想起古希腊的民主制,这曾是西方人曾经引以自豪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关于古希腊的民主制,还是存在着不和谐音。学者们普遍认为古希腊的民主制与近代西方民主不能同日而语,并置疑:一种把妇女、异邦人、奴隶(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排出在外的制度能称为民主制吗?此外,古希腊民主制普遍存在的骚乱和短命,又使另一部分人颇有烦言。

古希腊的社会制度并非民主制一种,换句话说,民主制只是希腊城邦多种政体之一。亚里士多德根据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而把政体分为三类,又根据统治者是否照顾到全城邦人民的利益把三类政体各各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因而有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六类,前三类为正宗,后三类为变态。^①而我们所论证的民主制属于哪一种,亚氏并未作出区分,后人根据亚氏的论述认定以多数穷人进行统治的平民政体即民主政体。^②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多数人进行统治的政体只有共和政体和平民政体两类,而亚氏本人认为共和政体在古希腊城邦几乎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则是平民政体,^③那么除了平民政体之外便没有什么政体可称为古希腊的民主政体。

对于以上所言的古希腊民主政体,亚氏把它视为变态政体之一属,可见并无推许之意;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等人对这类民主政体也殊无好感;萨托利在大量引证了近现代诸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9。在这里亚氏还标明了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的区别:“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部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

② 参见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284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6。

学者的论述后,理所当然地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无异。^①或许萨托利为了论证的需要把古希腊的民主政体过于极端化了;而亚氏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客观得多,他根据具体情况把平民政体区分为五种,而只有最极端的平民政体才具有专制的性质,并认为它“显然就不像一个政体”。^②

说了这么多,古希腊的民主制究竟为何物?亚氏为它归纳如下:它以全体公民的平等自由为基础。所谓平等就是说全体公民人人相等,人人轮番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全体公民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所谓自由,就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人生应任情而行,各如所愿。”在这一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全体公民从全体公民中直接选举统治者,有些不需要专长的职位可以抽签产生;对被选举者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或仅订立极低的财产资格;统治者一般都不能连任,而且任期都比较短;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政事或至少是军国大事必须由公民大会裁决;在司法方面,由全体公民或全体公民选出的人们组成公众法庭,有权审判一切案件;……^③

比照一下古希腊的民主制与西方现代民主制,人们通常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古希腊民主制把人民的大多数(妇女、外邦人、奴隶)排除于民主制之外;而萨托利把两者的区别更加扩大和绝对化了,他不仅指出古希腊直接民主与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重大差别,甚至认为古希腊民主政体中的个人自由与现代西方民主中的个人自由背道而驰,直至最终得出古希腊民主与现代西方民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结论,更遑论

① 参见萨托利:《民主新论》,第292—296页。

②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1、1929。

③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1—314页。

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了。^① 萨托利的论证有其独到之处,对两种民主制下的个人自由的分析也不无精当,但却没有抓住古希腊民主政体的要害,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

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简直就是骚乱与短命的代名词,这已为历史所证实;把穷人与富人的阶级斗争视为古希腊民主政体急剧动荡的原因,也已经是老生常谈。问题在于,文明时代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为什么使古希腊的民主政体顷刻瓦解,却无力撼摇现代西方民主呢?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现实政治的目击者,又是具有极高智识的思想家,对古希腊民主政体的衰乱作了广泛的分析,他指出人们以追逐个人的利益和名位为目的,当个人的利益不能满足,面临威胁、受到损害时,人们便攘臂举事,这是骚乱根本性的动因。^② 在古希腊民主政体中,人们追逐个人利益的冲动,往往外化为对富人利益的侵夺,或者通过不利于富人的法律,或者为富人罗织罪名,或者直接侵吞富人的财产,从而导致穷人与富人的暴力冲突,使民主政体动乱频仍,随时都可能倾覆。^③ 这种动乱是在古希腊民主政体这一特殊的背景中产生的,而人们之所以选择民主政体,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生来是平等的,既然大家都平等地生为自由人,就应该在一切方面都绝对平等。^④ 因此,夺取富人的财产以使之均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实,亚氏在分析动乱的原因时,并非只限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而是从古希腊整个社会政治入手。他认为问题的关

① 参见萨托利:《民主新论》,第十章“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

②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2^a,30—40。

③ 同上,第五卷,第五章。

④ 同上,1301^a,28—30。

键在于如何理解平等与正义,平民认为人生而平等,应在权利、财富、社会职位诸方面都平等才符合正义;而富人则认为人们在个人财富上必然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必须保持,并在社会职位的分配上以财产的多寡为基准,这才是正义。两者都要求公平与正义,然而各执一端则分别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这两类政体是希腊城邦政体中最常见的。^① 亚氏甚至明确指出,对平等和正义的理解所执一偏,“就是邦国内讧的源泉”。^②

对平等和正义的理解,一直困惑着希腊人,亚氏为解决这一难题筹划良久,仍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平等和正义这些问题,要在理论上弄明白谁所抱有的见解是正确的,这实在很困难。然而这类困难,比之更加困难的劝人遵守正义,那就微不足道了;人们要是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就不惜违反正义。”^③ 古希腊人既惑于平等正义而不得其要,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又各逐私利而不能调和,一个崇尚自由平等的民族最终则罹于公平正义之难,不亦悲夫!

诚如亚氏所言,古希腊城邦的动乱之源是人们在平等正义的旗帜下追逐个人的私利。但在人们的利益普遍对立的文明时代,人们谋求个人的私利是无可厚非的,问题的根本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何把纷争不息的人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在一个共同体内,使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亚氏憎恶于富人与穷人的争斗,曾经幻想建立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可以调和富人和穷人对立的理想城邦,但随即他又否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0^a、1301^a。

② 同上,1301^b,4。

③ 同上,1318^b,1—4。

认这种理想城邦存在的可能性。^①梭伦的改革在缓解富人与穷人的对立方面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但仍然招致两个对立阶级的攻击。^②以一个时代命名的伯利克里,虽然胸怀豁达,智慧高远,最终也不能见容于雅典的民主政体。^③以上事例,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在古希腊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一种至高至上的统摄力量,能够把各种社会对立包容其中,这正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悲剧所在。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不仅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君权统治,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学说,其中的“名分”学说相对于古希腊各逞其欲的平等正义,无异于云泥之判。

近代西方民主的勃兴

西方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是古希腊民主制的直接后果,这种说法对反对极端民主的人是有诱惑力的;从古希腊的极端民主转化为中世纪的极端专制,依照辩证逻辑的发展也言之成理。但是历史学家不这样看,他们宁可选择古希腊民主制结束于马其顿的征服、古典西方文明衰败于蛮族入侵的答案。客观地看,说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不敌古代西方的专制政体而败下阵来,是有一些牵强;不过,把西方古典文明的败亡归咎于蛮族的入侵,却是值得商榷的。

在古代西方,从来就没有形成过能包容各种社会对立并使之和平相处的制度和思想,我们在上面曾提到,正是由于缺乏这一点,古希腊的民主城邦,总是处于不断的骚乱与动荡中。这种状况,不独民主政体如此,在寡头政体和僭主政体中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四卷,第十一章。

② 参见[英]安德鲁斯:《希腊僭主》,第7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参见韦尔斯:《世界史纲》,第二十一章。

同样存在。尔后亚历山大的统一,也只是在领土扩充和军事征服上做得像模像样,而政治上的兼容和思想上的统一却从未做到,以至亚历山大一暴亡,他的帝国便一分为三。^①同理,古罗马帝国的铁蹄虽然蹂躏了欧、亚、非三大洲,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海,但是政治上的腐败和缺乏凝聚力,使之过早地出现了颓败之象,蛮族的入侵仅是加快了这一过程。

在繁杂的社会对立中寻求其同一性,把不同阶级和民族的利益统一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这是西方古代政治中最缺乏的。古代西方的繁荣与强大,总是以穷兵黩武为其历史的背衬,一旦失去军事上的优势,那一种文明的末日也就到了。政治统一上的无能最终只能让位于宗教上的精神一统,当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会议上确认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一尊地位时,^②只不过是人们对人们普遍信仰基督教义这一事实的追认而已。^③西方人往往诧异于任何宗教都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地位,最好的解释是,中国人已经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体会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安定时,怎么还会去理会天国的未来许诺呢?

虽然把精神上的至上权威拱手让给了基督教,但欧洲的政治统一仍然迟迟没有到来,中世纪成了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国家四分五裂,诸侯龟缩割据,战祸兵燹接连不断,

① 韦尔斯在谈到亚历山大在政治统一上的举措时,不无揶揄地说:为了各民族传统的融合,“无论如何,他做过一件事,使这个说法看来似有可能;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婚宴,在这次礼宴上,他同他的90个将领和朋友们一起娶了波斯新娘。”见韦尔斯:《世界史纲》,第393—394页。

② 公元325年在尼科墨迪亚附近和君士坦丁堡相对的尼西亚镇举行了一次基督教会的全体代表会议,君士坦丁大帝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以官方的形式正式确认了基督教在西方的精神统治地位。

③ 西方人在长期的社会混乱中看不到苦难的尽头,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耶稣的在天之灵。

经济凋敝,人口锐减,思想禁锢,人们除了用自己的自由去交换领主或封臣的荫庇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基督教也没有给期望它的人们带来公正与和平,各个教派之间的争斗,对异教徒的血腥审判,不时而兴的宗教战争,比比皆是;罗马教廷不甘寂寞于它在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在与世俗君主的权力争夺中不惜大打出手,把耶稣的教诲置诸不顾。自诩为自由平等的欧洲人啊,怎么会堕入这样的境地?

在中世纪黑暗的天际中,十三、十四世纪终于出现了熹微的晨曦,这就是西方的自治城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自治城市在近代西方文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我们还将论及自治城市在近代西方民主中的奠基石作用。

让我们先回溯一下古希腊城邦在民主政体形成中的作用。环爱琴海林立的百十个城邦,是古希腊社会的主体,这些城邦,小的仅有几千人,大的不过数万人,其中最大的雅典城邦,在最兴旺的时候,也只有 30 万人左右;城邦与城邦之间,各自分立,互不相属,每个城邦都是政治、军事、经济完全独立的共同体。这样的古希腊城邦,是如何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联系在一起的呢?首先我们要弄清什么是“民主政体”。伯里克利指出,“民主政体”就是行政权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里;^①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民主政体”就是穷人的统治,因为穷人总是多数。^② 因此,我们把“民主政体”定义为多数人的统治。

说到统治,说到权力的行使,首先就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对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本章前半部分我们已详细谈到。统治的方式,或者说如何处理人与

①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 208—209 页。

②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0、1317^b。

人之间的对立,总体上可分为两种——专治与民主。专治统治方式的形成,由诸多因素决定,其中以人们之间关系的暴力对抗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所引致的人们的分散与孤立为主。^①在古希腊城邦中,情形却有所不同,决定其民主政体形成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古希腊当时正处在氏族社会解体并转向奴隶社会的过程中,在城邦内部还保留着鲜明的氏族社会的胎印,公民们都属于同一族类,外邦人和奴隶都被排除在公民的范畴之外;那时还没有常备军,每个公民既是战士(武器装备自备),又是普通民众;贫富分化虽然开始出现,但公民之间并不存在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政治地位是平等的。

其次,由于古希腊城邦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古希腊城邦在两项事业上颇为发达,一是海外殖民,一是贸易。这两项事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海外殖民和贸易的扩大使城邦公民的贫富分化日渐加剧;另一个结果是贸易的繁荣使城邦内从事商业、手工业、航运业的人大大增加,人们在经济生活上相互依存、交往日趋频繁,经济利益的对立也更为普泛。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由商品交换的频率增高所引致的人们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在民主政体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在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偶尔在城镇集市中进行一点小额的商品交换;从总的方面看,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稀少,居住分散,彼此孤立,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只具有偶发的性质。因此,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人们之间的对立。反之,在古希腊城邦中,随着贸易的日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益繁盛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增多,其关系必然是既互相依存又彼此对立,以致人们急欲在政治上使自身的利益得到实现和保证。

综上所述,城邦内部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非暴力以及氏族社会关系的残存形式,使人们在政治上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而对外殖民与贸易发展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和人们相互关系的日益密切与对立,使人们在政治上寻求自我利益的实现。人们在政治上既然是平等的,在经济上又各自谋求自身的利益,因而以民主的方式来调整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肯定能得到多数人的首肯;加之城邦公民的高度集中,人口数额相对较少,城邦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独立自主,这些都为古希腊城邦实行直接的民主制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也就在这样的关系中孕生了。

不过,城邦公民政治上的平等以及因贫富分化而产生的经济上的差别,既使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得以产生,又成为古希腊民主政体的痼疾:穷人以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经济上的平等,富人则以经济上的差异要求政治职位上的区别,^①二者各执一端,相互之间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是民主政体动乱的源泉。

现在让我们再来粗略看一下近代西方民主与自治城市的渊源关系。

无论是以赎买的方式还是以包税的形式,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出现了一批自治城市。它们从皇帝或者国王那里得到特许状,在封建领地环伺的氛围中赢得了政治、经济上的独

^① “一个城邦组织内,全部都是自由的公民,而富于资产的人则限于其中的较小部分;其一以自由为标帜,另一则以财富为依据,这些就是寡头和平民两派所各各据以争取统治权力的实际基础。”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0^a,2—5。

立：它们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司法机构，市民们可以参加行政官吏的推选；在经济上形成了各行各业的行会组织，实行本行业的自卫和垄断——虽然带有封建特权的痕迹，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经济团体，它们以一个声音说话，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利于它们自身利益的实现；最明显的特征是市民的人身自由，正如当时的俗语所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里没有封建法律的束缚，更不存在封建制度下的人身隶属关系。

人身的自由及相互关系的平等，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端赖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在西方的自治城市中，绝大部分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因而商品交换关系成为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当事人双方都作为独立的、自由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它不同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那种暴力式的强迫关系，也不同于农奴对封建领主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即使是自治城市中存在的工商行业中的雇佣关系，雇主与雇员之间也是以自由人身分的关系出现的。因此，在自治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自由平等的关系（注意：这种自由平等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

商品生产和交换不仅在人们之间产生平等自由的相互关系，而且使人们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互相依存又彼此对立，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系。如何调节和制衡这些利益关系，使之利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便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不可忽略的问题；在自治城市内部，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人们之间普遍依存和对立的利益关系，更使保护私有者的个人利益、保证商品生产的顺利进行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总之，欧洲各自治城市的崛起，经历了一个自身调整 and 发展的过程。

但是,商品生产天生是外向性的,随着自治城市的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扩大、新大陆的发现,封建制度的外壳已经不能容纳新的经济力量的生长了。分封割据的封建壁垒、皇家王室对工商业的种种限制、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宗教信仰的严厉禁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无异于重重枷锁。另一方面,这时的第三等级已今非昔比,他们不仅在人数上日愈壮大,所掌握的社会财富也在迅速增长,而且以他们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正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全球;他们不再满足于自治城市的狭小空间,要求更为广大的市场、更加开放的世界。

经济上的客观需要必然转化为政治上的主观冲动,羽翼已丰的第三等级正式向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下了战书,战书上只写着几个大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如此明白晓畅的语言只是政治上的呐喊,而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他们也不稍懈怠。他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对封建制度发动了全方位的进攻,虽然各国的情况不同,进攻的方式也不一样,但经过反反复复的斗争,终于在西欧北美竖立起民主共和的大旗,至今仍令西方人引以为傲。

西方民主政体的形成,如果从15世纪起算,到17世纪的英国革命,其间经历了大约两百年,不少西方学者把这一过程归功于西方民主思想的复兴与传播,而于经济上的变度却置之不理或重视不够。其实,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西方自治城市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普遍对立;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自由关系;商品经济取代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这些才是近代西方民主的真正底蕴。

近代西方的民主政体,迄今为止仍还具有生命力,对照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混乱与短命,因而产生了一个引人入胜且至

关重要的问题。萨托利在他的《民主新论》中对古希腊民主和现代民主作了比较,首先他认为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或称间接民主)比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接着他以西方现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来否定古希腊个人自由的存在;最后他为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划下鸿沟,认为二者截然不同,相互之间不存在承继关系。^① 他的分析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抓住现代西方民主的最根本之点。我们曾经说过,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悲剧在于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包容各种社会对立的至高无上的统摄力量。那么,这种统摄力量在现代西方民主中有没有呢?萨托利指出,现代西方民主政体的理想之源在于这一原则:“培育着国家的酵母和营养品是差异而不是划一。”他武断地认为,除了现代民主政体以外的一切政体,统统都是清一色的世界,而唯有现代民主政体才是多彩多姿的世界,这种多彩的世界是由“自由主义”促成的。^② 其实,“差异”和“划一”在任何政体中都是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于用什么方式来包容这些“差异”,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某种“划一”。

从根本上看,现代西方民主是统一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础上的。人们或许会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古代的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为什么没有导致古代民主政体的产生呢?在古代,虽然有“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的信条,但更有神权、王权及各种封建特权凌驾其上,使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在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经济已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已经货币化了,财产成了人们标示自己社会地位的唯一筹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到:“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

① 参见萨托利:《民主新论》,第十章,“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

② 见萨托利:《民主新论》,第294—296页。

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① 只是到了这时,“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才有可能得到完全的认可。只要离开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根本,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代议制民主”和“共和国”,都将化为乌有。请看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仅是由于私有财产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便使富人和穷人阅墙;1789年的法国革命,在无产者平均主义的财产要求中,共和国归于败亡。

在商品世界中,人们的一切利益都结晶于私有财产,人们之间的一切差别和对立,都简化为私有财产的数量关系。现代的民主政体在实际的政治纲领中正是抓住了“私有财产”这个根本,但是在理论上是否也达到了深刻的认识,那倒未必。

现代民主的痼疾

从15世纪开始发蒙,到了19世纪,现代西方民主历经数百年之后得成正果,正式登堂入室,在一系列西方国家中最终摧毁了封建专制,代之以五颜六色的民主共和旗号;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没有封建传统的前提下,来得更便捷,以最短的时间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但是,当第三等级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他们的共同胜利时,就已经开始分裂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支反封建的同盟军,怒目相向,似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无产阶级发现他们在反封建的胜利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们最主要的自由只是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在失业到来时,甚至这种自由都没有;他们的平等,只是听命于资本家给他们确定的工资,听命于资本家为他们安排的工作条件和秩序,而这些往往是低得不能再低的。社会的贫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

差距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在疟疾般不时发作的商业危机中,大量的人被抛入失业、赤贫、饥饿的深渊,求告无门。人们劳动的权利、生存的希望、财产的保障、人身的自由、平等的关系难道就是这些吗?

国内的情况如此,国际间的关系又怎样呢?老牌的殖民主义者已经把世界蚕食了不少,新生的帝国主义更是虎视眈眈,什么“劣等人种”、“野蛮民族”需要它们的拯救与开化,藉此便堂而皇之地在别人的家园中进行掠夺和杀戮;帝国主义之间也没有什么规矩可言,只要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今天的盟友会变成明天的仇敌,它们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惨绝人寰的战争。这就是它们时常挂在嘴边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公平正义”吗?

面对如此栩栩如生的西方民主的讽刺画,世人不会无动于衷。空想社会主义者温和的社会改革方案我们就不提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的根本否定放在后面来论说,尼采的极端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也不必理它,“无政府主义”的“高论”更无须聆听,我们仅是循着西方主流的政治思潮来洞察西方民主政体的内在矛盾。

“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民主学说的老大哥了,作为自由主义始祖的洛克绝对没有想到,他锻造的反封建专制的自由主义武器,会在民主政体建立后,被无产者用来对准民主政体自己。法国大革命中无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呐喊,使慌了手脚的资产阶级不惜与往日的宿敌——封建势力联手,最终把穷人的自由平等要求浸渍在血泊中。法国大革命硝烟还没有散尽,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共产主义流派便已繁花盛开,虽然它们各自的政治主张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自由平等的崇尚。

已经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并不喜欢无产阶级摆弄自由平

等这个武器,自由主义虽然是激进的反封建的利器,却不能用它来断伤自己,必须使它改头换面了。

19世纪法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孔斯坦把自由区分为公民参与政权行使的“政治自由”和人们在思想、言论、财产、经营、贸易等等方面的“个人自由”,并指出在古希腊这类民主政体中,公民只有政治自由,没有个人自由,这也许就是古希腊民主政体失败的原因;在人口众多疆域广大的现代国家,政治自由既无可能也毫无意义,因此,现代民主的自由应该是人们的个人自由,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他看来,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是不相容的,并指斥卢梭的错误就在于把自由同政权相混同,认为自由的关键就在于人民掌握政权,结果导致了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统治;由此他进一步指出,人民主权同君主专制一样都具有侵犯个人自由的危险性。^①

孔斯坦的意图是明确的,既然政治自由既无可能又毫无意义,一般老百姓就不必掺和到政权行使的活动中去了,只要能保证自己的个人自由就行。

同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边沁则是以其功利主义而闻名,他用人人都“求乐避苦”的功利原则,把人们的自私自利理论化了;把每个人的利益累加起来就是社会利益,似乎这样就可以消融人们之间的对立;如果政府致力于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就是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不是一个好政府吗?现代民主政体做到了这一点。

真是“绝妙”的理论!

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密尔,虽然自称是边沁的衣钵传人,但他的功利主义与边沁的却有区别。他强调人的社会

^① 参见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372—37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感情,主张人们在追求幸福时要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彼此平等的成员组成的社会;认为基督教“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的原则,正是功利主义全部精神之所在和它的理想境界;他认识到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力之间、个人独立和社会控制之间存在矛盾,必须作出恰当的调整;他提出“任何个人的行为只要不危及他人的利益,就有完全的自由”的原则,极力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认为个人自由既是人的目的和幸福的根本,又是人类幸福和社会进步的首要因素之一,主张社会和政府对个人自由实行“放任主义”和“不干涉原则”,这样对社会更有利。^①

从孔斯坦到密尔,可以理出这样一条脉络:孔斯坦看到普通民众的自由平等的要求,有可能危及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试图把广大民众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边沁以功利原则来说明人的自私自利,把个人利益的总和视为社会利益,以如此笨拙的手法来抹煞普遍存在的社会对立,实在不算高明;相比之下密尔要客观一些,他认识到社会对立的存在,不过他开出的处方,却带有明显的主观性。总起来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实现,并没有如它们所标榜的那样达到社会公正,自由平等也只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冲突非但没有按社会契约来解决,而是更加暴烈和频繁。19 纪自由主义的思想,一方面是这一现实的返照,另一方面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所作的匡救时弊的努力。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看出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尴尬,他指出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不能给人们提供一个确定的原则,在知识领域和信念方面造成了混乱。他指责功利主义只看到人的利己主义本能,忽略了人性中的

① 参见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 384—388 页。

利他主义倾向和社会感情;在他看来,社会起源于人类的利己与利他的社会本能和社会冲动,社会愈向前发展,人的社会感情或者说控制自利的能力也就愈发展,社会的基本特性——和谐与团结——就愈益显著。他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家庭中相互协调和依从的关系,就是社会的基础,他以此来论证人们在社会中的合作关系和对政府的服从。但人毕竟还有利己的本能,如不加抑制,就可能导致社会的解体,因此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维持和巩固社会秩序。他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不干涉个人生活”的理论,认为个人权利在本质上只起破坏作用,在社会政体中,人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为了进一步说明人们在政治上的服从关系是必然的,他指出人在肉体上、智慧上和道德上都不相等,并因此而为等级制度和独裁统治张目。^①

用家庭关系来设定社会关系并非恰当,认为“社会愈发展,和谐与团结就愈显著”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等级制度和独裁统治则更是开历史的倒车,孔德的理论看来难行其道。

斯宾塞虽然也是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理论直截了当得多。他先把人类社会模拟为生物机体,接着把阶级和阶级差别看作社会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既然阶级是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那么各阶级便要各司其职以维持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所以,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是“社会协作”的关系。与孔德不同,他强调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个人的“自然权利”,主张国家或政府不得干预个人自由;但在说明如何实现个人自由时,他把达尔文主义引入政治学,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中也起支配作用,并把它

^① 参见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400—403页。

说成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因此,他反对政府制定“济贫法”及其他社会保障法律,认为这样不仅侵犯了个人自由,而且把“劣者”、“弱者”保留下来将会延缓社会进化的过程。^①

斯宾塞把阶级对立理解为“社会协作”,这倒是美妙得很,但又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社会进化的规律,却又太残忍了一些;更令人惊叹的是,斯宾塞居然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集合在一起,而能怡然自得。

无论是孔德还是斯宾塞,都没有脱却资本主义的窠臼,所不同的是孔德已经厌倦了自由主义的抽象,试图以实证哲学为资本主义指点迷津;斯宾塞虽然同为实证论者,却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而且在对待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时,比自由主义更为绝决。

时光辗转于20世纪,情况并未见好转,反之,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则更加激化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灾难;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粉碎了资本主义的神话;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一部分国家的政府急速右转,极右的德、意法西斯政权的出现,标志着这一过程的极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经受不住经济危机的考验而声名扫地,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面对动荡不定的政局更是无能为力,在这两者的夹击下,资本主义奉为至宝的自由主义已是气息奄奄。

以这样的情势,应该说政治学领域更有作为,但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御苑中,却寻觅不到不世出的奇葩;也许政治学家们面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还没有回过神来。

^① 参见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407—413页。

难怪罗伯特·达尔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政治学的衰落期。^①

如果在这一时期硬要找出政治学中的主流思潮的话,只有把“行为主义”拿来充数了。本世纪兴起的行为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实证主义的衣钵,它试图把自然科学中已经取得的某些成就借用到政治学中来。如果仅是如此,倒也未可厚非。然而糟糕的是,行为主义怵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多重危机,把这些危机的存在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斗争”,意欲建立一门所谓“精确的”政治科学来取代传统的政治学。在极端的情况下,行为主义否认传统政治学中任何关于价值标准的信念,把国家制度、政治权力以及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等等排除于政治学的研究之外,而把研究的重点局限于个人的行为方面。虽然行为主义也把个人行为放在所谓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来加以研究,并运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对之进行规范和定量,但是,政治学一旦脱离了它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基础,“那它就必然是一种徒劳的事业了。”^②

行为主义学派犹如自闭于象牙塔中的学者,于实际的资本主义政治并无多少补益;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成功事例的折冲,还是出于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迫压,三四十年来出现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计划干预和社会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自身的社会对抗,使资本主义度过了有史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反思这一历史事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个人对立是一切社会对立的根本,这些社会对立在资本主义时代达到了顶峰,

① 达尔还写到:“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政治哲学主要靠吃老本,即前几个世纪伟大政治哲学家所写的著作过日子。”见罗伯特·A. 达尔著:《现代政治分析》,第16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参见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第二章,“行为主义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参见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170—172页。

而不管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还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都在根本上加剧了个人之间的对立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

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近代的民主政体是统一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础上的,凭藉这一点,个人自由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放纵,必将在正反两方面产生互为矛盾的结果。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为前提,个性的解放、个人积极性的发挥,使社会生产力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政治上的个人自由,改变了社会权力的原有结构,使政治权力的蜕变得得到一定的有效的遏制。但在另一方面,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会导致宏观经济的无序失控,严重时就是毁灭性的经济危机;政治上的放任自适,人们将以个人的利益为标的,难以形成恒久的公正的社会规范,使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普遍对立更易于危及社会的安定。因此,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崇尚,一方面促成了社会的普遍进步,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个人对立和社会对立的尖锐化,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尤其突出。

从孔斯坦到行为主义,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之间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一直都是困扰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的主要问题;而现代民主政体所极力宣扬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在这些矛盾的挤压下,或者已经变形,或者开始走调,甚或走向专制独裁。可以这样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冲突,是现代民主政体必须面对和亟需解决的主要矛盾,这正如一部车上的两个轮子,只转动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这个轮子,而不启动社会利益和社会规范这个轮子,只能使车子原地打转,甚或会撕裂车身。应该指出的是,二战期间及其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启动社会利益和社会规范这个轮子的尝试,这也是现代民主政体至今还有一定吸引力的根本所在。但如根据这一点来预言现代民主政体从此便长风破

浪、直挂云帆,却又言之太早。

迄今为止,传统政治学中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民权利、社会公正等等价值标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还只是精神上的向往。熊彼特曾经断言,在现代的民主政体中不可能存在人们“共同的幸福”和“共同的意志”。^① 林德布洛姆认为,现代的民主政体从未是完全民主的,只能算作多头政治,在这种多头政治中,企业主集团享有特权,而劳工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别无选择。^② 罗尔斯试图以他的《正义论》来匡复社会正义(实际上这种社会正义在现代民主政体中从未实现过),在政治学久已沉寂的西方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在他热忱的“补天”方案背后,则是惨淡的社会现实。近代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在他的近作《极端的年代》中鸟瞰本世纪:“世界经济前途暗淡,世界政治动荡不安,但是更令人彷徨的现象却是弥漫各处的一片社会道德危机。”他只能“让我们一起盼望,但愿新来的年月将是一个较美好、较公正、也较有生机的新世界,因为旧的世纪逝去时,其临终景象并不美啊”。^③

① 参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二十一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 参见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第十二章,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第16页、第2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章 战争与阶级

战争竟是文明的产物,多么令人难于接受的现实啊!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战争不仅没有断绝,而是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人们总是在翘盼世界和平的早日实现,但战争的阴霾却不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面对难以驾驭的战争机器,人类是否应该更多一些清醒,更多一点理智。阶级与战争似乎是最好的兄弟,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战争,都是以阶级斗争为其内容的。现代的中国人,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可谓刻骨铭心,这得归功于(或归罪于)十年“文革”,当触及人们身心的阶级斗争弄得人人自危而谈虎色变时,我们不应简单地把它弃之不理,而应从血淋淋的现实中总结出垂范后人的教训。

一、战 争

文明与野蛮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集团之间以有组织的方式而进行的武装暴力行为,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了,《吕氏春秋·荡兵》上就说过:“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考之于近代所发现的一些原始人的共同体,在他们的各氏族各部落之间,争斗也时有发生。因此,说战争起源于人类的文明时代,似不准确,

而应把它追溯至原始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早已存在各民族或共同体之间的争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些争斗和文明时代以后发生的战争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原始部族的争斗主要是为自己的生存条件而进行的,不以掠夺他人的财产和奴役他人为目的。在原始时期,当自然条件恶化或由于其他因素威胁到人们的生存时,人们便会自然地迁徙到适合生存的地区;如在迁徙地遇到原有的居留者时,就可能发生争斗,其结果或是入侵者被阻拦,或是原居留者被驱逐。在这两种情况下,战胜的一方夺取或保留了居留地,战败的一方被消灭或被驱逐,争斗的目的主要是争夺合适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对对方实行人身奴役或财产掠夺。^① 所以我们在关于原始社会争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俘虏或是被杀掉,或是被接纳为本部族之人。其次,和以上一点有连带关系的是,由于人们只是在生存环境已经恶劣到不能再生存时才会迁徙,由于人们财产关系的淡化,同时也由于土地的广袤和人烟的稀少,原始人类的生存要求被限制在极低的水平上,原始氏族之间的争战杀伐也只是偶或为之,不具有经常性和普遍性。至于有些学者认为原始人类没有专用的兵器和没有常备军是原始争斗与文明时代的战争的一个重要区别,我倒认为未必。当农民起义的锄头镰刀或西方自治城市的市民武装在文明时代的战争中显示威力时,我们也许就不会固执只有兵器和常备军的运用才是战争的成见了。

我甚至倾向于认为,原始争斗多发生在以采集渔猎为生或以畜牧为业的氏族之间,因为这些氏族的生产条件是自然

^① 原始人类在财产关系和财产意识上都几近于无,自然难于产生财产掠夺的冲动。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生长的动植物,他们或逐水草而居,或四处游弋觅食,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流动中难免与其他氏族遭遇,因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从事原始农业的氏族则不同,他们划地定居,自有相对的固定性;他们播种收获,能有较为稳定的收入;除非天灾肆虐,收获大减,他们一般不会转涉他地;即使不得已而迁移,他们也较容易找到适于农耕的土地,再次定居下来,因此与其他氏族冲突的可能性要少得多。

如果以上这一点能够成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始争斗大都发生于游牧氏族和以采集渔猎为生的氏族,这种争斗从本质上看,应该说半是动物的本能,半是生产活动的自然延续。

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以及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私有财产关系和私有财产意识日渐膨胀起来,人们凭藉承留下来的原始人的粗犷狂野和没有任何伦理道德约束的生存本能,与现实物质利益的急欲追求结合在一起,肆无忌惮地对其他氏族发起经常的攻击,以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恩格斯对此有明白晓畅的阐述:“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部族的贪欲,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了。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他们进行战争,仅仅为的报复侵犯,或者为的扩大已不敷用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只是为的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所以,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都耸立有高峻的墙壁:它们的广阔的壕沟成为氏族制度的坟墓,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①

在财产掠夺成为战争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人们也许逐渐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发现,把战俘当作牲畜或劳动力,使之从事于生产性的活动,更能获取稳定和长期的收益。于是,从最初自然俘获的敌人到专以捕获异族人口为奴隶,便成了战争的新内容。我们或许不必弄清财产掠夺、奴隶掳获、领土占领等等在侵略战争中孰先孰后,也可以暂且不考虑兵器的自然演进和常备军的出现起于何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商品交换而起的人们的无尽贪欲和普遍对立,是文明时代战争的主要动因;或者换句话说,国家的、阶级的、集团的、个人的物质利益,从来都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方面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①

问题的困难在于,原始的争斗同样可以说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战,同样也是以集团的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人们之间的冲突。如果把战争的起源界定在商品交换出现以后,是否有违客观史实呢?我们可以从量的方面来说明文明时代战争与原始争斗之间的区别,^②但单纯量的差异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我们主要还是从质的方面来判定这一界限。前面已经说到,原始人的争斗主要是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在那种状态下,着力要解决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而因此发生的原始人群之间的冲突,只是解决人与自然界的矛盾的附带条件,所以争斗的结果是把战败者驱逐或消灭。文明时代的战争则不同,战争的目的和对象主要是人,即争夺他人的财产,奴役他人的身体,而占有他人的土地只是为了达到掠夺财产和奴役

① 《孙子·作战篇》明确写到:“取敌之利者货也。”意谓战争之目的在于夺取敌人的货财。

② 人们通常认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战争的频数有明显提高,但要找出确切的数据来说明原始状态下战争相对较少,却不可能,这皆因时代久远且无文字的记录。兵器和常备军的未曾出现似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原始争斗还没有专业化 and 经常化,但这充其量只是间接的证据。

他人的目的。因此,文明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当然同时也不排除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原始争斗与文明战争之容易混淆,也让孔老夫子陷于这一矛盾中,他有时认为,人类只是在进入文明时代(即小康)以后,战争才出现;^①有时又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战争就存在了。^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把战争的起源界定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后,自有其正确性;^③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纵览历史的前提下,也作如是观。^④

文明时代的战争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为基础,以对他人的财产的掠夺或强占为其主要内容,这是文明战争与原始争斗之间的本质区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克劳塞维茨的一句“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⑤让众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折服。但是,战争作为政治在某种意义上的延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对立时,是以对抗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以消灭对立的另一方为首要条件;而政治的目的则是把各种对立的力量统一在一个社会有机体中——就这一点而言,战争与政治是有根本区别的。

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语)。

① 孔子曰:“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② 《大戴礼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孔子回答:“与民皆生。”

③ “在有阶级以前的原始公社制度下没有战争这一社会现象,……公社之间和部落之间的武装冲突就其实质来说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战争。”见塔布诺夫、鲍卡列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第25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④ “自大约五六千年以前,第一个文明进入原始人类生活时起,战争和阶级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见汤因比:《文明经受了考验》,第2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 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第4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两军对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这种极端的对抗关系中,正常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或者失去了约束功能,或者适成为有害的束缚。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用高度凝练的五个字“兵者诡道也”^①概括了战争的诡异多变和诈谋权欺;毛泽东把宋襄公在战争中的不乘人之危斥之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②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争中讲仁慈是最为有害的错误思想,因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手段”;^③黑格尔则以哲学家的深邃指出,战争的双方彼此处于自然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法的关系,也不是道德关系,而是以自身的利益为最高法律。^④

由于战争的激烈对抗性质,战争的残忍与暴烈便成了最令人发指的社会现象,而且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人们通常也把原始社会称为野蛮时代,把阶级社会称为文明时代,当我们把战争定格为文明时代的产物时,历史老人一定会用满含讥讽的眼光凝视着人类,不无辛酸地说道:自诩为文明的人们,为什么要用野蛮的战争机器对准自己的同类?

箭在弦上

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尤其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战争就是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白骨藉藉的同义语。但是,战争必能使另一部分人受益,否则战争便不可理喻。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战争是由统治阶级发动,并为统治阶级的

① 见《孙子·计篇》。

②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60页,1967年横排袖珍本。

③ 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第23—24页。

④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30节—337节,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黑格尔在这里谈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也适用于一般的战争。

利益而进行的。^①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正确性,因为统治阶级最有攫取他人财富的冲动,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最有能力通过战争去实现这一点。但如把它绝对化,却有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毛泽东在他的经典之作《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分析了过去忽视武装斗争的危害性,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②并且一针见血地宣称:“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③因此他反复告诫全党同志:“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④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革命战争,对于争取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和解放,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人类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以及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战争,同样也不能用“战争由统治阶级发动”来概括。

历史上的战争形形色色,或是兵起萧墙,或是铁骑欧亚,或是蛮夷入侵,或是文明征伐,或是揭竿而起,或是教众圣战,……如此缤纷繁复的战争景观,实难一言以蔽之。不过,当我们将对战争现象作高度抽象时,还是能发现,无论任何战争,战争的双方都是为利益而战;而在这些利益之中,物质利益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首要的。另一方面,从战争的激烈冲突中所表现的人际关系来看,既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也有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战争,还有被统治阶级内部之间

① “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引自《列宁全集》,第八卷,第531页。

② 引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09页。

③ 同上,第506页。

④ 同上,第510页。

的战争;既有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分阶级的战争,也有国家内部、民族内部主要以阶级划界的战争。人们常说,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但通而观之,说战争是人们作为私有者而互相对立的极端形式,也许具有更高的抽象。

我们以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来说明战争的必然性,似乎还欠缺一点说服力,因为对财富的追逐和人们之间的对立,在文明时代一直存在着,并非一定要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战争总是伴随着人类,但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相比,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据的份额,毕竟要少得多。因此,说明战争的必然性,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只是其内在动因,还须辅以其他因素,才能把战争状态与其他对立状态(如文明形态所有制、阶级斗争、法律制度等)区别开来,才能在总体上把握战争的必然性。

以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和人们之间的对立为前提,战争一般在两种状态下产生,一是自然状态,另一是失衡状态。所谓自然状态,系指对立的双方没有共同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只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实现我方利益而不顾及他方利益的暴力冲动。^①例如野蛮民族的人侵,例如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没有国际法约束的战争,均属此类。自然状态下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古代,尤其突出表现在原始部族向文明社会转换的过程中,如哥特人在欧洲的横冲直撞,又如成吉思汗的骑兵席卷欧亚。

① 许多思想家都提到过“自然状态”,大多数人把它视为人类在文明社会以前所处的状态。霍布斯以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自私自利,“人对人如狼一般”;洛克认为那时人是自由平等的,但个人财产尚无保障;卢梭则把自然状态称为人类的“黄金时代”,没有贫富悬殊和等级差别。这里关于自然状态的定义主要来自黑格尔。

失衡状态意指原有的社会秩序或力量平衡被破坏,新的秩序或平衡尚未建立,人们或者不能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生活,或者因自身之虚弱而貽敌人以可乘之机。失衡状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个国家法制的崩坏,可成为内部动乱或招致外敌的诱因;贫富两极的极度分化,以致民不聊生,穷人的起义和革命将不可避免;政治腐败,官吏贪暴,往往是民变或入侵者的良机;阶级对峙中力量的天平发生了于被统治阶级有利的倾斜,社会革命的时机就将到来;国势衰微,敌国坐大,是被动挨打的先兆;……以上是从被动的方面看待战争。从主动的方面看,国运鼎盛,敌国弱小,便是穷兵黩武的温床;经济危机,内政动荡,对外战争成为宣泄的闸口;谋求霸权,重组势力构架,战争就一触即发;力量对比逆转,宗教信仰不能调和,也都可能点燃战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自然状态和失衡状态往往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自然状态就其没有法律道德制约和没有平衡机制而言,即是一种失衡状态;失衡状态从原有法律道德体系的毁坏和社会平衡关系的丧失来看,也可视作自然状态的回复。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然状态表示事物的原发性,而失衡状态则表示事物的后续性,换句话说,自然状态是原生的,失衡状态是后发的。

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别开生面地预言,冷战结束后,各种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认为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是流血冲突经常发生的地带,并以前南斯拉夫的内战为例。对于亨廷顿的高论,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与事实相违。诚然,冷战结束后地区性冲突骤增,但这与其说是文明冲突的实证,不如说是苏联—美国两极世界平衡消解后的反弹,还更接近正确。

如果说人类对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和财富追逐这一历史趋势无能为力的话,那么,建立有效的法律体系和行为规范,实现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就成了防止战争、减少冲突的主要途径。这一点不啻于一国之内适用,在国际之间尤然。不论是二战以后联合国的建立还是各国间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不论是大国间的军备竞赛还是裁军妥协,其目的都是旨在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和达成某种力量均衡。战后在世界大范围内较长时期的和平(局部战争固然有),不能说不是得益于这种秩序和均势。

战争以它自己的轨迹运行着,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在激烈对抗的敌成双方,只能以暴力扼制暴力,用战争消灭战争。善良的人们祈祷和平,厌恶战争,也许对这种以暴制暴的作为不以为然;毛泽东则深谙战争的辩证法,他生动形象地说:敌人“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①在另一个地方他使用了更明确的语言:“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②孙臆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战争的必然性,指出敌人张牙舞爪,蓄势待发,应该怎么办?具有极高智慧和德行的领导者,就把自己的国家武装起来,用于防止战争。^③《吕氏春秋·荡兵》也谈到,战争由来已久,难以禁止,国家只能建立正义之师,以制止战争;

①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24页。

②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12页。

③ 《孙臆·势备》中的原话是:“夫陷齿戴角,前蚤后锯,喜而合,怒而斗,古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为备,圣人之事也。”对此我作了一些引申,但无太过。

不能放弃武装；否则天下大乱。^①我们现在常说的忘战必危，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以上所说的以武力对抗武力，以力量制衡力量，仅是在实现力量之均衡，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建立健全的社会法律体系和行为规范。诚然，力量之均衡对于和平的赢得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一个人们乐于接受的良好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则更为根本，即使后者的和谐统一需要前者的强力维护，也是如此。换一种表达方式：国防的强盛和军事的运用，只是局限在保境安民、维护正常的国际和国内秩序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如果以为国盛力强，便欲横行天下、称霸世界，殊不知适为取败之道。中国古代先贤对此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其他学派的思想我们就不细数了，仅以对军事最为熟稔的思想家来说，便可见其一斑。孙武写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② 孙臆的认识更透彻，他指出，知兵善战，并没有弄清战争的真义，要明白讲信修睦、素行仁义，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既要用武力保护自己，又不要好战逞强，这才是合乎战争之道的。^③这样高的境界，西方人达到过吗？

古代西方根本就没有能与孙武孙臆相媲美的军事思想家，单是军事谋略的千变万化，奇正诡异，那倒也罢了；更大的差距在于，西方人只知穷兵黩武，耀武扬威，鲜能认知“兵者不

① “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诛伐不可以偃于天下。”见《吕氏春秋·荡兵》

② 见《孙子·形篇》。

③ “……凡知兵矣，而未近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孙臆·威王问》

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①的道理,一味地征战杀伐,攻城掠地,逞悍猛之勇,图掳掠之快。殊不知,在他们迅速崛起的同时,已经开始步入败亡之道,远者如亚历山大和凯撒之征服,近者如拿破伦和希特勒之称霸,莫不如此。至于着重于精神之感召,施仁政于国于民,让敌国畏威怀德,使四夷仰化风从,更是西方人闻所未闻的。

“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②这样的金玉良言,实在应该让好战者们多聆听一些。但是,战争贩子们或者利令智昏,或者逞强霸道,对于这样的话多半是听不进的。退而次之,如果我们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③来进言,西方军事家也会懵然不觉。^④再等而次之,我们若以“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⑤飧西方人,他们也许才会欣然受之,但是,如果结合上下文来看,这里的“战胜而强立”只是作为道义之行的辅助手段,^⑥对此西方人怕又会兴味索然了。

固然,西方人不是鲁夫,更不是笨伯,东西方人在战争观上的这种差距,乃是因为西方人在战争问题上更偏重于进攻性、侵略性,他们以战争为勇武之表现,以战争为谋利之捷径,崇尚武力,弱肉强食;而中国人则强调立义用兵,认为战争是为了禁暴除害,是为了保境安民,战争只是行仁义之道的必要

① 见《老子·三十三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② 引自《孙臧·见威王》。

③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

④ 克劳塞维茨理解不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他以轻蔑的笔触写道：“让我们不要听说不经流血而克敌致胜的将军。”参见佐克、海厄姆合著：《简明战争史》，第14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⑤ 见《孙臧·见威王》，篇首孙臧就指明：“克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

⑥ 同上。

的辅助手段。如此一来,我们就回到一个老话题: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①

战地黄花

马克思主义一般以战争是侵略还是反侵略,以战争是统治阶级发动还是被统治阶级发动、是压迫民族发动还是被压迫民族发动,来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前者是非正义战争,后者是正义战争。其实,对于战争之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分,历来都有,而于中国尤著。在先秦诸子中,已经有了行仁义之政、兴王者之师、诛无道、救民倒悬的义兵之论;也有把“攻人之国,夺人之用,废民之利”斥之为不义的非攻之说。到了汉初,对战争之正义与否更有了系统的论述。《淮南子·兵略训》首先把那种霸占别人土地、抢夺别人财物的战争称之为不义之战;把那种平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的战争称之为有义之师。接着作者从正面论证了进行正义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无义之君,纵欲贼民,是国家最大的祸害,应尽早诛伐之,否则为害更烈。在对这样的暴君发起正义战争的时候,先要把他的暴行布告天下,然后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不要侵民

① 荀子对战争有非常精彩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兼并他人国家的一段话,即使对于今日之世界仍有指导意义,故此不嫌累赘地录之于后:“凡兼人者有三,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德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愈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乎掌筭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之年,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愈贫,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引自《荀子·议兵》

扰民,而要恤其贫穷,脱其囹圄,赏其有功,这样,老百姓必然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甚至能兵不血刃,而成王霸之业。至于以侵地广壤、掠人财物为目的的非正义战争,必然遭到顽强的抵抗,战争发动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便广开杀戒,以致尸骨遍野,血流成河。这样的战争不仅不能成就王霸之业,反因其失道寡助,必将败亡。

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说到底,就是人心的向背问题,古语所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已经从终极上指出了战争的结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作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的卓越论断,并依此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视为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有人也许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凭空虚划,自壮声威。其实不然,这是被古今中外无数的例子证明了的,乃千古名言。

然而,战争的正义与否,在民族国家已经形成、国际体系日趋稳定的当今世界,往往是以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和现实格局来判断的,因此,对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不免会各执一端,真伪难辨。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海湾战争,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对内实行独裁,扩军备战,对外则肆意挑起战争,意欲称霸中东。就算两伊战争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悍然入侵,其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则是世界昭然。这不仅破坏了地区性的和平,对世界和平也是一个威胁。对这样一个政权,是应该允许它继续存在,还是应该限止它摧毁它呢?美英国家自然认为,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迫使萨达姆政权解体,是正义的战争;其他一些国家则肯定,侵害一个主权国家,干涉一国内政,其非正义性尽在不言之中。

即使我们基于这样的认同,不管一国之政权如何腐败,一国之人民如何遭殃,但凡入侵一个主权国家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还是会在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上面对另一个难题。

当我们把非正义战争界定为入侵者发动的战争时,总不难发现,入侵者一般都蓄谋已久,有备而来,对敌我两方的优劣强弱成竹在胸;而被入侵的国家或弱小不堪,或内政败乱,或防备松懈,因此,猝然临之于战争,必败无疑。值此,被侵略的国家会惊呼:正义何在?!得道多助何在?!

诚然,侵略战争在开始时往往都能取得局部胜利,有些甚至能毁人家园,灭人社稷,实现全盘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或者只是暂时的,不久将转化为败绩;或者胜利者实行更为人道更为有效的统治,使被占领国欣然向化。在这两种意义上,同样是得道多助,正义必胜。

正如前面所说,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正义与非正义模糊混沌的前提下,要在敌我双方就战争之正义与否达致趋同,几乎是不可能的,交战国双方必将以其自身的利益各自敷衍出正义的理由。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可以看到,正义之旗帜在两军对垒的上空高高飘扬,藉此以凝聚军心,鼓励士气。《孙子兵法》上早就说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①这里所谓的“道”,可以理解为正义的旗帜,用这面旗帜把全国上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即使是法西斯发动的惨无人性的侵略战争,也在利用这一原理,希特勒以优秀的日耳曼民族拯救世界为由,激发了数千万德国人的狂热;日本法西斯用“大东亚共荣圈”作幌子,把“武士道精神”装扮得更为招摇。因此,就是从极端的形式上看,人的因素在战争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各个国家会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来判定战争的正义与否,竟管交战国双方不可能在战争的正义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还是得承认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有它的客观性,国与国

^① 见《孙子·计篇》,《孙子·谋攻篇》中有一句更直露:“上下同欲者胜。”

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国际行为准则予以规约,而且人类正在朝着这个方面继续努力,使世界更趋于合理。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扩大的翻版表现出来,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同样,为了使这一对立不致危及人类的生存,为了避免在这种对立中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人类必将会发明合适的制度,制定相应的国际行为规范,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对立统一。

人类向往世界和平,谋求脱厄于战争,这不仅是美好的愿望,也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在前面谈到人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非要否定其他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兵书中,除了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取胜的必要条件之外,选将练兵、法纪严明、装备精良、粮草充足、运输便捷等也是利战的重要因素。在当今的战争中,这些因素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在古今战争中却出现了一个重大区别,即物化的力量在战争中起着愈益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物化力量既非简单的人力堆砌亦非在短时期内所能营造。举例而言,在古代战争中,将军的指挥策划、谋士的智慧谋略、兵士的骁勇善战,在短兵相接之际人的因素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即使出现了新的更有杀伤力的兵器,人们也较易获得并较快地仿制出来。在现代战争中却不同,人多势众并非是一种优势,兵练将良往往也乏用武之地,坐在荧光屏前轻按电钮就能实施致命的战略打击,手无缚鸡之力的科技专家比之气饱力足的纠纠武夫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诚然,高科技武器也只能由人来发明制造和使用,但是,现代高科技武器的研制必须凝其全力(人力、物力、财力),假以时日(既非一日一时,亦非一年半载),才能成功。

现代战争是军事力、经济力、科技力全方位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往往使竞争的参与者精疲力尽,欲罢不能。二战以

后美苏的军备竞赛,为苏联经济装上了沉重的翅膀,^①在整个70年代,苏联的军费开支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而在国家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重,更高得惊人,占40%以上。^②因此,80年代下半期戈尔巴乔夫掌权以后,鉴于在美苏对峙中苏联经济的沉重负荷(虽然这并非唯一原因),急欲与美国结束冷战局面。^③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类最初披坚执锐,发动战争,主要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巨大利益;而今人们扩军备战,引弓控弦,却弄得财政吃紧,经济难堪。战争对人类还有什么吸引力呢?

现代战争除了使经济不堪重负之外,也越来越成为无利可图之营生,战争的激烈对抗形式不仅使战争的挑起者难以达到其预定的目标,即使入侵者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也会因为被占领国人民的反抗、不合作和高昂的统治代价,使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化为乌有。反之,在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下,在绝不屈服的民族意志的抗争中,战争总是成为侵略者的泥淖,越南战争中美国的泥足深陷、阿富汗内战中苏联的难以自拔,即是最好的说明。战争的高成本和低效益,甚至是负效益,难道还不足以使嗜利如命且又冰冷理智的当代人,望而却步?

更不要说,核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人类,战争已经不复再有那种实现国家利益、纵驰民族意志的往日旧观了,正如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战争已成了没有任何赢家的死亡。对

① 论及苏联经济的停滞,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比起经济体制的僵化死板来,只能算作次要的原因,但绝非可以忽略不计。

② 参见《世界经济统计年鉴》(1982),第227—228页。

③ “可是,除了立即跟美国方结束二度冷战——而且越快越好——中止这个令苏联经济大出血的对峙局面之外,苏联这位新领袖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引自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第711页。

人类整体而言,核战争就像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①所不同的,它不只是对准一个人,也不是对准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对准全人类。人类面对自己呼唤并制造出来的战争这一魔怪,想必是百感交集,苦果难咽。

当我们回顾人类的战争旅程,也许能略感欣慰的是,随着国际秩序的营建和完善,随着力量均衡朝着有利于人类大家庭的发展,随着战争的所费不貲和所获菲薄,随着民众意识的日愈觉醒和更富于理智,人类将逐步从对抗转向对话,从战场走向谈判台。这看来是一个大趋势。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词中有一句“战地黄花分外香”,历来被人们誉为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黄花又被喻作即将逝去之物。

战地黄花是否就是明日之黄花?

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拂去历史的尘埃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现代中国人听得烂熟而生厌的字句。当我们刚刚告别“文化大革命”那梦魇般的阶级斗争年代,重提阶级斗争,尽管只是纸面上的,也可以想见人们在感情上深深的抗拒,顿觉重理这一话题是多么地不合时宜,甚至有干犯众怒之危险。然而,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阶级斗争绝不会因为我们的重提而转剧,何况我们的任务不过是清除阶级和阶级

① 达摩克利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信,他总爱吹捧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用一根马鬃把一柄利剑系在座位的上方,以示帝王之危殆。

斗争问题上的历史积垢,试图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文明社会重大景观的本来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异议。马克思主义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划定人们所从属的阶级,^①也获得普遍的认同。本书中我们一直以商品交换引致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为主线索,在第二章中就说明了这两个矛盾的发展导致了文明形态所有制——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基础并剥削他人劳动的所有制——的产生。但是,正是在这种私有制中,我们所看到的仍然只是个人与个人的对立,或私有者与私有者之间的对立,何来阶级与阶级的对抗?譬如说张三是地主,李四是他的佃户,他们之间的利益对立只局限在李四与张三之间,在一般情况下,李四不会把对张三的不满或仇恨发泄在其他地主身上。

如此来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人们会认为连政治常识的ABC都达不到。于是,人们谆谆教导:阶级是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来划分的,李四虽然只是张三之佃户,但有千千万万个李四,他们以租佃地主的土地为生,遭受地主的剥削,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同类,他们的集合便是佃农阶级;张三可能只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地主,他出租土地,收取地租,靠剥削满足个人及其家庭的私欲,他的行为纯粹是个人的、私利的,但有成千上万个像张三这样的地主,因此可以把他们归之为地主阶级。

^① “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259页。

单纯以某一些共同点对人们进行分类并不难,把人们在社会中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同作为阶级区分的标准,也难以激发人们阶级感情的认同和调动人们在阶级斗争中的积极性。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够把人们的阶级感情发挥到极致,能够把人们作为阶级一员的那种勇猛气概充分地展现,这种情况就是同一阶级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利益追求,并与其对立阶级正处于激烈的对抗中。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只有当农民的生存条件普遍被破坏,没有其他生路之时才会酿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有当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使无产者生不如死之际,才会势成燎原。当然,这些是极端的例证,不过,通过这种极端的例证,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关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两个基本方面:(1)无论是阶级还是阶级斗争,其根本的立足点是个人利益及其实现,在这种个人利益中,经济利益是首要的,没有这种个人利益,阶级和阶级斗争将无所附丽。(2)阶级利益虽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基于某一普遍共性的抽象,但是,抽象的阶级利益很难使活生生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个人感兴趣,只有当阶级利益直接表现为个人利益时,才能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这种直接的共同利益,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只有在人们同时并较普遍地感受到个人利益受到威胁,并有可能和必要群起抗争时,才能形成共同的直接的阶级利益,才能凝聚成巨大的阶级力量。

以上的两个方面,肯定会遭到正统观念在理论上的尖锐驳斥。对第一个方面,人们还会以人类历史上众多的例子来证明,不少的仁人志士在各种社会对立中,所表现出来的为民请命、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披肝沥胆等义举,绝不是一个可鄙的“个人利益”能容纳的;至于现代中国革命中无数的共产党人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英雄行为,如以“个人利益”来解释,那简直就是一种亵渎。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不论这些人是

为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战,还是为民族或国家的利益献身,他们实际上已经超脱于自己本阶级的限制,而在追求一个崇高和远大的社会目标。^①这些人只是社会生活中的极少数。而芸芸众生则往往是以自己的个人利益来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他们绝少理会宏大的社会理想,更不会对艰深的政治理论孜孜以求,他们只在意自己的切身感受,只有自己的实际利益才会把他们卷入阶级斗争的狂潮中。请看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无一不具有杀富济贫、开仓分粮、均平财富、甚至任意掳掠的自我财产意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如果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实惠政策,恐怕不会出现母亲送儿、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热烈景象,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自己的土地那种翻身的喜悦,也难出现千万民众踊跃支前的宏伟场面。我们再翻一下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也将不难发现,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热衷的是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革工作条件等直接关及个人利益的经济斗争,对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样精深的见解,大多数工人或是盲然不解,或是浑然不顾。在历史巨人马克思的深邃目光与广大工人只关注眼前利益的现实目光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于用思想或理念填平的鸿沟。

以上的第二个方面,可能会招致更多的责难,在此我不作过多的辩解,暂以几个普遍认可的事实以作支撑。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小偷扒窃或歹徒行凶,旁观

^① 如果有人愿意作这样的统计,看看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中究竟有几人真正出身于无产阶级?究竟有多少是贫苦农民的后代?我想统计者一定会失望,他可能难于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与他们的阶级出身之间找到必然的联系,甚至会得出适得其反的结论。

者往往袖手不管,甚至唯恐避之不及,鲜有挺身而出、伸张正义者。这里的旁观者并非都没有正义感,而是各自有自身的利益,一时之间又不能集成共同的力量,否则以众人之力,制服几个小偷或歹徒,是绰有余力的。^①毛泽东有时把人民大众比喻为一盘散沙,意思是指他们各自营生,自顾不暇,难以聚集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还有一个重要的反证,如果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总能自动地形成共同的利益,总是凝结成巨大的阶级力量(假设每个人不是有自己的个人利益的话,这种可能是存在的),那么,任何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要想维持他们的剥削和统治,都是不可能的,即使维持很短的时间。因为相对于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而言,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人数和力量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事实上,自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一直维持着他们的统治和剥削。

个人利益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是所有社会对立的基本元素。可以这样形象地看,个人对立犹如几何学上的点,把这些点联缀起来,就可以形成一条线,这条线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再将阶级之线织成一片,就形成了民族或国家这个面。把个人利益及其对立、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或对立,相应比作几何学中的点、线、面,由此便构成了复杂多样的有形的政治世界。在这个有形世界里,没有点就没有线,没有线就没有面,因此,个人利益及其个人之间的对立,是社会对立的基本。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个人之间的对立触目皆是,升工资、分房子、争名誉、要地位所激发出来的争斗,是不能用阶级这一概念加以分析的;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

^① 千岛湖的游船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歹徒抢劫了几十个台湾游客的财物,并将他们尽数杀害(包括船员),弄沉游船,然后几个歹徒从容遁逃。

宫廷政变,兄弟阋墙,也无法用阶级斗争相涵盖;现代经济生活中市场竞争,兼并分化,杀价倾销,大多是企业主之间的行为,难以戴上阶级斗争的桂冠。当然,阶级斗争也普遍存在,大到奴隶的暴动、农民的起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小到消极怠工、破坏工具、逃亡等,都可以视作在大小范围内以阶级利益为标识的统一行动。当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和侵害时,例如异族的人侵、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无论是个人的对立,还是阶级的对抗,此刻都可能暂时搁置一旁,而结成不分个人和阶级的统一战线,同仇敌忾,以保卫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当我们分析各种社会对立时,既要看到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更要理解个人对立的普泛性,既不能忽略国家之间的对立,也要看到个人对立是所有社会对立的基础。另外,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阶级对立并非只是阶级斗争一种形式,而阶级斗争更不是必欲置对立阶级于死地而后生。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加论述。

宜将剩勇追穷寇

谁都知道,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说得极端一点,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非布朗基主义的少数英雄的革命冲动,而是根植于历史与社会的沃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

① 这一思想被列宁和毛泽东全盘接受,列宁说:“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某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引自《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页。毛泽东也作过同样的论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

这是从深刻的历史反思中得出的结论。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沉思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的系统分析,从而把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奠立在坚实的基础上。^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归纳为三种形式,即经济方面的斗争、理论方面的斗争、政治方面的斗争。^②

同任何理论一样,马恩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处于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虽然已经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并且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但是,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的前提下,这里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提法还是一般化的。还须提及的重要一点是,马恩根据欧洲当时的具体情况,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③接着马恩谈到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将和各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现政权。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可见,马恩把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近期目

① 可以用几句话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简要地概述如下:“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31—832页。“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261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628页。

③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4页。

标和最终目的有机地统一在共产党人的策略中。不过,在这里马恩尚未标明无产阶级在这些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共产党宣言》刚一出版,欧洲大地上的革命运动已是风起云涌,1848年2月,首先由巴黎的工人阶级发起革命,废除了君主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这一革命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响,在德意志、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都发生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革命或起义。但是,法国二月革命的成果却被法国的资产阶级所攫取,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并没有根本改变,当巴黎的无产阶级在1848年6月再次拿起武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时,资产阶级就用残暴的手段把六月革命淹没在无产阶级自己的血泊中。

马克思、恩格斯热切地关注着1848年的革命,并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其中,在革命失败以后,马恩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尖锐地指出,在即将到来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并且得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结论:“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因此,“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①与此同时,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认为“六月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82、385页。

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施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①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经典术语。

无产阶级在革命的斗争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思想，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中得到了部分的实施，诞生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② 巴黎公社虽然仅维持了短短的两个多月，却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 这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为无产阶级作出的又一新贡献。

于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谈到：“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二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指《共产党宣言》，作者注）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④ 马恩的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在有了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以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有了新的发展，无产阶级不是一般地谈论和进行阶级斗争，而是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7页。

② 恩格斯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权威在巴黎公社中的作用：“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54页。

③ 引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④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9页。

要在阶级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砸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

列宁全面继承了马恩的阶级斗争学说,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就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必要的政治条件”,^①并且坚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②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1917年8、9两个月),列宁更是系统地阐明了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清理并批判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一再重申必须打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③这些思想,集中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这本书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上的保证。

当我们简略地不无遗漏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描述一番,再回眸于中国革命的滚滚烟尘,毛泽东的伟岸身影便立即浮现出来。如果说十月革命是即时的成功的伟大尝试,那么中国革命则是漫长的历尽艰辛的长征。在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追杀,在外有帝国主义的强敌环伺,造就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在国际共运史中都是屈指可数的。正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不仅深刻领略了马

① 见《列宁全集》,第六卷,第11页。

② 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52页。

③ 引自《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88页。在稍后几天,列宁还谈到马克思曾经认为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限于欧洲大陆的国家,对于像英国、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有可能不破坏现存的国家机器而实现人民革命。列宁指出这一说法已不适用了,必须无一例外地打碎国家机器。参见同上,第202—203页。

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在实践中更是将这一学说运用到空前的高度。

中国革命是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走过来的,阶级斗争的存在自然不用说了,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首肯的。但是,在阶级斗争的方式上,党内却存在严重的分歧。1927年3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党外一些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便投身于武装斗争,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当党内其他同志热衷于城市暴动,急于攻占大城市的时候,他却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②并且他强调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18年来用血换来的经验。

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历来为毛泽东所倚重,这自不待言;在其他许多方面,或者是围绕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或者直接就是阶级斗争别的形式表现,毛泽东都使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臻于化境。譬如在统一战线中对不同阶级既联合又斗争;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中以广大农民为同盟军;在各阶段的革命斗争中坚持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以组成强大的阶级力量的群众路线;以阶级斗争辅之以经济斗争的土地革命;把党建设成一个永远站在阶级斗争前列,在思想上、组

① 引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7页。

② 引自同上,第573页。

织上、政治上无比坚强的领导核心；……如此等等。

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节节胜利，值此，国内外一些友人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建议。此时毛泽东已是成竹在胸，胜券在握，及时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指令。“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追”的禁忌已被反其意而用之，在此我们不仅领略到他那驰骋古今、睥睨中外的诗人气质，更让人感慨的是他将阶级斗争学说提炼到炉火纯青、青胜于蓝的境界。

横刀立马难了情

关于阶级斗争，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高度浓缩。在上一小节中我们引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时，之所以有意作了一个重要的疏漏，没有把马克思的阶级消灭的观点包含进去，主要是为了叙述上的便利。

从一开始，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时，总是和阶级的消灭直接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这么说，消灭阶级就是阶级斗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当无产阶

^①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333页。

级消灭资产阶级以后,“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①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费解,令人不得要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消灭阶级的预见,既不是主观的臆想,也不是美好的愿望,而是有其深厚的理论根基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其总的历史背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发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使社会的共同的使用生产力成为可能,同时也造就了庞大的产业大军以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因此,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而私有制正是一切阶级对立的根源,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到:“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②

按照马恩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一旦成功,社会主义公有制甫经建立,阶级就开始消亡。^③ 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却向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38页。

②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③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此马克思既没有讲这个时期是长还是短,也没有讲这个时期的具体特征。后来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或需要任意解释“过渡时期”,致使心怀叵测者也振振有词。

世人昭示了另一种前景：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已普遍建立，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因此而消灭，在某些时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究竟是什么呢？

事态的发展提供了两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像马恩曾经预见的那样，在数个国家同时发生，而是在俄国单独出现并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必然遭到国际资本主义群起而攻之，从漫骂诅咒到经济封锁，从阴谋颠覆到公然入侵，这是被历史证明了。^①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非但不能取消，而是必须强化，用之唯恐不及。另一种解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不像马恩预见的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出现，而是无一例外的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甚至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度涌现。^② 在这些国家既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化大生产，也没有势力强大的无产阶级产业大军，有的却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因此，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中，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并不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如何战胜资产阶级姑且不说，要把小私有制和封建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得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或许是时势使然，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重大的突破，他们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列宁有一段话经常被引用来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① 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作一旁证。大陆解放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便无时或休，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的登陆，只不过是同一行径在军事上的反映。

② 从二战前的苏联到二战后的东欧和东亚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只有东德例外，但这个特例主要是外力的作用，这是世人皆知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①与此相对照,毛泽东也有一段异曲同工的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②不过,毛泽东在写这段话的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当前的主要矛盾,但过了几个月,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公开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还认为,“‘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

① 引自《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1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

提法是不对的。”^①

自此以后,在认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陆续发出了一些精练的极具鼓动性的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并认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的这些思想,被衍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

还须特别指出一点,列宁和毛泽东都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列宁说:“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②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说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③ 在上引那段列宁的话中,列宁虽然说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但据我所知,马克思在谈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时,是有保留的,只有当被压迫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而进行阶级斗争时,才可能成为历史的动力。^④当然,也许列宁和毛泽东在谈到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时,是指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斗争,但如此笼统地强调

①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

② 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57页。

③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9页。

④ 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一贯都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强调生产力的革命性力量,并不认为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都对历史有推动作用。试举一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明:“中等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留下深深的隐患,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当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当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二者合在一起,将会对社会主义的实践产生何种的震荡,就可想而知了。苏联的情况我们这里不谈,在中国,1957年的“反右”斗争,最初只是让广大群众提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最终却发展为波及全国、涉及党内外人士的阶级斗争。“反右”以后,阶级斗争的弦便越绷越紧,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一封“万言书”,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毛泽东定性为“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①“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此时则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毛泽东这样做时,心中可能只有一个信念,自己是在捍卫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然而,“斗争正未有穷期”,庐山会议的斗争,仅仅是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斗争的无限扩大拉开了序幕,接踵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一大批曾经与他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相濡以沫的战友贬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与他们之间在政见上的分歧称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并且认为这种阶级斗争要长期进行下去,每隔几年再来一次。阶级斗争的这种提法,绝对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永远是后无来者的。

临到生命的终了,毛泽东认为他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① 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转引自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见《解放文选》(下册)第72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命”。^①可见他自己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如何之重,但是,正是“文化大革命”耗尽了他老人家最后的精力;当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功过要由后人来评判时,其“悲观情绪已溢于言表”,^②值此之际,他是否也对那些与之同甘共苦、浴血奋战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同志怀抱几分难了之情呢?

三、难听的阶级斗争

惊弓之鸟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毛泽东以他那纵横捭阖的恢宏气度和游刃有余的斗争韬略相结合,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把亿万民众的政治狂热充分地激发出来,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能也是举世无俦的了。个人的权威和意志力能在历史上划下痕迹的,除毛泽东之外恐怕再无人能出其右。

然而遗憾的是,一场政治运动的领导人愈是强有力,他的思想和行动愈是不能顺应历史、合乎民心,他所带来的灾难就愈大。同理,他如果能代表历史的潮流,满足人民的愿望,他就能无往而不胜。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这是正的方面的例子。相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正是毛泽东的领导,则弄得天怒人怨,人人自危,这个道理也就不言自明

① 参见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见《解放文选》(下册,)第745页。

② 同上。

了。毛泽东一生都在讲辩证法,他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①这两件事却一正一反,一福一祸,福兮祸兮,孰能料之?

最让人警醒的是,阶级斗争这个武器,曾被毛泽东精熟地运用,推翻了三座大山;同样是这个武器,加之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和更为精当的运用技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屡屡受阻,难成正果。于此观之,阶级斗争只是一种手段,在阶级斗争的背后还潜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动机,如果不能认识和把握这一社会动机,阶级斗争的运用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还会断伤自己。

当我们翻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忍卒读的社会长卷又将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到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划到了敌人一边;从反动的“血统论”到貌似公允的“不唯成份论”,将非无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变成灰溜溜的一片;从“砍资本主义尾巴”到批“资产阶级法权”,使农民兄弟和工人老大哥的生产积极性丧失殆尽;从大讲“儒法斗争”、“批周公”到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又搞得一大批实实在在工作的同志抬不起头来。加之“从触及灵魂到触及肉体”、“文攻武卫”派性斗争、“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疏散下放”……更是弄得父子反目,夫妻离异,家庭星散,朋友成仇。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手段,如抄家游街、围攻殴打、造谣诬陷、诽谤中伤、告密反戈、明枪暗箭……真可谓集人类丑陋之大全。

人们除了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磨难之外,物质匮乏也日甚一日。食品的短缺让绝大部分营养不良的中国人感到

^① 参见上文,见第178页。

“运动”没有必要；^①年年都在宣扬粮食大丰收，然而粮食、肉类、副食品凭票供应的范围却越来越宽，人们要能大块朵颐、畅怀痛饮简直就是罕见的事；岁岁都在讲工业增长，然而人们的工资则长年不变，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排队购物越来越普遍；物价固然稳定，可是人们手中既无余钱，货架上也空空如也；市场也算繁荣，但只是表现在熙往攘来的人潮上。

“文化大革命”没有带给老百姓任何实惠，而只有精神上的苦痛、物质上的贫乏、思想上的禁锢。“文革”初期人们迸发出的那种政治狂热，一方面源自于人们对毛泽东的由衷敬仰，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某些积弊心存抵触，一旦有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宣泄口，便一发不可收。但是，不管领导人的主观动机是如何之好，也不论群众的政治热情如何高涨，当一场政治运动不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好处，不能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反而是动乱连年，百业凋敝，这样的运动最多只能是强弩之末。

可惜，“文革”不只是强弩之末，以种种迹象看来，它更像困兽犹斗，这至少使中国人在痛苦中多挣扎了数年。当人们试图拿起“四大”这一“文革”中大事宣扬的武器，对“文革”的错误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四大”的自由也就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字狱、反革命罪，为此不知有多少人作了牺牲。人们有怨声则不能载道，而只能腹非，民情汹汹，天下钳口。如此地置民情、民心、民愿于不顾，天人违和，倒行逆施，即使有再高的阶级斗争技巧，即使把阶级斗争天天挂在嘴上，讲它一千遍，一万遍，除了徒增人们的反感，再不可能有其他的功用了。

^① 这里的“运动”语含双关，既指“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也指身体之运动。现在的中国人（主要是城市）为减肥而运动，为健康而节食，两相比较，恍如隔世。

后人肯定难以理解“文革”这样的动乱为什么会持续 10 年之久,更不能设想种种令人发指的行径在“文革”中能大行其道。就算是当代的中国人,“文革”也宛如一场恶梦,真伪莫辨。当人们惊魂甫定,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老百姓普遍认为,这是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之争。直观上看,似乎就是这样。试看从“文革”发动到结束,有多少风云人物上上下下,走马灯似的变来换去,正应了那句老话,“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只有毛泽东是唯一的赢家,自始至终牢固地控制着领导权,直到他的生命終了。但是,这种市井之论,既不能见容于党史专家,也与事实相去甚远。一代伟人毛泽东,倘只是权诈之辈,怎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不可撼摇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而毛泽东作为党内第一把手,却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赖以成功的党和党的广大干部,这需要何等的胆识和魄力就不用说了,更主要的是它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是如何地对立化,毛泽东对党的前途和命运是如何地担忧。

自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按理说,剥削阶级的基础已经铲除,阶级斗争的范围和规模都将逐渐缩小,人民内部的矛盾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在这个前提下,1957 年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针对共产党执政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提一些意见,初衷肯定是好的,但这场运动后来发展为众所周知的“反右”斗争。从整顿共产党领导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到大肆挞伐党外人士的“右派”言行,这是一百八十度的逆转。1959 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原先是为了纠正“三面红旗”的执行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冒进等等“左倾”错

误;然而,彭德怀一封旨在纠正“左倾”错误的给毛泽东的信,却使庐山会议的主题截然反向,从反“左倾”变为反“右倾”。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过去4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在他的带动下,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既谈了缺点错误,也总结了经验与教训,使大会成了民主与集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生活的典范。但是,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埋下了“文革”十年动乱的导火线。^①

仔细回味一下这段历史,毛泽东在以上三大事件中,似乎是首鼠两端、出尔反尔,甚或被人们看作是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斗争伎俩。^②但是,这种看法过于皮相。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在重大问题上如此朝令夕改、前后矛盾,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在这10年不到的时间内,毛泽东连续在三次大的运动或事件中前恭后倨,苍黄反复,这其中必有更深层的原因。

对于毛泽东这段时期的作为,已经有无数的文章文件作了评论评定,其中当然不乏客观公正之说。在此,我只从另一侧面作一探讨。愚以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诸多矛盾逐渐彰显出来,毛泽东作为具有高度智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最先感受到了这种

① “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说到,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警惕出修正主义,就是针对他们所说的。”引自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见《解放文选》(下册),第728页。

②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转引自《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一卷(上),第297—298页。毛泽东本人也在反右斗争中谈到“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也给人一种误解,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采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但把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全面地加以考察,应该肯定最初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使党的领导得到改善。

或隐或现、扑朔迷离的变化。下面我们具体而简略地列举几个这样的矛盾。

由于共产党的执政而在一些干部中滋生的特权思想、脱离群众、革命意志衰退等等,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之间产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决定在1957年开始整风,主要是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① 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是老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中曾经整肃过,而官僚主义在过去的整风中却未被提及,可见官僚主义是与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为此,毛泽东试图动员党外人士提意见来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党有一个基本估计:“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② 所以,当所提的意见从否定的方面超出毛泽东的基本估计时,他就认为是“右派”向共产党猖狂进攻,必须坚决反击和打倒。

劳动人民的解放、共产党的卓越领导,确实曾经激发了亿万民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人们的主观热情与客观的经济规律之间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商品货币关系必然产生的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与共产主义的大公无私、勤劳奉献的远大理想之间也构成一矛盾。这两个矛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得到具体体现,譬如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冒进”

① 毛泽东写到:“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9页。

②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0页。

与“反冒进”、“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试图恢复供给制、全民大炼钢铁和“共产风”、“超英赶美”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可以看作是这两个矛盾的图解。毛泽东对这些矛盾已经觉察，不过他认为群众的干劲可鼓而不可泄，也更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精神而蔑视自私自利的商品意识，因此，他在着手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又决不允许“右”的思想的反扑，以至于把那些对“左倾”错误的善意批评误判为“右倾”机会主义。

最让毛泽东难以释怀的是僵硬的公有制的低效率与具有私有化倾向的举措的高效率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说，在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使农产品连续3年欠收，而“三自一包”的自由放任却迅速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饿饭问题；在城市，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能较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精神鼓励、政治先行却越来越难以唤起劳动者的热情。作为共产主义的坚贞不渝的战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和政治领袖，毛泽东对于这样的现实是不能认同的。而党内一大批领导经济工作的同志，则倾向于能取得经济效益的政策。这一重大分歧终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①

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对以上矛盾的先见之明，并没有引导他从制度层面上去深探究竟，却牵引他把矛头对准党内那些务实的领导人。他错误地认为，这些领导人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正在执行一条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路线，必须把这批人打倒。但是，当这批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以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非但未见转好，而是愈见恶化。在此情势下，毛泽东似乎想从社会经济关系中来探

^①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表示反感，并且认为“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参见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解放文选》下册，第731—733页。

求问题的根本,找出“反修防修”的正确途径。他再次发起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认为商品货币关系、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物质利益、小生产等等都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必须加以限制或取消。^①其结果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成了大多数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往事,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品尝这杯苦酒时,感怀会大不一样。我倒是认为,历史的辩证法同样在这里嘲弄着我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让人民永远当家作主,使党更加团结壮大,结果是人们在精神上政治上的沉重压抑,党的威信和凝聚力的极度削弱;毛泽东最早洞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或危机,然而却让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更加突出和恶化;毛泽东一直都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但他晚年则陷于最大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那么,会不会有这样的辩证法呢:“文化大革命”既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渊薮,又可能是人们提炼政治精华的巨大富矿。

柳暗花明又一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四人帮”的垮台为标志,全国人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欢庆这第二次解放,这本身已经从行动上彻底否定了“文革”这种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继续在回响,“抓纲治国”成了华国锋这一过渡政权的响当当的口号;“文革”十年混乱带给人们的思想上的迷惘、政治上的疑惧、生

^① “文革”中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虽然比1958年的批判声势大得多,但在实际上却不敢提出消灭商品货币,恢复供给制,这可能是有鉴于1958年的“共产风”的惨痛教训吧!

活上的贫乏,还远远没有消除;党和国家法纪的败坏,国民经济的一蹶不振,文化教育事业的残破不堪,也都亟待解决;……人们用百废待兴来形容这一时局。

神州乱迷,乾坤倒旋,谁来扭乾转坤,清定神州呢?“时势造英雄”,历史把邓小平推到了前台。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迅速打开了局面,仅就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领域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又对“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作了总结:“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①同时还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重新作了估计:“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②

奇怪的是,以上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新论断,在理论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震荡(相比于公有制和商品经济所引发的争论更是如此),对老百姓而言也没有带来多少狂喜。或许是理

① 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同上,第841页。

论界对此早有共识,或许是老百姓对此早已厌弃,总之,反应是平平淡淡。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新论断包含着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回复到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一切社会的发展进步,必须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在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性作用时,也只限于阶级斗争能解放生产力、能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这个范围内,外于此的阶级斗争,不仅不是革命的,甚至是反动的。^①因此,阶级斗争只是形式或手段,而内容或目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尤其如此,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这一点,不要说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让人们信从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文革”十年更是从反面证实:阶级斗争只要脱离了人们的切身利益,只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阶级斗争只会失败,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即使有毛泽东那样的高人指导也不行。

其次,不能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不能把一切社会矛盾或社会对立都看作阶级斗争的反映,阶级斗争充其量是社会矛盾或对立的某种表现形式;一个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对立是普遍存在的,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有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有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有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至于个人与集体、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家庭、集团、阶级、民族内部的各种矛盾,都可以形成众多的排列组合;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等领域中由于意见分歧而表

① 参见本书第177页注①。

现的矛盾和对立,更是难以数计。如果这一切都要戴上阶级斗争的帽子,都要“上纲上线”,那真是帽子满天飞,棍子到处打,弄得人心惶惶,国无宁日。

第三,阶级斗争固然存在,而且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因此,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但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照搬战争年代那种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这在《决议》中已经写明。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以后的阶级斗争,不必采取那种必欲置敌人于死地而后已的形式。《决议》中可没有这么说。那么,不是急风暴雨式的就应该是和风细雨式的了,似乎也不能这样理解。不过,《决议》还是有这么一段引人遐想的话:“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①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以后的阶级斗争将以什么方式来进行,但却肯定地谈到“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

以上三个方面,有些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在一段时期内被混淆、被遗忘了;有些是对“文革”的阶级斗争形式的否定;有些则预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式的改变。仔细咀嚼这三个方面,对如何正确看待、处理、进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大有助益的。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5页,重点号是作者所加。

有必要提醒一下,以上的论断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来的,是以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为前提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① 剥削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已经没有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② 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正如毛泽东经常引用的那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展,各种所有制关系又再度复萌,特别是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最近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宪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私营(民间)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修改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一事实用国家大法确定下来。

至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为什么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大行其道,我们在第六章再来谈。这里只想强调的是,随着所有制形式的变化,阶级关系必然因之改变,原来《决议》所说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现在必须面对两种选择:或者认为现在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不会产生剥削更不会形成剥削阶级,那么我们就能安然地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这张床上睡大觉;或者直接承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大量出现必然导致剥削和剥削阶级的产生,那么就必须对此作出新的解释和限定。

在以上两种选择中,无论我们任选哪一种,都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否则,单只是个体经济和私营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23页。

② 同上,第822页。

经济的存在这一事实,就足以酿成人们重大的思想混乱,从而可能为新的社会动乱留下祸根。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随便作一下社会调查,就能知道老百姓对新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对立颇有烦言;任意翻一些报刊杂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和平演变”的警告不绝于耳;^①在改革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款或老板们,在打着精较的算盘时,心中也在打着鼓——是否有一天他们的财产又会被没收;还有相当一部分中等阶层的人,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民主富足和改革开放的温饱小康,作壁上观;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们更是喜不自禁,认定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指日可待;……如此混杂的思想和行止,如何看?怎么办?

出墙红杏

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划限,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大量涌现,必然产生剥削现象和剥削阶级。如果以《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那么现在一些人发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和平演变”的警告,就不是捕风捉影,而是振振有词。简单地把这些人斥之为左倾余孽,既不能服众,也于问题的解决无补。

如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理论为依据,现阶段我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确实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日成就。因此说,大力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前几年流行的一句俗语“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① 新近出版的《交锋》一书,其中有一小节的标题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呼之欲出”,并在文中列举了一些报刊对“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报道。

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尴尬局面。我们暂且把这种矛盾现象撇在一边,仅从一个方面而论,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大量存在,马克思一定认为剥削和剥削阶级将会产生,而老百姓也会从亲身的经历中感受到,新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已成事实。面对这无可规避的社会现实,我们将如何看待呢?

我们假定以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普遍存在为前提,^①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作一些新的补充和分析。

当我们把商品交换的出现所导致的文明形态所有制,当作一切阶级对立的基础时,主要是指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实际上,在文明社会中,除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与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的阶级关系,而这些阶级关系主要是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所引致的社会分工的扩展和固定化的结果,例如手工业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便形成手工业者阶级,商业的独立化使商人阶级的出现成为必然,国家制度的经常化诞生了官僚统治阶级,……这些阶级关系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而引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所能囊括的,而只受制于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的普遍存在。因此,在文明社会中,不能单纯地把一切阶级关系看作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即使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某些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想来不难理解。另外一点是,所有阶级关系(包括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在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存在的大前提下,主要

① 一些人会认为这种假定没有必要,他们指出,个体及私营经济的普遍存在已是事实,无须假定。对这部分人我要说,这种假定还是必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既然是客观的,就不必限制,应让它们自由发展,更无须对新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作任何分析与研究。另一些人会说公有制仍是主体,虽然宪法中已规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会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构成威胁。对这部分人而言,这一假定就更为必要。

表现为既对立又同一、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抗的予取关系，^①而不是主要表现为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会遭到猛烈的抨击。

人们通常把两大对抗阶级——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称之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解决。我的观点则相反，这种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既非是不可调和的，更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能彻底解决的；而经常是可以调和的，是通过你不死我也活的阶级斗争来逐步缓解的。

固然，两大对抗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时而有之，奴隶的暴动、农民的起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都可作如是观。但是，从人类整个历史长河来看，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极其短暂的，而且大多是在被剥削阶级无路可走、生不如死之际发生。反之，在绝大部分时期内，两大对抗阶级处于同一个统一体中，它们之间的矛盾往往是通过你不死我也活的阶级斗争来局部解决。具体而言，奴隶常常以破坏工具、怠工和逃亡来对奴隶主进行斗争；佃农则不时以抗租躲债的形式来抵制地主的重利盘剥；现代的无产阶级更多地是用罢工、谈判和资本家周旋。

特别要强调的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文明社会形态中，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过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被剥削阶级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起被剥削阶级自己的统治。翻开历史我们就能看到，任何一次奴隶暴动都没有结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是如此，中国封建社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人际关系之三种”一节。

会的农民起义最能说明这一点,举世罕见的规模巨大次数众多的农民起义从未冲决封建主义的束缚,至多只是重新换一个皇帝来统治而已。^①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局也与此相仿,巴黎公社的起义没有得成正果;1918年11月的德国工人起义,也没有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两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真正较量的国度,但都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至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二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它们的革命的胜利,更多地说是民主革命的成功。最让人难以启齿的是,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虽然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现在大多数都回复到资本主义制度,这能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吗?

在此要声明一下,我并不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也无意否认两大对抗阶级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对历史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不能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所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要着意指明两个事实:(1)两大对抗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才将激化,演进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阶级斗争采取的是你进我退、折衷调适的方式。(2)两大对抗阶级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双方既斗争又同一,一方不能消灭另外一方,唯一的可能是,双方两败俱伤,被新的矛盾统一体所取代。

作为以上第一点的补充,既然两大对抗阶级的斗争通常

^① 对于从未成功的中国农民起义,现代史家爱用胜利果实被统治阶级篡取来解释,如果说所有的开国皇帝都不是出身于农民阶级,那么朱元璋勉强可以算一个吧,但他实行的依然是封建统治。问题不在于是谁篡取了农民起义的领导权,而在于这种农民起义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封建统治。

都表现为非暴力的形式,那么,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而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更应该表现为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的关系,阶级之间的矛盾随时都在产生,也随时都在解决,其解决方式或者互利互惠,或者调合妥协,或者欺蒙哄骗,……较少诉诸武力。况且国家的职能就在于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促使各种社会矛盾(当然也包含阶级矛盾)的和平解决,防止矛盾的激化而引致暴力冲突。^①

作为以上第二点的补充,两大对抗阶级不能互相消灭,只能同归于尽。这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常态。奴隶社会的覆亡,不是由奴隶阶级的斗争来完成的,而是由于新的矛盾统一体——地主和农民的出现;封建社会的终结,也不是由于农奴或农民的起义,而是由于新兴的第三等级的崛起;资本主义社会呢,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败亡的迹象,或者换一种更准确的说法,资本主义并非没有败亡的迹象,而是没有一个更优越、更牢固、更富于生命力的社会形态来取代它,因此它尚能苟活于人世。社会主义可以算一个选择,但是它自身的问题还多,生产力的水平也还不够,只有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方面的成就高出于资本主义时,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才指日可待了。

明确以上两点对于现实政治有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随着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崛起,国内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将发生大的变化:除了固有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小私有者阶级、商人阶级、企业主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公务员阶级、雇佣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何谓制度”。

劳动者阶级等等都将涌现出来,^①在这些阶级之间,必将产生大量的新的矛盾。如果对这些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阶级矛盾的产生,或者视而不见,掉以轻心,或者如临大敌,必欲歼之,都会危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对于这些新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必须妥善地处理,既要看到各阶级利益的冲突、对立或矛盾,又要看到它们之间利益的和谐、一致和统一;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政府作为至上的力量,要能及时洞察、解决、调和这各种矛盾,使各阶级的利益都能得到较好的实现,促成人们整体利益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来之不易,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两大对抗阶级的殊死斗争不能在根本上营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必须以新的社会阶级的矛盾统一体代替旧的社会阶级的矛盾统一体,才能建立和稳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的中国,就不应提倡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反而应该是培育、巩固、加强这个新的矛盾统一体,调动各个阶级的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建成远胜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到了那时,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才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现实。

其实,中国共产党历来都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在有产阶级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前提下,我们将如何处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人们开始支吾、回避和退却了。当我们在宪法中已经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在现实中已经深感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应该理直气

^① 这里的阶级划分,只是举例而言,没有作严格的定义,而有些阶级,如知识分子阶级,过去只把它作为一个阶层来看,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分子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比重都会加大,形成独立的阶级是有可能的。

壮地说,必须扶持、保护、尊重个体小老板、私营企业主、商人等剥削阶级的合法权益,调整好他们与其他非剥削阶级的相互关系,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为什么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体和私营经济会长驱直入,势成燎原,这一问题已超出本章的范围,留待第六章再作探讨。

•

第五章 城市与商业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又一重要表征,如何把城市与商品交换联系起来考察,这是本章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城市的重要并不在于它是文明的产物,而在于它对整个文明进程的促进作用,尤其体现为对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推动;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类开始迈入现代文明。然而,人类文明与商业的不解之缘并非是波澜不惊地及于现代,反之,波诡云谲的商海历来都是招人非议又惹人入魔的。今天,商业文明似乎取代了一切文明而成为文明的同义语,但谁又能否认,它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现代忧患呢?

一、城市在文明中的位置

城市的源起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学者们较容易达成共识,但关于城市的起源,学者们则难于形成统一。澳大利亚著名的历史学家蔡尔德以技术革新和谋生方式的改变来论证他的“城市革命”;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亚当斯则强调社会组织 and 行业专门化在“城市革命”中的作用;胡利安·斯图尔德和卡尔·威特福尔认为社会对灌溉的需要导致了国家和城

市社会的发展;美国著名的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更是小心翼翼,在他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这一专著中避免对城市的起源作明白晓畅的回答,而以罗列的诸多因素以飨读者。

孔子在关于“小康”的那段著名的话中,^①谈到城市的出现是与私有制、国家、制度、战争、伦理道德等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希罗多德记述了米底亚人建立城市的经过:起初,米底亚人以部落为单位散居于各个村庄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混乱和暴力现象日益猖獗;于是,人们便推举德奥修斯作为主持公道的评议员,当各村发生争斗时就由他来评判是非,作出裁决;久而久之,他的作用逐渐成了村民们不可缺少的需要,人们便拥戴他们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德奥修斯作为国王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专门修了一座宫殿,让国王住在里面并由侍卫加以保卫;然后他又要米底亚人在宫殿外围修了高大、厚实、一层套一层的城墙,让所有的米底亚人搬到城里居住。^②

希罗多德的描述显得过于粗糙和简单,孔子的论说白描于既成的事实,没有表现流动的神韵。然而,即便如此,两位先贤的论述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城市起源这一问题的最早的线索。如果把这些线索联缀起来,再作一些适当的补充,我们就可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运动着的画面。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说明,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引致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这两

①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礼运》

② 参见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36—37页,中国工业建筑出版社,1989年版。

重矛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外化为人们财产私有意识的日益强化,不同共同体之间为争夺财富的暴力冲突日益增多,共同体内部贫富分化日益加剧。面对如此普泛的社会对立,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来对这些社会对立进行调节、平衡、控制,以保证人们的社会生活在既定的秩序中运作。人类社会越发展,这种社会功能就越重要,社会制度在不断地完善,管理机构在不断地健全,社会公职人员在不断地专门化和专业化,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日臻成熟。

与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或孤立化相伴随的必然是管理职能的社会化,人们现在才发现,在经济上的自然分工之后,在社会关系上或者说政治上又出现新的分工,僧侣、军士、官吏、帝王成了这种新的社会分工的成员,并且凌驾于胼手胝足的劳动者之上。这一日渐形成的统治阶级,在军事上因其掌握了常备的武装而强悍,在政治上因其严明的社会组织而行动统一,在经济上因其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而势大财雄。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防止内部的暴乱,在一定的区域内,选择适合的地势,深掘沟壑,夯筑城池,让国家的管理机构盘踞其间,豪门大户亦扈从追随,平民百姓只能就近搬迁,于是形成了最初的城市。

城市本身的建立已经很好地说明它是社会政治化过程的产物:^①它那高大坚固的城郭、鳞次栉比的宫室,只有由一个政府组织集社会之力才能完成;它那中规中矩、井然有序的城区布局没有一个统一的行政领导便难以实现;它那星罗棋布、

^① 皮特里指出,古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城之间的平均距离大约都在 20 英里。参见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 56 页。

错落有致的城与城之间的相对架构更是非一统的国家机构不能成就。城市不同于中世纪的城堡,只是让领主或封臣蜗居在里面,任随他们的主观意愿在领地内作威作福;城市也不同于土豪乡绅的土围子,只是用于保护他们的身家财产;城市更不能类比于人们自然形成的聚居地,因为在农耕或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经济形式决定了绝大多数劳动者只能在分散的、广大的地域内谋生,人们的聚居至多形成小型的村庄或乡镇,而不可能形成大多数居民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古代城市。^① 因此,最早的古代城市首先都是社会的政治中枢,在政教合一的国度,则多了一重宗教的神秘面纱。

胡如雷先生正确地指出,中国古代城市的建立,其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② 政治作为城市建设的决定因素,在城和宫室的规格上也表现出来。《周礼·典命》郑玄注:“公之城,盖方九里,官方九百步;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官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官方五百步。”但是,城池只是古代城市的外部形式,人们通常以城墙的有无来判断城市的是与否。对此,刘易斯·芒福德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城墙只是城市的偶然性特征,而非本质性特征。他以玛雅帝国和古埃及王国的早期为例,指出那里的城市虽然没有城墙,但因其内部功能仍不失为城市。^③ 城墙的主要功

① 在古代城市中,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只有两类人:手工业者和农民。这两类人在城市人口中只占少数。农民住在城中,只是碰巧他的土地紧挨城市,他的住址与土地的短距离尚不影响他的农作,但这样的农地所能容纳的农民与庞大的城市人口相比,人数极少;而尚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使手工业者在城市人口中也居少数,但其多寡要视各古代城市的具体情况而定。然而作为通例,军队、官吏、大地主、商人、僧侣、帮佣等则是古代城市人口的大多数。

② 参见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十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③ 参见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65—67页。

用是防御外敌的入侵,当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天然的屏障能使外敌无由出现时,人们又何须耗费巨资去构筑巍峨的城墙呢?古代克里特岛的城市,稍后的日本和英格兰的城市,都没有城墙捍护,盖因于大海的环卫,这些均可作为佐证。不过,我们不能走得太远,这些例证只是极少的特例,而且是因为自然环境为这些古代城市承担了城墙防卫的功能;城墙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等到现代战争的炮火使之失去防御的功能时,才会最后消失。

布罗代尔轻率地相信,“城市的出现如果不是早于农村,至少也与农村同时。”随后他举了中世纪西方城市和新大陆殖民城市的例子。^①姑且不说他的例证距人类最早的城市在时间上有数千年的间隔,根本不能用于说明城市的起源;而且在他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他偏重于从劳动分工和人们的自然聚居来说明城市的形成,^②从而忽略了社会对立的普遍化所导致的政治化过程对城市起源的决定性作用。即便是对于中世纪城镇的形成,英国历史学家托玛斯·弗雷德里克·陶特也认为:“建立城镇的政治需要早于其经济需要。中世纪新城镇初建时是很粗陋的,那时军事上的考虑从来都是第一位的。”^③

“城市”一词是现代汉语中的用法,似未见诸古代典籍。古文中的“市”,主要是指商品交易的场所,它在古代城市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在唐代以前,城中实行坊市制,坊是官吏和其他城市人口居住的地方,在坊中不得从事商业贸易;人们所要进行的商品买卖,集中在城中专辟的“市”内进行,而市占的

① 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八章:城市。

② 同上。

③ 转引自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201页。

面积一般都不大,商品的交易量相当有限。^①在唐代长安城中,有108坊,另有东西两市,两市所占的面积只有4坊之大,如此悬殊的比例,难怪范文澜先生认为有误。^②由此可见,“市”,或者说商品交换连及商品生产,在古代城市中并未占据主要的位置。

直观地看,在一个城市中聚居了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口,而其中大部分人又不从事直接性的物质生产,应该说必须要有繁荣的商品交换才能维持众多城市人口的日常之需。但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实际情况却与此相悖,这一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一般性的解释是当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尚不发达,而特殊性的解释可以是以下几个方面:官营的商业和手工业包揽了皇室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官吏的俸禄全部或大部以实物支付;^③富室大户在距城不太远处有自己的田庄,可以供其所需;……如果这几个方面成立,商品的交易量将会不如想象的那么大。然而,总的发展趋势却是,商品交换在城市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正是我们下面将要论及的。

文明的加速器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特别钟情于城市,他们在谈到文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把城市看作文明的化身。他们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国家城市的毁灭就是文明的毁灭,一个国家城市的兴盛就是文明的兴盛。城市既是文明的产物,又是文明的载体,人类文明各种奇伟诡异的历史场

① 参见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252—254页。

②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③ 官吏的俸禄形式,各朝各代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势是从实物俸禄向货币俸禄转化。秦汉以前,是以封地食邑的形式出现的,西汉最初是米,尔后半米半钱,直至清朝,才最终转化为钱。

面,多半是在城市这个舞台上导演的。

说到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在一个狭小区域内聚集了众多的人口,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这一简单的事实却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分析了,商品交换必然导致人们之间的对立,导致两极分化、财富的聚集、战争以及军队的出现、种种制度的建立、城市的兴起等。在这一系列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那就是社会分工。人们通常都说,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商品交换成为可能,而商品交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是从物质生产领域着眼的。我们在论述城市的起源时特别强调社会分工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部门,而是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机构职能专门化方面显得更为刺眼,如军士、衙役、官吏、帝王等职业。^①

社会分工的普遍化,不论是作为原因还是结果,必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予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之间相依存,互有取予,同时又彼此对立,此损彼益。此外,由商品交换所引致的人们物质利益上的对立性,同样将渗入人们之间的对抗关系和合作关系中,从而使这两类关系具有了新的内容。^②人们之间这种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的予取关系,以及具备了新内容的对抗关系和合作关系,在城市这一载体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聚居在城市中,每个人从事自己固有的职业,他们之间必然产生频繁的予取关系,否则

① 上层领域的专业化,是否应作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看来还颇有争议,尤其是把统治阶级的权力行使看作一种职业,更难获得认可。但是,当一种社会职能必不可少时,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什么呢?

② 关于这三类关系,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人际关系之三种”。

城市这个机体就不能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人口高密度的集中,也使对抗关系和合作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城市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频仍与发展,无疑将加快人类文明的进程,完善人类的文明成果,促成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由此我们发现,正是频繁战争使军事技术得到迅速的提高;社会犯罪的增多和财产纠纷的频仍使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雅典的神殿使人们的协同劳动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帝国使行政管理日趋成熟;至于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建筑规划、百工技巧、天文历算、医学药理、宗教学术等等,无一不是在人们频繁的交往中才呈现出繁花似锦、层出不穷的格局。

最值得书写的是城市在加速商业贸易中的作用,我们前面曾经谈到,商品交换的发展对于城市的起源只起着间接的作用,而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才是城市发轫的直接导因。但是,城市一旦出现,它众多的人口和普遍的社会分工,不仅使频繁的商品交换成为必要,也使频繁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因为只有有密集的人口和普遍的社会分工的前提下,才能使商品交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城市中,由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使最初的城市拖着巨大的经济自给的尾巴,商品交换尚未起着显著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发展,商品交换在城市的生活中愈来愈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先秦“日中而市”的定时贸易到汉以后坐商铺店的日列都市,^①从秦汉时期官吏俸禄的实物形式逐渐向

^① “日中为市”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的一些偏僻乡镇都还沿袭着,这里所强调的是,在西周的京城中,商品交换只在早上、中午、傍晚分别进行,以此来说明在先秦的大城市中,商业贸易还是有限的。

明清货币俸禄的转化,从汉唐以前“坊”“市”俨然分立的城市布局到宋以后坊市制的打破,在在都说明商业贸易在城市的羽翼下不断地发展壮大。^①

城市作为商业贸易的固定场所和商品的集散地,用一根强劲的纽带把各个民族各个地区联结起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传》中谈到各个地区的物资和产品,通过商品交换,互通有无而至富庶,特别是当时的京城长安,作为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更是“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各地的物质商品云集于此,其中不乏国外的商品。桑弘羊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与贤良文学的辩论中列举了众多的外国物品。^②而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是明证。其实,各国各地的商品交换能丰富和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这还在其次;商品交换将促进交通运输的发展,这也不言自明;更重要的是通过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各个地区不同的文明得以相互交流、融汇和光大,而其他的形式(如战争、文化交流等)都不如商品交换那样来得快捷和有力。

最能说明城市对文明的加速作用的莫过于中世纪西方的自治城市了。前此我们曾经谈过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兴起结束了封建的生产方式,把人类带进了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现代民主制度也是在自治城市这个温室中发酵的;其他如思想启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无一不是与城市紧密相连;当然,其中最具活力、最具革命性的还是非商品交换莫属。正是以自治城市为发端,商品交换把它的触角伸入农村,伸入封建主的城堡,伸入欧洲大陆的每个角落,然后漂洋过海,伸入新

① 在西方城市中,商业的发展也同样经历着由小到大的过程:“市场,在中世纪城镇中,原是一个受保护的组成部分,它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后来变成一个日趋扩大的机构,把市场的方法和目标渗透到城市的各个部分中去,……。”引自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307页。

② 参见《盐铁论·力耕》。

大陆,伸入世界各地,把整个地球搅得沸沸扬扬,从此取得了我们称为现代文明的灿烂成就。

反观一下农村的情况,在强烈的对比中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城市的加速作用的理解。在广大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各家各户的孤立独处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男耕女织的家庭经营方式把人们与外界的联系限制在极小的空间内和极少的时间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并非域外奇谈,而终其一生从未踏入城市一步之人也所在多有。虽然农村人也有自己的生存交往方式,如宗法关系的联接、乡镇集市的交易、邻里乡亲的酬酢等,但这些极其有限的相互关系,只会把人们固着在现有的生活方式中,千百年中变化甚微。即便在今天的农村,交通便利、与外界交往广泛密切的地区发展就快,变化神速;而闭塞雍滞、与世隔膜的地区则蜗行龟步,鲜有进展。

因此,仅仅是人们频繁的交往就能推动文明的进程,而在人们的交往关系中,作用最大、最具有革命性的仍是商品交换关系。城市正是以其密集的人口、广泛的社会分工而成为文明的加速器。人们习惯于把农村的落后归咎于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剥削,统治阶级通过赋税、贡纳、地租等形式把财富集中到城市,以供其挥霍。这种观点用之于古代城市,应有一定的道理,但如认为城市的发展就依靠这种经济剥削,却大谬其然。作为现成的例子,西方自治城市并不存在这种对农村的经济剥削,却有着迅猛的发展。问题的根本正在于城市自身有其内在的生命力。

城市既是文明的结晶,更是文明的加速器,醉心于人类文明的人们,难道不应该高喊一声:“城市万岁!”

城乡对立的新视角

城乡对立是一个老话题,城里人主要是从文学作品中来了解农村,什么“城乡对立”、“工农差别”在嘴上说说似乎还有革命的味道,偶或到乡下小住几日,乡里人待若上宾,既能感受到民风的醇厚,又饱览了清新的乡村景物,绝对是件惬意的事。真正让城里人认知城乡对立的是6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和稍后一些的城市居民的“疏散下放”。^①如此众多的人口一下子涌到农村,每个生产队平摊不到几个人,但却牵动了城市里的几乎每个家庭,一封封诉说农村艰辛的家书寄往城市,城里人满含泪水地把好不容易挤出来的钱和粮票寄回农村,这似乎成了他(她)们为乡下的城里人能做的唯一的事。当年的知识青年今天大多数会为自己在农村的那段经历感到不凡,但当时他们仅仅为了获得一纸返城证明,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恐惧而急欲逃离农村呢?城市的先进与农村的落后、城市的舒适与农村的劳苦、城市的丰富与农村的贫乏,也许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文化而起的城市人与农村人的隔膜,这些都是城里人到农村后难于适应且无法解决的对立。

城乡对立自古有之,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或差距皆起因于城市在政治上对农村的统治,在经济上对农村的剥削。具体点讲,统治阶级盘踞城市,利用权势向农村征收赋税徭役;城居的官僚地主、豪强大地主和商人地主,通

^① 从1968年开始的头两年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约在四百万人左右,而1968年至1976年的知青总数有1623万人,但后面的知青大多是到知青农场和单位办的知青安置点,比起“插队落户”的老三届知青来,他们对城乡对立的感受要逊色得多。

过地租剥削把财富聚积在自己手中;城市商人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进一步地剥夺农民。^① 因此,城市的富庶与农村的贫困,以及其他方面的城乡对立,根本上是建立在城市对农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上的。这种观点用之于古代城市,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你看,城市中绝大部分人不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他们靠什么来供养自己呢?他们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却能锦衣绣食,奢侈淫靡,不全都依赖于对农民的剥削吗?

我们把视线换一个方向,把它对准中世纪西方的自治城市,却发现了截然相反的情状。自治城市中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工商业者,统治阶级却不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住在自己的领地内和城堡中;在政治上是乡村的领主统治着城里的工商业者,在经济上是城里的工商业者上贡给乡居的领主以换取有限的自由。夸张地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农村的封建领主对自治城市在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但是,众所周知,自治城市的发展在城市发展史上是最快的,它的富庶与繁荣在短短几个世纪内竟统治了全世界。

中世纪自治城市与古代城市的强烈反差,显然难于证明城市的繁荣与发展是建立在对农村剥削基础上的观点的正确性。那么,关于城乡对立,我们是否可以从别的角度来窥视一下呢?

结合前文中已经谈过的内容,我们知道,城市建立的直接导因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而政治和军事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体现,目的是把各种社会对立维持在秩序的范围内,本质上它们应是超乎社会对立之上的社会权力。因此,城市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所在地,发挥着保护四乡、抗御外敌、管理

^① 参见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十二章,第六节“城乡对立关系”。

百姓、统治社会的功能。如果我们把国家机器的存在看作社会发展和稳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官僚、军人、警察、公务员等等就只是社会分工的新成员,他们和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劳动互换关系,似乎不应以城市对农村的剥削视之。

在中国历史上,从汉高祖的“无为”之治到唐太宗的“轻徭薄赋”,从宋仁宗“庆历新政”中的“重农桑,减徭役”到明太祖的“兴水利,开田畴”,其意都在与民休息,兴利除弊,恐怕不能以“剥削”一词所能解释。但是,从秦始皇的穷奢极欲到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从隋炀帝的荒淫无度到唐明皇的声色犬马,我们又能看到多少体恤民情,不尽都是些滋扰民生之举吗?加上住在城里的大地主,满身罗绮,食皆粱肉,也只能依靠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因此,说城市剥削农村,同样是振振有词。

应该承认,当统治阶级聚居在城中,肯定存在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关系;反之,当统治者龟缩在自己领地的城堡或庄园里,自治城市中主要由工商业者居住时,我们可不可可以说农村剥削城市呢?^①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城市剥削农村还是农村剥削城市这种形式上的转换,而在于把城市的繁荣、富庶、文明、进步与农村的冷寂、贫穷、愚昧、落后的对立,归罪于城市对农村的剥削。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进入了一个误区。

固然,古代城市中大多数人从不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他们的消费靠农村的赋税、徭役、地租等来维持,在作了一定保留的前提下,说城市剥削农村,还言之成理。但是,能否说城市

^① 布罗代尔认为:“农村与城市‘互为前景’:我创造你,你创造我;我统治你,你统治我;我剥削你,你剥削我;以此类推,彼此都服从共处的永久规律。”《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77页。

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农村剥削的基础上呢？在“文明的加速器”一节中我们看到，城市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各种相互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与城市对农村的剥削没有直接的联系。相反，城市对农村的这种剥削关系，往往还有碍于城市的发展。话怎么这样说呢？在我们的议题中，城市中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必须依靠对农村的剥削而生存，这种剥削关系是单向的，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不存在物质互换关系。城市人剥削得来的财物，或者供自己直接消费，或者进入市场，交换能满足自己各种欲求的消费品。在这种剥削关系下，城市越富裕，农村就越贫困，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民不聊生，背井离乡，大量的流民涌入城市，甚而酿成暴乱，其攻击的目标首先对准城市。历史上无数的农民起义，大体都是如此。

田园荒芜，城市败破，文明的进程一度中断，这是城市剥削农村激起农民起义后的一般的普遍的情况。人们或许会说，只要城市对农村的剥削适当，不要过激，还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那么这种“适当”的尺度是什么呢？恐怕无人能够清楚地确定。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城市各个方面的发展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城乡经济的发展，也只能依赖广泛的经济交往关系才能继续；而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关系，只是单方面的取或予，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关系。这种剥削关系，只会阻碍城乡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城市依靠农村的供给，城市中从事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人不吃饱穿暖，怎么能有所作为？因此说城市的发展有赖于对农村的剥削，这是一个容易混淆人们视听的事实。古代城市剥削农村是一个客观存在，城市中从事非物质生产活动的人确也需要农村的供养，在这一前提下，似乎很难否认城市的发展以对农村的剥削为基础。但是，在中世纪西方自治城市中，并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剥削，城市的发展却达

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这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人们通常认为城市对农村实行经济剥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城乡之间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这同样是一个误解。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专门论及。这里只需要强调,在城乡的商品交换关系中,交换人双方都是独立的商品所有者,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剥削关系。人们也许还会以城市商人的欺诈、强横来说明这种不等价交换,其实,生意人的奸滑与诚实不是以城乡划界的,何况城市商人与农村交换时首先面对的对象是封建领主、地主、富人这些有权有势的家伙,而不是可以任意呼来喝去的乡民。

事实上,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荡与克服;城乡经济的发展,更有赖于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广延,并且将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从根本上说,城市的富庶、繁荣、进步、文明与农村的贫穷、冷落、停滞、愚昧之间的对立或差距,主要取决于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优劣,而并非由城市对农村的剥削所决定。^①

二、独具魔力的商业

“剥削”与商业利润之抵牾

商品交换开启了人类文明的闸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对立、战争的频仍、制度的建立、城市的兴起……都与商品交换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至于谈到商

^① 还有一点可作旁证,凡是紧挨城市的农村都先富起来,这一点古今皆然。西汉桑弘羊在《盐铁论·通有》中就谈到:“它近市者家富,……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业,那就更不用说了,它直接就是商品交换的化身,或者换句话说,商业就是商品交换的专业化。

在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人类文明便与商业如影随形,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明;甚至在成文历史以前,商品交换就已经存在,现代考古的发现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人类文明起源于商品交换这一认识,不仅是理论的推演,同时也与无数的历史事实暗合。

但是,商业的魔力对于世人来讲,不是在于它把人类导入了文明之旅(其实这一点更为重要),而是在于它在转手之间便令财富膨胀起来。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雪了会稽之耻后,飘然而去,用其术至力于商业,19年中三致千金,当今的士子怕也会欣羡不已吧。司马迁把不依赖宦途而能致富之人称为“素封”,把之比诸为一都之君,与王者同乐,不也令人心向往之吗?汉初,即使贵为天子,也配不齐四匹马一色的马车,将相也只能以牛车代步,而商人则逐利巨倍,有千、万的进帐,“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縠。”^①汉高祖一怒之下,命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②这已经有点忌妒的意味了。

一般人抱着世俗的观念,认为商业就像点石成金的魔杖,顷刻之间便能盈利致富。严肃的思想家们则往往以批判的目光注视着商业,亚里士多德认为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是不合自然的,应该受到指责。^③中国历史上也多有才俊之士指斥工商业为浮末淫巧,必须严加控制或摧抑。但是,不管世人与

① 见《汉书·食货志》。

② 见《史记·平准书》。

③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第九章、第十章。

学者对商业的看法是如何的天差地别,商业的魔力仍然使芸芸众生拜倒在它的脚下,平头百姓不用说了,即使是最高的统治者,也时常经受不住商业利润的诱惑。以皇家的面目出现,官营商业,实行垄断,与民争利,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不仅醉心于权力,还痴迷于财富,甚至想出了出卖赎罪券以获利的“高招”。到了近代,重商主义作为经济学中最先涌现出来的学派,认为只有商业才是获取财富的真正源泉,更是把商业的魔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于谈到前几年中国的“下海”潮、“经商”热,不也说明人们对商业仍然痴情不改吗?

不管人们对商业是说好还是说歹,商业以其自身的必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它荡涤着世界,但并不曾净化人们的心灵;它振奋着人类,但并非出于大众的利益;它无孔不入,遍布宇内,人们在感受着它无所不在的照拂的同时,却又怅然若失,油然而生莫名的空虚。

商业的迷人之处,首先是它那幻象般的财富增殖手段。马克思用 $G-W-G'$ 这一公式,简捷地突出了商业资本的增殖过程:商人用一定量的货币—— G ,通过商品(即 W)的买和卖,最终获得了一个增加了的货币量 G' ($G' = G + \Delta G$)。这就是商业赢利的秘密,近人把这一增殖过程称为剥削。

关于剥削,现今的解释是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强迫或迫使另一部分人为其劳动,并从中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如果用这一定义来测度商业行为,则尽有不符之处。大家都知道,剥削或剥削制度是建立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基础上的,剥削者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者则缺乏或丧失了生产资料,被剥削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屈辱和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劳动,遭受剥削者的剥削。因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剥削的前提,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

系则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而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交换者双方是独立的,彼此之间不存在人身或财产上的依附关系,他们各自是自己的产品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当事人双方不可能产生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相互关系,双方在交换中是以独立、平等、自愿、互利的对等关系为基础的。在这里,既无剥削制度中那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人为分离,也无剥削制度中那种政治或经济上的强制或依附。因此把商品交换或商业行为中产生或存在的贫富差距或货币增殖视为剥削,与传统的剥削观念多有抵牾。

但是,商人凭藉商业行为而产生的货币增殖或财富积聚,如果不视之为剥削,又将作何解释呢?一种古旧的观点认为,这是因商人善于掌握商机,逐时乘利,贱买贵卖所致。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尖锐的批评。^① 马克思指出,把社会的商品交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所有进入商品交换中的人,他既是商品的买者,又是商品的卖者;一身而二任的他,如果在作为买者时所赚到的好处,在作为卖者时就将失去。因

①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把价值 100 的商品卖 110,即在名义上加价 10%。这样,卖者就得到剩余价值 10。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在第三个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 10% 的特权。我们那位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赚得了 10,但是作为买者要失去 10。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结果是,全体商品所有者都高于商品价值 10% 互相出卖商品,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完全一样。”“我们再反过来,假定买者享有某种特权,可以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在这里,不用说,买者还要成为卖者。他在成为买者以前,就曾经是卖者。他在作买者赚得 10% 以前,就已经作为卖者失去了 10%。结果一切照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183 页。

此,商业利润或剩余价值不能以贵卖贱买来获取。^①

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不是把商品交换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是理解为个人时,有可能某个商人特别狡猾,他总能在商品交换中做到贱买贵卖,欺骗每一个与之交易的人,从而获取利润或剩余价值。^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财富并没有任何增加,狡猾商人所得到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只是另一方的不足价值,一方的增加,是另一方的减少。从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③

马克思把个别的、偶然的情况排除在外,也不为流通中自能增殖货币的幻想所迷惑,他宁可以等价交换作为一般商品交换的前提,从中去探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源泉,因此创立了他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力图说明,一切剩余价值或利润(它只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都来源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商业利润也不例外,也是由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绝不是所谓“贱买贵卖”的结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是以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为前提的,这一前提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才具备;而商业赢利是人类最古老的赚钱方式,早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后的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如何使时空倒流,而能说明前此数千年的商业利润呢?马克思早已意识到

① “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同上。

② 参见同上,第185页。

③ 引自同上,第185—186页。

这一点,并且允诺将在随后的研究进程中回答这一问题。^①

尽管马克思在后继的分析中说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业资本如何在产业资本谋得的剩余价值中分得一杯羹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马克思却留待《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人资本的史的考察”这一章中来论及。首先,马克思论证了商业资本之所以早于产业资本而存在,是因为产业资本要以商业资本所集中的货币财富以及所营造的社会需求为前提;随后谈到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独立存在及其具有优势的发展,是以社会生产尚不发达、商品生产尚未普遍为其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商业利润只能来源于侵占和欺诈。^②

于是,对于商业利润特别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赢利,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如果认为商业利润是剥削,就必须修改传统的“剥削”定义,因为传统的定义是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作为“剥削”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在商业中并不存在这种分离;如果认为商业利润不是剥削,就必须对商业利润的来源给出新的理论说明。我们作何选择呢?

贱买贵卖之灵窍

司马迁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③ 传诵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若放诸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致

① “在我们的研究进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是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引自同上,第187页。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在这一章中作者还明确谈到:“商业利润不仅会表现为侵占和诈欺,并且大部分也确实是这样发生的。”

③ 引自司马迁:《史记·货殖传》。

富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经商,商业比之手工业而言,赢利且快且丰,而如与农业相比,获利则更为悬殊。这一现象,如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二重性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一种商品凝结的劳动量越大,其价值量就越高,反之亦然;商品的交换是等量价值的交换,即使商品的价格或高或低,但总是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按照这一理论,在商品交换中以不等价的交换而致富,是不可能的,因为商品交换是等价的交换,此其一;其二,商业行为并不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形成商品的价值,说经商能致富,并且比工农业更能赚钱,岂不大谬其然。

然而,经商能致富,极而言之,唯有经商能快富大富,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不移的事实,倘若劳动价值论对此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是否应寻求另外的答案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之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诞生这段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以自然经济为主,进入商品交换领域的产品甚少,而以商品交换为指归的商品生产更是微乎其微;虽然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逐渐向商品生产这一层面倾斜,但终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之前,自然经济毕竟是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

在我们的分析中,尽管以自然经济为前提,但是商品生产已具雏型,商品交换更以一定的规模存在着。在这个总的背景下,我们把流通中的商品归结为三类:(1)生活必需品。如

粮食、衣物、食盐、日常生活用品等。^① (2)生活奢侈品。如珍奇玩好、金银器皿、异域宝货、绫罗绸缎等。(3)生产资料。如农具、土地、手工业原材料等。

在对商品的类别作了粗略的界定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商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的结构。中国古代有“四民”之分,即士、农、工、商,^②基本上囊括了主要的社会成分,我们便依此作为分析的基础。

士,按《汉书·食货志》解,是读书而至于做官之人。实际上并非读书才能做官,如以军功或祖宗荫庇而获取官位者。不过,我们可以暂且约定士是进入仕途并领取朝廷俸禄的官宦之人。这一阶层的人,以从政为职业,不从事物质生产,从经济的角度看,他们是单纯的消费者。他们对商品的需求,集中在生活必需品和生活奢侈品,尤以后者为主。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他们的俸禄较为优厚(有时还包括贪贿所得),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在他们的收入中只占一个较小的比例,而收入中的较大部分将用于奢侈品的消费;二来在明清以前,官吏俸禄或者半钱半粮,或者田银混发,^③实物俸禄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实物可直接作为生活必需品进入消费,无须从市场上购入。当然,还须提及一点,中国封建士大夫习惯于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购置田产,这似乎成为通例。这时已经不能把他看作单纯的士了,而应把他归入地主或农的范畴。

农,这在古代不是一个阶级区分,而是一个职业分类,用现在的话讲,农就是以农业生产为其生活和收入来源的人,它

① 住房也属生活必需品,但当时一般人们的住房,大都是自备材料,请工匠或自行搭建,很少以整房进入交易。

② “上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见《汉书·食货志》。

③ 参见本书第202页注③。

包含农民和地主。在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生活必需品的绝大部分自己生产,只是偶或把自己的剩余产品拿到市集上出售,换来的钱或者购置一点自己不能制作的农具和生活必需品,或者作为货币租税上缴给官府。^①至于生活奢侈品,大都与他们绝缘。地主则不同,他们出租土地或雇人耕种,因而占有大量农产品,除极小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外,大部分将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他们对于商品化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喜尚;他或者是个土财主,自己节衣缩食,把赚来的钱窖起来或用于购买更多的田地;他或者是个开明土豪,不仅个人及时享受,还结交官府,并投资于工商业。可以这样说,地主是生活奢侈品在农村中的主要的或潜在的消费者。

工,泛指个体手工业者和经营手工业作坊的作坊主,他们是社会分工的重要部分,并且是最早以专业的商品生产为能事的。他们的产品大部分甚至全部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不过相互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区别。个体手工业者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因为他们个人的手工劳动和极其有限的资本,注定他们只能有微薄的收入,凭藉这样的收入,仅能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和简单再生产;他们是生活资料商品的主要消费者,但于生活奢侈品则不敢问津,他们也经常购买一些生产资料,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个体小生产。手工业作坊主则不同,他们经营手工业生产并使之商品化的目的就是谋利,他们饶有资财,广置产业,雇工请佣,颇具规模;他们获利甚丰,除了带有雇工剥削的性质,也是规模经营的结果;作为社会商品的供给者,他只生产一种或几

^① 中国封建时代的农业税赋,大部分以实物缴纳,但有些也规定必须以货币缴纳的。

种商品,但作为社会商品的消费者,他的需求却广泛得多: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自不在话下,他所经营的产业所需的生产资料也是必须购买的,他还特别钟情于生活奢侈品,否则他那万贯家财将如何挥霍?

商,是我们论题中的主角,它包括众多的小商贩和为数不多的巨商大贾。前者小本经营,随时买进卖出,赚点蝇头微利,维持个人温饱足矣,但想要有什么大动作,却仍感囊中羞涩。后者则气势非凡,跨州联郡,远涉异域;与时俯仰,商海翻覆;驱坚策肥,富埒王侯。可是,不管小商贩和巨商大贾在经营规模和赢利收入上有多大的差距,但在一些质的规定性上两者却是相同的:他们都不从事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都是以赢利为目的,而且这种赢利都只能在商品的贱买贵卖中获取;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消费,都靠商品流通来满足,他们的经商活动,也只有在商品流通中来实现。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全方位的商品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特别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他们是同一商品在其中两易其手的唯一的群体,也就是说,对同一商品而言,他们既是买者,又是卖者,这是其他群体都不曾具备的。

以上对商品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划分中,我们看到,士大夫是一个只买不卖的群体,^①他们既不知稼穡之劳苦,也不悟工作之艰辛,对商品的价格不可能有客观的评价;加之他们收入颇丰,来之甚易,对自己中意的商品,出手阔绰,毫不吝惜。自然经济下的农民,只是偶尔进入交换,商品意识本就不强,他们所出卖的农产品,多数为剩余产品,随便换几个盐巴

^① 马克思认为要使贱买贵卖得以实现,必须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的阶级的存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84—185页)这个阶级在文明社会中一直是存在的,即统治阶级。

钱,他们并不太计较价钱之多寡。地主与农民迥然不同,积攒财富是他们毕生孜孜以求的,大量的实物地租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必欲使之变为响当当的硬通货;他们时常在流通领域中周旋,总想使自己的农产品卖个好价钱,除了供求关系的无情作用之外,没有什么能抑制他们强烈的逐利心态。个体手工业者的生活与生产,全靠商品流通维系,他们的手工业产品,只有在商品的转形中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产品成本几何——用了多少钱的原材料,花了几个工日,因此在出售产品时他们胸有成竹,定价而沽,既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有时他们在确定所售产品的价格时,就主要考虑的是能收回本钱。手工业作坊主却没有这份洒脱,他们斤斤计较着自己的投入与产出,毫厘不爽地计算出每一批产品的出售能获利多少,这是他们经营手工作坊的主要动力和唯一目的。四民之中,对商品的价格算计最精的是商人,他们买进卖出,唯利是图;他们对商品的价格差了如指掌,因为同一商品在他们手中实现了买和卖的统一;出于职业的需要,他们对商品的供求状况了解得也最为精到;如此看来,商人目的明确,计算精确,信息灵通,在商品交换中已是稳操胜券了。

把上述的分析综合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带结论性的论断:

农产品——主要是粮食——虽然是人们第一位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在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粮的社会需求极低;与之相对基数极大的农业生产,即使每个农户只将少许的商品粮上市,加上地主出售的商品粮,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供给量。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品粮的供给大于需求,这是

农产品价格低迷的主要原因。^① 值得强调的是,在自然经济时期,农民种粮主要是为了个人消费而不是为了出售,因此粮价的高低并不影响他们种粮的积极性,更不会因粮价太低而改营他业;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土地上耕耘,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粮食,以致使粮食价格长期在低谷徘徊。^②

手工业产品的遭遇要好得多,它有极高的商品率,可以这样说,它的产量几乎就是它的商品供给量。不过,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手工业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只占有较低的份额;另一方面,它的商品需求面却极广,不仅达官贵人、城市平民需要它,农村中的地主老财、一般农户也需要它。较低的社会供给和较强的社会需求相遇,手工业商品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即便某个行业的商品供过于求,由于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必然会使那个行业的手工业者停产或转产,使供求关系恢复平衡。更有甚者,如果某个行业的产品具有垄断或半垄断的性质,且关系国计民生(如盐、铁产品),那这个行业就有大钱赚了。总而言之,手工业产品的价格比之农产品的价格,要坚挺得多。

商人以经营商品的买卖获利,商品的供销差价、市场的供求状况是他们时时关注的;他们在经商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这样的经验,供求缺口越大的商品(这里指供不应求),获利越丰,古人早就有“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的经商总结。商人们随利而转,所谓“富无经业,货无常主”,什么商品能赚钱,他们便经营什么。商人们除了具有掌握价格、

① 有些时候,由于战乱或者天灾,导致粮价暴涨。《史记》中就有宣曲任氏在战乱中囤积粮食而致巨富的故事。但在中国历史中,统治者为了防止因灾荒而起的粮价上扬,尝设立常平仓、义仓等以平抑粮价。

② 对地主来说犹然,他并不会因粮价低而少收地租,甚至可能会对农民课勒更重,因而决不会减少商品粮的供给量。

了解市场、逐利专一、精于计算的优势(这一优势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直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特殊效应),而且其资本的流动形式还能使之在不利的情况下较快地实现转移,避免陷入严重的亏损。这于农民来说,懵然不觉;于手工业者而言,也是不可比拟的。商人以这些优势遨游商海,鲜有失利。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在社会经济的总体格局基本定形的前提下,某些种类的商品具有长期供不应求的趋势,这就是生活奢侈品。奢侈品不同于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往往是有限度的(以满足人们的必要需求为限),而奢侈品不仅作为一种生活上的享受,并且还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其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奢侈品中舶来品占有可观的比例,因其是异域之货,人们难以侦知其真实价格,且稀罕难得,供给极其有限,尤为有钱人所钟爱。^①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中,奢侈品的贸易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商人们获取暴利的主要源泉。^②还须提及一点,士大夫阶级作为一个只买不卖的消费群体,收入丰厚,肆意挥霍,对奢侈品的高价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由于奢侈品本身价值高,来自异国他乡,故经营奢侈吕需要雄厚的资本,而非一般小商人所能为,这就决定了奢侈品的高赢利带有垄断利润的性质。

农民挟其供过于求的农产品,以其浑沌未开的商品意识,不欲与工商业者争锋;手工业者虽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兼具旺盛的市场需求,却难与商人比肩;商家逐浪商海,与时高下,操

①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唐太宗,曾经俭约朴素,清静寡欲,也敌不住奢侈品的诱惑,“市索骏马,并访怪珍,难得之货杂然并进,玩好之作无时而息。”见魏征:《十渐不克终疏》

② “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缣,得匈奴累金之物,……鼯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盐铁论·力耕》

其奇贏,其利必倍。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此之谓也。

商业欺诈,瑕不掩瑜

“贱买贵卖”这一普遍的历史现象,在我们的分析中,其神秘的色彩已经淡然褪去,所看到的只是供求关系、垄断或半垄断、商业意识等等枯燥抽象的概念演绎;我虽然尽量在表述上使之通俗化,但不知是否把这样的观念传递给了读者,即“贱买贵卖”的普遍存在,是在商品关系尚不发达、供需缺口甚大、经济生活中垄断或半垄断的现象较多、绝大多数人商品意识淡漠、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实现的前提下形成的。

有了以上的理解,“贱买贵卖”与劳动价值论中的等价交换原则的冲突就不如表面上看来的那么大。众所周知,劳动价值论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早期的理论归纳,姑且不论这一理论在日后的发展以及反对派对它的攻诘,但有一点是确凿不移的,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认为,价值规律或等价交换必须以经济生活中的自由竞争为前提。大卫·李嘉图这样说:“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① 马克思对这一看法是赞许的,他评论道,李嘉图不过是说,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② 因此说,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而非垄断或半垄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自由流动(这要求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和人们普

① 引自《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第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9月第1版,1983年6月北京第5次印刷。

②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遍的商品意识),是价值规律或等价交换的前提;倘这一前提不存在,“贱买贵卖”的普遍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把“贱买贵卖”从理论的泥淖中提高出来似乎并不困难,令人难于涤除的是那堆积在商业赢利上的历史污垢;古往今来人们总在议论商业是欺诈、掠夺、剥削,商人则成了奸猾、狡诈、卑猥的代名词,一句“无商不奸”更是把商人的行径作了千古定格。

从“贱买贵卖”中获取利润,以不等价交换而致富,如果不以欺诈或剥削而论,又将作何论处呢?从表象上看,商业盈利来源于商品的供销差价,这里已经预设了不等价交换为前提,按照通俗的看法,不等价交换不是欺诈,便是剥削。^①倘若我们反而论之,商人用多少钱买的商品,便再用同样的价格卖出去,会是什么景象呢?商人们无利可图,就连基本的生活也维持不了。这时人们可能会慷慨大度地说,还是应该让商人们赚点钱,但只限于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已。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为了让商人有活路,适当的欺诈或剥削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再换一个角色看看,如果不是以商人为中介,而是由农民或小手工业者自己出卖产品,假定当时他的产品供不应求,卖了好价钱,我们是否也可说农民或小手工业者在这里进行了欺诈和剥削?

诚然,商业欺骗行为在各个时代都有所存在,而且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似乎有水涨船高、花样翻新之势;宋代商人已经有“贩米而加水,卖盐而杂以灰,卖漆而和以讷,卖药而易以他物,如此等类,不胜其多”的劣迹;明代商人则“多用贗银、溷杂贸易、欺侮愚讷”,干起了伪造货币的勾当;清代商人亦“多机

①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剥削”一词有其固定的含义,将之用于商业行为中并不合适,但人们仍喜欢把商业上的不等价交换称为剥削。

巧,能为伪物,始与交易则出以尝试,外若可观,非信贷也”。^①说到商业上的造假作伪,也许没有谁能比得上当今的中国人了,近几年来,假冒伪劣商品随处可见,泛滥成灾,防不胜防,让中国老百姓饱尝了苦头,甚至连远在异邦的外国佬也不能幸免。^②

尽管如此,总体上看,商业欺诈行为在整个商业活动中毕竟只占少数,人们只要随意看一下身边的事实,也就不言自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绝对不是依靠商业欺诈来支撑,这个道理大家也懂;甚至就个人而言,就算他是造假的高手,也难于使同一个消费者上当两次,人们恰当地把这一行为称之为“一锤子买卖”,他想以此而长期赚钱,恐怕未必能够。因此,商业欺诈在商业活动中并非主流,不论在何时何地,终其所观,均不能成其气候。如果以一个“奸”字来概括所有的商业行为,实在是以偏概全。^③当我们把商业欺诈限定在那些以次充好、以伪当真的商业行为时,人们也许还会对另一些利用市场供求矛盾,利用地区差、时间差、价格差而获巨利的商业行为不能释然,认为在商业活动中获取厚利就是不道德,应该受到指责。面对这样的责难,如果我们不是戴着“等价交换”的眼镜,而是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观点来看待,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愤懑;或者我们以“商人需要冒险,虽然有时赢利,但有时也会亏本”来解释,人们可能会多一点谅解;倘若我极言其实

① 转引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223页。

② 受中国伪劣商品之害最深的应该是俄罗斯人,最后他们不得不在商店门口挂上“本店无中国货”的牌子以挽回顾客。

③ 商业欺诈的危害远非一个“以偏概全”所能了断,商业欺诈不仅危及整个经济秩序,它也是商业活动本身的蠹虫,试看现今诸多商家对假冒伪劣商品的痛心疾首以及防假、打假的不遗余力,便可明白商业欺诈与正常的商业活动势同水火。一个明智的政府,是不会允许商业欺诈肆虐的。

——没有商业赢利,就没有商业,而没有商业,就没有人类今天的一切文明成就——人们是否会顿时哗然呢?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指出商业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并隐约地预示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能使各行各业兴旺发达,使人们安居乐业,竭尽全力地工作。^①这样的识见,不惟在中国历史上属凤毛麟角,在古代世界史上也难以有人与之比肩。^②粗俗地讲,商人经商是为了赚钱,如果不能赚钱,便没有人去经商了;这种利益驱动,不仅于商业如此,于工、农业亦然。传统上人们把商业的作用归结为互通有无,拾遗补缺,促进社会分工,满足人民需要,实在是造福一方,遗利桑梓。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从根本上讲,商业的这些作用,正是因为商业贸易或商品交换引发了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导致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无限追逐。^③在这一矛盾的驱策下,商人们离乡背井,不辞劳苦地进行长途贩卖;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有厚利可图,商人们便趋之若鹜,其结果是生产者多了产出,消费者得到更多的满足;某种商品供大于求,无利可图,商人们便弃之如敝屣,其结果提醒生产者别再生产了,避免无效劳动的产生;奇货可居,能获巨利,人们便挖空心思,发明创造,生产出一代又一代的新产品;供求关系,至关重要,商人们便殚精竭虑,捕捉商机,使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无

① 见《史记·货殖传》:“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②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只是这一思想的阐发,不过已经晚出了1800年。

③ 关于这一矛盾的详细论证,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

微不至的关照；……所有这些，没有利的驱动，便有令不行，有禁难止；有了利的驱动，便无足自行，遍布天下。在计划经济年代，物价稳定，但商品奇缺，人们紧握着票证度日，盖因没有利的润滑；在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声中，商品老化，品种单一，几十年中几无改变，人们想要利也没有利。至此，人们才开始悟及古人所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西汉中叶著名的“盐铁论”中，桑弘羊极力吹捧商业的作用，认定经商就能使国家富足，并非要依赖劳形竭力的农耕，俨然一副重商主义的腔调。^①针对这一点，与之辩论的贤良文学之士强调：天上怎会掉馅饼呢？没有耕耘，便没有收获，不事生产，哪能有物质享受？^②显然，贤良文学之士并不曾了解到，商业的重要作用并不在于“无中生有”，而在于它激发了人们无尽的贪欲，用一句正面的话来说，它调动了人们巨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蓬勃地发展。

但有一点贤良文学之士是正确的，即商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如果为流通过程中所获取的滚滚财源所迷惑，一味强调商业是致富的法门，甚至把它推向唯一的位置，忽视生产性行业的发展，对一个民族或国家将会是灾难性的。上文中我们曾谈到，16 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恃海外掠夺与贸易而建立的老大帝国，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洪流中迅即地衰颓了，而重商主义的理论喧嚣，也为更注重生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

① 桑弘羊言：“故乃万贾之富，或累万金，追羨乘利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

② “文学曰：……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同上。

代。^① 商业的魔力不是无限的,它的魔杖只有在把社会生产这个财富的真正本源牵动起来时,我们才能切实感受到它那灿烂的辉煌。

三、商业周期^②

聚沙成塔

从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买卖再到商业票据结算的大宗贸易,从走乡串村到坐列都市再到计算机前轻按键盘的交易方式,商业已经走过几千年的风雨历程而遍布寰宇,具备了吞吐世界的威势。在仰视了商业的璀璨荣光之余我们再俯瞰商业的艰难辛酸,从中国先秦的重商到尔后两千多年的贱商轻商,从古代地中海沿岸商业城市的繁荣到中世纪西方商业的凋零,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而高奏凯歌的世界贸易到以商业命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谁又能说人类对商业这个魔怪已经知根知底了呢?

我们前面说过,商业的发展要与生产性行业的发展比翼而飞,才能有持续的进步,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古人却没有意识到。司马迁已经算是对商业极为开明的一个人了,他引用

① 参见本书第73—74页。

② 商业周期亦称经济周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我认为称作商业周期最为适合,一则因为商业周期的出现与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二则商业周期这个词与我们这一章的标题是太切合了。商业周期已经是专门的经济学术语,在这里只能对它作通俗的并非全面的一般性描述,以期和本书的要旨相匹配。

《周书》中的话来说明农、工、商、虞发展是国强民富的本原，^①但似乎只是把四者分别开来看待，并没有发现商业对农、工、虞三业的相互促进作用。至于秦汉以降，通行的观念更是把商与农、末与本对立起来，认为商兴必妨农，末起必害本，于是，“重农抑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便成了基本国策。

应该看到，把商与农作为对立的两个产业，认为商业的发展有损于农业，这在古代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在上文中曾经谈到商业的繁荣会加剧统治者对农民的克剥；^②另一方面，商业的兴盛，助长人们对财富的贪求无厌，并集中表现在土地的兼并上^③——这两个方面都会通过对农民的侵害而危及农业。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环境中，“重农抑商”是一个起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

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总体上看还算成功。在过去那种崇尚暴力和强权的时代，因商业而起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往往不是引导人们去发展生产，而是诱使人们用武力或强制性的权力去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④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在商业的繁盛中滋长着他们对外殖民掠夺的野心，但这种喜尚暴力而忽视生产的作法究竟使他们的帝国维持了多久呢？

①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殖传》。

② 参见本书第74页。

③ 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已经观察到商业与土地兼并、土地兼并与农民困苦的连带关系：“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偏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纲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见《昌言·损益篇》

④ 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16 世纪初的东欧,成了西欧的原料生产地,东欧的领主们为了在原料供应中获取更大的财富,迫使农民变成农奴,把更加沉重的劳役负担加诸在他们身上,布罗代尔把这种情形称之为“二期农奴制”。^① 悲乎,东欧领主在商业贸易中的逐利心态把历史拉向后退。

当然,阻挠商业对生产性行业起更大促进作用的主要因素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历来都是消解商业的革命性作用的惰性力量,每家每户男耕女织的田园景象足以把商品交换限制在最低的水平。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商业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已名列前茅,但农村的自然经济壁垒仍然未能打破;至于中世纪的欧洲,领主经济更是把农村箍得像铁桶一般,商品交换近于绝灭,甚至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初期,城市中的工商业主想要把他们的经济触角伸向农村,也屡遭败绩。^②

好在商业和手工业的联姻还算美满,两者之间的相濡以沫成了古代贸易舞台上的主角,幸亏有了它们,才上演了人类文明的连轴重戏。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一直在侵蚀着农村中的自然经济,虽然开始时进展缓慢,并不时被人为的阻力所中止,但积羽沉舟,商品经济之壮大毕竟压沉了自然经济这艘旧船。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提到西方自治城市在陷自然经济于灭顶之灾中的重要作用。在本书第二章中,自治城市如何促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大家也许还记忆犹新,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今天几乎每一样使用物品都成了

^① 参见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 275—280 页。

^② 参见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三章,“土地和金钱”一节。

商品。

资本主义开始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地区之间的隔绝、国家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对立,都阻挡不了商品经济坚定有力的前进步伐。商品经济不仅吞噬了城市,也深入了农村,不仅把商业、工业、信贷业、服务业、劳务业等等收编麾下,也使农林牧渔等这些自然经济把持最久的行业,全面地商品化了。人们现在才真正领略到商业那所向披靡的力量。^①无所不在的商品经济,从否定的方面讲,“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②从肯定的方面看,它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

人们似乎很难领会商品经济所带来的道德上精神上的失落,却对商品经济所引致的泉涌般的物质财富欣喜若狂。可是,当人们正享受着因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而来的诸多实惠时,当社会分工的日愈精细使生产力得以极大提高时,当商品交换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能分离时,当人们的逐利心态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好回报时,……一种前所未有的灾难正在向人类悄然袭来。

中国人对经济危机并不陌生,但只局限于书本上的认知,却没有亲身的经历;现今的西方人虽然仍在遭受商业周期的困扰,但那种瘟疫般的经济灾难,似乎永远躲在历史书中;只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西欧与北美,才身临其境地感受

① 不过人们切莫忘记,商业征服世界的这种威力,是以工业为其坚强的后盾,所以,重商主义同时也被称为重工主义,不是没有来头的。

②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

③ 同上,第256页。

了那人类最初几乎无一计可施的经济瘟疫。商业周期在 18 世纪资本主义的某些国度已经出现,当时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性的经济周期来看待,没有人把它与战争或其他外部扰乱的影响清楚地区分开来,而是把它视为偶然的灾祸或经济错乱。^①到了 19 世纪,每隔 7—10 年便来一次的经济危机,恶魔般地附在资本主义身上,规则性地发作,并且不只是一个国家发生,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同病相“连”,甚至波及其原料供应国,使危机具有了世界性质。

人们开始注意经济危机,并把它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因此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一般都将经历四个阶段,即繁荣、危机、萧条、复苏;^②每个阶段互相依存,相互继起,周而复始地循环着,每一次循环算一个周期,这就是商业周期。在繁荣阶段,需求旺盛、物价上升、利润趋高、投资膨胀、就业增加、信贷扩张、产量剧增。当繁荣达到一定高度时,危机暴发,此时产品积压、银根紧缺、股票大跌、信用崩溃,经济陷入极度的混乱和停滞之中。紧接危机的是萧条阶段,工厂减产甚至停工、失业大量涌现、需求剧减、物价低廉、游资充斥、存货出清甚慢,……萧条达到最低点,复苏阶段开始,生产逐渐增加、投资重新启动、物价稳中有升、利润日趋恢复、市场需求转旺……经济再次步入繁荣阶段。

商业周期中令人最难忘怀的是危机阶段,这一点可以从商业周期经常被称为经济危机中看出,在危机阶段,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一下子瘫痪了。对广大无产者来说,他们没有工作,流落街头,饥寒交迫,只是

① 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第 539 页,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② 商业周期的这四个阶段也有称为扩张、高峰、衰退、谷底的,虽然用词不同,其意却相近。

因为他们为社会生产了过多的商品；他们忍饥挨饿，度日如年，却阻挡不了农场主们把牛奶、粮食倾倒入河流，把咖啡当作蒸汽机的燃料；如此恶性的两极逆反，难道就是现代文明奉献给人类的吗？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灾难，人们惊诧、愤怒、悲观、绝望、欲哭无泪、求助无门；面对危机、（尤其是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上流社会再也保持不住他们的冷漠和矜持了。企业家们原本以为每隔数年就来一次的经济危机就像自然年景的丰歉一般，已经习以为常了；经济学家们曾经自诩洞见了周期的规律，并以给人类指点迷津为傲；政治家们更是志得意满，既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又畅想着美好的未来。^① 1929年的经济危机，给这一切打上了否定的封记。无论是危机的破坏性、危机的深刻程度、危机的波及面，1929年的危机都是空前的，一时之间，社会精英们瞠乎其外、束手无策，没有几个人不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商品经济有如涓涓细流，终于汇成汪洋大海，当人类驾驭着挪亚方舟在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大帆破浪时，是否能保证生命之舟永不沉没，这一点尚难定论。商品经济又有如粒粒砂砾，凭藉“看不见的手”而堆积成塔，但往往在不可抗力的作用下坍塌一片，这却是在历次经济周期中屡屡被证明了的。人类能不能在商品经济的砂石中掺入一些水泥，加上几根钢筋，让商品经济之塔屹立不倒呢？

① 正是在1929年危机发生的前一年，美国总统柯立芝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谈到：“自美国建国以来，历届国会审度国势，莫有本届之兴旺繁荣，……但观今日生存之必要条件，已由生活所需，进入美衣美食豪奢之境地。生产不断扩大，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我国今日之成就，实足快慰。我国未来之前途，实很乐观。”转引自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第12页。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

经济危机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对人类的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自己创造的经济奇迹,不自觉地伤毁在自己手中,人类好不容易建立的理论框架,抵挡不住经济危机的冲刷。诚然,人类对于商业周期的认识,需要一步步地深化,任何理论都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商业周期中并非只有危机这一现实,也往往让经济学家们作出乐观的判断。鉴于此,我们不能责难理论家们智识不高,而应看作有以使然。

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腾跃,思想激越,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病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并且在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经济学家们自然不会去注意自身机体可能隐藏的病症,而是把目标对准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思想。亚当·斯密作为那个时期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针对当时重商主义对内实行经济干预对外实行贸易垄断的政策主张,把自由放任的思想引入政治经济学。^①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从雇佣劳动、土地买卖、国内生产、对外贸易等诸多方面都力主自由竞争或自由放任,可以说,自由放任的思想是他的学说中的主轴。

以经济生活中的自由放任为基础,亚当·斯密提出了他被后人众相赞誉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正在努力追求自身的利益,当这种追求被自由地用于物质财富的生产时,社会总的财富必然增加。这是因为在自由竞争的

^①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政治上自由主义的提出早在15、16世纪就已出现,按理说这只是第三等级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的反映,但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到了18世纪才出现(亚当·斯密自己认为他最先在经济思想中提出天赋自由的原则)。这种时间上的间隔或倒置看来只有这样来理解,当经济生活中的现状尚未危及到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时,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是不会被提出来的。

前提下,人们都力图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最能获利的生产行业,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提高产量。人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追逐个人的私利,并不曾考虑到社会的利益,但是当每个人尽其所能地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时,社会总体的利益将得到最快的增进。这就有如一只看不见的手,促使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的利益。^①

“看不见的手”简单凝练地勾勒出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血气方刚的形象,如实地反映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逐用之于生产领域,必将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这一恒定真理(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这一相对真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乐于接受的,自私自利的行径竟能增进社会的利益,没有哪一种对立统一会这样令人陶醉了。不管自觉不自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乐意把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传承下去,到了法国人萨伊那里,竟然演变成了“萨伊定律”。

萨伊和亚当·斯密一样,极力推崇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运用,但他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一思想,而是把它用之于新的研究领域。在当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商业周期现象日益显露其原形,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问题,自然为众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就是生产过剩或需求不足,如何理解社会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就成了解答这一问题的核心。在萨伊看来,社会商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平衡的,因为商品的供给最终将转化为人们的收入,收入又会转化为需求,所以,供给会为自己创造需求。作为个别的生产部门或行业,难免会产生局部的或个别的失衡或生产过剩,但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随着价

^①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6—29页。

格的自由波动,能自动消除这种生产过剩或失衡。因此,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均衡发展的,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或需求不足,也就是说,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

姑且不谈“萨伊定律”中是否有其合理的成分,在资本主义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萨伊定律”终难逃脱被抛弃的命运。特别是1929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彻底破除了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行调衡的最后一丝幻想,把原有的经济学体系冲得乱七八糟。不要说那些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普遍存在的经济学说全然无地自容,就是那些对经济危机或多或少作了合理解释的理论也左支右绌,更遑论提出有效的经济对策了。这个时候,出了一个经济学中的划时代人物,他就是凯恩斯。

对于“供给能给自己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凯恩斯首先就予以否定,他指出萨伊定律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假定之上——即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是相等;而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并非常常是均衡的。在这里凯恩斯引入了“有效需求”概念。所谓有效需求,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需求,它由总的社会消费量和总的社会净投资量二者组成,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会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而经济危机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极端化的表现。那么,是什么引致有效需求不足呢?

我们知道,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将转化为社会总收入,姑且不管这种社会总收入将在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如何进行分配,人们的收入一般都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储蓄。因此,社会的总收入在这里分割为两个部分,或者说由两个部分构成,即社会的总消费和总储蓄。假定总储蓄全部转化为总投资,总消费与总投资之和便等于总收入,而且这两者

之和也即是有效需求,这时,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均衡的。但是,如果总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总消费与总投资之和便小于总收入,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就被打破了。

因此,理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作为投资者来说,他从银行贷款(或通过其他集资方式)来进行投资,是希望通过投资活动最终能获取一定的利润;如果不能获取利润,他就不会投资,也就不会向银行贷款,银行的储蓄存款也就不能转化为投资。另外,向银行贷款是要付利息的,如果投资所获利润只够偿付利息甚或不够,投资活动也不会进行。所以,投资要能获得足够高的利润,既能偿付贷款的利息,又能让投资者得到一定的收益,人们才会乐此不疲。由此观之,投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贷款之利率,一是投资所获之利润及未来利润之预期,凯恩斯把后者称之为“资本之边际效率”。^①

在决定投资的两个因素中,凯恩斯认为资本之边际效率是决定性的,当投资者预感到投资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时,投资便会停止。当然,不是每一个投资者都会这样做,但当总投资不能吸收全部储蓄之时,便会出现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也就是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此即意味着国民经济陷于不均衡状态。

人们也许会说,如果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把剩余的储蓄转化为消费,不是同样可以恢复社会总需求,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均衡。诚然如斯。但是,在人们的收入中,消

^① 我这样说的不准确,但为了让对经济学少有涉猎的读者能看懂,同时又限于篇幅,只好作这种浅陋的解说。对于凯恩斯的另外一些概念或用语,在本节中还会有类似的冒犯,--并望读者谅解。

费的部分和储蓄的部分是有一定比例的,人们往往为了将来之需或以防不测,进行储蓄,而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消费的比例将趋小,用于储蓄的比例将趋大,凯恩斯把它称之为“边际之消费倾向”。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明白,消费是否扩大,受到消费倾向的制约。

我们在上面把人们的收入区分为两个部分,或是消费,或是储蓄。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形,人们将收入中的一部分保留在自己手中,既不用于储蓄,也不即时用于消费,而是持币待购或持币不购。比如,人们为了交易的需要,手中总要留置一些现金,在短期内(或10天半月)逐日支出;另一种情况是,人们手持一定的现金,只是为了应付不虞之支出;再有就是为了投机而手持货币,最近的例子是股票的买卖。以上三种情况,凯恩斯称之为“货币之灵活偏好”。需要说明的是,既然人们手持一定的货币,不即时用于消费或投资,因此形成了一定的收入积淀,削减或迟滞了社会的总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

总起来看,凯恩斯把引致商业周期的因素主要归结为三个,即消费倾向、灵活偏好、资本之边际效率,而其中又尤以资本之边际效率为最。特别表现在人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阶段,就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①对此凯恩斯论证到,在繁荣阶段的后期,经济高涨,价格上扬,这时生产成本虽然也有所上升,但投资者仍然有可观的利润,为此人们仍在盲目地投资。在人们乐观过度之际,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人们

^① 注意,凯恩斯在谈到危机时绝口不提生产过剩和投资过度,而不联系这两者实在难以说明资本之边际效率为什么突然崩溃,虽然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十一章第Ⅲ节谈了诸多因素对资本之边际效率的影响,在第二十二章第Ⅱ节也谈了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但仍然令人对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不甚了了。

对未来之预期又转化为悲观,于是投资大减,从而形成危机。

在危机到来及其后的萧条阶段,由于经济的普遍不景气和人们对未来预期之普遍悲观,消费和投资都将处于最低的水平,但要恢复经济,必须加大消费和投资,这是一个矛盾。这一矛盾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国家出面,干预经济,促使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均衡发展。这是凯恩斯从他的《通论》中最后得出的结论。

承认商业周期普遍的客观的存在,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探讨了商业周期的成因,破除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能够自动调衡经济的神话,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使国家对商业周期的调节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促成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到混合经济的过渡,……这些加在一起,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凯恩斯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吗?

是否峰回路转时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一个分水岭,至深至巨的危机现实,让世人不得不相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声名狼藉,山穷水尽。与此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却一枝独秀,成绩显赫,以致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西方社会经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①如此强烈的反差,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混合经济”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在凯恩斯的《通论》中,已经提出了把私人追逐个人利益

^① “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时,苏联总生产量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摘自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第137—138页。

而产生的积极性与国家经济的有效干预结合起来,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正常发展的思想。^① 尔后在凯恩斯的一些追随者的努力下,迅速将这一思想政策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步上了混合经济之途,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因此也成了官方的正统的经济学。

所谓“混合经济”,其指导思想是在经济中既要继续发挥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要国家或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的调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毁灭性打击。换句话说,就是要转动个人利益和社会统制这两个轮子,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均衡地运行。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概略地讲有这么一些:在触目皆是的私营经济中,掺入国有、国营经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相机地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在就业、收入、医疗、教育等方面实行全面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回顾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的政策及其效应,有两点应该说是不可否认的:一是在混合经济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这不啻是对社会主义某种意义上的肯定,另则也预示了崇尚极端个人利益的资本主义的危殆。二是混合经济制度确实延续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虽然商业周期并没有消除,而且周期的频率也加快了(5—7年),但是周期的振荡幅度却大为减小,且不说1929年经济危机的那些致命现象已经飘然远去,即使由此上溯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大震荡,也似乎成了往事尘烟;人们所看到的是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物质生活水平的实际提高,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且还有几乎无所不在的社会福

^① 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二十四章,第Ⅲ节,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利制度为其善后。无怪乎西方史家把二战后到 70 年代这一段称为黄金年代。

但是好景不长,进入 7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患上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的特殊病症,其主要表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大量增加、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对这一特殊病症,原有的经济语汇无以名之,西方人只好另造一个新词——stagflation,中国人把它译作“停滞膨胀”,或简称“滞胀”——为之命名。对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滞胀”的症状是一样,但病情的轻重却不同(参见下表),西德和日本看来是病情较轻的国家。这种差别,艾尔提斯认为是由凯恩斯派的政策决定的,受凯恩斯派政策影响最大的那些国家,都是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国家,如英国和意大利。^①

国别	消费物价指数					失业率 (%)					GNP 年平均 增长率(%)	
	1982 年 = 100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51—1965	1971—1980
美国	30.9	33.8	42.0	59.3	85.7	5.2	4.5	4.9	8.5	7.1	3.7	2.9
英国	15.3	18.3	22.8	42.1	82.4	1.5	2.2	3.0	4.3	6.4	2.7	1.8
意大利	13.6	17.2	20.0	34.2	72.9	5.6	5.3	5.3	5.8	7.5	5.5	3.1
法国	21.2	25.4	31.4	47.8	78.8	1.4	1.5	2.4	4.0	6.3	4.9	3.6
西德	42.3	48.5	54.6	73.5	89.7	1.3	0.3	0.8	3.6	3.0	6.9	2.8
日本	22.4	30.1	39.3	67.7	92.9	1.6	1.2	1.1	1.9	2.0	8.9	4.8

资料来源:戈登:《经济学》1990 年第 5 版,附录;《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

^① 参见华尔特·艾尔提斯:《凯恩斯派传统教义的失败》,载于《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为什么说“滞胀”是资本主义前所未见的新病症呢？因为按照资本主义过去的经验和理论，如果经济繁荣，必须伴随物价上涨和较高的就业水平；如果经济衰退，则有较低的物价和较高的失业率与之相伴。这就是说，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有一种对换关系，换言之，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成反比。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这种对换关系，被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更加理论化了，他在1958年发表的《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根据英国近一百年中物价与失业率的反比关系，制成一个坐标图，即经济学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但是，“滞胀”的出现，“菲利普斯曲线”显然失灵了。人们现在看到，经济增长迟缓，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经济现象一改旧观，令人为之愕然。问题还不止于此。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凯恩斯派政策的指引下，曾经赢得了20多年的黄金时代，但现在人们发现，过去服膺的凯恩斯的处方已经不能奏效，经济再不像凯恩斯预见的那样——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经济持续增长——发展，而是发生了相反的情状。对此，即使是凯恩斯派的经济学家，也只得承认这是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① 凯恩斯理论面临严重的挑战。更让人懊恼的是，在凯恩斯学说一片颓丧的氛围中，面对“滞胀”中并存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人们似乎无所措手足，医得了高通胀，社会就得吞下更高的失业率这枚苦果；医得了高失业率，人们就得承受恶性通胀的折磨。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哀叹

^① 琼·罗宾逊夫人是凯恩斯派的得力干将，她认为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即对古典学派的否定。“滞胀”以后凯恩斯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她认为是第二次危机。参见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同上。

到,资本主义混合经济陷入了“最残酷的两难困境”。

现在轮到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哼鼻音了,他们不无幸灾乐祸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且从自由主义的武库中拿出了几件旧兵器,把它们磨得雪亮。资本主义社会也太过势利了,凯恩斯学派一旦失势,它们便吹捧起自由主义的新宠来。新增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于1974年颁给了崇尚极端自由主义的海耶克,正是这位先生,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仍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于消费过多造成的呢!^① 仅隔两年,自由放任学说的另一员干将弗里德曼,也戴上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至此,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再度甚嚣尘上,到了80年代,他们的论点已经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调。然而,新自由主义不过是明日黄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根本难于贯彻始终,凯恩斯学派的幽灵总是挥之不去,在经济中的实际效应仍然不如人意。^②

面对“滞胀”这一现代病症,经济学家们自然不会置之不理,成篇累牍的文章与著述铺天盖地而来,研究“滞胀”的成因以及寻求其对策成了西方经济学中最为热门的话题。在这里我们不能对这些论述加以评介,即使最简单的也不行。我们只能从这些论述中抽绎出几点,这几点对于所有流派来说几乎都是有共识的。

在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凯恩斯派政策的实施,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行全面的社会安全福利制度,在一段时期这些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一些潜在因素的日积月累

① 参见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同上。

② 霍布斯鲍姆对此有较为公正的看法,参见他的《极端的年代》(下),第十四章,“危机二十年”。

和制度惰性的潜移默化,最终将导致世所公认的如下现实:1. 工会的议价力量加强,工资呈现刚性,具有只升不降的趋势(至少就名义工资而言);2. 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以高税收来维持;3. 政府行为的增加,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形成资源的浪费和效率低下;4. 在以上三者——高工资、高税收、低效率的合力下,企业利润相形减少。

马克思有句名言:无产者没有祖国。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者没有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改变成“资本家没有祖国”,也许更贴切一些。试看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和更好的投资环境,资本输出日渐增长,它们先是在拉丁美洲安家,次后在东南亚地区登陆,最近把中国大陆作为最佳的资本输出地,……显而易见,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低工资、低税负(包括许多优惠条件)、环保方面的低要求,等等,无疑是最能吸引资本家的。看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是必然的趋势,资本的逐利动机犹如水银泻地,它的流动是没有国界限制的,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流动,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急先锋。

其实,资本的逐利动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荣辱兴衰。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实质上是受逐利动机这根神经牵制的;“萨伊定律”的平衡机制,也只有借助利益驱动,才有可能;凯恩斯对商业周期的分析,直接把资本之边际效率以及利率作为危机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资本的唯利是图的面目更是跃然纸上。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甚至假定,尽可能地降低利率,在一定时期内,“让资本丰富到一种程度,使得资本之边际效率等

于零。”^① 这一假定,且不管它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幻想,还是具有一定真理内涵的预见,但毕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利润的追逐,不仅是资本主义围绕旋转的核心,而且还是资本主义成于斯毁于斯的玄机所在。

^① 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185页。

第六章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龃龉

商品货币关系促成并推动着人类的文明进程,商品货币关系越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便越丰盛,当人类还未来得及品尝文明的正果时,文明的酸果先期落在人间。资本主义以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征服了人类,带着它的无限张力和原始冲动,赤裸裸地毫无节制地蹂躏着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人们不仅彷徨于旧社会的挽歌中,而且直接身受着资本主义新社会的无耻、冷酷、血腥和征服,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是没有任何道德禁忌的。这一现象,在资本主义早期,似乎已成定式。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有感于人类的深重苦难,对资本主义发动了全面攻击,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点睛之笔。但是,建立公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却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引致迷惘、混乱和失误,直至今日,仍在束缚着我们改革开放的事业。这究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的偏差,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局限?看来两者皆有。

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

理想的公有制

“消灭私有制”这句响遏行云的斗争口号,曾经激励了无

数的共产党人人为之浴血奋斗。早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言谈论述中,私有制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成了千夫所指。马克思主义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它的思想的三个来源之一,肯定是继承了这一批判性的遗产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慷慨陈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痛披其弊,极富感染力,不禁使人联想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私有制的批判;当人们读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①时,更会相信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渊源。《共产党宣言》以其犀利生动的文笔,在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同时,使人感受到对无产阶级充沛的感情,这会让人以为,《宣言》只是一篇感奋人心的感情色彩多于理智思考的战斗檄文。如果你这样想,那就错了。

诚然,《共产党宣言》文字激越,没有更多的理论阐述;在时间上,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作品,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问世的10年前。^②大家都知道,正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第一次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而且一经得出这一原理,马克思使用它来指导他的研究工作。如此看来,此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似乎不可能运用了这一原理。这一疑问,马克思自己作了解答,他明确地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在1845年至1847年期间已经形成,他和恩格斯把这一原理也用于《共产党宣言》的写作中。^③因此,《共产党宣言》不是一时的即兴之作,也不是没有理论根基的激昂之语,而是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科学之论。

① 引自《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

② 《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于1858年8月—1859年1月,1859年在柏林出版。

③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这是《共产党宣言》与空想社会主义类似言论的根本区别。

说到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必须首先提及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那段人们熟知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集中表述中,我们仅选用与我们的论题直接相关的两段话:“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①“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②这就是说,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当生产关系(包含所有制关系,甚至可以说主要是所有制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或破坏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就必将发生社会革命,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抗正在酝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已具备了物质条件。

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以及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具体论述,散见于马恩的其他著作中。

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用于说明资本生存的人身条件正在消失,而消灭资本的人身条件正在形成:“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

①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 同上,第5页。

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

《资本论》中的一段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角度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性: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 如果读者细心一点,在以上这一段话中,马克思不只是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将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走向灭亡,而且还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同时也为社会地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接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3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31—832页。

指出这一矛盾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次后又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发展和激化,“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 10 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① 在这里,恩格斯不仅预言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灭亡,并且描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诸多优越性。

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恩格斯还在《共产主义原理》、《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作了具体的表述,综合起来看主要包含这么一些内容: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或国家所有、社会生产的计划管理、消除竞争、阶级消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440 页。

不存在贫富分化、取消商品货币、人的全面发展、人力物力的巨大节约、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以上这些内容,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经实行过或试图去实行,^①可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按照恩格斯的蓝图实施的(在此之前,苏联人先作了榜样)。

两相比较,马克思却绝少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具体的未来描述,在一些不得不作出某种表述的场合,马克思都谨言慎行,注意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强调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力图从历史的高度予以辩证的解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按劳分配的论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② 马克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却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当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求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指南时,只能满足于恩格斯明确易懂但带有主观臆测的表述,而不易寻得马克思明白的科学的解答。

然而,尽管马克思难得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表述,但还是以他深邃的思想为我们留下一段隽永深刻的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① 也许只有“阶级消亡”是一个例外。

②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时,还说道:“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这也可作一例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页。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怎样理解？是否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钥匙？这些问题留待后面再谈。^②

消灭商品货币

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晦涩难懂,用他自己的话说,分析商品的第一章是《资本论》中最难理解的。好在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全面地介绍马克思的商品货币学说,只须简要地说明在他的学说中商品货币与私有制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商品货币在公有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即使是这样,直接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说明商品货币与私有制的关系,仍然可能是冗长和令人难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一反上面介绍公有制理论的做法,尽量不引用马克思的原文,只将他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相关论述,简略地白话一番。

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的劳动是个别地、私自地进行着,人们的劳动产品是个别的、私人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种类各别的劳动产品,又是由具体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的,如农民生产粮食、铁匠打造铁器等。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的劳动表现为私人的、具体的劳动,而劳动产品就是私人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

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人们之间必然产生互换劳动产品这样一种社会行为,人们用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去交换别人生产的不同的劳动产品,以满足自己其他方面的消费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32页。

② 马克思的这段话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遗忘了或误解了,假如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期,好好地咀嚼一下这段话,真正建立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情况会大不一样。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对这段话又起争论,惜乎没有朝着理想的方面发展。

需要。在这种不同劳动产品的互换中,自然会出现一个交换的量的比例问题,用一种劳动产品交换另一种劳动产品,如何确定它们之间的交换量呢?不同质的东西,是不能在量上通约的,而不同的劳动产品,它们是不同的私人的具体的劳动产品,它们之间也没有质的同一性,怎么能进行交换,并在量上互相比较呢?于是,马克思发现,进入交换的劳动产品,无论它是哪一个私人的、具体的劳动产品,当它进入交换后,私人的劳动产品,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而生产的,是供给他人消费的,因此,私人劳动的产品具有了社会劳动的性质;另外,任何具体的劳动,尽管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是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表现为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劳动就具有了一般的抽象劳动的性质。

这样一来,私人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又是社会的一般的抽象的劳动;私人的具体的劳动产品同时也是社会的抽象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进入交换的劳动产品中找到了它们共同的质——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既然在不同的劳动产品中具有共同的质,那它们就可以直接在量上进行比较,实现交换了。不,现在还不行。

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产品中的这种抽象的社会劳动,不能直接表现出来,而只能通过一个中介,迂回地表现出来,这个中介就是一般等价物,它是一般社会劳动的代表,这就是货币。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的劳动产品中的抽象的社会劳动,只能通过货币来表现,而劳动产品的互换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这种交换就是商品交换。

在公有制建立以后,情况将发生变化,社会将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人们的劳动不再是个别的私人的劳动,而是集体的社会的劳动,人们劳动的产品也就是社会劳动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因此也

就没有用货币来表现的必要。这时,社会分工仍然存在,但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者的消费是这样来得到满足的: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将从社会方面领到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他凭这张证书可以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品。这种证书或凭证,不是货币,它是不流通的。因此,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没有货币,也不存在商品交换。

对于货币的酷爱与憎恶自古以来同时存在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引述了不少前贤古人对货币的厌恶之词。在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货币大都抱有否定的态度,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把金银看作贱物,只配用于制作奴隶的脚镣手铐、或粪桶溺盆;在欧文的理想社会中,他也主张用劳动券来取代货币。^① 这些思想,马克思肯定都了如指掌,但他不会让自己的理智受感情的牵引,他宁可从理论上宣判货币的死期,也绝不对货币作情感上的褒贬。

马克思论证了商品货币关系与私有制的必然联系,也推论出在公有制经济中商品货币将荡然无存;但如果在公有制经济中出现或存在商品货币,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一如马克思以往的严谨学风,他对此问题几乎无一论及,倒是恩格斯和列宁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启人思迪且影响深远的论述。

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向中国人推荐要读的马克思主义的精典作品之一。这本书是恩格斯对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影响相当大的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的理论的批判。书中,恩格斯对杜林试图在他的未来社会主义中保存货币关系作了辛辣的嘲讽,指出如

^① 从最近国内发行的一些刊物所披露的情况看,毛泽东对货币也是深恶痛绝的。

果杜林在他的公社中保留“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的货币的话,那么,就会“在个别的经济公社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① 其结果只能是公社解体,私有制复辟。

在稍后几页中,恩格斯还有一段更具普遍性(不只是针对杜林)和真理性的论述:“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其中影响公社的最有力的手段。”^②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货币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也许是革命性)作用,尤其指明货币促成了原始公社的解体。

列宁从苏联最初的“战时共产主义”中第一次尝到否定商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43页。

② 同上,第349—350页。

品货币关系的苦头(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但这并没有改变他意欲消灭商品货币的初衷,只是认为可以暂时忍一下:“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取得社会财富的证券,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遗毒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①在相隔几个月之后的“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说到:“……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货币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但是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而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②

总起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不应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并对商品货币关系持否定态度。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的论述表现出学者的儒雅;恩格斯的论战则带有学者与革命家兼有的敏锐;列宁的论说却流露出革命家坚韧不拔的执著。这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蕴含着对人类历史的深刻理解,然而,也正是这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少磨难。

①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2月,引自《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91—9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引自《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21页。

二、正与反的冲撞

天使与撒旦

无产阶级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所取得的胜利,使共产党人倍受鼓舞。请看,苏联共产党从1898年3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①到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取得全国的解放,也只化了28年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学说不敢奢望的,马克思主义却做到了。于是,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规行矩步,也就成了情理中事。

社会主义甫经建立,人们便兴冲冲地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经常强调的主题,首先被摆在社会主义的议事日程上。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实践中遭遇的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再谈,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商品货币这个魔怪是怎样捉弄人的。

把货币这个“人尽可夫的娼妇”,^②这个能引致高利贷、私有制的妖孽称之为撒旦,并不为过;同理,把社会主义消灭商品货币的企图比喻为天使,也还算恰当。这场天使与撒旦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苏联共产党的前身)虽然于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宣布了党的成立,但是,还没有共同一致的路线,还没有规定出党纲和党章,还没有一个中央统一的领导。参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27—28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② 莎士比亚语,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52页注(92)。

的斗争,孰优孰劣,谁胜谁负,让我们拭目以待。

1918年至1920年,列宁在刚建立不久的苏联推行了一系列被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其基本内容是: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在工业中加速实行普遍的国有化;实行贸易垄断,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国营企业实行供给制等。仅从商品货币关系方面而言,所谓余粮收集制,就是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留下口粮、种子外,其余都上交给国家,国家手里掌握的工业品也分配一部分给农民。这不是商品交换。另一方面,在所实行的企业供给制中,国营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动力等,工人所需要的口粮、日用品,由国家无偿地供给;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无偿地上缴国家,由国家实行统一分配。

“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曾被当作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尝试。列宁当时认为,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可以很快地取消商品货币。但是事与愿违,战时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后果之一,是破坏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同时使工业生产近于瘫痪,黑市贸易泛滥,投机倒把猖獗。可以这么说,战时共产主义使社会主义第一次尝到了否定商品货币的苦果。^①

战时共产主义使苏联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境,面对这一局面,列宁审时度势,决定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我们这里就不介绍了,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这里还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即在新经济政策中,最初规定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实物

^① 当时的情形极其险恶,用列宁自己的话说:“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引自《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61页。

交换,这种实物交换是一种特殊的不包括货币关系的商品交换。^①但这种交换一展开,很快地就突破了地区限制,并使货币交换自发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因此,苏维埃政府后来便取消了地区限制,并使商品交换、工资、税务等都逐步货币化。^②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可谓立杆见影,在短短的一两年内,便使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列宁对新经济政策并不欣赏,认为它是当时的苏联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是一种退却,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列宁把它们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商品货币关系,列宁也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贸易自由,恢复商品交换,毫无疑问会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他虽然迫于时势而承认在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货币还要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却念念不忘最终要消灭商品货币。在他的《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他甚至向往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应该在世界几个最大的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这令人想起莫尔的乌托邦中黄金马桶的故事。^③

毫不夸张地说,否定商品货币几乎使苏联这第一艘社会主义的战舰翻船。对这一说法也许会有很多的反对意见,人们会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当时能采取的唯一正确做法;战时共产主义也不能等同于消灭商品货币;怎么能说战时共产主义给苏联带来了深重的危机?怎么能说否定商品货币就会使社会主义翻船呢?我们假定,如果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会不会

① 列宁把这种实物交换称之为工农业产品的“流转”。

② 以上关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表述,主要引自李忠杰、徐耀新、魏力合著的《社会主义改革史》,第49—51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③ 以上列宁的这些观点,散见在他的《论粮食税》、《十月革命四周年》、《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论合作制》等文章中。

有更好的结局？如果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就不会产生如此深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人们会回答说：历史没有假定。是的，历史不能假定，但是，历史能够重演。

让我们再来看看天使与撒旦在中国的搏斗吧。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苏联的教训和经验，没有一开始就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在公有制中的存在，而是把商品货币保留下来，运用起来。但是，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而必然产生的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人们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都逃不过毛泽东如炬的目光，他在1957年就讲到：“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時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①看到这些，不能不令毛泽东怀想起战争年代所实行的供给制，那时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大家都没有薪水，生活待遇相差不多，然而却工作努力，打仗勇敢，并不计较个人利益。

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以赞许的语气谈到供给制，对薪金制却多有微词，并且指出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工资多、体力劳动工资少等都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主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当时，一

^① 引自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9—420页。

些地方已经搞起了人民公社,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是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随着生产的发展,将可以实行供给制,当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时,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①

既然上有中央的决议和领袖的指示,自然就有人景从风云,在实践和理论上把它们变得“声色俱厉”。《决议》发表以后,全国便卷入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全国农村基本上都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很快地推行了一些供给制的做法,最为普遍的是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有些地区甚至连衣、食、住、行、生、老、病、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声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转发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盛赞供给制的好处,批驳人们对供给制的攻击,抬出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试图达到否定物质利益原则、否定工资制的目的。毛泽东为这篇文章专门写了编者按,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同时又肯定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②自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人民日报》上辟有专栏讨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然而大势所趋,基本上是赞扬供给制的文章,强调工资制的呼声却很虚弱。

人民公社运动中搞大锅饭、供给制的做法,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一点现在可能没有多少人有疑问了。但如果说这种大锅饭、供给制的做法就是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

① 参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北戴河会议”,载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共和国轶事”,第二卷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当日的《人民日报》上并没有注明这个编者按是毛泽东写的,但据了解内幕的人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手。参见《解放文选》下册,第764页,及《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下),第69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也许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可。毛泽东在推崇供给制、贬抑工资制的同时也在大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他似乎认为,提倡供给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与强调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是并行不悖的。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战争年代所实行的供给制,并非以消灭商品货币为前提,而是与社会上普遍的商品货币关系并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深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存在商品货币,必须承认价值规律。^① 其实,斯大林关于商品货币的认识距离马恩列的思想已经是太远了,而且也缺乏科学的严密性,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这里要强调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如果要普遍实现供给制,彻底否定资产阶级法权,就必须消灭商品货币关系。^②

对以上的问题,毛泽东自己作了回答,他在1975年初发出了学习理论的指示,再度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批判。这时,他不再认为否定资产阶级法权与消灭商品货币是不相关的了,而是明确指出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等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都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必须加以限制。^③可见他对

① 毛泽东当时(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建议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读两本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本就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正是在斯大林的这本书中谈到,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

② 以陈伯达为代表的某些人当时就主张废除商品货币,并在他们起草的党的文件中故意避免使用商品、等价交换等概念。毛泽东批评了这种观点。客观地讲,陈伯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理论还是很熟悉的,他在提倡供给制、否定资产阶级法权的大气候下,主张废除商品货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

③ 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学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种理论或思想的指导下,这一次的批判似乎进行得更加有模有样,也更多了几分理论色彩,动用了全国的舆论工具,对资产阶级法权口诛笔伐。但是,也许是有鉴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否定资产阶级法权的灾难性结果,这一次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口头上,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却不敢有太大的动作,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仍因其旧,奖金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已停发,但八级工资制还在执行,城乡的集市贸易或自由市场大部分被取消,一些地方的自留地和自留畜被收归集体所有,……即使这样,还是使久不景气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两次大的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可以说是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对商品货币关系否定的历史重演,同样都给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在社会主义时期,否定商品货币关系不行,试图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更不行,这是社会主义用无数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如果人们对这一点还持疑义的话,柬埔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所执行的政策及其结局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4月17日攻占金边,标志其夺取了全国政权。在此之前,1975年2月柬埔寨共产党就已制定了取得政权后要采取的几个政策:“将原来共和政府占据的金边和各城市的居民全部撤往乡下,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以获新生。与这项政策同时提出的还有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废除私有财产制度。”^①取得政权后,他们果然执行了以上政策,把数百万城市、市镇人民赶到农村,让他们集体劳动,集体吃住,取消货币,取消集市,……结果是生灵涂炭,众叛亲离,国民经济一落千丈,物质消费极度匮乏。

① 引自王爱飞:《波尔布特》,第10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天使与撒旦的搏斗算是告一段落,每次都是以撒旦的获胜而告终,这给我们留下了深长的历史思考。

中国城乡改革的反差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犹如一个性情暴烈、不容拂逆的君主,谁胆敢对它的权威挑战,谁试图否定它的存在,便会招来即时的、暴烈的惩罚;与此相比,公有制更像一个权高位重、苦心孤诣的国王,虽不能从谏如流,却以万民为念,一心一意想把国计民生搞好。当然,任何比喻都不会十分贴切,这里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比它的商品货币学说,更具有生命力,更能持久,更具备科学性。

不带偏见地看问题,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曾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劳动者获得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当数千年的剥削制度已被推翻,劳动人民伴随着翻身喜悦而迸发出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是可以想见的。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都有一段因劳动者的冲天干劲而蓬勃发展的历史,即是明证。

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久便出现了问题,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劳动者的积极性下降,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老化,物资短缺。于是从50年代开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陆陆续续进入了改革的行列,改革的锋芒主要是对准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对公有制这块社会主义的基石,大都不敢触动。因此,所有的改革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过局部的进展,但最终都无力挽回颓势,无法使社会主义送入摆脱困境。只有中国的改革是个例外。

认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关键,可能是犯了大忌。我们暂不谈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与实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有大的差别,也把公有制改革的理

论推演暂且摆一下,先来看看两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事实。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可谓有口皆碑,从 1978 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现在,已经二十有一年,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的黄金时代,自建国以来,没有哪一个时期有如此长的持续繁荣,甚至自然灾害也不曾中断过这 20 多年的岁岁丰登。可是,在此之前的 30 年间,中国农业则几起几落,中国人民也曾饱经沧桑。

全国解放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自己的土地,社会生产迅速恢复和增长,到了 50 年代初期,农副产品的供应已经非常丰足而且价格低廉。^①从 1953 年开始,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到了 1957 年,全国的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在此期间,存在工作过急、过快、过粗的现象,遗留了一些问题。合作化的锣声还没有敲完,人民公社的鼓点便已播响。1958 年下半年,绝大部分的农村完成了合作社向人民公社的过渡,“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当时被标榜为更高层次的公有制形式,有些地区还在忙活着向全民所有制转化,有些地区却在声称向共产主义过渡了。

人民公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农作物的大幅度欠收,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这笔帐人们过去把它算在“浮夸风”、“共产风”的头上;“文革”结束后,理论界有人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认为在所有制形式上不断拔高,急于从较低的公有制向较高的公有制过渡,是导致这场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虽然使问题的认识深了一步,但仍未脱出公有制理论的固有窠臼。真正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和解决的是中国农

^① 那时两三分钱买个鸡蛋,三四毛钱称斤猪肉,自由买卖,没有计划供应的限制。以致六七十年代的人们,在食品计划供应、匮乏不丰的经年累月中,不时拿 50 年代初期的丰足食物作精神会餐。

民,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①使农业经济迅速地走出了低谷。我曾经在贵州和安徽农村分别待了几年,据当地的农民讲,当时如果不搞包产到户,要活着度过困难时期,几乎是不可能的。

到底有多少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到底持续了多久?我没有查到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如果断言包产到户挽救了农业经济,使全国走出了困难时期,便不能做到言之凿凿。虽然我倾向于这样看。但是,可以断言的是,凡是当时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迅速地扭转了农村的局面,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农副产品的供应又重新丰富起来。然而,好景不长,至迟到1966年,全国完全结束了包产到户的实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把包产到户算作刘少奇、邓小平的一大罪状,大批特批。自此以后,在农村全面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机制,评工记分,年终结算,再度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②

从1966年到1978年,农村一直走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之路,也没有全国范围的大的折腾,广播报刊中年年都在宣讲农业大丰收,但是,城里人所能感受到的只是粮食、食油、布料的最低限度的定量供应;很多地区的食肉、白糖、肥皂、豆腐等等农副产品或与农业沾边的产品也是凭票供

① 包产到户在50年代合作化运动中就曾出现过,但涉及的面不宽,影响不大,并被当即禁止了。到了60年代初期,一些地区的农民在情急无奈之下又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如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表示支持,邓子恢更是大力鼓励。毛泽东最初的态度是犹豫,后来表示反对,但又作出指示:“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这使包产到户在实际中得以延续了一段时间。参见《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下),第517—519页。

② 在此期间,有些地方还有更极端的做法,扩社并队,“一平二调”,任意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原则,甚至把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应;有些地方的票证竟然发到几十种之多;人们仿佛没有享受到丰收的任何好处。面对这种物资的普遍短缺,也有人为之辩解: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国家需要积累,进行建设;中国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中国农民再次以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回答。1978年,各地农村零星兴起的包产到户,开始碰到了一些阻力,但很快便势成燎原,并且发展为包干到户,即通常所说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到1983年初,全国实行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达到93%。实行“双包”的结果,首先就表现在粮食产量的直线上升,1984年就突破了4亿吨,比“文革”结束那一年的产量净增1.2亿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粮食产量竟有这样大幅度的增长,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并没有减少,土地也没有增加,仅仅是一个农民发明的包干到户,就让长期匮乏的中国人吃穿不愁,实在值得我们的理论家深思了。

“双包”对农业生产力的促进和引致的农村的深刻变化,已经是昭著天下,不言自明的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双包”的实行,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1985年全部寿终正寝,“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荡然无存。显然,这是所有制关系上的重大变化。依据正统的观念,“双包”被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也有人认为“双包”就是分田单干,是私有制的复辟。在此我们先不作辩论,只须要读者记住,无论正反双方,都把“双包”的出现视为所有制关系的变动。

说罢农村,再让我们来看一看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

不按精确的定义,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从50年代算起。解放以后,我国延用了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这一体制实行不久,其弊端就显现出来,突出表现是:经济的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并且主要以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地方和企业没有权利,缺乏积极性。针对这种状况,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中央和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国家权利和企业权利的关系。但是,在计划经济大的框子内,市场机理被否定,价格法则被严重扭曲,企业的权利要真正落在实处已经很难,加之随后而来的“大跃进”的主观意志和“文革”对物质利益原则的否定与批判,企业的权利更是成了一句空话。所以,终止于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或调整,主要是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上做文章。1957年以前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时期,1958年开始把中央所属大批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又把大批企业重新收归中央直接管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再次把大批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这种企业管理权限的一收一放,是为什么呢?一般性的解释是,过去中央集权,地方没有积极性,因此把权利下放给地方;当地方有权以后,却又有本位主义,大上项目,乱铺摊子,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于是中央又把权利收上去,但地方又没了积极性,中央也难以把全国的企业管理好,又使经济陷入僵局,只得再次将权利下放。这就是经济理论界所说的“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这种收收放放,便成了过去经济体制改革的怪圈。

现在意义上的改革是从1978年起算,经过最初几年的酝酿、探索、试验和实践,认为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时机已经成熟。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城市体改全面推开的标志。《决定》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此以后,国企改革就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

场。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脉,是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搞活国有企业,让它成为充当活力、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确实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国企改革从最初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随后相继而起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股份制等等,并没有给国企带来真正的活力;与之相伴随的反而是国有企业消费基金失控,国有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国有企业行为短期化,国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国有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增加,国有企业职工大量待岗下岗……各种问题纷至沓来,国企改革日见其蹙。人们不禁要问,国企还能撑持多久。

当我们将农村改革和国企改革择其大要地扫描一番,再把农村改革和国企改革两相比较,其反差实在有天渊之别。农村的承包制在一两年之内就立见成效,国企的改革(包括承包制)在十几年的实践中则深陷泥潭;农村改革好比“不尽长江滚滚来”,浩浩荡荡,一浪高过一浪,国企改革宛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万木凋零,一片萧瑟景象。

农村改革和城市国企改革的强烈反差,人们可能会有多种的解释,但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经营权是否真正落实到劳动者个人手中。农村改革在肯定的方面做到了这一点,国企改革的做法却是否定意义的。

无可奈何花落去

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国企改革的艰难是因为过去长期在计划管理体制下生存,现在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其实不然,国企缺乏活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使是长

期在市场经济中滚打的国企,也不能摆脱效率低下、亏损累累的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自称为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都兴办了一些国有企业。这些国企在市场经济的怀抱中长大,并在内部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随着这些国企的发展,弊端也不断涌现,总的情况是,国企经济效益不高,缺乏活力,负债率上升,亏损严重。进入80年代,这些国家都急于把国有企业拍卖、转让或出租给私人经营,以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从而形成一股席卷世界的私有化浪潮。^①

或许人们会说,资本主义的国企不能与社会主义的国企相提并论,那么,再让我们看看正宗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国企与经济体制改革。

从50年代初赫鲁晓夫执掌苏联政权到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最终把共产党政权化为云烟,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停时续,从未放弃过改革现有经济体制的探求与实践。综观苏联几十年的改革历程,作一个非常粗略的划分,可以归纳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在宏观方面,改革主要着力于经济管理体制和计划体制上。在管理体制上,时而从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体制到以地方的经济行政区为主的横向管理体制,然后又回到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时而从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转为以工业联合公司为基本环节的两级或三级管理体制,再到组建跨部门综合体的新的管理机构——总是在“条条”和“块块”上下功夫。既想排除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所带来的部门

^① 近来也有人在谈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还是有活力的,但是从普遍的情况来看,恐怕只是个别的,不具有代表性。其实,自古迄今,国营或官营的经济实体都难得有好效率,汉武帝曾经极力褒赞的雷锋式人物卜式,也因为看到官营盐铁业所导致的产品低劣、价格昂贵的弊端,而遭到汉武帝的冷落。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十》。

分割、各自为政、机构重叠管理僵化、地方没有积极性等弊端，又想避免地方分权以后所导致的地方本位主义、重复建设、国民经济失衡、国家对经济调节作用的削弱等等恶果。在计划体制上，从最初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的计划指标改进为只集中于长远目标、总的速度和比例、总体经济战略的宏观经济计划；从主观意志、行政命令加经验主义的计划方法发展到采用经济数学和计算技术的科学的精确计划；——无不透出对传统计划体制中所产生的计划不切实际、难于完成、长期短缺、经济失衡的无奈与挣扎。

在微观方面，改革主要表现为以物质利益原则来刺激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于企业，一则在权力上以“挤牙膏”的形式，逐步释放给企业在产、供、销、人、财、物等方面的有限权力，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一则在利益驱动上以利润提成和生产基金付费，以净产值指标和稳定的利润定额提成，以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和资金自筹等方式，不断挤压企业日渐枯竭的积极性。对于劳动者，从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并重到提倡同工同酬、实行计件工资加奖励、发明五花八门的工作法、翻新各种劳动工资制度等，在不同的时期都在为刺激劳动者的劳动热情而殚精竭虑。

应该承认，每一次改革都或多或少地推动着苏联经济这一庞然大物前行，尤其是在改革初期有时还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的改革总是磨蹭在管理权限的调整和计划方式的改换上，从未放弃过行政手段的操纵作用；对企业和劳动者这一社会经济的基本细胞也只单调地用物质刺激这一手段来激活，不能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落实在劳动者个人手中。以上改革途径的选择，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对商品货币关系持否定或保留的态度，在计划经济中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所有制形式上崇尚“大”与“公”。因此，苏联经

济在宏观上没有市场调节这一自动平衡功能,在微观上没有劳动者个人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内在动力。所以,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如推巨石上山,越到后面,越难以进展,而且稍稍不慎,巨石便会滚落山底。

诚然,在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政权的后期,曾经允许部分个体劳动的存在(但不允许雇工),想让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农村也试图推行生产队、作业组和家庭承包。但是,我们姑且不谈这种有限度的个体经济在汪洋大海的公有制经济中能起多少作用,也不论使国企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是否让所有权和经营权落到了实处;仅以农业的情况来看,当时国营农场已占农业用地和农业产值的一半以上,而集体农庄也几乎成了半国有经济,除了各种经济指标由国家下达外,集体农庄庄员也成了每月拿工资的“旱涝保收”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这种前提下,要想在农业推行各种承包制,难度就大得多。^① 当经济体制改革尚未使苏联经济得以根本好转时,戈尔巴乔夫又急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现公开性和民主化,意欲以此来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殊不知现代民主是以商品经济和私有制为基础的,^② 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点缀和装饰,而是彼此对立的私有者用于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只要苏联老百姓所获得的民主权利不能用来从正确的途径中实现自身的利益时(因为僵化的经济体制限制了这一点),这种自私的民主权利必然以其狂野的力量寻求各种可能的宣泄口,从而酿成社会动乱。可以这么说,

① 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在农村最穷的地方搞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可谓穷则思变。在苏联不管城市和农村,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大锅饭”现象要普遍得多,这无疑会阻滞改革的进展。

②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近代西方民主的勃兴”。

苏联的解体,正是因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劳而无功、国企改革“瞎子摸象”的时候,过早地启动了民主政治这个闸阀,以致社会主义被冲得落花流水。

至于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或者囿于苏联的传统体制,或者慑于苏联的直接干涉,或者由于苏联的间接影响,虽然在改革的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作中各有招数,但总的都没有脱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之轂;尤其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经济、所有制关系上畏首畏尾,没有实现根本性的突破,因此其改革的实效和苏联相差不多。只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分别在商品货币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上有新的突破,下面就这两个方面略谈几句。

匈牙利的改革在苏东国家中一枝独秀,算是搞得最成功的,曾被誉之为“计划经济的神童”,意思是匈牙利国家虽小(在苏东集团中是最小的),改革起步较晚,却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出类拔萃,取得骄人的成绩。

在预先作了充分的准备和精心的策划之后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于1968年全面展开,随着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和修适,它更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观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试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调和起来,这一点是它有别于其他苏东国家改革的主要方面,也是它能在改革中取得较好成绩的根本原因。

早在50年代,匈牙利的经济学家就已经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传统观念,认识到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匈牙利在改革中把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管理体制,认为市场与计划并非不相容,而是具有一致性和互补性。虽然他们强调匈牙利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在处

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辅”的意味,但在高度集权、行政管理的体制中,这已算很大的进步了。

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还被运用于价格制度的改革和处理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中。在保证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政府逐步放开价格,并让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逐渐趋同,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在处理国家与企业 and 职工的利益关系时,强调以物质利益原则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把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企业的利益直接挂钩,在企业内部则实行灵活的按劳分配制度。

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肯定和运用,给匈牙利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国民经济得以稳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有一定的提高,社会商品供给增加,市场呈现繁荣景象,人民生活水平得以迅速改善,……这些成绩在经互会成员国改革普遍疲滞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光彩夺目。

但是,如同所有经互会国家的改革一样,匈牙利在所有制问题上仍然固守成规。尽管匈牙利也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并存的必要性,并在改革中扶植个体经济的发展,但仍念念不忘传统公有制形式要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总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打转转,不敢在公有制形式上越雷池一步。于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国有企业的弊端愈显突出:消费基金膨胀,产品更新换代迟缓,技术革新和设备改造停步不前,“大锅饭”现象难以消除,经济效益下降。当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大的比例时,国企的弊端将会表现为全国性的症状:经济增长减慢、亏损企业增加、通货膨胀、财政负担加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南斯拉夫的改革起步最早,而且一开始便不同凡响,提出了工人自治的思想。作为工人自治的经济基础,南斯拉夫人

突破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国家所有制的固有模式,创造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这一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集体、集团和个人,而是属于全社会,属于所有劳动者。南斯拉夫人认为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社会所有制才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所有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官僚主义,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管理,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统一。

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工人自治表现为:在企业内部,工人委员会成了企业的权力机构,它有权决定干部的任免;有权向社会公开招聘企业的经理或厂长,并使他接受工人委员会的监督;有权批准企业的计划决算;有权决定属于企业部分的分配方式等等——总之,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由劳动者决定,劳动者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这种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全体、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的公有制形式,在实行的初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吸引了社会主义各国的目光,使众多的社会主义者心向往之。

但是,从南斯拉夫自治制度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社会所有制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直接落实到**每一个劳动者**。于是,在南斯拉夫的自治道路上,一直有三个问题困扰着南斯拉夫的改革者们。第一,消费基金失控,消费增长快于生产率的增长。企业作为基本的自治体,或者提高产品的价格,或者挤占流动资金,或者亏损挂账,或者减压上交国家的税费,或者挪借折旧费以作消费开支,……想方设法地以各种手段增加职工的收入和福利费用。第二,投资效益低下。在国家控制投资基金的前提下,各地区、各部门竞相向国家要资金,上项目,以致重复建设,基建战线太长,浪费严重;在已建的企业内部、自治团体并不关心设

备更新和技术进步,而是习用竭泽而渔的方式,侵蚀和剥离企业资产。第三,联邦中各共和国、自治省的地方本位主义不断加强,“经济民族主义”得以发展。作为自治实体的扩大化,地方自治力量必然寻求自身本土利益的实现,各共和国、自治省都力图搞自己的经济体系,自行其事,保守排外,地区分割异常严重。

为什么把以上这些问题归咎于社会所有制呢?我们知道,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必然产生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之间作为私有者的普遍对立。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只有在生产资料是财富的源泉时才有意义。当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劳动者个人,也不属于任何私有者时,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只会是掠夺性的,而不会关心生产资料的发展、转型和增殖;当人们可以不通过艰辛劳作而获取收益时,甚至连掠夺性的生产也不屑为之。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工人自治,使劳动者有了使用不属于任何个人的生产资料的机会,也使劳动者有了自由决定分配的权利,因此,劳动者就难以做到对生产资料的珍惜和爱护,却容易以各种手段获取尽可能多的个人收入。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苏联东欧的解体,将会成为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永久的话题;在可能会有的无数的因果系统中,我想,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如人意,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遍览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改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让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实在在掌握在劳动者个人手中,是成功的关键。这三者紧密联系,实际上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关系。对于前两者——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视、市场机制的运用,现在可能没有多少异议了;对于第三者,一定还有人啧有烦言。然而,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

如果不闯过所有制这一关,就不会有坦途。苏联东欧的改革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的发展是正面的证明。也许有人马上会反唇相讥:苏联东欧解体后,普遍推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不同样搞得一团糟吗?且不说俄罗斯的“休克式疗法”^①必然会产生巨大的震荡,即使和缓地从一种体制转到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体制,也会有一段调适期。东欧私有化后现在已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俄罗斯虽经“休克式疗法”而元气大伤,但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不会是太遥远的事。

三、天堂的呼唤

徘徊于地狱与天堂

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任何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抛弃或否定,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在相反的方向上,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崇尚与运用,又会使革命意志衰退,产生贫富对立和两极分化。在两个极端之间,尽管我们还可以排出一些较为温和的层次,然而这并不能逃离在商品货币关系上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人们在商品货币关系上的犹犹豫豫和吞吞吐吐,还有这样一个附带的原因,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已反复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存在商品货币关系。鉴于以上的原因,商品货币关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主义的理论界争论了几十年,而且还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

^① 在西方一些经济专家的极力怂恿下,1991年10月28日俄罗斯通过了经济改革纲领,其中心内容就是立即推行全面的私有化,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实行完全的市场竞争。这个纲领被称之为“休克疗法”,意指其过猛过快。

也就不足为怪了。

既然马恩列都明确谈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应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然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又证明不运用商品货币关系不行,这可让斯大林犯难了,如何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斯大林玩了一个脑筋,他既不引证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商品货币关系必然会导致私有制的论述,更把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关系是以私人劳动为前提的话置诸脑后,仅只引用了恩格斯的这么一段话:“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并且认为,恩格斯这段话指的是,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之后,才能消除商品货币。

在对马、恩、列的论述作了以上的技术处理后,斯大林指出,在苏联现阶段,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生产资料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全民所有,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城市国营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农村的集体农庄)的产品交换,只有通过商品货币的形式,集体农庄才愿意接受,其他的交换方式都不行。所以,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并存,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①

在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论述中,他只说到商品货币关系是集体农庄唯一能够接受的交换方式,但为什么这种交换方式只能是商品交换关系而不能是其他,却缺乏深入的科学论证。另外,斯大林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学说出发,全面地理解和探讨这一学说的科学性

^① 斯大林的这一论说,后来被理论界称之为“两所有制决定论”,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尤深。关于他的这一论点,集中表现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请参见其中一节:“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和局限性,而是对这一学说作了实用主义的片面利用,甚至是阉割。这些理论上的不彻底,至少在两个方面给社会主义的实践带来消极的影响。

一个方面是,既然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决定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的存在,那么这种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只局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范围;而在国营企业之间,在生产资料的范围内,却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把生产资料看作商品,至于生产资料的流动,也被视为调拨而非交换。这就把商品货币关系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阻碍了商品货币关系积极作用的发挥,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学说缺乏全面的认识,对这一学说中的科学论断没作辩证的思考,故而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与私有制、剥削、两极分化是绝缘的,可以大胆使用。这种思想从长期看更具有危险性,尤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如果只看到商品货币关系不得不发展的一面,而忽略它具有分裂性的破坏性的另一面,同样会给社会主义带来本质上的危害。

客观地说,斯大林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否定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氛围中,给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学说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点,让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发展。在 50 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理论界一般都遵循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但是,斯大林的“两所有制决定论”很快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于是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持续 30 年之久的激烈争论。

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头戏。自1957年以后,中国理论界就有人对斯大林的“两所有制决定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如果不把国营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看作商品交换,不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而是看作由国家统一支配的产品,可以无偿调拨,那么,国营企业的物质利益就不能和它的实际贡献挂钩,国企的物质利益便不会得到正常的实现,国企的生产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为此,人们便提出,国企各自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要进行经济核算,这才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试图以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立论。与此同时,也有人更深入一步,从按劳分配,从劳动力个人所有,从个人之间物质利益的差别等方面来说明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以上这些观点,开始只是少数人提出,到了1977年以后,已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仍坚持斯大林“两所有制决定论”的人成了少数。

但是,商品货币关系的渗透性不只局限于按劳分配和企业的物质利益方面,它是涵盖全社会的。人们逐渐发现,商品货币这个魔怪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充塞于宇宙天地之间,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要运用价值规律,要承认商品货币关系”这种有限制的提法,发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呼声,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在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另一种不同的声音,或者坚持“两所有制决定论”,认为国企之间的产品调拨不是商品交换;或者认为商品交换是旧社会的残余,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或者肯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不能提社会主

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这些相反的意见中，我们再次发现这一耐人寻味的矛盾现象：一部分人看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对之持完全褒赞的态度；另一部分人则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所引致的社会对立和两极分化忧心忡忡，主张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是个一般前提，从未发生过商品货币关系应不应该存在的争论，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坚定了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与否，成了重大的争论问题，并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导致剧烈的摇摆和经济动荡，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倘若我们辩证地来看待这一问题，商品货币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限制的发展，同样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和经济矛盾；而社会主义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右褒贬，是否能使我们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化，从而找出一条左右逢源的中正之路呢？

中国理论界有一个作法，在肯定商品货币关系的时候，把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推在“四人帮”的身上，以便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论大张挞伐。其实，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并不是“四人帮”的发现，马、恩、列早有论述，而且其中不乏真理的闪光；问题只是在于，马、恩、列主要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待商品货币关系，对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作用强调不够，便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留下了遗憾。但如果我们走向另一极端，只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意义，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消极影响视而不见，可能会给社会主义留下更大的遗憾。

在1984年，中国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至今日，又在声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之音仿佛已消声匿迹，人们也不再为社会主义到底还要不要商品货币争论了。但是，商品货币关系这

个撒旦就这样轻易放过了我们吗？不，它只是换了一个面目，又开始在所有制关系上作弄人了。

公与私的较量

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是否应该存在的争论似乎偃旗息鼓了，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与“私”的较量又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文革”以前，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不容置喙的禁苑，理论家们除了颂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优越性，没有其他的事可做。当然，人们可以把颂歌唱得更响亮些，可以论证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可以昧着良心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做都是很保险的，且不顾一大二公能不能填饱人民的肚皮，公有制的无限拔高是否真能把社会主义送入天堂；至于公有制的僵化形式引致的重重弊端，反而成了人们不敢问津的事。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开始解禁，理论家们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讨论所有制问题了。最具有说服力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学说，据此可以论证生产力水平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直接关系：生产力水平高，属于社会化大生产或集约化经营，与之相适应的将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生产力水平次高或较低，可分别采用集体所有制或个体所有制。以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来说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更重要的在于破除了越大越公越好的形而上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多种所有制形式并举，在理论上站住了脚，在实践中更扎下了根。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有制形式争奇斗妍，竞放异彩，简直使中国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博览会，恐怕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期同时并存如些繁多的所

有制形式。单只在中国农村繁花似锦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具有多种形式；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人们一般把它归之为集体经济，但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它却是五花八门的；此外，个体经营、三资企业、私营经济、股份制、合作制……真是应有尽有。这些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取得惊人的成绩，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支柱。

在以上所说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中，我没有列入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有意要作的区分。在这些排除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所有制形式中，我们作一抽象，就不难发现，这些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所有制形式，有一个共同点，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经营权直接归属于个人。这种个人有些是劳动者，有些是小老板，有些是食利者，有些是资本家，但总而言之，产权关系是明晰的，是归属于个人的。

反观传统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曾经一统的公有制天下，可能只剩下半壁江山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此。最让政治家们忧心如焚的是，尽管国家和政府倾其全力要搞活国有企业，然而十多年的国企改革历程，路似乎越走越窄，回旋的余地也越来越小。亏损—负债—倒闭成了不少国企改革的三部曲，国企宛如嗷嗷待哺的婴儿，只等待国家财政这个奶娘来喂养。

近一段时期，国企资产的流失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并且认为国资的流失是和国企改革陷入困境大有关联的。诚然，国资的流失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或者因承包人竭泽渔而產生的国资流失，或者是主管部门领导乱拍板而导致的国资流失，或者急于把国企低价拍卖造成的国资流失，或者与外商合资合作中的国资流失，……但是，只要简单地分析一下，与其说国资的流失与国企改革陷入困境有因果关系，毋宁说这两者都是同一个根本问题不同侧面的反映。这个根本问题

就是：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泛化，或未曾落实到个人。

在人们惊呼国资流失的时候，已经有人在注意另一更为普遍更为有害的现实，即国资的消失。^① 国资的流失我们还可以把它推到承包人、私营业主、外商等钻营觅利之辈身上，国资的消失却是另一回事了：企业负债经营，带亏运转，使亏损愈益严重；企业设备大量闲置，固定资产不能更新，经年累月固定资产形同废铁；产品滞销，库存如山，最终只能折价销售或长期积压，价值尽失；国企职工为维持生活，变卖资产，举债度日，坐吃山空。在这些现象中，并没有不法分子操纵其间，乘机牟利；也不是精明狡诈之徒因时俯仰，合法赚钱；但是，国有资产却实实在在地不见了，消失了。这从反面证明，国资的流失乃至消失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它们都只是现象。

归根结底，传统公有制企业的症结所在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有权缺位”、“所有权淡化”、“所有权虚位”，这些不同的称谓都是指向这样一个根本：传统公有制的所有权没有实现个体化。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理论界是越来越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突飞猛进和国企改革的彳亍而行，也让政治家们作出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战略选择；但是，要理直气壮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大刀阔斧地推进公有制改革，仍然还是疑云重重。改革开放以来，是“公”是“私”、姓“社”姓“资”的争论即是一例，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平息。

正方说，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其境况越来越差，这能称为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是要逐渐消灭阶

^① 凌志军在他的新著中直接提出：“流失”与“消失”，哪个更坏？其结论是“消失”更坏。见凌志军：《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第438—440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级,消灭剥削,消除贫富对立,消除两极分化。现在剥削出现了,贫富对立加剧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之路吗?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鼓吹市场竞争,无限制地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以致国民经济失调,国有企业举步维艰,国企职工大量待岗下岗,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这样的吗?社会主义是要造就一代有理想、有觉悟、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沉渣泛起,党内腐败成了官僚主义的替换语,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丧失殆尽,“黄、白、黑”现象流毒全国,何谈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反方会说,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前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日愈加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改革开放后扭转了这一局面,社会生产力得以迅猛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加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改革前社会主义长期不能甩掉贫穷的帽子,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物质供应长期短缺,贫穷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商品丰富,供给充足,脱贫人数日益增加。社会主义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①改革前思想禁锢,言路闭塞,阶级斗争天天讲,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社会主义的自由人在哪里呢?改革开放以后提倡思想解放,政治相对宽松,文化意识领域百花初绽,确是解放以来少有的。

双方唇枪舌剑,各有千秋。正方所列举的改革开放后出

^①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可以说与非公有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所产生的负效应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反方力据的改革现实,也是举世瞩目,有口皆碑,尤其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方面,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是,双方的争论又各有盲区,择其要点而言,正方无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愿也不能说明传统公有制中的种种弊端,更遑论解决这种种弊端的有效途径的提出,而是用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来硬套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反方却竭力回避非公有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与各种社会阴暗面的直接联系,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传统公有制理论与现实所有制形式的冲突。^①

“公”与“私”、“社”与“资”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看来争论的焦点将集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容与形式,而且问题必须这样提出:倘不能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进行彻底清理,倘不能对现存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合理内核作出科学的论断,这场争论是难以平息的。不过,所有制只是文明的流亚,真正的元凶是商品货币关系,也许人们还不习惯这样看问题,而这正是本书极力强调的。

几点启示

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起算,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历尽艰辛的社会主义运动,为人

^① 以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明多种所有制并存,虽能说明一些问题,却有极大的局限性。它既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什么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仍能长期存在并且充满活力;也不能解释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传统公有制为什么弊端丛生,回天乏力。按照传统的所有制理论,社会化大生产应该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坟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建立,并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展现的基础。

类留下了从未有过的辉煌。细数人类的文明进程,没有哪一个社会形态是在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孕生,并在众多信徒的努力下成形。马克思主义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亿万人民的生活,使他们朝着摆脱剥削自身解放的道路上迅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荣耀。但是,这也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哀:人们把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而导致的失败,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把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的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归咎为马克思主义的失灵;甚至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个论点去反对它的另一个论点,试图用这种“语录打架”的形式去解答纷纭多变的现实世界。列宁曾经把那些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不肖子孙,是十分恰当的。

然而,“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的、教条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在是太难了。

人们振振有词地说,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生命力。道理是不错。但是,回顾社会主义的风风雨雨,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发展,几乎都经历了艰难的过程,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就以中国为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曾使中国共产党人奋起仿效城市起义,中国革命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最后由毛泽东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让中国人经历了十年内乱的腥风血雨后,才体会到可以用另一种形式处理阶级矛盾;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论述,把中国人两次投入穷过渡的苦海,然后才理解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在这个僵化的框子中挣扎了30年,才开始悟出市场经济的妙用;

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铁律,即使在国有经济四面楚歌之际,也不敢轻易提出否定。难道只有经历长期的磨难,只有遭受重大的损失后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难道就没有人能较早地提出问题、较好地解决问题?^①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似乎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有最高领导人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不用说了,斯大林可以算一个,毛泽东是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邓小平也能够跻身其列。但如果是其他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不被加上修正主义的罪名就算幸运的了,根本不敢奢望获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殊荣。当然,人们也许会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仅是个人思想的产物,只因毛泽东或邓小平在其中特别突出,因此冠之以他们的姓名。诚然,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是,倘若毛泽东没有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倘若邓小平不是实际上掌握了最高领导权,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恐怕就要换一个冠词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用哪一个伟人的名字来命名某一种思想或理论,而是在于只要某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一旦形成,与之相反的即便是具有真理的思想也不能行于世,除非到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生命或自然生命的结束。苏联建设时期布哈林的某些思想是正确的,却被斯大林压到低层;“文革”以前,刘少奇、邓小平的某些思想更具有代表性和真理性,然而还是被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斥之为修正主义。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事业就变成了少数人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有个别最高领导人才问津。这种状况能够有利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

^① 这样的人是有的,就拿马寅初的人口论来说,在 50 年代提出就具有先见之明,然而只因马克思批判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便被打入冷宫,以致中国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以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

大发展吗？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存在一个不彻底的危害。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敬若神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某些带有局限性的甚至错误的观点,人们不敢直指其非,充其量只能采取隐喻式的、嗫嗫嚅嚅的态度来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并尽量把新观点装在马克思主义的老框子中。即使在革命和建设最危难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无疑会使社会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典型的例证是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学说。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已经发现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主义来说是致命性的,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清理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学说,只能以委婉的方式在新经济政策中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并把这说成是暂时的退却。苏联社会主义时期保留下来的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也只能以“两所有制决定论”这样的曲笔来加以论证,而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彻底清除商品货币关系上的迷雾。从极端的形式上看,中国两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说与这种不彻底性无关,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彻底否定,更是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学说的直接演示,这些都产生了毁灭性的灾难。从一般的情况来看,这种对商品货币学说欲言又止的暧昧态度使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敢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把社会主义自茧于计划经济的丝网中。

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人不算少。但在马克思主义难于发展的大氛围下,人们的这种关心,在中国展现出一种特殊景观。一部分人出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心,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都有所突破,并且解决了现实的社会问题,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这一部分人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为了适应大的社会氛围,一般都不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交锋,而是自说自

做。另一部分人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战,对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违拗的所作所为大兴问罪之师,却不管这些所作所为是否解决了现实问题。这同样也是一种关心,同样也受大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于是,这两部分人的对立就不可避免。前一部分人不愿与后一部分人就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作理论上的辩难,却简单地把后一部分人指斥为教条主义或“左”倾余孽;后一部分人并不理会前一部分人所取得的改革成就,却只挑拣现实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学说中不相吻合的方面而大张挞伐,武断地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右倾。这样你一个左的帽子我一个右的帽子互相冠戴,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并无助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许已经厌倦了这种论争,挂起了“不争论”的免战牌,以期用改革的事实教育大家。平心而论,不管左也好,右也好,绝大部分人对中国、对社会主义都有一颗拳拳之心,就拿建国以来所谓各种左的右的斗争来看,真正居心叵测、胸怀险诈的又有几人?大多皆是忠义之辈。倘若双方不拘泥成见,不囿于定规,不互戴帽子,不乱打棍子,实实在在地去探讨问题,去解决问题,则国家幸矣,民族幸矣。

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学说,但不是静止的终结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对前人的思想的继承和扬弃,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后人的继承和扬弃。如果以为躺在马克思主义这本大书上睡觉、咀嚼、内耗,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继承马克思主义,就能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那将大错特错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谈到,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的喜悦。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只终止于马克思的话,那么马克思能高兴起来吗?

“大跃进”时期,人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通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个天

堂。现在看来,这成了一个笑谈,但在当时,不少人笃信这一点。人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天堂的感召力就在于此。当我们回顾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都是成功的记录;苏联东欧的冰释瓦解,遂使资本主义兴奋地为社会主义准备“最后的晚餐”。但是,耶稣死后就要复活,升入天堂;社会主义在历尽劫难之后,也必将再次振兴。倘使亿万民众大力襄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天堂还会远吗?

第七章 新世纪的钟声

以上各章我们对文明的一些主要表征作了简扼的透视,试图给人们留下这样的深刻印象: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原动力。这二者皆起源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

由此而决定的人类文明诸景观中,最让人感奋的是财富的喷涌,永不枯竭,而且有从涓涓细流变为浩荡江河之势;最令人沮丧的是人们的贪欲,永无厌足,并且往往激起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忌妒、仇恨、奴役与杀戮。于是,在人类文明这个舞台上,同时上演着两出戏,一出是悲剧,一出是喜剧;同时存在着两个主角,一个在行善,一个在作恶。人类沐化在文明的升腾景象中,同时背负着历史翅膀的沉重;在前瞻文明未来的宏伟架构时,凭吊着社会伦理道德的沦落。

文明历史的矛盾状态,激发了无数先哲伟人的雄心壮志,救人民于倒悬,脱大众于苦厄,建立一和谐美好的社会,成了他们矢志不移的终生追求。然而,人们在追求善时,却不能禁绝恶。甚至还有更令人尴尬的局面,当人们似乎已经走入善的乐园,却发现误入了恶的城堡;当人们仿佛远离了撒旦的国度,却迟迟不能进入天使的殿堂。

善与恶这两个幽灵,形影不离地依伴着人类。让我们来摸摸恶的底细,看看善的面目,是否能把二者化合分解,塑造

出一个新的魂灵。

一、文明的原动力

“人为财死”的精义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俚俗之语，至多只能算中性词，也许还带有贬损之意。然而它千百年来，传诵至今，足以映证它的生命力，比起许多精深的理论来，它除了朗朗上口、简扼易记，似乎还具备隽永深刻的含义。

让我们首先重温一下第一章曾谈及的部分内容。商品交换出现后，就个人而言，人们的消费需求辐射向全社会，一切社会分工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切进入交换领域的商品，都可能成为人们的需求对象，这个产品链或商品链是无限延伸的，它为人们的消费需求提供了无限扩张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个人的生产能力终究有限，他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技术能力、分工定位诸多条件的制约下，只能生产数量有限、品种单一的产品或商品。这点有限的生产产品，在进入交换后，只能换回有限的消费物品，这样一来，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可能向往的消费需求之间就存在一个较大的距离，我把它称之为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

面对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我们作一个单向度的分析，把人们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规约在辛勤劳动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人们为了使个人的消费不断得以扩大和满足，完全以个人的勤奋工作来实现这一点，那会是什么景象呢？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竭尽全力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增加产出，创造社会财富，在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个人生活不断地得到提高。这全

然是一幅社会主义的美好景象,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能欣然接受,即使我们首要强调把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劳动绩效直接挂起钩来,而不是空谈什么“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分配原则,也会如此。

司马迁可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头脑,他只是以史家的梗直之笔,为我们作了纪实报道。他写到,自从虞夏以来,人们都在追求享受,耽于安乐的生活,吃喝玩乐,极尽其欲,相互之间还竞相攀比;这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时尚。^①在这种大趋势下,无论以任何动听的理论,企图说服人们返朴归真,清心寡欲,去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最终还是不能劝化大家。对此,司马迁认为,统治者最好的办法是因应这一历史潮流,不要去干涉它;其次是因势利导,使之朝着有利于统治的方向发展;再其次是以礼义来教育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再再其次是用法令法规加以限制;最糟糕的是统治者与老百姓对抗,禁止人们追求享受。^②

司马迁进一步指出,追逐财富,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欲求,所以,“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城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

① 这里的虞指有虞氏,夏指夏后氏。有虞氏舜是中国史称中“五帝”的末一位,夏后氏禹紧接其后,开启了中国夏朝。近代史家把夏视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即我们所说的文明时代的开始,也就是商品交换出现的时期。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明确提到,虞夏时期已经有了货币。结合这里所说的人们对消费需求的不知厌足,亦可证明商品交换出现以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是一历史趋势。

②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西方经济学如果要找自由主义学派的始祖,恐怕非司马迁莫属。

馥鸣琴，揄长袂，蹶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荣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糒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①短短数百字，写尽了人间逐利百态，真可算得上“人为财死”的精典注解了。

司马迁虽然描绘了各色人等追逐物质财富的各种表现，但他肯定地认为只有农业、手工业、商业、自然资源的开发才是社会财富的本原，是国家富强、人民殷足的根本。因此，应该让人们各尽其能，各竭其力，以满足自己各方面的消费需求。只要人们安居乐业，不需要行政命令，也不需要政治动员，人们自会日夜不辍，勤劳敬业，社会财富将会最大限度地涌流出来，这就有如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不就是我们所要遵循的经济规律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奔波忙碌，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王公贵族尚且如此，何况一般的老百姓呢？

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就能发出这样精妙的论述，真令人拍案叫绝。

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驱策每一个人各尽其能，集成了无以伦比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这是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类的最大惠赐。如果人们的各种努力，如上文所述，规约在个人辛勤劳动的范围内，那对社会全体而言将是最惬意的。然而，现实社会提供了各种诱惑，使人们可以不经过辛勤

^① 此处引文及上下文中关于司马迁的论述，虽然作了一些引申，均可见于司马迁《史记·货殖传》。

劳动,而能获取财富,人们为此趋之若鹜,即使作奸犯科、违法乱禁亦在所不顾。这就构成通常所说的社会阴暗面。显而易见,商品货币关系所激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散射四面八方,人们极尽机巧、勤劳、吝啬、奸诈、凶悍、勇猛、智谋、卑鄙、残忍……无不为了谋求尽可能大的个人利益,人类因此也置身于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之中。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尽管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方式与手段千变万化,尽管对人们逐利行为的合法与非法的界定会有歧异,但是,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都会对五花八门的逐利行为作出明确的划分,哪一些逐利行为是社会允许的,是值得支持和赞助的;哪一些逐利行为是对社会有害的,必须予以打击和禁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当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对人们的逐利行为进行正确的划分,并能通过政策实施和制度建设使之朝着最有利于社会全体的方向发展。或者不如说,这只是一个理想模式,而在实际中只是或多或少接近这一理想。

人们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革命性作用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这个过程很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人们对商品货币关系所引发的社会罪恶的认识却是即时的,从一开始就感受到有一个世界之王——货币在向人类作威作福,人类的精英们一直在谋求如何脱却它的控制。所以,在文明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内,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总是对商品货币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但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繁荣与进步,最终将系之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系之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系之于把这种无限追求规范在正确的途径中。人类对以上这些关系理解得越深,运用得越好,文明的成就就越大,反之亦然。

特别要强调指出,在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普及的现代社会

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是不能任意限制和否定的;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同样是不能限制和否定的。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其结果只会是商品货币关系和人们的逐利心态的恶性发展。^① 不能因为商品货币关系引致的诸多社会不公而置商品货币关系于死地,同样也不能因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而对它的负面影响置若罔闻。关键在于,如何把人们强烈的逐利动机导入正确的轨道,使之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同时,堵塞一切危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谋利渠道,迫使敢于犯禁者得不偿失。^②

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在正确的导向下,推动着文明历史的进步,这就是“人为财死”的精义。当然,“人为财死”这把尺子,不能量尽天下英雄。“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的辛弃疾,恐怕不会为财物所困扰;“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汉高祖,决不会因财物而挂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更是以天下为己任,不以财物为念;……人类历史上如此这般的人物屡有发见。但是,无论是学者、思想家,还是政治家,如果以他们的高蹈绝行、雄才伟略去要求一般老百姓仿而效之,则是万万不能、万万不可的。芸芸众生大多只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鲜有心怀高远而身体力行者。有一句老歌词“大河有水小河满”,曾经被人们用来譬喻“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理想追求,可惜这既违背自然规律,也违背社会规律。从自然规律上讲,是小

① “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物质刺激,否定个人致富,人们一切正常实现个人利益的途径都已堵死,只能通过开后门、行贿赂、偷拿公共财物等恶性方式来谋求个人利益。

② 这种理论上的泛泛而论是容易做到的,在实际的操作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往往互相缠绕,彼此对立,难以形成一个公正的判别标准。不过,人类文明社会一直都在制定一打破一重建这种判别标准。

河有水大河才会满;从社会规律上讲,只有以个人利益的实现来激励每一个人努力工作,才能使国家富强。

辩证法的自白

商品交换的出现与发展,引致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直观地单方面地看,这个方面对人类文明的进展似乎只有利而无弊,当人们努力劳作去谋求更大的福利时,人类社会将日臻进步和富强。

商品货币关系不仅激发人们逐利的无限冲动,从一开始还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换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从互利互惠的角度而言,也可视作平等的和有利的;即使双方都从个人利益出发,斤斤计较而彼此对立,仍能在对立中达成一致,实现同一,使矛盾得以解决。可是,商品交换关系中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并非只局限于对等和互利的范围内,在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与野蛮未驯的原始冲动的结合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早就溢出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平庸,^①而具有了狂野、勇武、残暴、险诈等多种面目。

人们以暴力掠夺他人的财产,使对立具有激烈对抗的形式;人们通过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迫使他人作为其劳动,使对立具有剥削的形式;人们通过公共权力的掌握和国家机器的控制,满足个人的私欲,使对立具有压迫的形式;人们以欺骗、造假、犯禁等手段来谋取暴利,使对立具有违法乱纪的形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商品货币关系一发轳,便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成为定局。商品交换当事人的自私自利,尚还以当事人双方的互相取予而彼此获利;而由商品货币关系衍生出来的其他亚种、变种,

^① 这里的“平庸”一词,取其平等中庸之意。

则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表现出更多的不平等,从而成为各种社会罪恶的渊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只是一般的形容词,残忍、凶恶、阴险、冷酷、卑鄙、诡诈、剥削、压迫、利欲熏心、贪得无厌、骄奢淫逸、横行霸道、贪赃枉法、作奸犯科、鲜廉寡耻、作威作福……则成了文明层面的另一真实写照。

面对文明的丑恶现实,人们深恶痛绝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希冀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对立、没有两极分化的和谐友爱的理想社会。古今中外不少仁人志士为此奔走呼号,苦心孤诣,艰苦卓绝,前赴后继,其情可敬可佩,其行可歌可泣,但终究不能圆其梦想。迨及近世,马克思主义卓然而起,在社会基础、理论架构、组织中坚、革命手段诸方面提供了全副装备,使社会主义这一理想社会得以实现。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当人们着手消灭社会对立和社会差别时,却发生了逆转。兹举几例。

例证一:就业与工资制度。在社会主义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营企业实行了就业终身制,人们一旦被企业录用,便永无失业之虞,生老病死,概由国家包下来。后来人们把这形象地称之为“铁饭碗”,任谁也打不破。与之不无联系的是工资制度,当时实行的是高就业、低工资,企业职工工资不高,而且相互之间的工资差别不大,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虽然没能做到绝对平均,相对还算平均的。这种就业与工资制度,过去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加赞赏。确实,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工作无保障和社会贫富分化的悬殊,这是多么的平等与合理啊。人们依此可以想象,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一定会日益高涨,社会财富会迅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为和谐。然而,事与愿违,“铁饭碗”吃出了懒汉,低而几无差别的工资产生的是惰怠,同时,评工资、换好工作的争斗还此起彼伏。

例证二：医疗制度。生病住院，医疗费用全部报销，还可以享受病假休息，国家职工在疾病问题上被一视同仁，这应该说是非常人道和公正的。从常理看，谁都不想生病，某人倘若因为生病而多花了国家的钱，人们一般不会因此而耿耿于怀，并与之相互攀比。但是，随着这一制度的实行和延续，诸多弊端便显露出来。人们或者无病呻吟，或者小病大养，或者乱开补药，或者以一人该享受的医疗福利而惠及全家，甚至为了药品的包装盒而开药，翻演出买椟还珠的现代笑话。与这些弊端连带的还有，病人与医生沆瀣一气，乱开处方，有时还反成为病人指导医生开药；职工与单位财务人员私相授受，以便报销药费时通行无阻。这样一来，医疗费用连年剧增，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以致真正有病时却无钱治病。

例证三：企业无竞争。过去有一段时间，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对立是资本主义的弊端，它会产生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之间不需要竞争，更不存在对立，企业只要遵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就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和谐发展。殊不知，无竞争无对立的企业生产和服务，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产品质量的固化，花色品种的凝滞，服务方式和内容的下降，单位成本的上升，……其结果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较好地提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不无羞愧地说，我们现在所享有的现代物质文明进步，大多是拜资本主义生产所赐。作为反证，改革开放以后，引入竞争机制，情况大有改观。凡是引入竞争的行业和部门，人们都在赞叹变化的神速；相反，在那些尚在实行垄断的行业，如供水、供电，人们还不得不忍受“电老虎”、“水老虎”的肆虐。

这种类型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从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出，消除对立、消除社会差别虽然是一些美好的愿望，但却不能变成美好的社会现实。当我们自认为消灭了社会对立或社

会差别时,新的对立或差别却正在形成,尤其在我們对社会对立或社会差别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缺乏认识的时候,新的对立或差别的出现往往使我们猝不及防,并演变为恶的对立。

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在于我们能否消灭社会对立或差别,而在于,正是因为这些社会对立或社会差别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些对立或差别的矛盾发展,才推动了文明历史的进程。这样说会使许多人迷惑不解:既然社会对立或社会差别的存在具有客观性,既然这些对立或差别的矛盾发展是文明历史的动力,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消除各种社会罪恶(社会罪恶也是社会对立),完全应该对各种社会不公安之若素。这正是“理想与现实”千古难题的症结之一。^①人们对各种社会罪恶和社会对立疾之如仇,试图彻底消除之,但是社会对立是不能消除的,它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产生“理想与现实”的千古冲突。

我们不能消除社会对立,只能改变对立的方式,使之朝着更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不能否定社会对立,而应该运用各种社会对立,推动历史达于理想的彼岸。就以上面所举的例证来说,否定任意解雇职工、使劳动者毫无保障的资本主义用工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一点已大有改变),却并不意味着要建立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约束没有制裁的劳动终身制,而是要以新的对立方式,建立一个奖勤罚懒、优取劣汰、社会统筹、敬业守本的用工制度。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过于强烈,为害尤大;但建立一个没有竞争的经济体制,只能使经济成为一潭死水;倘能建造一个适当竞争、社会规约的经济体制,既免除自由竞争的恣睢之害,又能保持对立统一的发展精奥,不更于社会个人有利吗?

^① 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参见本书导言部分。

万事万物都蕴藏着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对立与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这就是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商品交换关系出现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对立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社会对立,既推动着文明历史的进程,又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对这些社会问题、社会对立或矛盾,既不能作简单的肯定,也不能作简单的否定,而应遵循着矛盾运动的规律,因应于事物的发展,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寻求人类的用武之地。

同源异类的善与恶

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并蒂连理,同是商品交换所孕发出来的。当我们为了论证的需要,把二者区别开来,分别说明它们对人类文明的作用时,是在作一种主观上的划分。这可能会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可以截然分开,人们可以崇尚对财富无限追逐而激发出来的永远进击精神,对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却可以弃之不顾;或者我们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同时又能保持人们追逐财富创造财富的无限冲动。如果你这样想,那就错了。

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都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也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相依存,相互促进,主导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从最原始的商品关系上来看,首先有社会分工,首先有人们作为所有者而彼此对立的商品交换关系,人们才逐渐萌发对财富的无限追逐,才有使这种无限追逐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是以人们之间彼此对立的商品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必

然使人们更加看重个人利益,使人们在与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更加强调个人利益,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和普遍。

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必然促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形式更为多样化。理解前一点似乎不难,人们都知道,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单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量降低,商品的门类和品种增多,这些都有利于人们无限追逐财富的欲求。后一点的理解要难一些,社会分工的发展为什么又是人与人之间对立形式的多样化呢?其实,社会分工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分工条件下,必然产生不同所有者之间互相交换其劳动产品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对立统一关系。此外,不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分工之间存在对立,在同一行业内,每一个所有者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更有销路,更能卖个好价钱,同行之间也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这当然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在于,不管是不同社会分工之间的对立,还是同一行业之内的竞争,都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更高的水平上满足人类的无限需求。所以说,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互为因果,交相作用,彼此激荡,在人类文明历史的舞台上演出千姿百态的话剧。

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总是交织在一起,并且迅速地泛化开去。文明社会的各种对立——个人之间的、阶级之间的、民族之间的、国家之间的,大都因物质利益的追逐而勃发;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总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转剧。更有甚者,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对立,往往因物质利益的诱惑而淡化或变质:绿茵场上足球健儿的竞技,可能被金钱所腐蚀而作伪;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许只是物质引诱下的短暂欢欣。人类除了物质利益的追求之外当然也有其他

追求,但难保这些追求不陷入金钱的陷阱,不堕入物欲的深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世界为之旋转的轴心,在绝对的意义上应该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是转动这个轴心的动力。

然而,这种动力作用的方向有时正,有时反。当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实现时,历史是朝着正的方向发展,当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只注重个人利益的实现并危及社会利益时,历史是朝着反的方向倒退;当人们尽心竭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美好的未来时,社会是前进的,当人们绞尽脑汁去占有他人的劳动,并使社会劳动整体萎缩时,社会便沦落了。

为什么社会的动力会存在正的和反的力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有时促进社会的发展,有时又阻碍社会的进步呢?

前面我们已经多次谈到,商品交换的出现引致了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以及人们作为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对立,这两个矛盾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外化为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这两个矛盾运动的变化,从正的方面看,能够促使人们努力地发展生产,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使物质财富尽可能多地涌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复强调,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推动着文明历史的进步。从反的方面看,这些矛盾也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去实现货币财富的追逐,从最野蛮的到最现代的,从最直接的到最隐晦的,从最笨拙的到最精巧的,人们用尽一切手段来谋求物质财富,这就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经常看到的侵略、剥削、压迫、掠夺、欺诈等罪恶行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说,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是文明社会的一切罪恶的渊藪,阻

碍着文明历史的进步。

推动人类文明历史的正反力量,从社会伦理关系上看,正就是善,反就是恶。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是正是反,是善是恶,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更须注意的是,我们在推行善时,要正确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要使人们无限追逐物质财富的欲求得以正常的实现;我们在遏制恶时,不要作简单的否定,更不要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一无足取,而是要用新的对立代替旧的对立,引导人们从正确的途径去实现财富的追逐。

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一方面表现为善,一方面表现为恶,善推动着历史的进步,恶阻碍着历史的发展。在我们的论证中,人们肯定已经有了这样的印象: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促使人们辛勤劳动;在人与人的对立中,公平竞争,互利交往;那么,人类的文明将得到极大的推动,这就是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激化为不劳而获;在人与人的对立中,以强凌弱,非对等交往;那么,文明历史的前进将遭受巨大的阻碍,这就是恶。在这里,对财富的追逐是用劳动手段还是非劳动手段,在人与人的对立中是否公平对等,是善与恶的判别标准。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致,劳动概念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有些人进行直接性的劳动,有些人的劳动却是间接的;有些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有些劳动并不创造物质财富;有些劳动胼手胝足,有些劳动则绞尽脑汁;有些劳动终日忙碌,有些劳动却片刻成功……至于人与人对立中的公平对等标准,就更难确定了,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由于处于对立关系中,对公平对等的理解绝对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公平对等的认定也会迥然有别。不过,即使因社会分工的复杂化而让劳动概念飘忽难定,即使公平对等原则因人、因时而俯仰,我们还是

可以在终极目标上为善找到一个恒定的标准:当一个社会较多较好地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一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更趋于和谐与统一(并非不包含对立),这个社会就较好地发扬了善,抑制了恶。

对于善的含义我们已经作了大致的界定,在相反的方向上,对于恶的定义也已经大致作出;如果在善的定义中有其扑朔迷离之处,在恶的定义中也会存在相似的情形;最后,当我们以社会的终极标准来判定善时,恶的终极标准也可以相应确立。可是,整个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倘若我们只能从社会的终极目标上来判定善与恶,那只是宿命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分辨善与恶,并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相应的制度架构,以昌兴善,以阻遏恶。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无论人们在主观认识上有多么的不同,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历来都是社会伦理的重大焦点。但是,传统的善恶观与我们这里确立的善恶观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传统上或者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明善,或者从人的本性上来证明恶;^①或者把个人对财富的无限追逐,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视为恶的根源,而予以鄙弃;或者把个人利益的自由放任,把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奉为社会进步的铁律,而大力推崇。传统上的这些善恶观,或者把善与恶断然分开,各有所出,或者对善与恶作主观臆断,随意敷设。我们的善恶观则强调,在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中,在人与人的对立关系中,既孕育着善,也萌发了恶,这二者同出一源,混同宇内,我们往往能在善中发现恶,在恶中窥见善。人类的最大难题可能就在于,有时我们必须把二者分离开来,就像分离水

① 人性的善恶在中国历来都有争论,著名的是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在西方,霍布斯以人的自然状态为恶,卢梭则以人的自然状态为善。

分子中的氢元素和氧元素,为人类提供最为洁净的取之不尽的能源,但目前这样做成本太高;有时我们又必须让二者化合在一起,好比水对于人类来说是须臾不可或离的,但往往也存在吞噬人类的可能。

二、社会伦理的悖反

人心不古

从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的发轫期到今天商品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商品货币关系呈现出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到高、从个别到普遍的发展历程。与此相适应,由商品货币关系孵化而出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也日臻激烈而普泛。在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和人与人之间对立的交互作用下,人们不仅用善的手段来谋求财富,也会用恶的手段来谋求财富;不仅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获取利益,还会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获取利益;不仅以自己的劳动来增殖财富,更会以他人的劳动来增殖财富。这些对财富的追逐形式,必将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更趋激化和普及。

仅就人们的社会关系这个层面而言,商品交换越发展,人们之间的对立方式就越多,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就益甚,人们的自我意识就愈强烈。这一总的历史趋势,中国古人早就有所觉察,历朝历代的先贤总有人在追怀先朝民风的醇厚,慨叹近世人情的浇薄;尤其在某些时期人们之间的对立未能被规约在社会秩序的范围内,以致政治昏暗,经济衰败,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他们更会发出“礼崩乐坏”、“纲常废弛”的悲鸣。于是,在中华文明长河中,历来都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定评。

人与人关系上的各种对立、对抗、矛盾、冲突,显扬为人与人之间的欺压、侵袭、险诈、虚伪、卑污、势利、贪婪、贿遗……构成了文明历史的另一面。这种文明景观,让思想家们触目惊心。

有着极高智识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似乎早已朦胧地意识到,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人心的迷乱,是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和发展分不开的;①他清楚地看到,声色犬马、穷奢极欲,将会引致更多的社会问题;②他倡导绝圣弃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保持淳厚的民风;③最后,他把那种民不迁徙、回归自然、互不交往、与世无争、恬淡无为的状况,视为理想。

墨子对人世间的各种对立深恶痛绝,认为它们是天下的大害。他看到这样的普遍现象:国与国之间互相攻伐,家与家之间互相争夺,人与人之间互相侵害;强大的暴凌弱小的,富贵的傲侮贫贱的,智诈的欺压愚朴的,更是比比皆是;甚至在被视为国之纲纪的社会伦理关系上,也出现了危机,当国君的不惠顾下民,做臣下的不忠实国君,当父亲的不慈爱子女,做子女的不孝敬长辈。这些社会罪恶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只知利己,不知利人。因此他指出,每个人只要能够做到自己爱别人,别人就会爱自己,自己利别人,别人就会利自己,实现了这种“兼相爱、交相利”,天下的罪恶自然消失了。④

①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三章》)

②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

③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

④ 参见《墨子·兼爱》。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山河破碎,人民乱离,名教败坏,于是成就了名噪一时的魏晋玄学,其代表人物是王弼、何晏、郭象等。在他们的论述中,流露出对现实政治的哀叹与无奈。他们认为世界是“玄冥”的、不可认识的,玄是黑暗,看不清楚,冥是蒙昧,难以辨明;对于世间事物的变化,他们认为是独自完成、不可捉摸的,并名之为“独化”。因此,人们对人世间的苦难,既不能认识,又不能改变,最好是做到无知无欲,安于现状。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长期混乱之后,宋朝理学的兴起成了这一危机时期的反响。而轮到宋朝理学的关键性人物朱熹,又面对南宋的半壁江山,目睹朝廷奸权当道,从而继承二程的“天理”、“人欲”观,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在他看来,“天理”是善,“人欲”是恶,“天理”是义,“人欲”是利;而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安危,就在于“天理”、“人欲”孰占上风。他还认为,天理人欲是截然对立不能并存的,“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①这就把人的物质欲望推到了罪恶根源的极端位置上。

及乎近代,西方列强的环伺侵略,中华千古文明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岌岌可危。无数仁人志士为求富国强兵而披肝沥胆,主张维新变法的主将康有为,在历经蹉磨之后,发表了他的《大同书》。他的大同学说,不是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模本,而是掺糅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不仅看到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国内社会政治肌体上的赘疣,也注意到西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其根本在于财富之不均。因之,建立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对立、劳动者最光荣、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调济的“大同之世”,遂成了他的社会

① 见《朱子语类》卷十三。

理想。

思想是现实的临摹,现实反映的真伪,大都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角度。以上我们非常粗略地把中国社会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展现出来,无外乎是要说明,商品交换出现以后,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在人类历史中具有恒久的性质,而且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对财富的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还将产生加速度的效应。古代先贤大都对商品交换的进步作用认识不足,而对商品交换所引发的社会对立却如鲠在喉,这二者交相影响,于是便出现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经常看到的那种景象:一方面对工商业实行抑制的政策,另一方面商品货币关系所必然引致的人们的逐利冲动和对立,由于没有正常的宣泄口而肆意泛滥;一方面对人们的一切物质欲望持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人们物质欲望的恶性膨胀。

稍加注意就能发现,我们以上列举的那几种社会伦理思想,基本上都发生在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或是诸侯攻伐,攻城夺地;或是土地兼并,贫富悬殊;或是吏治腐败,贿赂公行;或是异族入侵,贪求无厌;一句话,都是物质利欲恶性膨胀的时期。作为对社会罪恶现实的反动,这些社会伦理观念的提出,自有其道理。但是,极端的社会现实,必将激发极端的社会伦理,如果把这些社会伦理用于社会实践,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先依循老子的思路,让人们回到结绳记事、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生存状态。世间一定会少了无数的纷争,人心也绝对没有那么多的贪婪和险恶。同时,人们也将长期处于饮毛茹血、刀耕火种的物质贫困境况,只能仰赖大自然的赐予或者默受它的狂暴。人们一方面可能免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争斗,另一方面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却本领低微,在很大程度上任“物”宰割。倘若其他民族率先进入物质文明之

域,那就更惨了,原始经济的樊篱阻挡不了商品经济的冲击,手执利器的“文明”人也不会放过与世无争的“野蛮”人,最终,处于原始生存状态下的生民仍然逃不出任人宰割的命运。近代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所作所为即是其例。

墨子的学说缺乏老子思想的深邃,但却通俗而更具感召力,每个人都替别人着想,自己的利益又被别人所考虑,于是,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实现,而且又不会产生人与人的对立。多么吸引人的画面啊!然而,墨子正是看到了人们之间的相贼、相攻、相敌、相伐这些普遍对立,才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如果没有人们之间普遍对立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兼爱学说。因此,人之间的对立是前提,是客在,兼爱学说是愿望,是主观,此其一。其二,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其中心内容是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倘或反其道行之,让人们首先去满足别人的利益,实现所谓的“交相利”,那么,个人行为的动力在哪里呢?这无异缘木求鱼。其三,对立是运动,是发展,即使存在恶的对立,总体上看亦是如此;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社会必将停滞。所以,墨子的兼爱学说虽然美妙,却形同画饼。

魏晋玄学虽然也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但一般而言只是老庄思想在另一时期的回照,而且更多了几分消极和颓唐,在此就不必多说了。^①关于宋朝理学,其悖谬并不如晃眼看来那么严重,“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确实很极端,倘人欲可灭,人类社会还会剩下什么呢?但是,理学中所讲的“灭人欲”,并非指正常的饮食男女之欲,而是那种过多过盛的物质欲望。然而,即使是这种意义上的“灭人欲”,也不敢恭维,因为人欲不

^① 学术界一直都有人认为魏晋玄学并非是道家学说的简单再现,而是企图援道入儒,重新振兴儒学,不过却事与愿违。

仅是不可灭也不能灭的,而且还是人类历史的推动力。纵然人欲有恶性发作的时候,也只能强加控制及疏导。至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其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昭然,对它的批判现代人已耳熟能详,更无须缕分细析了。

中华文明走过了漫漫长途,我们总能找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现代翻版,虽然我们对上述社会伦理思想多所批评,但在积极的意义上,清醒地认识到物质欲望与社会罪恶的内在联系,明确地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是诸多社会不公的原因,仍能给后人良多的借鉴。

原罪教义

商品货币关系渐进地普被着人类社会,由它所从出的各种对立和诸多的社会矛盾,困扰着中国的先贤圣哲,同样也困扰着西方的思想家们。从古希腊的诸多学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各家各说,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近代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无不为人文文明的罪恶现实痛心疾首,希图建立一个美好的人类未来。对以上这些西方观念中的社会伦理思想,我们暂不置评,这里只想就在西方历史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基督教伦理思想,作一简单的评述。

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是由犹太教发展而来的,《圣经》中的《旧约全书》是犹太教的经典,《新约全书》是基督教的经典,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我们就以《圣经》的论述为主要的依据,来探讨这一主宰西方一千多年的宗教伦理思想。

在《旧约全书》的“创世记”中,有一段描述人类罪恶起源、看似荒诞不经实却富寓深意的话: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一男一女两个人,把他们放置在伊甸园中,园中有长满各种果子的果树,听凭他们食用。但上帝告诫他们,有一株能知善恶的树(又称智慧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可是,夏娃受

蛇的引诱,偷食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并让亚当也吃了。吃了果子后,他们就知道了善恶,眼睛也明亮起来,看见自己赤身露体,有了羞耻之心,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裙子,把自己遮掩起来。上帝知道他们偷食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便惩罚他们,让女人永远受生育的痛苦,让男人终身劳碌,并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① 这就是著名的原罪学说。

这一段话如何理解呢? 人类原始初创,蒙昧无知,取给于大自然,无忧无虑地生活,全然一幅原始天成的景象,这里借上帝之手把它完成了。如果人类任凭大自然的安排,听从上帝的告诫,不受蛇的引诱,不作主观的努力,或许还能长期安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伊甸园之乐。然而,蛇出现了,蛇代表什么呢? 利欲、邪恶,还是别的? 不管怎样,人受它的引诱,偷食了智慧树上的禁果,变得聪明起来,知道了善恶,于是便堕入人类痛苦的漫漫长途。把人类的不幸和苦难归因于人类智慧的产生,这使我们联想起老子所言“慧智出,有大伪”、“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② 二者如出一辙。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们对社会罪恶的产生还茫然无解,能够从人的智慧的产生,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勃发,从人实现自身利益的冲动来说明社会罪恶的出现,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抽象思维能力了。

上帝所造的人,在地上生生蕃息,越来越多,而且罪恶也越来越大,到处都充满了强暴,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看到这一切,心中忧伤,后悔造了人类,就决定把人及地上的一切生物消灭掉。当时只有一个人,名叫挪亚,是个义人,上帝看中了他,便告诉他,要他用歌斐木造一只巨大的方舟,让他把地上有血肉的生物一公一母带上一对进入方舟,

① 参见《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二、三章。

② 见《老子·十八章、六十五章》。

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也同进入方舟。然后,上帝降了40天的大雨,洪水泛滥,地上成为一片汪洋,淹死了所有的生物,方舟中的除外。洪水过后,挪亚和他的儿子、妻子,并所带的一切生物都出了方舟,挪亚为上帝筑了一座坛,用洁净的生物作献祭。上帝闻到献祭的香气,心中就想,人虽然从小就怀着恶念,但我以后不再因人的缘故而诅咒他,也不再用水淹没地上的一切生物了,并因此与人类立了约。^①

这一段记叙的前半段颇好理解,上帝看到人类普遍作恶,就决意要加以铲除;而对于行善的少数人,他又要蓄意保护。颇难理解的是后半段,洪水以后,挪亚献祭,上帝便与人们立约,从此不再用水来灭绝人类。这意味着什么?是因为人们信奉上帝,上帝便恩赐他们,赦免他们?还是因为上帝对人类所犯的罪恶已经习以为常,生了恻隐之心,不再加以严惩?也许两者都有,人类的罪恶是与生俱来的,这无法改变,但只要人们奉事上帝,听从上帝的劝诫,仍有获救的希望。

自此以后,上帝特别眷顾挪亚的子孙们,让他们蕃衍众多,日益壮大,并帮助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出埃及的过程中,上帝大显神威,不惜以暴烈和残忍的手段,驱赶和消灭以色列人前进路上的敌人;同时,如果以色列人自己违拗上帝的旨意,上帝耶和华也会动怒,施以惩罚。耶和华还为以色列人立了戒律,即著名的“摩西十诫”,^②引导以色列人,经过数十年的搏杀,终于在约旦河以西建立了自己的家园。^③

① 参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六—九章。

② 所谓“摩西十诫”: (1)除耶和华以外,不可信仰他神; (2)不可雕刻和崇拜偶像; (3)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 (4)当纪念安息日为圣日; (5)当孝敬父母; (6)不可杀人; (7)不可奸淫; (8)不可偷窃; (9)不可作假证陷害人; (10)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以及财产。

③ 事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在犹太教中,有这样几点是可以确定的:人生而有罪;但可以赎罪;必须信奉唯一的神耶和华;并谨守他的诫命;能够以暴易暴;还能无往不胜。犹太教的这些教义,可以这样翻译: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由于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彼此间的对立,罪恶的社会现实不可避免;人类为了减少世间的罪恶和苦难,应该努力行善,不要作恶;更重要的是,必须尊奉一个唯一的正义之神,听从他的命令,遵守他制定的法律和伦理准则;对于那些作恶的、敌对的、不信奉正义之神的人们,可以用暴力铲除他们。

犹太教的这些教义,对于长期生活于现实苦难中的人们,对于因内部对立而四分五裂的民族,对于身处无社会秩序无道德规范中的人类,这无异是一种福音。它能燃起每个人生命的希望,它能凝聚一个民族的精神,它能为社会建立一种秩序,最后不无重要的一点是,它在纷然敌对的各民族各国家之间,树起了一面大旗,让人们集合在这一旗帜下,同仇敌忾。

犹太教曾经使以色列——犹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占有过他们的辉煌,然而,或许是犹太教的民族狭隘性,或许是它本身固有的暴戾之气,妨碍它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这时,出了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把犹太教改装成具有普世意义的基督教,耶和华不再是犹太—以色列人唯一的保护神,只要人们信仰他,他会给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带来福音;他有着更为博大的爱心,教导人们“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犹太教中隐含着的原罪—赎罪—最终审判的人类历程,在基督教中也更加完整和张扬了,人生原本就是罪恶,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行善、祈祷、忏悔等方式来赎自己的罪,最后,当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上帝会根据每个人所行的善恶,作公正的审判,善者进入天堂,恶人堕入地狱。

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这种发展,在更普遍的意义获得人

们的宗教认同,普救万民的上帝脱却了犹太教中上帝的偏狭,爱人如己的教诲表述了人们对和谐、友爱、幸福的向往,原罪—赎罪—最终审判的教义在百无一法的前提下差强人意地调和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罪恶与善良、苦难与幸福的现实冲突,并为人们许诺下美好的来世天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点,一是《新约全书》记述了对货币财富的明显的憎恶。一个有钱人来对耶稣说,上帝的诫命他都遵循了,还需要做什么才能永生呢?耶稣告诉他,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把它分给穷人。那人一听,就忧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于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①“马太福音”这样写到:“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②紧接着耶稣告诫人们不要追求物质享受,而要顺其自然。耶稣把追逐货币财富的人排斥于天国的门外,看来已经意识到财富追逐与社会罪恶的内在联系。

另外一点颇有争议。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③耶稣既告诫人们要爱人如己,这里又要人们之间互相争斗,这种自相矛盾我想应该这样理解:耶稣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是一社会现实,

① 《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十章。

②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玛门”即指财利。

③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

这种普遍的社会对立盖因于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因此,人们必须抛弃自我,遵循上帝的道,听从主的教诲,才能使普遍的社会对立得以化解。

基督教作为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宗教,逐渐蔓延开去,这时正值古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衰亡时期。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在基督教问世以前,古代西方从未出现过精神上的一统,尽管亚历山大和凯撒都分别建立了庞大的帝国,那只是凭藉穷兵黩武实现的暂时统一,却不能为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提供可靠的保证。^①而基督教一出现,便以它博施广济的善行、伸张正义的主张、直面社会罪恶的坦诚、解救人类灵魂的允诺、唯我独尊的一统,赢得了普遍的认同,这无疑是与当时因个人意欲过于膨胀而产生的政治暴虐、社会混乱、人心离散、道德颓坏的现实分不开的。

基督教虽然入主了西方的精神世界,它的局限性很快地就暴露出来,它对神性的崇拜和对人类理性的鄙夷,它对财富的愤疾和禁欲主义的倡扬,它对上帝的绝对至尊和对异端的残酷迫害,都使它所鼓吹的博爱和许诺的天堂乐园大打折扣。更使它声名狼藉的是,它在要求人们禁欲苦行的同时,教会却在广聚财富;它在标榜和睦相爱的同时,教皇却在操纵各种战争。由此亦可见一斑,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作为一种必然性,基督教不仅对它们无能为力,而且在某些时候,教会、神父、教皇还得对这种必然性俯首称臣。

现代人的忧患

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资本主义操持着它凌厉的物质武器来到人世,它先是在西欧安家落户,旋即把它的触

^① 参见本书第113—114页。

角伸向四面八方,所到之处,望风披靡,无论是原始蛮荒的新大陆,还是文明悠久的老大帝国,都阻挡不住它锐利的挺进。它或是以自由贸易的和平准入,或是以船坚炮利的悍然侵入,渐进地鲸吞着整个世界,然后不无傲慢地宣称:是它把人类带入了现代文明。

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社会伦理思想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分野,即把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和资本主义以后的时期一分为二,社会伦理思想有了明显的逆转。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总体上看,一般的社会伦理大都对人们的物质欲望,尤其是对人们的无限贪欲持否定、压抑甚至禁绝的态度;在人与人对立的关系上,倡导折衷调和,把个人自由压制在家族利益、宗法关系、君主专制的范围内,并不时以人性的泛爱来消解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创造得到首肯、赞美和宣扬;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强调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把个人权利置于最高的位置,在极端的情况下,鼓吹阶级斗争,甚至主张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伦理思想上的这种重大转变,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是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急速发展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不仅使人们享受着它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利益,而且使其追逐财富的无限冲动更为勃发;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伦理日益成为这种无限冲动的最大的桎梏。于是,日渐强大起来的第三等级要付诸行动了,他们不仅为自己准备了思想上的武器,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作后盾,这是任何封建君主都抵御不住的,就连旧有的社会伦理也只能落荒而逃。

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在为自己的社会锻造新的伦理武器之外,传统的占主流地位的基督教伦理思想也开始见风

转舵,为新的资本主义伦理喝起彩来。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影响甚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着重论述了新教徒们如何把耶稣基督的教义,引申为世俗物欲的冲动,并且在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总体格局下,奇妙地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发财致富的无限欲求,打上了勤劳坚毅、节俭素朴的印章。韦伯把它称之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使我们联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驳,他把资本斥之为每个毛孔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把资本主义精神等同于奸诈、残忍、血腥和罪恶。

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可能天差地别,但是,这种本质上的差别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在韦伯写作那本书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看到节欲勤奋的新教伦理无力阻止资产阶级暴发户对人生的尽情享受,而随着财富的增长,资产阶级的傲慢、愤怒和欲望也成比例地增长。^①换句话说,新教伦理的理想化或虚伪性根本掩饰不住财大气粗的资本主义的凌人盛气。到了本世纪70年代,享有盛誉的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他这样写到:“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崩溃(归咎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变革),使得美国社会中有关劳动与报偿的合法信念遭到破坏,由于这种转变,也由于目前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新道德观念,当今公众情绪中普遍存在着迷惘感和沮丧感。”^②“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它传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原来建立在视工作作为神圣事业的新教观念上,并依赖从中滋生出来的一种道

①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2、1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② 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0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德化报偿体系。现在,这一切已为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所取代。”^①

其实,不论是韦伯还是贝尔,如果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划上等号本身就有些牵强,尽管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曾经一度起过精神支柱的作用,但并非是唯一的精神支柱。更主要的还在于,新教伦理的禁欲倾向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的物欲追求和普遍对立在本质上是冲突的。加之个人主义的盲目放释、自由主义的极力鼓吹,因此,新教伦理的衰微或迟或早都要发生。在西方,“上帝已死”已经是老生常谈,享乐主义的泛滥和社会道德的沦丧也不是什么新的研究课题,在普遍的社会伦理道德危机中,透露出现代人的深深忧虑。

资本主义并不像它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把现代文明带给了人类,至少在主观意愿上不是这样。当资本在世界各地蚕食鲸吞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给那里的人民带去现代文明,带去物质进步,而是想到如何尽快地把自己的腰包装满,如何使被侵入国长期成为自己的附庸,成为自己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材料的供给地。一部资本的早期历史,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血泪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开始觉悟,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解放,这时,资本主义宗主国一般都不会对这些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予以理解和支持,而是相反,甚至予以暴力镇压和武装干涉。因此,在19世纪、20世纪大多数的时间里,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了主要的社会景观。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在社会伦理思想上也截然不同,社会主义伦理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32页。

倡导大公无私,鄙视自私自利;推崇道德高尚,贬抑唯利是图;宣扬阶级内部的友爱,非难不同阶级之间的调和。通过这种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教化,曾经自诩为造就了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就以中国为例来说,五六十年代,人们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满怀热情,生活充满理想,向往更为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那时干部廉洁,社会风气良好,人们工作积极努力,并不太计较个人得失,政治上要求进步,行为上克己自律,思想上勇于自我剖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坦诚多于险诈,率真多于圆滑,互助友爱比比皆是,见义勇为并不鲜见,助人为乐成为社会风尚,舍己为人并非笑谈。

到了“文革”时代,人们把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倾注在毛泽东身上,其生活理想、政治热情、革命干劲未见少衰,尤其在年轻一代身上。人们喊“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并非只是一种政治口号,不少人在真心实意地实行着。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是阶级斗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在人与人之间要经常高扬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旗帜,而且在个人自己的头脑中,也要经常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致搞得人人为敌,人自为敌。但是,尽管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搞得过于紧张,社会主义伦理和道德的说教却并未弱化,而是更加纯粹或极端化,“兴无灭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为人民服务”、“语录热”、“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提法和做法,随处可见。不过,随着“文革”的延续,人们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人生理想失去光环,革命干劲消磨殆尽,社会上弥漫着普遍的怀疑、不满和怨愤。

“文革”以后,人们积郁已久的政治情绪有过短暂的勃发,思想解放运动也有助于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和视野的开阔。《中国青年》杂志以一封署名潘晓的信,曾引发了一场关于人

生理想的范围广泛的大讨论,可是,社会的伦理行为和人们的道德观念已不复再有五六十年代的旧观。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本已式微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再次遭受严峻的考验。虽然一再强调“两手都要硬”,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同时抓;虽然在要求人们学习先进模范人物事迹的同时,重提学习雷锋和焦裕禄;虽然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提倡“无私奉献”,大力开展“献爱心”活动;如此等等,其力度和声势不可谓不大,但似乎难于挽回一代颓风。人们的普遍冷漠和玩世不恭,这只是一般的现实;精神家园的丧失和伦理道德的危机也仅是有识之士的呼声;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各种道德范式的颓坏,贪污腐败的盛行,“黄、赌、毒”的泛滥。

人们时常把“文革”后期的人心离散、失望迷乱归咎于“四人帮”的肆虐,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不公和道德沦丧比喻为打开窗户自然要飞进来的苍蝇,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反躬自问,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颓败,只是因为几个丑类的播弄,只是因为几只苍蝇的嗡鸣,这不同样说明,这样的社会主义伦理太过脆弱,太不堪一击,怎么能够担当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呢?

自从建国以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建树未曾稍有懈怠,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功用却日现其蹙,可以这样说,对于社会主义伦理的实行,50年代人们奋力而行,60年代勉力而行,70年代量力而行,80年代无力而行,到了90年代,可能只将它束之高阁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好,意识形态领域抓得不紧,如果仅就这些方面而言,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无出其右。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功能性障碍,应该有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在我看来,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商品货币关系在作祟。简而言之,商品货币关系所引致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

与人之间的对立,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存在;但在建国初期,剥削制度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共产党廉洁奉公的领导、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物质欲求,缓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并向人们展示出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然而,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各种经济制度(包括工资制度)的建立、商品货币关系的继续使用(虽然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和范围有较大的限制),人们世俗的物质欲望和商品意识必然逐渐抬头,不仅工人农民蠢动着这样的欲求,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会闪现出类似的思想;共产党的干部同样是肉身凡胎,偶或地闹名利、争地位亦属情理中事,只有军队中的士兵似乎免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腐蚀。^①在今天看来,人们关注个人的物质利益,是极为平常的事,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在毛泽东眼里,人们的自私自利是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共产主义的理想水火不相容的,他要用一次接一次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来荡涤人们的私心杂念。当这些思想政治运动收效不大时,他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认为这就是“防修反修”的最好形式。

然而,商品货币关系的必然性比任何力量都强大,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作为文明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毛泽东也深知物质财富生产的重要性,他希图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要求人们摒绝个人私欲来努力工作;他在农业上树立了大寨的样板,在工业以大庆为楷模,但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并不能激发人们实

^① 解放军中的士兵每月只拿几元钱的津贴,相当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难以滋生追逐物质利益的商品意识;加之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化,所以五六十年代的英雄人物和社会楷模大都出在部队,如雷锋、王杰、麦贤德、欧阳海、刘英俊等。

现自我利益的热情。当人们的个人利益没有正常的途径(“文革”把一切追逐个人利益的正常途径都堵死了)并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时,人们的个人欲求只有通过被扭曲的形式来表达,拉关系、开后门、偷拿公共财物渐习成风。在这样的情势下,一切高尚的伦理、美好的思想、领袖的精神感召,都已经显得苍白无力。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货币关系大发展,泥沙俱下的市场经济大潮,在社会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规范的经济秩序和行为准则时,已经汹涌而至。人们利用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缝隙,利用经济秩序的失范,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效益功能上的巨大反差,为自己谋取利益,由此而迅速地崛起了一个新兴阶层,其中多数或因勤劳而致富,或因善于商业操作而获利,自然也不乏以权谋私、贪污行贿、铤而走险而腰缠万贯者。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诸如就业、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子女教育、人际关系等,皆日益实利化或商品化。这样,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之间,至少存在两个矛盾:一方面是无私忘我,克己奉公的社会主义伦理,另一方面则是“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平等、公正、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训诫,另一方面则是贫富的悬殊、贿赂公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俗世景观。在这样的矛盾中,要让人们普遍信奉传统的社会主义伦理,真比登天还难。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伦理,在生产资料普遍公有、社会分配大体平均、商品货币关系相对弱化、公共权力尚未腐败的条件下,还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话,那么在 90 年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定局、生产资料的个体化已占相当比重、社会分配的悬殊难以弥合、权力腐败已经较为严重的前提下,

传统的社会主义伦理就失去了它的根基。当然,一个社会没有伦理的支撑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是,没有根基的伦理又不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

三、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

我们一路写来,极力要阐明商品货币关系与人类文明历史的内在联系,应该说,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就是发展、适应、认识、推动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只是有时人们不自知而已。由商品货币关系所从出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直接地或间接地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本书各章所阐述的,在所有制、阶级、战争、制度、城市、商业、社会伦理等文明景观中,我们无一不能从中看到人们的物质欲求和普遍对立的决定性影响。这些方面的各种内在矛盾,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一种社会哲学来加以统驭,可以足以自豪的是,中国的先贤在长期的实践中,成功地发明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哲学——中庸之道。

所谓中庸之道,也可说是用中之道,那么什么是“中”呢?“中”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是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繁衍。^①由于万事万物都存在矛盾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的存在,决定

^①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

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如果在事物对立的两方面中,硬要消灭、否定、取消其中的一个对立面,事物的运动,发展也就不存在了,事物的生命力也就没有了。因此,要兼顾矛盾的两个方面,使对立双方各得其所,不要走极端。这就是“用中”。①“用中”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很困难,要在事物的对立中经常把握允中平和,在运动变化的矛盾中保持不偏不倚,这需要对事物有深刻的认识,需要非常高的道德修养。②

中庸之道确实难以做到,只有圣人才能实现它,③真正实现了中庸之道,就能发育万物,国治民安,天下和睦,四海归顺。④因此,中庸之道就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加以施行,化育在政治、经济、伦理、法律、军事等诸多方面。后世诸儒对中庸之道多有阐发,是否尽合原创的中庸之意,尚付阙疑;中庸之道在实施的过程中,能否都做到中正不倚,和衷共济,则更有遗憾。但尽管如此,中庸之道在中国历史中的勉力而行,实在是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不坠之大经。

用今天的话来讲,中庸之道就是在事物的对立中寻求同一,使对立统一的运动得以顺畅进行。在本书的分析中,当我

①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圣乎!’”(《礼记·中庸》)

②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③ “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礼记·中庸》)

④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礼记·中庸》)

们把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看作文明历史的根本动力时,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实现同一,从而使人类社会和谐统一地发展,这不就是中庸之道所极力追求的吗!用中庸之道来处理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立,使中国人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内保持了统一、强盛、文明和进步,使中国社会在人文精神(并非依仗宗教意识)的统领下,实现了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昌明、社会的稳定、道统的一贯。因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包容性,在世界历史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当然,中庸之道也有它的局限性。中庸之道精于处理事物内部的矛盾,把对立面统一在一个矛盾体中,正因为如此,中庸之道倾向于折衷、调和,往往具有保守的恶名;特别是当人们对事物的对立缺乏深刻的认识,不把对立当作事物发展运动的源泉,而欲取消对立、窒息对立时,中庸之道更成为守旧停滞的替罪羊。最让人失望的是中庸之道不能用于解决恶的对立。所谓恶的对立,就是对立双方没有同一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庸之道是不能奏效的。恶的对立在人类历史中大致有三种表现,一种是原有矛盾统一体中的对立双方,没有可能再实现同一。比如说,农民与地主这一对矛盾统一体,在正常的时候,地主出租土地,农民交租纳赋,尚能维持生存,对立双方具有同一性,可以使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进行。当出现土地的急剧兼并,加上荒年歉收,农民的基本生活已不能保证,地主又不肯减租减息,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与农民之间已没有同一性,形成恶的对立,正常的经济生活将会中断,社会动乱便会到来。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大多是在这种恶的对立中爆发的。另一种是对立双方一开始就没有同一性,一方总想消灭另一方,比如两军对垒、异族入侵,俱属此种。第三种是出现了新的矛盾统一体,要取代旧的矛盾统一体,在两

个矛盾统一体之间,没有同一性。这方面的例子主要是新旧生产方式的更迭,如封建的生产方式取代奴隶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在这三种恶的对立中,中庸之道一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大的农民起义所引致的朝代递变、异族入侵所产生的国家分裂、新旧生产方式所激化的社会更替,大都是儒家学说动摇衰微的时期,也是中庸之道不能得行其道的时期。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新旧生产方式的更迭,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这时即便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也四处碰壁,深感其大道之不行。又如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猛烈冲击中国,在“器物之变”、“中体西用”、“变法维新”等努力均告失败之后,人们便把一切罪责推到了孔老二的身上,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愤怒口号。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在现代史家中,有人一会儿把孔子说成是奴隶主没落思想的代表,一会儿又把孔子说成是封建社会的祖师爷。孔子到底是奴隶社会的殉葬者,还是封建社会的祸首罪魁?如此大落差的身分变化,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玩味吗!

在我看来,孔子的这种身分变化,正好说明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和悠远恒长。不能要求儒家学说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更不能因中庸之道对恶的对立的无奈而排挞这一儒家学说的精髓。中庸之道作为一种通达的社会哲学,对于绝大多数社会对立具有极佳的现实意义,这是迄今为止的中外哲学中难有与之相颉颃的。^① 在此我们还得谈一下中庸之道的时

① 亚里士多德虽然也曾提出过“中庸”的思想,但达不到中庸之道的深度,更主要的区别还在于,亚氏的“中庸”思想在古代西方没有外化为现实的社会规范。

代性。在不同的时代,中庸之道的哲学抽象必将化为现实的时代精神,表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因此,不论是“三纲五常”也好,“忠孝节义”也好,“民本”、“尚贤”也好,“王道”、“霸道”也好,都会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我们今天再高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肯定不合时宜,再欲坚持过往的“义利之辨”,也将贻笑大方。中庸之道的生命力不在于具体化育的事或物,而在于根据具体的时代,化育出适合这一时代的事或物。把儒家学说在各朝各代的具体施为教条化、绝对化,这是食古不化;依据这种教条化或绝对化来判处儒家学说死刑,那又会把中华文明的精粹抛弃了。

今日之中国,已经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大变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实践,则更是发前人之未发。中庸之道行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其间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只占极其有限的比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由中庸之道营构而生的各种社会制度,显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大发展这一普遍事实。随着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旧的精神大厦已经坍塌,新的制度创设尚待完成,中庸之道还有用武之地吗?可以肯定地说:有!

在本书中我们说明了商品货币关系的产生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发端,分析了商品货币关系所引致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既是文明社会的动力,又是一切社会矛盾或问题的主要根源。在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达的今天,物质文明的进步一日千里,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而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在对立中求统一,在矛盾各方中坚持不偏不倚,从而使事物在对立统一中得以发展的哲学思维,正是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绝对需要。笔者不才,试以中庸之道用于社会伦理、所有制关系、政治体制三个方面,就教于海内

外同道。不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有所侧重地谈一些原则性的意见,不可能作全面的论证和详尽的阐述;另外,这些意见多与传统的观念相违,且系个人的一孔之见,疏漏与不成熟在所难免。

道德重建刍议

在“现代人的忧患”一节中,我们曾经谈到现代社会中伦理道德的沦丧、精神家园的失却、价值体系的紊乱、行为准则的失范,这些都是一个意思:社会伦理处于危机之中。在当今中国,道德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更大的范围内,伦理道德的颓靡也成为世界性的难题,这种普遍性的道德危机是否具有共性?抑或如人们通常所说,道德是具体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不同的社会当然也有不同的道德?

文明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而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自然也会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作出自己的主观评价,什么事情对自己有利?什么事情对自己有害?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坏的?但是,在人们普遍对立的社会中,倘若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对事情的好与坏、利与害作出主观的评价,并把这种主观评价用之于个人的社会行为中,那么,必将使整个社会纷然敌对、杂乱无章、邪恶丛生,危及每个人的生存。

为了使人们在普遍的对立中求得同一,为了避免社会在各逞其欲的纷争中趋于毁灭,人类一方面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往往强制性地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这一点我们在“制度”一章中已经谈及。另一方面,是建立一个价值体系,用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这样一些标准来统一人们的主观判断,依据这些价值标准形成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使之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潜移默化为人们自

觉自愿的社会行为。这后一方面,正是我们这里所要论及的。

一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旨在统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使之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因此,一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必须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能够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循;否则,一个社会的道德建构便形同虚设,达不到它的目的,没有行之有效的伦理道德和没有伦理道德,其结果是差不多的。但是,要在一个普遍对立的世界中求达一普遍认同的道德建构,又谈何容易,人们之间的对立愈普遍,普遍的道德范式就越难建立。一般地说,人类的文明社会越发展,人们之间的对立就越普遍,普遍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伦理也就越难形成,这可以用来解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规律性现象。

伦理学家们一般都认为,社会道德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而人们的社会行为又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产生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的问题。在原始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伦理规范,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虽然多了几分理想色彩,但基本上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原始人群内部,人们之间相互关系较为融洽,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实属罕见。这一点,近代史家对原始部落的考察亦可为证。

商品交换出现以后,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逐渐增多和扩大,人们之间的对立日渐普遍,尤其在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中,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更形尖锐。这时,人类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人们之间对立的普遍增长,作为文明社会的一个主要方面,更加需要一种社会伦理把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起来;应该说,伦理道德的系统化和重要性,在人类的文明社会更显突出。

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仍可以根据商品货币关系

在文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把文明社会划分为两个时期——自然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所谓自然经济时期,是指商品货币关系已经进入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自给自足的农牧经济仍然占据主要的地位,社会产品的商品率只有较低的比值。从通常所说的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属于这一时期。而市场经济时期,望文生义,系指商品货币关系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方面,社会产品的商品率占有极高的比值,社会消费和个人消费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商业流通来实现的。这个时期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算起,一直到现在,而且还会持续下去。

在自然经济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度和广度虽然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人们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实,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历史惯性的作用,主要通过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奴隶社会和西方的封建农奴制)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中国的封建制)来实现。^①这种占有方式,往往以王权至上或皇权至上的形式固定下来。在这个既定的历史前提下,统治阶级挟持政治上的强制和精神上的垄断,在伦理道德的建构上也显现出价值独尊的倾向(西方以宗教为权威,中国以礼教为权威),以稳定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但是,必须强调的另一方面是,在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总体背景下,一般老百姓之间的相互对立尚不普遍,因此,社会伦理中关于和睦友爱、互助亲善的一些道德规范,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不论中、外,不论东方、西方,自然经济时期的社会伦理道德中都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对商品货币关系持否定蔑视的态度,尤其把商品赢利视为社会罪恶的化身。这种现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农业社会”一节。

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还不占统治地位,而商业贸易所引致的急剧的财富增殖对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都将形成猛烈的冲击,对自给自足的农牧经济也将产生分化瓦解的作用。然而,对商业行为不论是法律上的限制还是道德上的谴责,都不能抵消商品货币关系强劲的侵蚀作用。因此,即便是自然经济时期,我们一方面仍将看到商品货币关系的稳步发展,尽管有周折;另一方面则是商品货币关系的恶性表现,如统治阶级的贪求无厌、官吏的贪污受贿,甚至神圣的教会、教皇,也抵御不住物质财富的诱惑。这些情况,越到自然经济时期的后期就越为严重。

商品货币关系的稳步发展,必将把人类带入市场经济时期,在西欧这个特定的历史舞台上,商品经济时期最先蛹化破茧了。^① 市场经济犀利无比,它对旧世界的破坏,对新世界的营建,我们早已述及。当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当这种关系席卷了每一个人时,社会的伦理道德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在自然经济时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那么在市场经济时期,这种普遍对立则是绝对化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相互排斥,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强调个人权利,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个人独立,强调个人平等,必然最为显著地反映在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价值观中,个人利益的追逐与实现成了社会伦理道德中的最强音。这种推崇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良好的推动作用,在现代文明的建树中功不可没。不过,商品货币关系的恣肆、个人意欲的放纵,即便从最好的方面来看,也并非尽能符合社会整体的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近代文明之星在西方升起”一节。

利益,如经济危机的产生和人类居住环境的恶化;而从坏的方面看,它所引致的社会罪恶和灾难,更是史无前例,诸如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社会犯罪的剧增。

把自然经济时期的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时期的伦理道德作一对比,最重大的区别是对商品货币关系所持的态度,前者极力对之贬抑否定,后者尽量对之褒赞推崇。与此相适应,前者强调社会的和谐一致,非难个人利欲的追求;后者倡扬个人利益的实现,注重社会的多元和利益的相互制衡。这种重大区别,寻根究底,是社会经济现实的巨大变化使然。我们不能以传统来否定现实,不能用自然经济时期的社会伦理来衡量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伦理,不能把二者的不合说成是市场经济时期社会伦理道德的颓败。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个人利益的片面强调、社会和谐统一的忽略,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致命伤。

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一方面既是文明社会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罪恶的渊藪,传统的自然经济时期的社会伦理对前一方面缺乏明确的认识,对后一方面却保持高度的警惕;现代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伦理(主要指资本主义的伦理)对前一方面有直觉的感知,对后一方面却抱有轻蔑的态度。换句话说,就人们对财富的个人追求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来说,传统的社会伦理则断然否定,现代的社会伦理断然肯定,这虽然可以说是当时的情势使然,但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二者未免失之偏颇。

在“同源异类的善与恶”一节中,我们对善与恶作了这样的定义:当一个社会较多较好地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一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更趋于和谐与统一(并非不包含对立),这就是善;反之则是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既要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的聪

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又要坚持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和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中,既要肯定传统伦理中强调社会利益、团体利益的思想,又要肯定现代伦理中强调个人权利的思想。这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二者谐调起来,使之达到对立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重新,必须在传统和现实的伦理之间搭起桥梁,并且超越其二者。

鉴于我们过去在社会伦理方面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的实现,当务之急应该在伦理道德上强调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这有点“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具体地说,我们应该鼓励人们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实现个人利益,树立相应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勤劳致富、合法赢利、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纳税光荣、童叟无欺等等。在鼓励人们公正地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提倡这样一些社会伦理,诸如奉献爱心、共同致富、热爱祖国、振兴中华、见义勇为、扶危济困之属。另外,一些传统的中华伦理也可继承,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老爱幼、恤寡抚贫、先忧后乐、舍身取义、大义灭亲、博施广济等。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还可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社会伦理,如职业道德、行业的行为规范;而对国家公务员,应该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科学预见,这段意蕴深远的话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再次把它摘引于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

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 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原理,这一原理用于说明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的、事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大家都知道,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不是通常意义所理解的对旧事物的完全抛弃,而是指扬弃旧事物中过时的、不合理的成分,保留或继承其中合理的内容。这种“否定的否定”包含三个环节,即正题、反题、合题,又称为三段式。反题是对正题的否定,合题又是对反题的否定,因此是否定的否定。在合题阶段,既扬弃了正题和反题中不合理的部分,又肯定和保留了其中合理的内涵,这时仿佛出现了向正题的回归,但实质上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使事物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具体到马克思所举的例证中,资本主义以前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正题,资本主义的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反题,在未来社会中劳动者在协同劳动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是合题。在正、反、合这三个阶段中,合理的内涵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或个人占有。马克思以历史与辩证逻辑的统一,向我们昭示了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个人所有制的重新建立。

我们在“文明的基石”一章中曾经说明,文明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二重属性——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物质属性由生产力的物质技术水平及其运动的方式决定,社会属性则由商品交换出现后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所决定。物质属性随生产力水平的变化,或是私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32页。

有,或是公有;而社会属性到迄今为止则都表现为私有。^①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生产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生产是分散的、小规模、孤立地进行的,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物质属性表现为私有,这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属性的私有化是相吻合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的大生产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物质属性应该是公有,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属性则仍是私有,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深刻地洞见了这个矛盾,并认为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于是,从这种认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过,恩格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属性的私有化性质缺乏认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仍具有合理性,便大胆地为未来社会的公有制画出了蓝图。马克思的思想要深邃得多,他从所有制的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已经感受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化或个体化的合理性质,从而提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令后人争论不休的科学预见。

按照辩证逻辑的推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小生产的、劳动者自己占有的私有制的否定,劳动者个体的私有制被资本家个人的私有制所取代。在未来社会的所有制中,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被保留,但不是资本家个人的占有,而是劳动者个人的占有;劳动者个人的占有,又不是分散的小生产的物质基础上的占有,而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占有。因此,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既不同于小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者个人的私有制,又不同于社会大生产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包含了二者又不同于二者的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这就是否定的否定。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中“所有制迷宫的两扇大门”一节。

马克思对个人所有制没有更多的论述,这是一个遗憾,但是,这种理论上的疏阔,被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和丰富了。从正的方面看,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就是“个人所有制”在现实中的预演。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中,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以及生产队原有的一些集体资产,都已量化到劳动者个人,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获得了土地几十年不变的经营权,实现了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同时,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集体有权每隔一段时期对土地的经营权重新划分,有权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进行干预,对一些大型的需要联合劳动和共同投资的经营活动,集体仍担负着协调和管理的职能。这种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的紧密结合,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吗?这种形式或许不是那么理论化,但却有实实在在的功效。

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反面证明了,国企不实现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就不可能走出国企改革僵局。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中分别谈到,不论是中国的国企改革还是苏联东欧的国企改革,由于没有在国家所有制上实现根本性的突破,或者使改革陷入困境,或者促成了社会主义的解体。最近几年来,实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了我国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并且特别强调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从字面上看,这确实抓到了所有制问题的关键,但是,在理论上仍未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国家或集体直接或间接地掌握和控制公有资产这一传统思维;在实践上,对国有企业直接干预和揩屁股的政府行为更是屡禁不止,欲罢不能。即使在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内,形同虚设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任命的董事长和经理、缺乏相互监督互相制约的内在机制等等,这些由国

家控股必然引致的种种弊端,恐怕会使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新生儿过早地夭折;更不要说利用股份制改制来转嫁国企的负担,利用股票的发行来大捞个人的好处这些非法性的侵害了。可以这么说,国有资产只要不实现个人所有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人们漠不关心的对象,同时又是人们侵吞蚕食、肢解剥离的待罪羔羊。

实现国有资产的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前所未有的事业。我们虽然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人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为我们实现个人所有制起到了成功的先导作用,但除了它尚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说,在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上,它仍处于分散的、小生产的阶段。因此,在大部分意义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难以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国有资产实现个人所有制取法的榜样。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并逐步完善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屡试不爽。它的资本量化、产权明晰、配置优越、管理科学、规模宏大等方面,为我们建立国资的个人所有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股份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完全分离(尽管某些劳动者也可能持有本企业的股票,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少数大股东对企业事务的垄断性支配;企业利益超越于社会利益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如此等等加剧社会对立的弊端,则是个人所有制应该避免和可以避免的。

国有资产的个人所有制,它不同于小生产基础上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同于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既包含了农村承包制中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直接占有这一合理内涵,又包含了股份制中个人对生产资料既联合又分散的占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在协作劳动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目前,我国一些中小型企业试行的股份合作制,可以看作建立个人所有制的一种有

益尝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我们应尽快地对这些试验和经验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总结,逐步完善为一套行之有效的新的企业制度,并试之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中。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个人所有制的建立提出更具体的设想,更不能确定其实现的时间表。如果我们的设想越具体,陷入空想的可能就越大。在大的方向确定后,个人所有制的实现,主要不是理论上的辩难,而是实践中的开拓。

把国有资产量化到劳动者个人,实现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总在说,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但是,在传统的公有制经济中,有多少劳动者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翁?又有多少劳动者在承担和执行主人的职能?其回答是否定的。只有实行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才能使劳动者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才能使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切实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如日中天,对公有制经济已经形成分进合击之势。在国有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总体氛围下,虽然有关方面警惕性极高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叫国有资产的流失与消失,但主观性的愿望仍然改变不了客观性的现实。如果国有资产的所有继续保持国家直接掌控的传统模式,那么国有资产的丧失殆尽,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危言耸听。反之,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形式,既可抵遏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彻底侵蚀,又能真正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其超越于个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综合优势,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

专制与民主之再否定

专制与民主,几乎成了人类文明社会政治体制中永恒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变迁,专制政体正在一曲曲挽歌声中步入坟墓,而民主政体的上空,似乎是一片蓝天,人们畅想民主的天堂,那里可以自由翱翔。果真是那样美妙吗?

在我们的论说中,已把人们通常所说的专制说成专治,并以中国的封建专治为蓝本,极言专治的合理性。在任何政治制度中,权力的行使都是核心,为此我们对权力的原本含义作了正面的解说,指出权力就是依据一定的制度,针对人们之间存在的对立、矛盾或冲突,进行辨别、调衡、仲裁直至强令其执行,目的在于排难解纷,调和衷济,使社会生活得以平稳地运行。因此,权力的行使是中正公允的。权力的运用要做到公正不偏,执掌权力的人就必须超脱于人们的对立之上,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个人的私利,了解人民的欲情喜好,体察人民的利害祸福,教导人民遵循正道。但是,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侵蚀,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贪欲和人们之间作为私有者存在的普遍对立,使权力的蜕变具有自发性,而当权力缺乏制衡时,权力的蜕变就成必然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正符合洛克关于专制的定义,专治也就变成了专制。^①

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封建专制的直接对立物,慷慨激昂地走上历史舞台,然而,在慷慨激昂的民主言词背后,涌动的是个人的私欲,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下面,集合的是一群为了自身利益可以无所不为的第三等级。民主政体也不像人们所吹嘘的那样,是人类智慧的天才闪现,更多的还是社会经济条件使然。我们说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产生民主的天然

^① 详细的论证参见本书第三章“专治”一节。

土壤,自治城市的存在是孕育民主的温床,而人们之间作为商品私有者普遍存在的平等互利关系才是民主的内核。应该承认,现代民主政治所崇尚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促成了社会的普遍进步;民主政体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制衡,较为有效地防止了权力的腐败;这些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过于强调个人利益必然加剧个人对立和社会对立,以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个人自由和社会规范的冲突,成了现代民主的痼疾。^①

民主成为一种时代浪潮,在苏联东欧解体以后,更是排空而来,直有吞卷世界之势。可是,人们似乎没有分清楚,资本主义的成功到底是商品经济的成功还是民主政体的成功,二者虽有联系且有互动关系,毕竟还是有主次之别。人们似乎更没有弄清楚的是,民主政体的炫耀只是一时的辉煌,还是人类社会永世的选择。在人们对民主的普遍迷信中,我们再来揭揭民主的伤疤。

现代民主是以商品经济时期人们作为商品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为基础的,在这种对立中,人们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最好的折衷办法是实行对等互利的原则,这种对等互利的原则,实际上是人们作为商品私有者普遍对立的结果。当人们在政治上高叫“自由、平等、博爱”时,其真实的意蕴是我个人的自由,我个人的平等,人们对我个人的博爱。但是,在人们之间普遍对立的社会现实中,要实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其实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从这一现实出发,熊彼特认为古典民主学说中所标榜的“共同的幸福”、“人民的意志”并不存在,因而他给民主下了一个平实的定义:“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民主”一节。

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① 据亨廷顿的说法,在二战以后经过长期的辩论,熊彼特关于民主的定义占了上风,古典学派的民主概念只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其信奉者越来越少。民主成了一个常识之词,而不是“溢美”之词。^②

从古典学派对民主的溢美之词到熊彼特程序化的民主概念,可见西方人对民主的认识是深化了;从西方国家挥舞民主的大棒到国内某些人对西方民主的随声附和,又让人怀疑世人是否对民主的真实底蕴有了深刻的体会。以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为标的的现代民主,至少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必然趋势。

1. 个人主义泛滥成灾。崇尚个人自由,鼓吹个人利益的追逐,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是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我们反复说过,在人与人之间普遍对立的前提下,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一方面表现为善,另一方面表现为恶;个人利益的实现,有时会促进社会利益,有时又与社会利益相冲突。个人主义的自由放纵,即使从好的方面来看,也曾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上,亚当·斯密所说的人们追逐个人利益最终将增进社会利益,经验证明这只有相对的意义,经济危机一到来,个人利益的追逐适成为社会利益的祸根;政治上,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确保,是公共权力腐败的防腐剂,然而却引致公共权力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蜕变(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详谈);文化上,自我的恣情发挥,虽然带来了百花争妍的迷人外表,最终却难

① 见熊彼特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33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 参见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4—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免享乐主义的放浪和空虚。^①在坏的方面,问题就严重得多,个人主义的恣睢,正是西方社会诸多社会阴暗面的策源地。暴力犯罪的激增、黑社会的猖獗、伦理道德的毁败、家庭关系的破裂、性关系的迷乱、人际关系的冷漠、社会治安的恶化……都可以和个人主义的泛滥挂起勾来。客观地讲,这些社会问题,并非是西方社会的专利,但是,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社会公民,自我冲动肯定会有较为恶劣的表现;由这种社会价值观衍生而出的法律法规,又多有迹近纵容的宽松;社会伦理在个人主义的冲刷下,愈来愈丧失道德约束的功能;这几者加在一起,从而使这些社会问题在民主体制中显得更为暴烈。^②

2. 社会利益的畸型化。个人主义的泛滥并不能抵消社会利益的存在,相反,个人利益越放肆,对社会利益的需要就越迫切;个人主义泛滥所引致的社会恶果,往往是用社会利益这只手来消弥的。最明显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二战前后西方民主国家社会政策的改变。粗略地划分,二战以前,经济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使经济危机每隔10年便来一次;到了1929年毁灭性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才省悟到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足以致资本主义于死地,于是改用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社会福

① 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这一点表现出最深的忧虑,他自称是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崇尚传统,对文化上的现代主义持否定的态度。

② 丹尼尔·贝尔写到:“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美国最大的困难在于:它在气质上过于个人主义化,在趣味和爱好上过于资产阶级化,而它却从未完全全地学会依靠集体解决问题的艺术,或者说,它从未真正地学会欣然接受公众利益至上的主张,以反对个人的利益。最后,我想郑重说明,美国——或者任何民主体——恰当地处理它自身问题的能力将取决于它的政治体系能否实现‘公共家庭’的某些概念。”引自《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75页。

利、计划调控、扩大需求等有助于社会利益实现的政策,以此来消解经济领域中个人主义盲目冲动而造成的恶果。这种政策改变,带来了二战以后一个时期的稳定和繁荣。但是,正当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自诩这是民主的成功之时,民主的危机又已悄然到来。^①

在西方政治学中,对社会利益的认识有一个误区,认为社会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当个人利益的追逐所造成的肿瘤用社会利益来抚平时,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在个人利益纷然对立的世界中,社会利益不可能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社会利益应该只是用来保护和促进个人利益善的实现,而不是用来姑息和纵容个人利益恶的发展。在现代民主体制中,社会利益一古脑儿被用来平息个人利益膨胀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社会犯罪用加强警力来防止,失业破产可以领取救济金,单亲家庭有额外的补助,同性恋能够寻求法律的保护,种族平等转化为求职上的硬性摊派……结果,个人和集团对社会的要求越来越多,而愿意承担的责任义务越来越少,社会利益不只是被用来促进善,也间接地助长了恶。^② 我把这称之为社会利益的畸型化。亨廷顿他们惊呼民主的危机时,难道就没有看出,政府的过重负荷不就是个人主义泛滥的直接结果吗?

3. 权力蜕变的新形式。在《民主的危机》中谈得最多的是民主国家统治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政府权威的衰落。我们

^① 参见克罗齐、亨廷顿、绵贯让治合著:《民主的危机》,第五章,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相反,我们想方设法把自己不愿承担的担子转嫁给别人。从来没有哪个社会主张其成员不负有任何义务,而我们却在日甚一日地主张我们是‘权利人’,有权领受这个那个,不断提高的期望像一切革命一样,很快地导致了一个权利人的社会。”见萨托利:《民主新论》,第459页。

曾经谈到,民主政体有效地实现了权力的制衡,防止了权力的腐败,这是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但是,民主政治是否又导致了权力另一种形式上的蜕变?《民主的危机》一书中的答复是肯定的,只是把它说成是权威的衰落,而没有说成是权力的蜕变;另外,对其成因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权力的正确含义是公正不偏,适度调衡。^①在现代的意义上,权力是保证和促进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正当实现的强制力量,而不是无原则地迁就个人利益和被歪曲的社会利益。在民主政治的实际操作中,权力的来源是人民的选举。为了竞取权力必须赢得足够多的选票,而为了竞选又必需大量的经费支持,因此,在竞选中尤其在执政后,权力的执掌者迎合民众的意愿和满足利益集团的要求,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这种总的情势下,人们对社会和政府的要求可能是不知厌足的,而政府对这些要求只能穷于应付,这当然可以被用来标榜人民主权的伟大,但同时又不能不说这是政府权威的软弱;当公众的利益不能统一时(在人们的普遍对立中这是经常发生的),往往引致政府权威的进退失据;更让人不能控制的是,只要公众的个人利益急剧地倒向一边,而这种个人利益又非正当地实现时,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出现希特勒执政的那种民主悲剧(可别忘记,德意法西斯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在一般情况下,会出现滞胀这种由于社会福利等各项开支膨胀而产生的社会病症。总之,权力在民主政体中必须凌驾于各种社会对立之上,否则便难以做到中正不倚、公正不阿,而往往成为群众的尾巴,摇来摆去,以致一方面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婢女,另一方面理应遭到人们的轻视,从而导致权力的公正性、权威性的消失。这就是公共权力在另一种形式上的蜕变。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还权力以本来面目”小节。

对中国封建专制和西方现代民主的内在精神的简要回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关于权力及其行使的精深理解,以及崇尚社会和谐和国家统一的政治施为。然而,权力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转化为腐败是一种必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在特定的时期容易构成对个人自由的压抑。西方现代民主的精粹在于对公共权力的制衡以及个性自由的解放,这正好是专制统治的克星。但是,个人主义的泛滥和公共权力的衰落,为民主政体落下了难于治愈的病根。如果让我们来选择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否应该在否定专制与民主的缺憾的同时肯定和继承其中的精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以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为基础,建立一个既能对公共权力有效制衡又能保证权力的公正行使、既能促进个人自由善的发挥又能抑制个人自由恶的增长的新体制。

只要我们开始行动,道路是可以走出来的。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8

SS□ ⇒ 10471293

DX□ =

□ □ □ □ ⇒ 2000□ 10□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